

为什么在挪威社会民主党显示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恢复力的同时，瑞典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领导权和前进的方向？丹麦反对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背景是什么？在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

前景怎样？英国工党应当接受选举改革吗？什么力量把法国社会党从胜利驱赶到了灾难之中？

意大利左派为什么没有能执非基督教民主党联合之后形成的政治使命？欧洲左派为什么没有能执非基督教民主党联合之后形成的政治使命？

西方 左派 图绘

〔英〕佩里·安德森
张亮 吴勇立 译

帕屈克·卡米勒 主编

从挪威到法国，从丹麦到英国，从瑞典到意大利，欧洲各国对于国内政治战略都已经有当这个核心问题被解决之后，西欧左派能获得新的轮廓线。

现代政治译丛

西方 左派 图绘

(英)佩里·安德森 帕屈克·卡米勒 主编
张亮 吴勇立 译



"200098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左派图绘 / (英)安德森, (英)卡米勒主编;
张亮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12
(现代政治译丛/吴源主编)
ISBN 7-214-03039-X

I. 西... II. ①安... ②卡... ③张... III. 左派 -
概况 - 西欧 IV. D0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7274 号

书 名 西方左派图绘
主 编 [英]佩里·安德森 帕屈克·卡米勒
译 者 张 亮 吴勇立
责任编辑 汪意云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盐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页 2
字 数 257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39-X/D·479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Copyright © 1994 by Perry Anderson and Patrick Camill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1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导 论	1
一 黄金时代之后的瑞典	28
二 模式转换中的挪威	62
三 丹麦：田园时代的终结？	87
四 德国：左派的停滞	115
五 英国：劳工和选举改革	147
六 法国：胜利和悲剧	178
七 意大利：新的议程	213
八 西班牙：社会主义的幸存？	265
注 释	305
译者附记	330

导 论

佩里·安德森

西欧的社会民主党素来拥有一派温文尔雅的形象。国际上社会党各政党似乎一直具有稳固的战后景观和实施相当平淡的政治改良的载体。后者虽然并不总是那么行之有效,可却特别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政治地震近来已经为这种形象树起了一面令人惊惧的镜子。1993年2月,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80年代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曾两次出任政府总理——在指控他腐败的强大压力下辞职。他目前正流亡突尼斯以逃避逮捕。1993年5月,法国总理、社会党人皮埃尔·贝雷戈瓦(Pierre Bérégory)在五一劳动节饮弹自尽,原因是他的私人财政问题受到新闻界的质疑并且对该党在大选中的惨败感到失望。两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恩霍尔姆(Bjorn Engholm)承认,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基督教民主党的竞争对手为什么衰落这个问题上,他撒了谎。然后,他辞职,稍后自杀。下一个月里,德国最强大的冶金工会的领导人、秘书长弗兰茨·斯泰因库勒(Franz Steikühler),因泄露了他担任董事会劳工代表的公司的内部商业机密而被迫辞职。同一时期,西班牙反对菲利普·冈萨雷斯(Felipe González)政府普遍腐败现象的谴责达到顶峰。结果,1994年春,它的两名高官——中央银行和国民警卫队的



首脑——因非法致富而被起诉。一个身陷囹圄,另一个在逃。英国的工党——与它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兄弟党派不同——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掌权了,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可这里也不得安宁。工党最重要的新闻赞助商和捐款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前工党党员,他对《镜报》帝国的操控实际上是经过工党领导集团批准的——在英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诈骗案败露之后,从一艘豪华游艇上投海自尽。

轰动一时的事件已成过去。但是,90年代这一横扫西欧社会民主党的丑闻大洪水,并不必然地构成观测其未来的正确向导。当然,五个欧盟主要国家同时发生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全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使人想到的,是存在于西欧重要左派组织的形象中的更加广泛的道德危机。在过去,要整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全以一种声音说话,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欧洲的西半部在传统上被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区域。^①历史地看,第二国际的群众性政党崛起于北方诸国。在这一区域里,要么存在以重工业较大规模集中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要么存在愿意与工人结盟的小农场主阶级(斯堪的纳维亚),经典的社会民主党在此扎下了根。群众性政党、强大的工会和早期的选举优势,标示出了这种北方改良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曾有过执政经验,可不管怎样,直到二战之后,它才在整个区域里成为一支常设的统治力量。正是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才在没有什么重要的左派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攫取政权。许多国家(英国和奥地利最为重要)实现了对精选出来的工业企业的国有化,但公有制并不是它们的首要目标。北方社会民主党最纯正的特征莫过于以充分就业和广泛的社会保障为内容的福利国家的建

设。它们的实现形式和实施范围随着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过，人们很少将这些成果仅仅归功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创。然而，这些政党所取得的政治成功，却总是建立在由这两项成就而获得公众支持的能力之上的。如此创生出来的政治支持被证明是累进性的。因此，不是在 50 年代或 60 年代早期，而是在 70 年代早期，作为一个整体，北方社会民主党的好运方才如日中天。1974 - 1975 年间，社会民主党获得了战后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全面胜利。那时候，它包揽了整个区域所有国家的总理之职：英国、西德、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

一旦这种政治颠峰状态或多或少地被达及，物极必反，支撑北方改良主义获得成功的那些经济条件就开始悄然退场了。70 年代中叶，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通货膨胀率不断加速上升，失业率居高不下。很清楚，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进入长期衰退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关头，社会民主党缺乏的不仅是应战危机的有效政策。当复活了的货币主义意识形态拣选过度的国家开支和过于强大的工会作为滞胀的关键原因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突然发现自己正与这种滞胀相关联。结果，社会民主党曾经驾驭的舆论掀起了一轮反对福利政策的浪潮，它促使该地区的右派政府全面上台。以 1979 年英国撒切尔政权的大选胜利为起点，运动波及西德和低地三国*，尤其不寻常的是，它还蔓延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在这些年里，只有奥地利和瑞典抵制住了这一趋势。80 年代的统治模式因此非常清晰。面对重新获得生机的右派对其战后优良政绩的全面攻击，北欧左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

南欧左派的成长走的是一条相当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法

*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注

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工业化过程总的来说进行得不够彻底或较迟，所以，在落后的农业文明背景上，宗教神职人员和封建领主的影响通常还比较强大。在第二国际的鼎盛时期，无政府的工联主义是这里的主流；在两次大战之间，第三国际成为劳工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到1945年它则创立了共产党。如果说较之于北方左派，南方左派在政治上更激进的话，那么，它在组织上则要薄弱一些。在这些现代化程度较低的社会里，战后政治力量的天平绝大部分时间里总是明显地倒向右派。在冷战开始之后的30年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霸权一直牢不可破。在法国，戴高乐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确保稳固的保守统治达20年之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裁政权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到了60年代，希腊的文官政府才执掌政权。时过境迁，长期的经济繁荣也在地中海地区产生了效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逐步侵蚀了统治秩序的基础。70年代后半叶，佛朗哥(Franco)、萨拉查(Salazar)和帕帕佐普洛斯(Papadopoulos)政权最终倾覆。在法国，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维持戴高乐传统的政策连续性的能力显而易见地正在下降。而在意大利，安德烈奥蒂(Andreotti)为了扩大议会支持不得不与意大利共产党(PCI)进行非正式磋商。

作为长期未被承认的政治选择的承担者，迟到的政治秩序的自由化为左派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机遇。在这三国中，权力更迭由于采取了抚慰性的君主立宪制而保持了与苏联相反的西方传统，共产党试图把自己定位为这一权力转换过程之自然的候选人。但是，欧洲共产党适应新形势的尝试到处都未能奏效。我们不难发现，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所有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都是按照第三国际的标准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不得不面对来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手的竞争。后者虽然在起点上更加脆弱，但较之于前者，其发展态势则要强劲得多，因为它没有国际

官僚机构和在与东欧政权的外部联系中形成的其他类似障碍。由于这些欧洲社会主义组织——社会党(PS)、意大利社会党(PSOE)、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I)——的兴起并突入国家政治舞台的核心,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迅即招致挫败。在葡萄牙和希腊,共产党虽然还没有重建,可结果却是一样的:葡萄牙社会党(PSP)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迅速超过它们,而后者完全是一个新兴产物。

当国家权力最终易手的时候,受益者因此不是革新了的共产党,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后政治角色的倒转中,就像北欧向右转一样,南欧向左转了。80年代初,密特朗成为法国总统;冈萨雷斯、克拉克西、帕潘德里欧(Papandreou)和苏亚雷斯(Soares)分别成为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总理。这些政府的构成极不统一。在法国、西班牙和希腊,社会党占据议会的明显多数席位,而在意大利和葡萄牙,社会党则只是执政联盟的领导者。欧洲社会党起初寻求的政策也不完全一致。法国人着手实施了一个关于国有化、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控制通货膨胀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除了希腊的较小范围之外,这在其他任何地方还没有相应的尝试。西班牙一开始就寻求传统的经济政策,意大利同样如此。不过,到了这个世代的末期,一般资产负债表的科目就已经很醒目了。南方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再生产出原先那种北方模式,即与强大的工会运动连接在一起的大规模的劳动阶级政党。它的领导集团典型地由一些能上不能下的职业政治家构成,相应地存在一个异质性更强的选民阵营,和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是上升而是跌落的工会。它也不能重复北方在战后所创造的充分就业的辉煌:整个80年代,该地区的失业人数一直居高不下。社会党执政时间最长的西班牙拥有欧洲失业人数的最高记录。

另一方面,即使不是福利国家政策的主要创造或全部,其中

温和的社会改良措施也还是被象征性地引入了。由此虽然带来了一些城市现代化,可是,那里的法律体系还是陈旧的,民主程序依旧得不到保障。这些政府的所有举措无不紧密地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制约。来自国际市场的相同压力在北方导致右派上台,而在南方则成为左派用以抑制任何过激冲动的理由。一旦法国克服周期性通货膨胀的最初努力在 1982 - 1983 年遭受挫败,绝大多数的欧洲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就简单地在全球经济的大潮中随波逐流了。在这 10 年的后 5 年里,它成为里根赤字经济政策掀起的投机狂热的被动受益者。这一政策在较为成功的选民阶层中鼓吹高消费,而对穷人和失业者却几乎什么也没做。在意大利,这一模式由于在克拉克西执政期间带来了似乎无法遏止的繁荣而得到广泛赞同,在西班牙第二届冈萨雷斯政府执政期间,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这一与福利改良主义的经典模式相去甚远的、社会民主主义南方版本的实行——它因为法国、西班牙和希腊,以及相对提前的意大利重新选举而得到确认——却依旧得到维护,以弥补 80 年代运动在北方遭受的失败。在西欧的政治均势中,瑞典社会民主工党(SAP)的幸存统治抵制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Ö)的联合执政也理应被算在内。政治全景应当说是混杂的,但也不是漆黑一片。事实上,它是这些年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发生的相对重大的综合作用的一个后果。在“社会民主党的终结?”一文中,沃尔夫冈·梅克尔(Wolfgang Merkel)以令人叹服的细致,追踪了西欧 16 个主要国家社会民主党直至 1990 年的运作情况。对这一问题之新兴的政治学研究目前正处于最佳状态,然而,梅克尔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作品,它还包含一个深思熟虑的争辩。^②形形色色的批评家——新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宏观调控理论家以及合理选择分析论者——从不同

角度都提出：社会民主党已经历史地处于衰落之中。在与他们的论争中，梅克尔以统计学的精确性说明：与 1945 - 1973 年这一阶段相比，作为一个整体，欧洲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在选举力量上还是在政府权力上都没有遭受损失。就其发生而言，他坚信，政策的退却被夸大了。出于对改良理想冷静而忠诚的信仰，梅克尔以一个乐观主义的注释结束了他的著作。不管条件怎样变化，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相当成功地抵御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当一个“超越市场的宏观调控新需求”出现的时候，它没有理由不重新繁荣。

对于一个忠诚而谨慎的观察家来说，情形只要看看 1990 年的资产负债表就行了。其后的结果对它并不友善。在北方，瑞典走“第三条道路”的尝试彻底失败了；自 20 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于 1991 年第一次下野，并把政权移交给了保守党领导的政府，到 1994 年夏季，国内失业人数达到劳动力总数的 14%，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最高记录之一。在南方，法国社会党在 1993 年的大选中一败涂地，这使右派获得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最大份额的议会多数。在意大利，意大利社会党 (PSI)——曾经是联合执政的核心——已经被淘汰出局。在 1994 年春天的大选中，它甚至连一个众议员席位都没有捞着，这使一个更加激进的右派联合政府掌了权，近来，它中间大多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几个月后的欧洲大选为整个欧盟范围内的左派境况拍了一幅凄凉的快照。在西班牙，社会党被它保守的对手们第一次彻底打败了。在法国，社会党的得票跌至不足选民的六分之一，这迫使作为党的领导者的米歇尔·罗卡尔 (Michel Rocard) 辞职。在意大利，左派之最大的残余部分，即新近改宗的社会民主党 (PDS)——从前的共产党人如今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得票缩减至不到选民人数的十五分之一，迫使奥其多 (Achille Occhetto) 辞职。在德国，经历了科尔 (Kohl)

12年统治之后,社会民主党(SPD)的得票跌至5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只是在英国,工党赢得议会多数,作为传统的左派政党取得了胜利。但是,投票结果如此之低——几乎不足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以至不能为未来提供什么可靠保障。较之80年代末期的结果,90年代中叶之后的统计学令人更加难以感到欣慰。此时,南欧已经急剧向右转,而北欧左派却没有做出什么令人宽慰的收复失地的举措来。

国家的选举周而复始。存在于西欧国家间的种种差异促使大选不可能完全同时地进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政府仍将存在下去——例如写作该文期间的挪威、丹麦、奥地利、西班牙和希腊,而且它们将赢得未来的大选。同样的情形无疑将很快在瑞典发生。但是,一个根本性的路线危机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乐观的评论家认为东欧共产党的垮台所强化的东西将能使社会民主党振作起来,但是,危机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它依旧要证明温和的体制改良就是它相反的历史选择。结果,市场意识形态在东方取得了如此彻底的胜利,以致它反弹回来反对西方任何实行经济调控和社会福利的国家。这一后果将持续多长时间现在还很难说。可它目前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它是在西欧不得不从战后最恶劣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发生的。如今,群众性失业已经不仅仅是远高于美国或日本的水平的问题了,它实际上比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还要高,而且没有任何长期改善的前景。^③西欧现在大约有2000万人失业,这超过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人口总数。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病的治疗方案,社会民主主义的吸引力根本没有得到巩固,相反,为自己原初的存在理由提供了那么多证明的灾难的复归进一步削弱了它。它曾经是抵制广泛失业计划的主要勇士,但是,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商业周期所带来的失业大潮的稳定上涨,它现在似乎退化为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社会民主党可能没有

终结。可是,谁能怀疑它现在正处于僵局之中呢?

历史地看,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左边始终存在着其他政治力量,为首的当然就是共产党。今天,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那从十月革命传承下来的政治血统的理论基础差不多已经消失殆尽了。意大利曾经存在过西欧最宏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如今,它已经衰变成一个小得多的社会民主党了。它阵容稳健,取代了意大利社会党的位置。别处的共产主义传统则坚持过着一种不可靠的暮年生活。有代表性的是,较之于社会党国际,它仍然聚集了一小部分选民,更加激进地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安排。这些党派与正统教义和原则断绝联系的程度,变化极大。瑞典共产党是一个极端,它早在70年代就进行民主化改革,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开放的左派政党。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则是另一个极端,它们的面貌大致未变。除了严重的内部分歧之外,法国共产党和它的前身很相像,只不过尺寸有些缩小罢了。同时,西班牙共产党在联合左派联盟的范围里重构了自己的形象。意大利共产党并没有全部融入社会民主党之中,而是在“重组”中留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余部。即使是在德国,共产主义传统也在东部群众的抵抗中得以幸存。所有这些党派目前的得票率都在选民人数的5%~10%之间。它们的全部选民人数都比绿党的人数多,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只有左翼社会民主党方才可与之匹敌。在丹麦或挪威这样的地方,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左翼社会党在对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内部反抗中诞生,它们把自己建设成了具有持久的政治特征的党派。在政治选择中,当最低限度的平等的代表权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另一个超越社会党国际边界的左派就出现了。在西欧这个整体中,这是一个普遍惯例。但不管怎样,它在哪里都没有机会单独组阁,它惟一的执政希望就是与一个强势的社会民主党结盟。对于后里根时代的资本主义,它持有更加尖锐的反对意见,



可它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并不比以往更丰富。至少是现在,这一政治领域的存在对于缓和左派的纲领性困境作用甚微。

在这些条件下,很清楚,我们需要对近年来的经验进行比较反思。这卷文献所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盘点。它的原文是10多年来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新左派评论》是一个在英国出版的杂志,但它却拥有国际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作为对英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传统的反拨,它较早对西欧左派的多样性产生了兴趣。就切入主题的问题而言,本书在已经存在的大量方式中标示出了一种新的路径。传统上,研究欧洲左派的文献容易落入两个窠臼:一个是对北方经典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一个是对南方共产党或——近年来的——欧洲社会党的研究。这种划分曾经很有道理,但在今天,它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梅克尔的比较测定,以对贯穿半个大陆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选举和“权力商数”(power quotients)的定性分析克服了它的不足。虽然梅克尔对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运作的真实报道常常是尖锐的,可还是存有太多的选择性。但在这里,有代表性的区域平衡已经得到关注,它第一次试图给予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北方、盎格鲁-德意志的中部和说拉丁语的南方以平等的注意。结果并非无一遗漏。像芬兰、冰岛、奥地利、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这样存在于三大板块边缘的国家就被省略了。低地国家和瑞士这样的宗教和语言的马塞克同样也被忽略了。优先权被给予了这三个西欧资本主义板块中的主要国家。

这些论文的第二个显著特点在于它们聚焦所要观察的国家案例的独特方式。当下研究政党或政治运动的最严肃的著作莫过于现代政治学作品了,它专门从事定量分析和相互关联的统计学分析。这种分析模式对于理解选举制度、投票模式和联盟原则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对社会的长期动力学机制和意识形态

冲突的关注则相对较弱。这些论文不是要丢掉前者所提供的洞见,而是要在前者的基础上,典型性地寻找重建这些国家的左派的发展道路,并适时地给予深入的历史叙述。在丹麦和挪威的个案中,整个社会对海外情况所知甚少,国家的政治图景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更加普遍的是,当下制度规则的起点——瑞典的福利国家、意大利的“解放”、德国的“冷战”、法国的第五共和国——其实已经为理解自身提供了一种切合实际的出发点。但历史并没有在这些描述中被赋予一种必然性的烙印。政党被理解为一个进行自由选择的集体行为者。历史回顾不是要把它们的发展道路归结为某一前定命运的拨弄,而是要揭露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错过的机遇和同样经常性地被避免的错误,正是这些构成了它们历史档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左派,这里的论文持有一种独立的然而又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对官方教条持批判的态度。它们差不多对某些被读者印象深刻地获得的事实都提供了一些与事实相反的思考。

同时,他们还寻找道路以贯彻葛兰西格言的精神:“从专论的角度来看,撰述一个政党的历史就是去撰写这个国家的通史。”^④由此,每一章都尝试着在当下论述的国家的全部政治力场——不仅包括右派显著的政治构架,也包括与左派的发展有关的更广泛的同盟军和敌人——中,去定位左派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一般背景中,因为每一篇论述都要强调它认定的特定国家的政治情景中最突出的特征,所以视角的转换自然非常宽广。开头论述瑞典和挪威的两章首要关注的并不是福利国家——这一外国人容易感兴趣的普通对象,而是它们战后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对此,乔纳斯·庞图森(Jonas Pontusson)、拉斯·穆塞特(Lars Mjøset)和他的同事争辩说:使这两个国家欣欣向荣的社会改良的物质条件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是,理解其中左派的命运的关键恰恰在于它的宏观经济管理。

他们所展示出来的事实和以往的一般理解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分歧。瑞典紧跟着雇佣工人基金的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暂时成功和最终失败而出现的劳动力市场调控是一种模式。挪威的“信用社会主义”(它在为石油价格所软化的自由化进程中被拆解)是另一种模式,它目前的失业状况较轻。但每一种经验的原创性都还保留着令人注目的地方。丹麦是其他地方重要发展的预报者,在这里上演的是另外一种戏剧。尼尔斯·芬·克瑞斯狄森(Niels Finn Christiansen)在这里解释说:在丹麦明显的阶级构成中,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较之于乡村的同类更加强大,这既促进了传统社会向城市化社会的重要转变,也因此由西方民粹主义右派在这里发动了反对福利国家的第一次重要的税收叛乱。在传统的工业选区和新兴的公共服务选区之间,左派阵营中都浮现出了第一条明显的分界线,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SPP)之间的对立折射出来的是下一个有前景的研究主题。

正是在德国,由这种分歧所导致的困境以最令人着迷的形式上演着。在那里,60年代晚期发生的最深刻的文化反抗和新生代反抗为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较之于社会主义人民党在丹麦的所作所为,德国的绿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官方政策采取了一种更加尖锐的对立立场。斯蒂文·派杰特(Stephen Padgett)和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追踪了那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抓住新老选民的时候日益麻痹它的张力,面对公然的“后物质主义”竞争,这种张力具有日益不同的外观,它竟然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像布里丹的驴子那样无法选择。我们清楚地看到,没有其他哪个欧洲国家,关于左派的政治和理论争论会被赢得议会多数这个战略构成问题所左右。如果相同的争论在英国出现了,那么,它们会以缓和得多的方式来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没有相对而言的政治反抗文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选

举制度的性质与众不同。后者正是彼特·迈尔(Peter Mair)为本论文集提供的作品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英语世界里,工党吸引了如此众多文献的关注,以至同样的政治基础在这里会被视之为当然接受下来,成为讨论的不需言明的前程。从1979年到1992年,工党经历了欧洲社会民主党所能忍受的最糟糕的一连串失败,它的选举厄运已经被爱娃·克瑞(Ivor Crewe)非常好地标示出来了,同时,它的政治变迁已经是乔治·爱略特(Gregory Elliott)热情洋溢的《工党政策和英国的特质》一书重新关注的对象了。^⑤在这样的语境中,重点讨论最不被人关注的东西自然更加可取,当然,决定工党政策特征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及其在英国独特的选举制度中的处境还是需要辩论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迈尔对投票制度和激进政治策略之间的关系比较分析,对左派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上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在意大利几乎是不需要强调的,因为在1993年赢得第二次全民公决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消比例代表制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选区制。历史地看,自从凡尔赛时代以来,正是欧洲的右派——以极好的理由——典型性地采取了有利于自己的不成比例的代表制度。^⑥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引入它们的第一人,贝鲁斯科尼(Berlusconi)则是现时代从中获益的第一人。在这里,选举工程是“现代化”政治这个使拉丁国家一致起来的更广泛主题的一部分。要是赋予这些社会以古希腊和罗马那样真正古朴的众多社会机制,那么,左派确立的、以交换为目的的、对选举权限的追求也就不可能诉诸现代性的理想。但是,没有一个能指会如此多变。在法国,乔治·罗斯(George Ross)和简·詹森(Jane Jenson)认为:共产党在它正当的时候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这一即使它在今天也极其依赖的传统,无疑是自取灭亡;这一放弃换回来的是共同纲领、一个以改变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界限为目的的、总的看来非

常胆大妄为的企图,它颇受欢迎,并跃跃欲试,可缺乏现实的成功机会。不过,他们也同样指出:社会党意识到了共产党的失败,因此转向了对公司和市场的过度崇拜,把它们视为实现现代化的巨神,它的转变所招致的失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西班牙几近40年的中央集权独裁专制使右派与国家的地方工业精英隔绝开来,这给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以较大自由。虽然这被迟到的劳工运动特许权延长了一些时候,但正像帕屈克·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已经清楚地说明过的那样,它在90年代也变得令人非常恼火。主要原因对上述三国都适用,但它在意大利却得到最广泛的展示。超越市场调节的、没有任何内容的现代性是一个危险的字谜,它的敌人是无所不在的腐败。在克拉克西的全盛时期,金钱腐蚀政府还是一种个别现象,所以,意大利社会党一跃成为最突出的政党的起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它适应了意大利社会的世俗化过程,而意大利共产党则为之所拒绝。如果说80年代的这一后果对意大利左派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结果就决不仅仅是意大利社会党政治生命的彻底结束,同时还应当包括意大利共产党的不体面退场。对此,陶比亚斯·阿伯瑟(Tobias Abse)争辩说:主要原因是,60年代以来,意大利共产党在创造性地回应人民群众反对旧秩序的渴望和斗争高潮问题上持续不断的无能。

宏观经济管理、社会集团、选举公正、公众和睦、文化现代性,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希望在西欧左派的议程中已经被删除的时代西欧左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它们背后现实发生的是西欧左派战略处境的双重改变。首先是选区的碎片化。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诸政党或它们的战后继承人可以在一个同质的社会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纯粹的劳工运动现在不啻是一个神话。上溯到60年代,制造业劳动阶级无论如何都是左派执政党所召集的社会联盟之富有魅力的政治核心,这一点

在南欧或北欧都一样。工业无产阶级从数量上讲是选民中最庞大的组成部分,从结构上看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从品行上讲是最独裁的。这些党派的政治领导阶层可能来自职业政治集团或知识界,它们的选民还包括从中低阶层和农民中来的部分人;当然,同时大量的工人时常也把票投给保守的党派。毫无疑问,这正是意大利理论家用劳动阶级的“向心性”这一术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即围绕左派融合成为一个力的编队。很清楚,今天的情况已不再是这样的了。^⑦在过去的20年内,当传统的农民、手工业者、店员失去了独立性,同时家庭主妇也成为劳动力的时候,雇佣劳动就普遍地扩散开来了,即使在最近出现的自我雇佣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新的例外。不过,在雇佣工人阶层内部,分工显然已经极大地发展起来了。

五条区分的轴线现在使任何以激进变革为目的的联合运动都变得更加困难。其中第一条是一个其分布模式已经转换了的老问题。较之于美国或日本,欧洲在制造业劳动和职员劳动的地位和收入问题上一直存在更重要的对立,这一点在集体组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上得到反映。今天,它们在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欧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据的比例已经倒过来了。制造业劳动阶级已经下降到从事经济活动的总人口的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平均水平,在各个地方都被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超过。即使在白领工人已经达到很高的工会组织水平、在传统上与劳工运动的客观目标相一致的地方,比如说在瑞典,他们的相对比重的客观改变也使他们与产业工人以往的协同连结变得松弛了。同时,在制造业劳动阶级内部,技术、收入和安全感的跨度也在稳步拉大。^⑧一方面,在里根时代繁荣起来的高技术部门的熟练工人,他们的物质境况从来都没有变得如此有利于生活,这对他们的投票模式留下了经常性的深刻影响,在英国,这使撒切尔获得了巨大成功。^⑨另一方面,非熟练工人和临时工——要么拼命挣

扎,要么长期失业——的数量膨胀起来了。在两者之间,经典的手工制造业的半熟练操作人员在数量上还是影响上都衰减了。结果是体力劳动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同时在它的最受剥削的集团和特权集团之间爆发了不断增长的利益冲突。

如今,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都比较迟,而退休的时间也延长了,因此,另一种社会分层也就日益变得重要了。年龄现在以新的方式把雇佣劳动工人分割开来。一方面,青年期延长了,它不再是成年期迅即降下帷幕的序曲。接受学校教育较迟(或者被认为是这样)的人群和工作较早的人群现在大多融合进入一个自我包容的青年文化圈,除了政治环境高度紧张的时刻,一般说来,这个圈子中的青年人是不愿意与新生代往来的,虽然他们自己刚刚才从这一时期度过,他们同时也不太关心阶级问题或地域问题。另一方面,出生率的降低和生活费用的上涨使人口中的年长者的作用也发生了一般变化。现在成年人大约平均有三分之一的生涯是在从劳动力市场退出来以后的日子里度过的。福利国家如今已经无法抗拒地变成了这一社会群体的公共支持体系,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费花掉了整个社会开支的三分之二。^①结果是一个既是财政的也是文化的分层逻辑,它使雇佣劳动工人的第二年龄段,处于在它上面的第三年龄段的需要和下面的第一年龄段的驱迫的夹击中,因而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压力位。

如果说上述改变已经把曾经很容易聚拢的选民分散了的话,那么,劳动力的性别分化的影响就要模糊得多了。传统的左派选民团在性别问题上总是显示出有亏空。在传统信仰或家务隔绝因素的影响下,妇女中总是有比男子中更多的人去投保守党派的票。例如,两者之间的缺口曾大到使英国工党在1951—1964年间无缘问津政权的地步。女性在雇佣劳动中的稳定增长——在欧盟平均占男性劳动力的60%,在斯堪的纳维亚是

70%——被认为已经消弱了这种模式。历史性反转的标志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已经有超过男性数量的女性投票给左派了。不过，转换还是分散的和短暂的。迄今为止，由家庭妇女数量的相对下降导致的政治力量的潜在加强，可能因为男性主导的工会运动已经在调适女工数量的增加这个实际困难而被过高估计了。在西欧绝大多数地方，工资的性别差距依旧很高；即使在差距较小的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们也还在不断要求工作的性别分离。也就是说，在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的净指数不是减少了，而是上升了。

最后，西欧从传统的移民出境国向移民入境国的转变——这比其他分化因素更加臭名昭著——已经腐蚀了绝大多数国家劳动人口中的文化一致性。如果说少数民族的多样化使得它的大都市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那么，它的政治代价则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症状的不规律然而确凿无误的上涨。欧盟现在从亚洲、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移入的人口总数大约是 1300 万。德国、法国、英国、瑞典和比利时大约有 10% 的学龄儿童具有非欧洲血统。美国的经验显示，种族和民族分离的后果可能是劳工运动——当然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相互依赖运动——的提示物。劳动阶级成为反对移民的右派的蓄水池——在法国、意大利、法兰德斯*、奥地利、丹麦——是碎片化可能加剧的警告。民族身份政治学是不可能为左派提供满意的地形的。

工作、收入、安全感、年龄、性别、种族起源等等的差异如此尖锐，以至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已经无法缝合那被要求挑战既有状况的社会权力主体 (collective agencies)。选民的分化使为激进挑战进行精神动员这个任务内在地变得更加困难。但

* 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另一个因素要比这个难对付得多了。正是强化经济监管减少了左派传统政策的目标实现空间。如果说左派战后的首要功绩是福利国家体系和几乎完全就业的产物的话,那么,从根本上讲,它驾控资本主义经济以实现这些成就的手段有两个: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途径一方面是和汇率体系,另一方面是对税收的控制。在最为有利的个案中,这些途径都曾被别的途径所充补,但从来没有被企业工资协定取代过。但在80年代,这些途径中的每一个都被严重削弱了。收入政策一直是个补丁现象,当雇员对曾经强化他们的力量的国家协定和工会丧失兴趣的时候,即使在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它们也被忽视了,就更不用说英国了。不管怎样,更重要的转变已经在别的地方出现了。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所释放出来的资本国际化这股洪水,要么使通过贬值以恢复贸易平衡变得日益困难,要么使通过降低利率以刺激需求变得日益困难。而在过去,它们曾是社会民主党人危机控制的武器库中两种被频繁使用的武器。今天,投机交易的易变性,对于通货膨胀的恐惧的瞬间敏感性,都影响了这两种途径的效力。在80年代早期,法国控制通货膨胀尝试的失败经常被拿来与瑞典货币贬值的成功进行对照。但是到了80年代晚期,后者的效力也消耗殆尽了,它并不能被重复使用: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后来的贬值就是选举灾难的一个序曲。在今天的西欧,虽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案例,但一般说来,国家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损耗还是稳步地变得更加显著了。

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受资本全球化的直接影响比较小,因此,很多单个纳税人并没有选择从他们本国体系中退出——即使公司税中很高的地方税对体制回缩的反作用是易受攻击的。依照赫希曼(Hirschman)的呼声表达(expressions of voice)理论,正是国内的政治主张成为关键性的制约力量。历史地看,在绝

大多数西欧国家,税收模式已经具有一种相当强的惯性,在时间推移过程中,其令人尊敬的国家形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不过,战后30年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公共开支份额的稳步上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的总体税收水平也随之上涨了。70年代早期开始于丹麦,80年代早期在美国和英国获得胜利,由激进右派领导的税收叛乱最终遏止了这个趋势。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公共开支的严重缩减——80年代,当实际发放的津贴的比重增加得更大、还有更大数量的养老金收入者和无业者需要补贴的时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它的平均水平却实际从46%上升到48%。相反,公共借款增加了,同时税收的递减性变得更大。在刺激消费的名义下,直接的工资税削减了,但同期非直接征收的消费税却上升了。除了那些非常富裕的家庭之外,降低工资税这种最直观的税收形式的意识形态影响大大超过了它的实际后果。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就此形成。在这种舆论中,对于任何左派而言,进行税收改革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不管改革实际上是中立的还是说只不过在对既有的实际结果进行重新分配,但大多数市民还是可能觉得税收似乎增加了,确立安全的改革尺度而不导致选举自杀因此变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⑩工党在1992年的命运,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计划在1994年春季招致的最新厄运,就是对这个僵局生动的说明。财政创制权的界限灾难性地限制了左派。对新税收的厌恶使得左派到处陷于一种防守状态。

落入变换社会基础和收缩政治地平线之间的陷阱中的社会民主党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方向感。在如此变化了的条件下,经历一次突变可能吗?在第二国际创立的那些年里,它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普遍斗争之中。然后,它寻求局部改良作为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渐进步骤,最终止步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福利和充分就业。如果它现在使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缩小并

放弃充分就业,那么,它将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运动?依照它的一个最精明、最有同感的观察家的判断,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悲观主义结论,“对于危机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未来,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看,它的复合性将更强;从组织上看,它将更脆弱、更加依赖于领导人的人格;从政治和选举的角度看,它将比老的社会民主党更稳定”¹²。这决不是一句令人放心的预言,它只是为社会党国际诸党派可能具有的协同性或力量提供了一些佐证。历史地看,只有在西欧,社会民主党才是一支统治力量。其他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区域的核心,即美国和日本,并不了解它,那里的劳工从来都没有获得像西欧劳工那样的政治独立性或者政治重要性。长久以来,这些资本主义文明的替代版本似乎是反常的,人们认为它们迟早要使自己与旧世界的经典模式一致起来。而今天,两种模式针锋相对似乎更具可能性。与美国和日本的总和相比,欧盟不仅人口少,产值就更少了。这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实体其实存在于欧洲之外。这是主导性的环境,在这里,公司注册增长持续高于欧盟,在它的社会模式中,成本压力处于下降通道。在欧洲委员会——更不用说欧洲议会——的官方修辞学和越发常见的政策中,必须去竞争已经成为需要适应的一项义务。在这个逻辑中,正是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不能承受的过去的遗产,成为一个应当被剥离的反常的东西。

不过,这样一个现在被商业观念非常广泛地讨论的“剧本”,并没有像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得出社会党国际诸党派将要终结的结论:丧失的仅仅是那种曾经把它们同美国的民主党区分开来的特殊作用,而后者是一个没做任何社会点缀就直接交付给资本主义的力量。对社会民主党实质说再见,并不意味这个术语一定得消失,它或许能无限期地坚持到下一个世纪——按照达伦多夫(Dahrendorf)曾经建议的道路,¹³如果各种类型的

“自由”政党将能在西欧的许多地方幸存下来,那么,它们与上个世纪作为政治理想的自由主义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丰富的联系。当然,这种类推是允许出现差异的。从温和的进步党(丹麦或英国),经坚定的保守党(比利时或意大利),到刺耳的反动党派(奥地利),今日之自由党国际容纳了一个广泛的政党谱系。即使像社会主义今天这样,社会民主党明天也变成一国性的了,社会党国际中的诸多分化阶层也将继续把它们自己定位为左派政党。

对于许多倾向于把资本主义作为最终胜利接受下来、只愿意接受局部变动的人来说,后者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更加可取的概念——不仅历史更久些,其道德方面的损害也更小些。在其最具吸引力的一种推论中,左派被认为是一个从启蒙精神中诞生的传统,它的使命就在于在并不有利的基础上去修复随之而来的各种不平等,因为历史使得它们可以修复。⁶⁴这个“矫正”工作不需要一个关于替代社会的一般理论,但在其自身等值的元后果中,它需要接受一个作为其自身永恒制衡力量的右派。这样的洞察力——在抛弃“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保留了“左派”观念,也就是说,使“对立面”这种比喻用法的字面意义成为不必要的了——的魅力可能会增长。不仅如此,足以令人尊敬的是,它指出了自己的界限。从政治上看,“左派”和“右派”术语就像它们是不可贯穿的一样是不可逃避的。既然每一个都要从对立面那里索取自己的意义,因此,它们的价值也就总是相对的。历史学家清楚地说明,左派和右派不仅存在于工党之中,在基督教民主党、甚至是法西斯主义政党内也同样存在。一个“左派”能够在过去是极右的、现在则被认为是中间性的完全资本主义体系中幸存。但不管怎样,矫正政治学所暗示出来的逻辑隶属关系都存在于这种地形变动问题之外,就像这个术语本身的词源学所指示的那样,具有对敌人非自愿的敬意。在这种

观念中,社会结构总是按照右派的意愿被编织,左派能够做的仅仅是打倒或修补它。这个谦逊的计划似乎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志。它在许多方面都表达了社会民主党人当前的心境。但是,我们必须超越它,因为不管怎样,系统性的变革就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

社会民主党的战后政治胜利建立在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结构体制之上。它的基础是:在能够适应供需波动的一国经济范围内的充分就业这个常态;为单个收入者家庭提供社会服务,在构成这种家庭的传统家族中,一般总是由一个男性雇佣工人做主;贯穿青年期的普及教育;包含对政府负责的公共部门在内的混合经济的运行;由群众性政党和高参与率支持的议会民主的合法性。今天,战后秩序的所有这些基本要素要么黯然失色,要么处于衰落之中。两个最深刻的转变是:工作世界与家庭世界都被征服了。充分就业已经化为乌有。大约有超过2000万的欧洲人完全失业,还有更多的人在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在许多国家,只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口有专职工作。面对70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国家调控显得无能为力。同时,大部分妇女——按照国家的差异从60%到80%不等——已经摆脱家务劳动。母性已经部分地从婚姻中解放出来——在斯堪的纳维亚,有一半新生人口是非婚生育,在法国则有三分之一,而20年前,它们则分别是20%和7%。¹⁵单亲抚育的儿童数量日益增长,在今天的大伦敦地区,5个孩子中就有1个是这样的;还有更多的儿童在家庭之外被照顾:在丹麦,2岁以下儿童的母亲中有一半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有更大数量的退休人口、边缘人口、临时工和在贫困中挣扎的父母等待着社会救济,即使是新自由主义政府也发现承担如此强劲增长的福利费用是极其困难的。

在许多国家,普及教育的发展没有产生预期的成果。在知识技能的一般储存水平不断提高的现时代,教育体制宁愿资助

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的公立学校,也不愿意为私立学校提供力所能及的财政帮助。它们使所有学校过于经常地成为赤贫的角斗场,这些学校已经被曾经视之为他们的启蒙场所的中产阶级父母抛弃。被种族隔离和财政困扰造成的新的紧张关系包围的公共教育体系成为地方性不满情绪的源泉,这种情形自从在美国出现很长时间以后,在英国或法国的一些大城市也相继出现。在经济自身中,任何类型的公共事业——被打上先天不足的标记——都已经缩小了。在西欧,由撒切尔政府发动的私有化浪潮还远远没有耗尽气力。当前的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是重要的国有财产大卖场,拍卖的范围不断扩大——从采矿业、制造业到公共服务业,现在连邮政运输、税务征收这些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守夜人国家的职能也一并出让了。当权力被转移到政府的内阁会议或资本市场的额外领地的时候,最终,议会权威被削弱、选民参政热情下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政治冲突的空间已经从群众性政党转移到电视节目,从言说转移到声音信号,从政策转移到人格。

新的社会民主党对这些问题没有形成任何解答,只不过是到处适应它们而已。从传统的角度来看,30 年代以降,这就是一个倾向于从它的范围之外[从像凯恩斯(Keynes)或贝弗里奇(Beveridge)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到像魏克塞尔(Wicksell)这样的标新立异者]而非其中获得其大量指导观念的运动。昔日重来,同样的事情可能再次发生,罗尔斯(Rawls)将为他自己对未来作出有影响的预见。在它们曾经对立的各个时期,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理论有效性持续存有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照。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鼎盛期,新保守主义是重新获得政治原创性的理论和建议的动力车间,一旦权力易手,它随时都准备替补。当然,这种工作总是能够搞到经费来源的;它所制定出来的政策当然会鼓吹更加适宜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秩序。不过,即使

承认这些优势,探索动力之间的差异依旧引人注目。只是在非常晚近的时候,这才开始发生变化。⁴⁶但无论如何,左派文化都没有沉睡不醒,它活跃于已经建立的政党的主流的边缘。正是在这里,在日常生活的边缘,大部分创造性的反思还是能够被发现的。

不过,或许更重要的是,在90年代欧洲的任何每一个角落,旨在恢复充分就业的合理程序都还没有被制定出来⁴⁷——如果现在没有竞争,这种生产方式的界限或许可以排除实现它的机遇,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在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界限内,疗救失业造成的混乱的两种相互替换的、但不是必然不能共存的方案已经在不断丰富的实践细节中被探索。第一种方案要直接面对工作时间的普遍缩减,着重考虑的是更加公平地分配就业机会这个问题。⁴⁸这种方案已经在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接受了若干次检验,并在法国的国家论坛上被更详尽地讨论着。第二种方案坚持用为所有市民(无论他们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还是之中)提供基本收入保障这种权益来取代陈旧的失业保险和附加补贴体制,因为在它看来,后者具有明显的缺陷而且效率低下。在回到孔多塞(Condorcet)和潘恩(Paine)时代的源头,按照这些线索提出的建议已经获得了新的经济学智慧和哲学智慧。⁴⁹在荷兰,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进入官方讨论阶段。

通过界说,这样一些规划保持了中性立场,它们陈述的是工作危机而非家庭危机。因为性别不均衡问题引起了一连串不同的问题。母性原本总是意味着从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撤退——一部分的或全部的,但它其实是建立在性别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在过去,在婚姻单位中,男性工资既为女性独立制定法典,又保护它。因为核心家庭的稳定性被破坏了,所以,生育负担趋于更重地落到妇女身上,让她们自己去养育孩子。特殊的女性贫困已是近年来来的一个显著趋势。长远地看,只有当母性不再成为经

济障碍的时候,性别平等才是可能的。²⁰一些循序渐进的措施或许可促成这个目标的达成。在普遍存在于瑞典和丹麦的儿童教育的社会分工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现存最先进的措施安排。但自由选择的逻辑都已超出这些观点:最低保证工资的领受者,通常都为了社会下一代的再生产而小心翼翼地算计着花钱。²¹这种再生产的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学校体系的任务。前进的方向是很明白的:它应当接受“每一个儿童都有权获得同等数量的教育资源”这一简单原则。在私人教育存在的任何地方,它的优势通常都被作为一个应当普遍实现的基准。²²换言之,公共教育体系应当旨在提高教育水平而非降低它。因此,尽管公共教育体系体现的投资规模并不小,但它并没有成为右派要求推行私有化的一个领域,这一点决非偶然。

生产当然是另外一回事。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并没有取消公共事业。无论怎样缩减,在绝大多数欧盟国家中,它都作为经济中的一个残余要素得到保留。从政治角度看,它目前还没有复苏的迹象。“国有化”——一直是一个应受到谴责的委婉说法——并非总是那么低效率,但是在公共管理的条件下,它既没有给民主也没有给公共事业的性质带来什么意义丰富的增长。如果现存财产关系将被改变,那么它也不会是通过这条途径来实现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要攻击当前的解决方式,那么有两条可以相互替代的路线可以利用。第一条的核心是公司决策体制。工业民主的理念有一个很长的历史和多样化的演进轨迹。近年来,一种新建议突然爆发,穿过从对德国“股票保管者”公司模式有节制的支持到更加激进的劳工管理公司观念的相当宽广的政治光谱,被人们看到。在德国模式中,工人、供应商和银行家都在管理层之上的监事会派出自己的代表,而后一种观念则在美国类型的 LMFs 或者巴斯克流水线(Basque lines)的合作社中得到体现。²³与此对照,另一种战略在



相对效率的基础上接受了公司内部的等级制,但通过给全体市民发放社会股息而改变了利润分配方式。^④这里优先考虑的是更加平等地分配收入,而不是企业民主化的组织情况。在每一种情况下,历史的现实前提都是:公司财产的当前构成总是可变的。

两条道路谁也不比谁差一些,它们都同样获得了制度民主类似的体制真实性。英国无疑是在代表制政府的要求和现实之间存在断裂的极端例子。在这里,社会民主党过去从来没有对专制权力不受制约的运用进行挑战,它把王室权力捧上了天,同时把温顺的立法权踩在了脚下,既没有对政治选择进行平等反思这种假象,也没有对基本权利进行立法保护这种假象,市民社会内部的独立运动——88章宪法——促使工党承担民主改革的使命,可它自身同样需要改革。结果真是够懦弱的。^⑤在西欧任何地方,民主至少在名义上被认为是最高公共权力。但是,在自由已经达到它的自然界限的地方,情况又如何呢?在60年代晚期,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曾把“敢于更民主”作为它的座右铭。之后,它对政治改革的贡献就变成了“开业禁令”(Berufsverbot)。从此之后,在国际的集体记忆中,没有什么要求比它更彻底地被埋葬了。哈贝马斯(Habermas)30年前曾经描绘的公共领域的衰落,还在未受抑制地继续进行着,而他曾希望政党和社团组织能够使之重新恢复活力。当然,他没有料到,所谓进一步“结构转换”实际上已经成为金融市场和内阁秘密会议绕开国家立法机关行使特权的便道。要知道,在欧洲范围内,即使是负责任的政府也没有这种外观。“马斯特里赫特条规”规定成立一个中央银行,发行一种没有最高议会或委员会控制的单一货币,但它仅仅加深了这个深渊。如果要重新确立代表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影响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景的基本原则,那么就需要在欧洲建立一个真实的联邦体制。对于这个问题,左派

并不比中派和右派看得更清楚或更富于想象力。犹豫不决和迷惘依旧是它们的标准反应。但正如文集集中的论文所阐明的那样,从挪威到法国、从丹麦到英国、从瑞典到意大利,欧洲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国内政治的一个主导问题。对于政治论坛上的每一部分而言,纯粹的一国战略都已经消失了,只有当这个核心问题被解决之后,西欧左派才能获得新的轮廓线。



一 黄金时代之后的瑞典

乔纳斯·庞图森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典因其最高的工会参与率（如今大约是85%）和最长的左派执政经历而特别引人注目。从1932年到1976年，瑞典总共才出现了三位首相，而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人。紧随着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造成的间隔（1976—1982）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连续三次赢得大选，从而重新获得他们作为“自然的执政党”的称号。但在1991年9月的大选中，他们接着就以历史性新低惨遭失败。从1932年到1988年，社会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所占份额从来没有跌至41%以下。而在1991年，他们仅仅获得37.6%的选票，更糟糕的是，自1928年以来，保守党领导人首次成为首相。^④

社会民主工人党是在瑞典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沉沦以致失败的。1990—1991年间，失业率增长了一倍，并在大选期间达到4%的高点，大选之后则又增长了一倍。至1993年夏，失业率达到7%，还有4%—5%的劳动力在进行再就业培训，以及在政府组织的其他劳动力市场课程中学习，许多观察家都预计下一年度的失业率将飙升至10%。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这实在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瑞典人眼中，这些已经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数字了。

然而，大选后经济状况还在进一步恶化，卡尔·比尔特

(Carl Bildt)领导的四党联合政府的声望迅即下降,作为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因此得以恢复。在1993年春天进行的两次单独的民意测验中,社会民主工人在具有明确政党倾向的选民中都获得了大约50%的支持率(这是1968年以来历次民意测验或大选的最高水平)。^②他们似乎极有可能在定于1994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重掌政权。但社会民主党人想将重新获得他们在瑞典政治格局中曾经拥有的霸主地位,却是不可能的。1991年的大选不应当被简单地看作是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个暂时挫折,它实际上是瑞典政治力量正在进行着的结构重组的一个界标。

因此,现在是对瑞典社会民主党近二三十年以来的政治经历进行清盘的一个恰当时机。清盘的方法之一就是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战后实现(或没有实现)的业绩绘制一张资产负债表,并对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他们顶着经济和选举困难坚持维护的改良主义成就的范围进行估算。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务。^③在一个开放的、具有贸易依赖性的经济环境中,社会民主党在资本增长的内在驱动和劳工运动的利益之间进行调和的能力,始终是瑞典的福利模式能够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经济管理因此历史地成为社会民主工人党已经实现的社会改革的基础,而且依旧是理解其未来的关键。为了理解瑞典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危机,我们将优先分析、观察其长期经济战略的发展轨迹,因为它们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三个不同阶段中先后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僵局,其秘密都在于此。

劳工的战后战略

社会民主党在瑞典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作用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一历史时期。^④在20世纪20年代这

段时间里,该党事实上放弃初衷,不再把大规模的国有化信条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或直接目标。但它的改良主义雄心壮志也不能被限定在“消费政治”上。相反,社会民主党人考虑的是公共工程计划,这是他们在1932年发动战役,通过在工业结构的改造过程中加强宏观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以扩大对经济的民主控制的更加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选择性的国有化不仅没有被抛弃,而且作为实现这一目的——不仅包括自上而下的公共控制,同时还包括一些自下而上的、企业层次上的共同决策形式——的诸多方法之一得到正视。^③

通过保卫与农民的议会联盟以及与大财团的议会外和解,社会民主工人党在20世纪30年代最终成为一个稳固的执政党。^④这些交易中的每一个都取消了那些曾有效削减了私营企业自主权的措施。特别是通过总工会(LO)签署的“基本协定”,蓝领工人工会同盟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分支机构,这样,私营企业的权利就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瑞典雇主联合会(SAF)是雇主的同盟,在1938年的扎尔茨耶尔巴登,社会民主党敦保工会默认了瑞典雇主联合会的32章章程,它规定:任何一个瑞典雇主联合会的分支机构参加的集体工资议价协议,都必须直接承认雇佣和解雇工人的管理权和控制劳动过程的管理权。

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回应瑞典共产党在战争期间获得的成就,社会民主工人党和总工会于1944年通过的战后纲领着重强调了扩大对经济的公共控制的必要性(但并没有对1938年的工业关系协定的条款构成挑战)。不过,在该纲领的绝大多数社会改良措施被高额议会多数批准的同时,对计划经济的恐惧使大财团和反对党(现在包括农民党在内)联合起来抵制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人党被迫进行防御。在1948年的大选中,虽然它还是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但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

党的联合得票率现在降到了 52.4%，而这一比率曾从 1928 年的 43.4% 上升到 1944 年的 57%。因为不希望依赖共产党，社会民主工人党从战后纲领较为激进的指导思想有所退却，随后与农民党建立了新的联合政府。计划虽然在该党的思想体系中依旧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但是，这个观念已经被重新界定过，它在本质上意味着反周期性开支、强调公共投资的同等重要性和长期经济预测。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劳工运动战略的重新定位，可以被描述为是一个从生产政治向以改良社会为目的的更加严格意义上的福利主义战略的转移。^⑨但这不是说社会民主党已经对工业发展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总工会新近成立的、由古斯特·瑞恩（Gösta Rehn）和鲁道夫·梅德纳（Rudolf Meidner）领导的研究部，开始逐步形成一种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经济管理方法，它抛弃了那个时代以冻结工资来制止通货膨胀压力的传统努力。至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瑞典社会民主党始终或多或少地在实行他们制定的战略。他们的思想前提是：提高生产力是实际工资的增长和福利国家的扩大的本质前提。或许是因为该国一直暴露在国际竞争之下，这一信条在瑞典的劳工运动中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另一个关键理念是：总工会的成员工会应当共同协调大家的工资协议，想方设法给那些最弱小工会的工资要求以集体支持。这也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两次大战期间的观念。瑞恩-梅德纳模式的创造性就在于：通过使低工资工会与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工运动的长期利益同一起来，使它们的短期再分配压力合法化的方式，把不同的瑞典传统融合到了一起。

该模式的核心格言是：工资应当由工作的性质而非雇主的支付能力来决定。同工同酬原则使劳工运动避免陷入收入政策的纠缠。因为通过创造一个更“合理的”收入结构，它可以降低

工资竞争——工人们更容易接受基于工作性质的工资差别。同时,由工资差别形成的压力,可以通过按照选择好的模式压缩企业利润的方式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低收入工人增加工资的一致性的工会努力,也给效率低下的公司和部门的利润空间增添了压力,迫使它们促进生产合理化,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由高收入工人确定的工资上限又促进了具有更高效率的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发展。

总工会和瑞典雇主联合会在20世纪50年代达成的最高工资交易的体制化,是雇主和政府努力限制工资增长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总工会努力对它们进行再分配的结果,但它仍然促进了总工会实行瑞恩和梅德纳鼓吹的那种工资一致政策的努力。平衡核心协议的效果虽然在局部地区部分地被工资浮动所抵消,但是,蓝领工人之间工资差别的有效压缩却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真实地发生了。³⁹

瑞恩和梅德纳从一开始就强调:工资一致协议对经济合理化的促进需要政府的积极支持。因为,除非国家补偿工人因为结构调整而遭受的负面影响,并帮助他们适应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否则,工会是不可能承担起该模式分配给它们的职能的。对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工人党理解颇深。1957-1958年的经济萧条以后,政府在职业介绍所、再教育计划和重新制定补助金标准上的开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始终稳步增长。供应经济学措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缓解工人对正在进行的合理化工作的反感。它们还打算通过为“发达”部门的资本筹集成本提供补贴的方式加快自身结构调整的步伐,并通过打破劳动力供给的瓶颈,以平缓工资浮动。

然而,什么将可以防止那些因为工资一致政策而承受压力的公司把较高的劳动力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以保证自己的利润呢?答案是让它们暴露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之下。瑞恩-梅

德纳模式由此为瑞典劳工运动长期支持自由贸易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效率更高的公司只是用工资一致政策允许它们获得的“超额利润”抬高了劳动力价格,而不是投资到新的生产能力中去,那该当如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如果工资浮动水平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管制性的财政政策就必须防止它失控。正如瑞恩所言,该模式规定了一个“普遍的低利润政策框架中的利润非一致性政策”。³⁹

如果高效率的公司的利润也被限制住了,那么,这是否将危及它们的发展?瑞恩和梅德纳为这个难题也提供了一个解答。解决之道就是把由管制性的财政政策产生的公共储蓄转化为新的投资。从本质上讲,国家应通过税收吸收公司的利润,然后再把公共储蓄借贷给企业。低息率抵消了工资一致性和财政节流对企业的投资倾向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利润通过信贷市场的“再循环”不仅抑制了财富的过分集中,还以增加对效率更高的公司财政扶持的方式促进了资本的运转。20世纪60年代公共退休基金的设立或多或少就是按照瑞恩和梅德纳设计的方式运转的。

简单地说,通过强调公司间的利润差别和排除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社会民主党的战后战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段的市场条件下,社会民主工人党实行的政策支持大型出口企业的发展,并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它们也鼓励各个公司以资本替代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攻势

劳工运动战后对投资的私人控制的认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受到工资一致协议挤压的工业部门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从工资一致协议中获益的部门将按照差不多的比率产生新的雇佣。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假设变得日益可疑。相对落后的工业部门的跌幅加速上升,可在同一时期里,发达部

门的增长却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雇佣增长,即使这种增长确实是存在的。充分就业如今变得日益依赖于公共部门的发展。

当这些趋势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劳工运动的普通群众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越来越不安定。1969-1970年间,一个未经许可的罢工浪潮令总工会的领导层大吃一惊。在一定意义上,这一运动是高薪工人针对工资一致政策的实施而发动的一场抵制运动。这些罢工的要求具有全新的性质,人们普遍认为,这表达了普通群众对工作条件和福特制(Fordist)大生产的管理实践的不满情绪。

作为对新的经济趋势和社会压力的一种回应,劳工运动推出了一系列创制,以挑战劳方和资方在战后所达成的那些协议的条款。1968-1970年间,社会民主工人党政府引入了大量旨在扩大对投资的公共控制和使“积极的工业政策”成为可能的制度性改革。1971年,总工会代表大会批准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旨在使劳动生活民主化的立法计划。它抛弃了德国模式中那种具有共同决策权的(同工会分离的、无权决定罢工的)执行委员会,转而主张在集体交易中扩大对非工资问题的讨论。总工会领导层的目的在于疏导普通群众的好战情绪,恢复地方工会组织的威信,但又不放弃对工资交易的集中控制权。它还认为,工业民主化条款可以成为同高级专业人员中央组织(TCO)——瑞典白领工人的同盟,它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迅猛发展,结果很快就成为总工会主要政策的支持者——交往的桥梁。³⁹

高级专业人员中央组织成员过去曾长期是自由党的选举主力,近来则成了更名了的农民党,即现在的中央党,超越其传统的农村选民、进行势力扩张的主要目标。在与像社会民主工人党这样的政党的竞争中,谁也不能漠视高级专业人员中央组织在工业民主化中的利益。结果是,从1972年到1976年,议会以

绝大多数赞同通过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亲工人法案,其中包括在董事会中设立少数派的代表席、强化安全管理员的权力、更加严格地管制临时解雇和解雇等,其中最重要的是1976年通过的“共同决策法案”,它规定:管理层在作出有可能影响工人总量的公司决定的时候,必须与工会协商,从而有效地废止了瑞典雇主联合会的32章章程。

受工业民主化战役的政治胜利的鼓舞,总工会现在认可了那个通过集体分红逐步改变经济的所有权结构的观念,它在鲁道夫·梅德勒为1976年的代表大会起草的报告中得到说明。这个解释性的文件引发了关于建立“大型雇佣工人基金”的论战。梅德勒计划建议应当通过一项立法,要求一定规模以上(拥有50或者100个雇员)的公司按照它们的年利润(可能是20%)和雇佣工人总体的特定比例,向基金发配新股。^⑤雇佣工人每年获得的募股资金的分配份额,应当由公司的利润和它的净值的比率来决定。利润率越高,所有权的转化就越快。^⑥

梅德勒计划规定:这种新形式的集体所有资本应当作为流动资本留在生成它的公司中。只有在雇佣工人股份占据募股资本的20%之后,投票权和其他所有权特权才将由地区工会来行使。在达到这个界限以前,所有权将授予一个主要由全国工会委任的基金董事会,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其他社会利益的代表。

那么,为什么应当拒绝个人股份分配观念?梅德勒委员会为它的计划提供了三个基本辩护理由。首先,该计划将通过使“超额利润”中立化的方式推行工资一致政策。第二,它将采取措施抵制财富集中,使改善公司的财政平衡的需要和劳动力指标的重新分配能够达成和解。最后,雇佣工人基金将通过在公司决策过程中赋予雇员及其工会以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权威,对1972-1976年的工业民主化改革进行补充。

非常难得的是,总工会领导层未与社会民主工人党领导层

进行任何事前磋商就同意了梅德勒计划。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开始的选举战中,社会民主党人刻意回避雇佣工人基金问题,反复声明:立法草案必须等一个公共咨询委员会的结果出来以后才会被正式提交,而这个委员会是不可能在大选结束之前完成它的工作的。

但是,在1976年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工人党却被击败了,这是40多年来的第一次,一个由三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组成的政府上了台。现在是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工人党和总工会一起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在1978年为雇佣工人基金起草了一个修正计划,1981年则提出了另一个修正计划。^⑧新版本的计划对雇佣工人基金的论证,其基础从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转向了提高投资比率,这就从梅德勒计划最激进的特色缩了回来。1978年和1981年的建议把集体的股票所有权同工资管制直接联系起来,降低了分红的规模,并规定:雇佣工人基金在一定程度上应当通过工资税来建立。在1981年的建议中,强制分摊条款被剩余利润税所取代。由工资税和利润税产生的总收益将转交地区性的雇佣工人基金,以向公司募股资本进行投资。这样,所有权的集体化将完全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雇佣工人基金的1981年建议重新确认了梅德勒委员会对个人所有权利的反对立场,同时以强制基金向养老金体系捐资的方式,在计划的改革里特意为雇佣工人提供了个人风险金。

引发这些变化的动机是政治。因为大财团和资产阶级政党都在猛烈攻击梅德勒计划,所以,这些新变动的目的就在于提高雇佣工人基金对公众的吸引力。但就像我们在表1.1中看到的那样,雇佣工人基金的支持率实际上随着新建议的每一次提出反而下降了。1979年之后的情绪变化特别清楚地被白领工会成员说了出来。高级专业人员中央组织的领导层对集体分红观

念开始是持积极态度的,但他们在 1979 - 1980 年间被迫退到一种中立立场,结果这就破坏了社会民主党人在此问题上与自由党和(或)中央党达成妥协的努力。一个公共委员会被指定去调查整个问题,但这是一个与瑞典政治的传统模式正相反的东西,它只是导致了一个死结,根本没能产生任何立法建议。³⁹

表 1.1 1976 - 1982 年选民对雇佣工人基金的看法(百分比)

	赞 成	反 对	未 定
所有选民			
1976	33	43	24
1979	32	45	23
1982	22	61	17
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选民			
1976	55	18	27
1979	58	15	27
1982	43	29	28

资料来源: S. 霍尔姆伯格(S. Holmberg):《变动中的选民》,斯德哥尔摩 1984 年版,第 170 - 184 页。

正像拉埃夫·莱文(Leif Lewin)所说的那样,“社会民主党赢得了 1982 年的大选,但它不用着感谢雇佣工人基金”⁴⁰。因为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同样不是一个成功者,到 1982 年,总失业人数达到了 3.5% 这个战后最高纪录。许多以前反对雇佣工人基金的选民,更多地开始关心失业登记这种糟糕的事情。在办公室里,社会民主党人反复尝试与中央党和自由党就雇佣工人基金问题达成妥协,然而没有什么更大的成果。在总工会的压力下,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共产党议会党团的支持,帕尔梅(Palme)政府最终在 1983 年 10 月颁布了一个掺水很多的雇佣工人基金法。新法令规定将利用特别工资税和利润税,在 7 年(1984 - 1990)中建成五个区域性的基础基金,之后的进一步收

益将不再转入它们。它强调：基金要按照证券投资的方式来运作，不再为就业或工业政策负责，并规定基金在任何一个公司所占比率不超过8%。

这个计划的懦弱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到1987年底，由雇佣工人基金掌握的保证金总量还不到沃尔沃一个公司流动资本的一半。^④到1990年底，当转化工作完成的时候，基金仅仅占据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全部市值的3.5%。劳工运动1976年的改良主义雄心与1983年的立法结果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决不仅仅是重要的。既然1982-1983年间，社会民主工人党在捍卫梅德勒计划的原初原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已经使得雇佣工人基金的整个理念成为瑞典劳工运动的一个政治责任，那么，这些变革就只能说是以高昂的意识形态成本买来的。在资产阶级政党继续纠集公共舆论劈头盖脸地攻击偷偷摸摸的集体化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在1985年和1988年的选举战中却试图使选民忘掉这个问题。

现在想来，雇佣工人基金的命运可以被视为二战后瑞典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工资一致协议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融合中，社会民主工人党对瑞恩-梅德纳模式的采纳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经济战略，它试图在公平和效率、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进行调和。这一模式的成功为埃兰德(Erlander)统治下获得的令人影响深刻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基础。当其中的第一个环节浮出水面的时候，劳工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首创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它们对资本的系统权力提出了更加直接的挑战。在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强力支持下，增强工业民主的措施被成功地引入。梅德纳计划为雇佣工人基金设计了一个大胆的步骤。其原动力就是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提供下一个经济战略，以创造性地解决由第一个战略所遗留下来的困境。可是，“社会主义的进攻”为什么最终失败了？

通常的解释认为：因为雇佣工人基金没有为雇佣工人提供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利益承诺，所以它没有能够激发出多少热情来。这当然是存在重要的真理性因素的，但它并不能够正确地解释该计划的失败，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工业民主化改革并没有为工人提供什么物质利益。公众对权力进行再分配措施的支持将建立在从措施到收入再分配的不同前提基础上，但是，人们并没有理由去怀疑它即将来临。雇佣工人能够像计算个人的短期收益一样出色地理解集体的长期利益。他们能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做出正确的回应，而这一点一直是改良主义政治的一个方面。⁴²

事实上，正如表 1 所显示的那样，1976 年和 1979 年有三分之一的选民欢迎雇佣工人基金理念。只是到了 80 年代早期，对它们的公共支持才陡然下降了。那时候，资产阶级政党和大财团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战，以反对总工会的建议和社会民主工人党所采纳的削减过的计划。因为确信自己的经济地位正面临一个真实的威胁，所以瑞典雇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公然叛变，表现出了一种政治强力。仅仅在 1982 年，大财团在反对雇佣工人基金的宣传方面所花费的钱就同五个议会政党竞选费用的总和一样多。更加关键的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控制了 80% 以上的发行总量的那些出版社和报纸的作用。米歇尔·格利尔姆 (Michael Gilljam) 对公共舆论的形成的细致研究最终表明，1979 年以后，反对雇佣工人基金的政治辩论在大众传媒中占据主导地位，公众对该问题的理解与媒体的宣传几乎是惊人地一致，正如他所说：“每件事情都表明，财团和资产阶级政党对集体性质的雇佣工人基金的有力反抗，在瑞典人民对该问题的看法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⁴³ 面论战的另一方，即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部门——在第一次论战中是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领导层——则完全落入对手的掌握中。本质已

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的计划在形式上的连续性给选民制造了麻烦,他们把制度化的形式和深思熟虑的改革目标混淆在一起了。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们——不仅是帕尔梅本人——对自己所捍卫的计划其立场并不太坚定,他们常常是含含糊糊,莫衷一是。在被询问到基金的细节的时候,许多选民的回答都是错的,对于辩论的主题没有一个坚定立场的选民人数,在论战过程中始终很高。⁴⁹因此,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梅德勒计划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这场论战中,社会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因为辩论几乎没有展开。

这并不是说雇佣工人基金战略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但看清楚这些障碍究竟是什么至为重要的。挪威理论家乔·爱尔斯特(Jon Elster)曾经争论说,雇佣工人基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体现一种简单而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公正理念。在这一观点看来,“只给那些出于某种理由碰巧被挑选出来作为基金投资对象的企业工人以雇员投票权”是荒谬的;既然“实际的权力将被由工会的官僚体制授予”,那么,“讨论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将通过工会在基金中的代表控制整个企业”无疑也是“可笑的”。⁵⁰这是一个草率的判断,较之于原初的梅德勒计划,它更加适用于1978年和1981年已经被掺过水的计划。因为在1976年的计划中,雇佣工人基金的投资不存在任何武断和任意:在已经赢利的公司里,基金拥有的股份将作为流动资本保留下来,所有权将由地区工会而非全国的工会官僚机构授予,直到基金拥有该公司20%的股本。爱尔斯特不能解释: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民主改革没有类似容易遭人攻击的地方,被人指责说把权力交给了工会的官僚们?

毫无疑问,爱尔斯特的批评抓住了雇佣工人基金具体实施方案中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预期中通过分红对雇员(或工会)的授权,就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利益分配一样,被不公正地

扭曲了。尤为严重的是,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总是自然地倾向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公共部门的雇员和工会,从改革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此相反,20世纪70年代的工业民主的改革措施承诺增加贯穿整个经济过程的参与机会,从而为所有工会去发动自己的会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有意思的是,1979-1982年间,从赞成到反对,公共舆论对雇佣工人基金的立场转变,在公共部门的雇员中特别具有戏剧性地发生了。⁴⁶这正是该战略的阿克琉斯之踵。总工会的领导层过去只是把它理解为是工资浮动问题的技术性解决,而不是一个需要动员公共舆论的意识形态霸权计划。后一个过程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设置,以便为公共部门的雇员和工会在集体资本的形成中提供一种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

1983年,雇佣工人基金被平静地埋葬了,这实际上只是社会民主工人党重新执政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已经选择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经济战略不仅仅要放弃20世纪70年代的劳工运动明确要求的激进目标,而且还与劳工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的传统经济管理手段完全背道而驰。新战略的设计师称它为“第三条道路”,以便与同一时期法国社会党采纳的、凯恩斯主义的传统通货膨胀道路,以及英国保守党正在实践的新自由主义的通货紧缩道路,形成便于区分的对照。这一描述还利于避免与瑞恩-梅德勒模式的纠缠,因为后者原本是作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一种选择被构思出来的。事实上,第三条道路与瑞恩-梅德勒模式的区别也是根本性的。瑞恩-梅德勒模式拒绝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搞平衡这一理念,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前提就是:新的经济增长必须以企业利润空间的实质性增加为基础,换言之,这是国民收入的一次重大的再分配,它涉及从工人到资本家的全体社会成员。

“增长第一,再分配第二”,社会民主党政府 1982 年这一看似平淡的宣传口号实际上真切地传达了社会民主党重大的思维转向。

在这条新道路的背后,是劳工运动内部顾问团体的变换。瑞典左派战后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是总工会的研究部。其理论优势的最好评价尺度就是它最重要的两位理论家——瑞恩和梅德勒——的地位。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如下一个事实发挥作用的一个结果:与工会没有组织联系的雄心勃勃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自动地被吸收到了政府组织中来,并被其日常事务所羁绊。在这些条件下,总工会的研究部就成为了研究长期战略问题的惟一场所。1976 年的选举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人党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它由先前的政府大臣们充任。这些制定政策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经济学的学院背景,并因为对梅德勒计划的厌恶而团结到了一起。他们的保护人是薛尔-奥洛夫·费尔特(Kjell-Olof Feldt),作为现在是反对党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主要经济发言人,费尔特在 1982 年成为财政大臣,在很多方面,他都是帕尔梅遇刺后的政府强人。⁴⁷

费尔特提高企业利润空间战略的关键,是在新政府上台之初就让瑞典货币大幅度地直接贬值 16%。而在 1977 - 1978 年间的几次小幅下调之后,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已经在 1982 年让克郎贬值了 10%。这种连续性决非偶然:像此前的资产阶级政府一样,社会民主党现在也承认劳动力价格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与此相反,1 年前,总工会代表大会拒绝把贬值作为解决瑞典问题的方案,而是试图通过扩大交通和基础建设投资以有选择地刺激内需。

政府和工会之间其实不存在直接冲突。在随之而来的工资议价回合中,总工会通过要求增加 2.5% 的平均工资而接受了 1982 年的贬值。帕尔梅政府遵守诺言恢复了资产阶级政府砍去

的福利权益,通过增加对财产、继承、馈赠和股市交易的税收,分散了紧缩财政的负担。它也着手实施一项公共投资计划,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完成了创建雇佣工人基金这样一场运动。社会民主工人党因此宣称已经吸收了总工会计划的要素。但其主攻政策方向确实是完全不同的。费尔特及其顾问决定优先考虑私营企业的增长、利润和市场竞争能力问题。1982年的经济启动的关键是一系列的供应经济学措施,这些后来成了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其中有五点特别重要:

(1) 在资产阶级政党对更多的企业进行国有化(其数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前50年的总和)的地方,新政府迅速采取措施裁撤了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并重建了那些20世纪70年代曾经收归国有的公司。一旦国有公司重新赢利,政府就鼓励它们通过在证券市场发售股票募集资本,而有些公司则干脆跌价卖给了私人。这一局部性的、讲究实效的私有化过程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将企业的决策同政治脱钩。

(2) 社会民主工人党避开了公共服务部门的私有化这一敏感问题,但与此同时着手实施了一项重要计划,以使公共部门合理化,并通过取消中央集中管理和推行“企业化经营”(把辅助性服务行业分解为若干属于地方政府的子公司)以增强它对于消费者权利的责任。公共部门应当向私营企业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理念规定了上述改革。^④

(3) 1985-1986年间,政府顺应国际形势降低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并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逐步取消了外汇管制。

(4) 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1989-1990年间推进了一项重要的税收改革,大大降低了累进所得税制的税率,并设立了一个将绝大部分雇佣工人包罗在内的单一的所得税。这一措施明显受到了1986年里根税收改革模式的影响,它的主要财政措施是削减税收减免比例、扩大关税、增加对资本增益的税收。

(5) 最后,卡尔松(Carlsson)政府宣布瑞典将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申请加入欧共体,其汇率与法郎挂钩。申请布鲁塞尔的席位,这是对社会民主党过去姿态的完全颠倒。事实上,上述每一个结构性改革,都可以被认为是对传统政策优先性的颠倒或重新界定。在每一点上,社会民主党都是在沿着新自由主义的方向前进。

第三条道路的矛盾

第三条道路的发端是与美国里根式的经济复苏同时发生的。在接踵而至的国际市场的繁荣的映照下,新的道路一开始显得似乎是一个绝妙的成功。从1983年到1988年,瑞典经济以每年2.7%的比率增长,贸易赤字变成实质性的赢余,失业率从3.5%下降到2%。1988年,在没有削减福利权益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消除了它们从资产阶级政党那里继承的(在1982年高达GDP的13%的)巨额预算赤字。大选之前的这种繁荣景象使社会民主工人党轻松地赢得了1988年9月的选举。费尔特的战略好像得到了证实,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社会民主党从来都没能够使通货膨胀率降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求的平均水平以下。到了1989年,物价指数一年上涨了6.6%,大大超过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4.5%的平均水平,差距正在扩大。对出口的影响不久也显示出来了。到当年底,瑞典的收支赤字甚至超过了1982年的水平。

后果就是1990年春天的重大的政治危机。这实际上是与费尔特的前提相一致的:费尔特——忽略了减少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所释放出来的信用交易的繁荣——把过度工资增长视为能够降伏国内通货膨胀和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法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卡尔松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草案,其核心是为期两年的严格的工资冻结和罢工禁令。总工会领导层被诱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工会很快就表示不满,而议会中的其他政党都拒绝接受

它们。社会民主工人党提交的法案肯定不能被通过,形势已经非常明朗了,于是费尔特辞职了。在被迫放弃工资冻结计划之后,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党达成了交易:削减公共开支,这次包括福利权益在内。费尔特走了,但他的理论思路却使他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前8年的选择现在被强化了。在1988年的竞选中,社会民主工人党许诺了三项重要改革:提供第六周带薪休假,将父母的产假从9个月延长到15个月,增加公共日托幼儿园的数量,以使每一个学龄前儿童都能上幼儿园。现在,所有这些都搁置了。大财团强烈反对前两条,因为它们减少了劳动力供给。而与此相反,美国1989-1990年间令人振奋的税收改革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传统选民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在民意测验中,它的声望直线下跌。⁴⁹受紧缩措施的影响,失业人口翻了一番,在一年略多一些的时间里,社会民主工人党迎来了60年来最惨重的失败。

在经历了的最初的成功之后,第三条道路何以会以如此戏剧性的失败收场?它不能维持无通货膨胀的增长的根本原因何在?最切近的原因非常清楚,即整个时段内瑞典的生产力始终徘徊不前。从1980年到1990年,按照劳动时间计算,雇佣劳动力增加了11%,但劳动生产率仅仅提高了9.5%。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原因何在?一个经常被人引述的解释认为问题在于社会服务部门的扩张,这一部门在瑞典的增长确实很迅速,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与1975年到1983年的2.5%,1963年到1975年的6%相比,1983年到1988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只有2%。⁵⁰尽管投资和生产能力增长了,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力衰减却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与其初衷相反,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政策直接导致了这一后果,这是一个从瑞恩-梅德勒模式的立场就可以预见到的后果。对此,拉纳特·爱瑞匈(Lennart Erixon)曾极有说服力地指出,

第三条道路鼓励企业在同一劳动力价格的基础上竞争,从而减少了企业从事工艺和产品革新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出口企业,因此,它协助保存了瑞典的现存工业结构。⁵¹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良好效益刺激了工资、奖金以及其他奖励的增加,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5年,相对劳动成本增加了一半。⁵²就像瑞恩-梅德勒模式已经预言的那样,政府的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复苏战略使得总工会和白领工人同盟进行工资管制变得很困难,从而将主动权交给了希望取消工资的集中议价的雇主手中。

社会民主工人党为公共服务部门制定的收入政策也破坏了工会最高领导组织的地位。作为削减公共开支的努力的一个部分,1985年至1986年,政府开始压制公共部门的工会,在私有企业采取措施之前为公共部门的合同规定了工资最高限额,并坚持:公共部门的雇员不再因为私有企业的工资上涨而自动地得到补偿。同时,它努力通过在公共部门中取消工资的集中议价,来寻求突破新劳动力雇佣的瓶颈和促进生产力革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它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空间,使之可以按照地区和生产活动的特性来支付工资。⁵³这样的政策既与同工同酬的原则相抵触,又侵蚀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形成的支持工资集中议价体制的标准舆论导向。

换言之,瑞恩-梅德勒模式为第三条道路的失败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说明:居高不下的企业利润孳生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工资竞争,削弱了总工会领导人实现再分配目标的能力,与此同时,工资管制范围内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的重要性,降低了企业从事生产力革新的压力。⁵⁴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产生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为什么忘记了瑞恩-梅德勒模式的教训?

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存在于劳工运动内部力量平衡的改变。总工会现在与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关系比以往更脆弱了。理论权

威从它的研究部跑到了人家的政策研究机构。梅德勒计划的失败意味着其公共威信的急剧下跌。当1976年总工会代表大会接受了这一计划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工会权力太大了,而现在有同样数量人认为工会权力太小了。1984年,在资产阶级发动了反对其继任者的大规模的春季攻势以后,持第一种看法的人的数量就以39%的比率超过了后者。⁵⁹在公共舆论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导人看来,对于雇佣工人基金,总工会已经力不能及了。除却这些理论的和政治的挫折,总工会正对其传统的工业领地失去控制。白领工人工会的增加,以及蓝领工人工会之间爆发的分配冲突,侵蚀了它协调其分支机构的工资议价行为和传达自愿工资管制的的能力。

在这些条件中,惟一能被预见的就是总工会对社民党政策选择的影响力的下降。在不能动员群众支持雇佣工人基金之后,总工会就不再意味着与第三条道路相对立的另一条道路了。它只有走自己的路了,因为它的目标之一是维持充分就业(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导人过去曾不断重申这一点),但这与撒切尔主义是对立的。但后来,有社民党人评论说:如果政府希望创造更多的失业,那么,就选择第三条道路吧,因为它已经产生了更具可持续性的、通货膨胀压力更小的增长。但在1990年以前,社会民主工人党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条道路只是表达了瑞典劳工运动中的一个陈腐话题。总工会依旧坚持认为充分就业是高于一切的政策,然而它已不再能为社会民主工人党提供关于通货膨胀、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建议了。

重建资本主义

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工人党20世纪80年代的转折都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脱离资本的政策来理解社会民主工人党

的政策,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就像在别的任何地方一样,在瑞典,大财团在20世纪80年代继续发动进攻。一方面,雇主联合会开展了一场持续的战斗,以取消工业部门内的工资集中议价体系,由此瓦解了工资一致。另一方面,大财团对瑞典福利国家的批评,对私有化、取消调控和加入欧共体等的鼓吹日益直截了当。最后,在那些工程企业和工资集中议价机制的其他反对者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工人党于1990年春愚蠢地关闭了它的谈判和统计部门。当年冬,它取消了政府机构中的社团代表制度。⁶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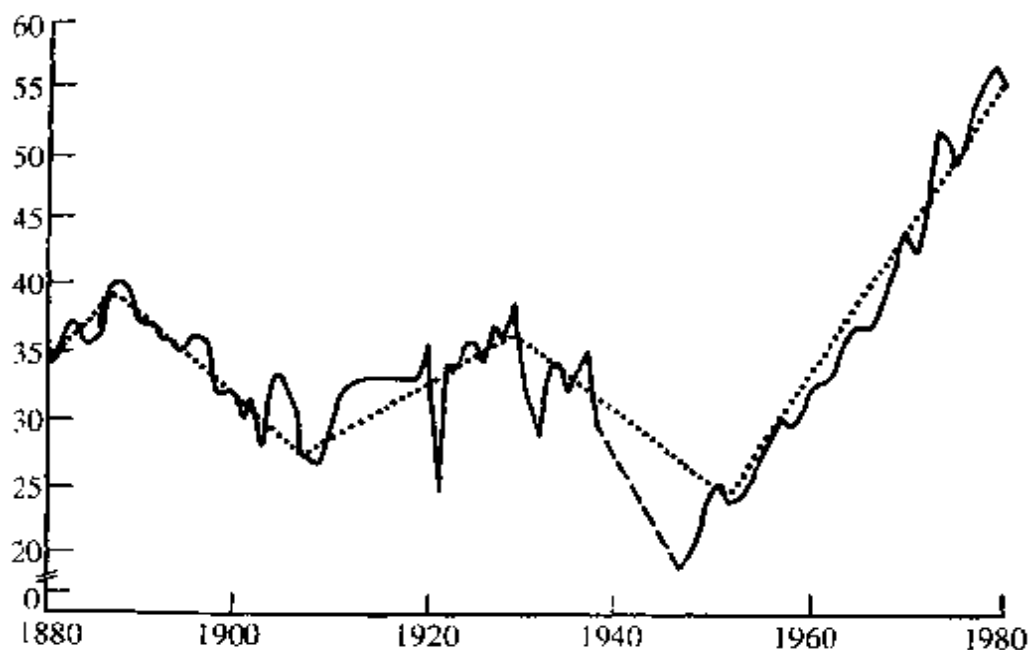
大财团这种两翼开展的进攻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时代,不过,一般认为,那时候它只是对更加有利的政治条件的一种机会主义回应而已。但是,资本的长期利益在这一时期已经改变了,它的新姿态反映了它的市场地位的变化。战后的瑞典经济因其对贸易的高度依赖性和著名的阶级妥协的制度形式而与大多数欧洲国家有所区别。把妥协归因为依赖性是非常吸引人的,但一种历史透视禁止我们夸大这一联系。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民主党的优势和阶级妥协的固定,其实是与瑞典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的显著下降同时发生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瑞典方才重新获得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贸易依赖性。

人们经常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性妥协是工人与内贸企业之间达成的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协定,说得广泛一点,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的优势是建立在工人、农民和内贸企业的联盟之上的。⁶⁷但彼特·斯维森(Peter Swenson)却争论说,正相反,历史性妥协应当被认为是出口企业工人与资本为了降低不参与国际竞争的部门的工会的工资要求而达成的一项协议。⁶⁸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必然矛盾,因为社会民主工人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成功的关键就是它能够同时结成几个跨阶级的联盟。其战后成功同样也是如此。在瑞恩-梅德勒模式的供应经济学

政策给大多数外贸公司带来好处的同时,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扩展则使瞄准国内消费市场的企业得到了实惠。战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内贸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利益。

尽管如此,上述两种观点还是忽略了1945年以后阶级妥协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特征:耐用消费品用户的增加和福特制大工业生产原则的推广。概言之,较早时候,瑞典存在三大主要工业门类:一、以出口市场为导向的、以原材料加工为基础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门类(如采矿、钢铁和林业);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机器制造”(如工业机器和其他机器和电器设备)的工程企业;三、雇佣熟练工人、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传统消费品生产工业(食品、纺织、建筑和印刷)。⁶⁹

图 1.1 1880-1980 年外贸(进口和出口)
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以固定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O. 克郎兹(O. Krantz)和L. 肖恩(L. Schön);
“工会眼中的瑞典危机”,L. 容伯格(L. Jörberg)主编;
《经济史》,斯德哥尔摩1985年版,第99页。

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瑞典新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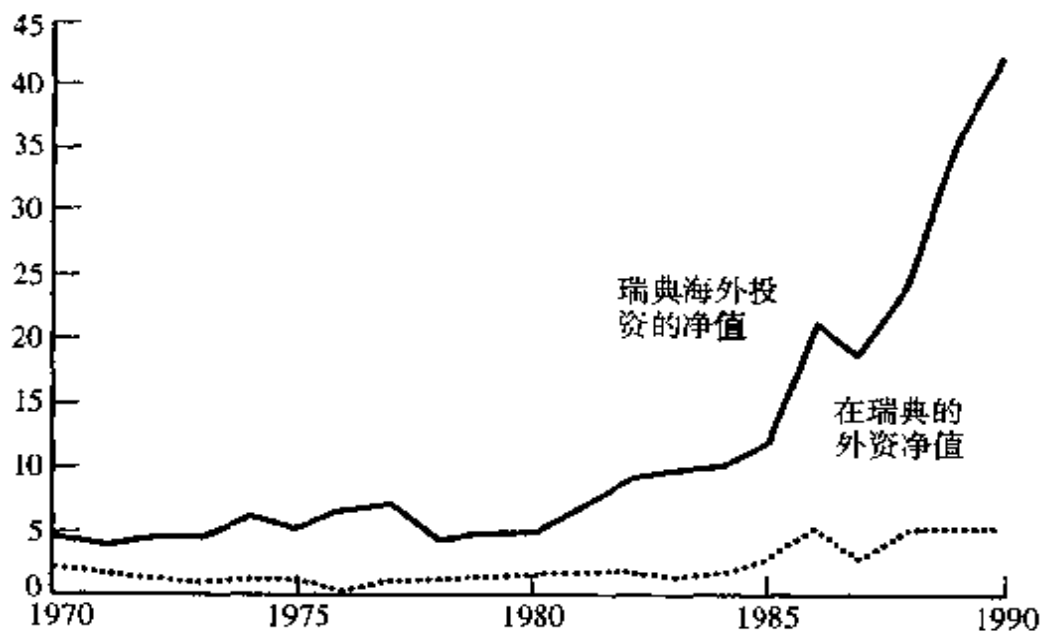
汽车和白色家电产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开始普及,在战后繁荣期间,它们的生产以极高的速度增长。以沃尔沃和伊莱克斯为代表的这一部门的企业,其资本集中比原材料加工工业低,却比老式的工程企业高。它们雇佣半熟练工人,通过满足国内需求而发展起来,但在繁荣过程中日益转变成为出口型企业。福特式的大规模生产企业因此占据了内贸企业和外贸企业之间,同时也是两种传统类型的外贸企业之间的一个中间位置。较之于其他企业,它们从战后增长方式的各个方面都获利良多:供应经济学政策促进了它们的生产合理化和工人的流动性,需求经济学政策促进了充分就业、提高了劳动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沃尔沃在这一时期成为大财团的阶级通敌者的主要代表,决不是偶然的。^⑥

受劳工运动的政策促进,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增长和福特式的大生产原则向其他工业部门的扩展,成为战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源泉,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它反过来又使实际工资的提高和福利设施的增加成为可能。福特制还产生一个影响深远的后果:就像它在商业圈中创造了一个占据关键性中间地位的新的企业门类一样,它在劳工运动中也生产出了一个占据类似地位的新的半熟练工人阶层。在劳动阶级被细分为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之后,新的生产体系的整合特征强化了议会代表讨价还价的力量,并通过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方便了工人利益的集中。^⑦对于工资交易的集中化而言,这样的福特制既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英国有了上述第一点却没有第二点,丹麦则有第二点却没有第一点。但在瑞典,出口依赖性、工业的联合主义、普选权斗争等民族性遗产和国际性的福特制模式发生了互动,有力地促进了总工会会有特色的“阶级联合主义”的出现。^⑧

正是这种构成情境在70年代开始解体。三个主要变革改

变了瑞典的经济图景。第一是工业日益增长的出口定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的贸易依赖性就稳步增长。表格1.1显示了这一趋势。进口扩大之后,老内贸企业也就衰落了,工程部门开始向国外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主要的福特式生产商已经开始超越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进军了,这必然会影响到企业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司出口越多,它从国内需求刺激中获得的東西就越少。它也改变了战后财政结算的逻辑。为了限制公司利润和工资浮动,瑞恩-梅德勒模式制定了国内消费税,而不是对企业利润进行直接征收。可一旦国外销售的重要性突破了一定的界限,那么,如果要控制企业就必须向企业利润直接征税,这导致该模式与企业利益发生尖锐冲突。

图 1.2 1970-1990 年瑞典海外投资的净值和在瑞典的外资净值
(单位:亿;瑞典克郎按 1985 年价格计算)



第二点改变更加重要。瑞恩-梅德勒模式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即由工资一致管制所生成的“超额利润”,将在这些具有高于平均生产力水平的企业或部门中转化为更多的生产和

雇佣。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兴旺的企业(特别是大型工程企业)开始回应由其日益增长的海外投资带来的国际市场压力。瑞典企业的海外机构的雇佣与它们的国内雇佣的比率从1960年的12%上升为1978年的26%,1987年的37%。⁶⁵20世纪80年代,企业的多国化发展加速进程在表格1.2中被描述出来了。它表明:之所以第三条道路即以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复苏政策未能导致生产力增长,是因为它所创造的大量超额利润都流失到国外去了。

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并不是瑞典资本海外经营扩张的首要原因。向海外投资的公司比那些没有海外投资的公司更加有利可图,因为工资一致交易让它们获益匪浅。这一点很具有典型性。而且,大部分海外投资都集中在那些高工资地区(西欧和北美)。它的目的是绕过贸易壁垒、巩固市场地位。因此,20世纪80年代,瑞典跨国公司逐步获得一种新的定位——不再仅仅是拥有流水线工厂和海外销售机构的出口商,而是从大量不同国家获得研制开发以及其他资源的跨国企业。瑞典进口的货物中有更多瑞典公司出口的产品,是这一发展趋势的显著标志。⁶⁶在这一戏剧性的发展中,若干大型工程企业把自己的总部迁到了海外。例如,沃尔沃现在就把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和苏黎世。

与国际金融市场融合在一起的新型跨国公司破坏了瑞典经济的内在凝聚性,限制了斯德哥尔摩的任何一届政府寻求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的经济政策的能力。社会民主工人党1990年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国的突然决定,就是对资本外流问题的直接回应。当然这里面也就有一个竞选动机——当时的公共舆论支持这个提议。事实上,社会民主党这一倒退适得其反,它让很多选民感到政府已不再能够控制它的政策议程了。

经济环境的第三点重要变化在于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瑞恩-梅德勒模式假定:借贷资本能够轻易地被股票所替代。如果

一个管制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减少工资是必要的,那么,公共储蓄就抵消了商业利润的压缩。1959年的养老金改革顺应了这一逻辑:商业储蓄下降,而贷款供应却急剧上升。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投资回报趋向于下降,但借贷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还是非常清楚的。以股票对于资本周转率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财政可靠性从1958年的44%下降到了1976年的21%。⁶⁹

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企业更加不愿意通过借贷为新投资融资了。结果是:被给定的投资水平开始强求更高的利润回报。在新的世界经济中,商业行为的这种改变反映了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在研制开发投资上的花费对竞争能力已经越发重要了,它们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致企业宁愿依靠自己的储蓄或者是股票发行来为它们融资。作为借贷资本的一种抗拒力量,对自我融资的投资的青睐因为(瑞典公司在海外投资必须与之交涉的)国际债权人对可靠性的更高要求而被加强了。⁶⁹

总工会承认,对国际市场压力的竞争性适应需要增加企业的风险资本供给。雇佣工人基金建议原本就是被设计出来,用以在不对从工人到资本的私有所有者的收入进行再分配的条件下实现这一目的的。可一旦它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总工会就不得不接受市场引导。这对工资议价的影响是直接性的。20世纪70年代晚期,瑞典雇主联合会拒绝了这一道路,因为在这里,工资增长的所有空间,已经在应当提高需要更大利润空间的股票的价值基础上预先决定好了。它争论说,相应的评价标准不再是国民经济中那些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生产力的提高,而是国民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批评的矛头自然是指向公共部门的。这是受保护经济部门中最大的一部分,其劳动生产率就像日常所理解的那样,总是比私营部门低很多。

我们最终看到了瑞典国内一次重大的生产重组。面对从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激烈的国际竞争,瑞典工业以一波合并浪潮、努力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劳动过程合理分解等加以应对。但普通的合理化收效甚微:它经常导致未经批准的罢工和工人其他形式、其他地点的抵抗,它已被证明是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⁶⁷从经济规模和劳动分工中获得的利益现在也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中穷尽了,因为竞争日益集中在产品质量和按顾客要求提供定制服务上了。新的口号是弹性生产。

这种普遍的迫切任务在瑞典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发展趋向。充分就业和工资一致的联合促使瑞典公司从事旨在改善工业产品质量的技术革新。⁶⁸在其潜能中勉强把工资作为重新招工及让工人能安心留在流水线上的一种手段,沃尔沃和其他福特式的大生产商不得不去接受非常高的缺席率和劳动回报率。“工作的人道主义化”计划部分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换言之,它是工资浮动的一个功能性对等物。不管怎样,同样的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也充当了雇主反对工资一致政策的急先锋。为了使用记件工资以更积极地促进生产力提高、产品意识和工人对企业的献身精神,它们不仅寻求取消工资集中议价体制,还引进了红利制、奖金制和其他不属于集体议价体制的奖励形式。⁶⁹雇主努力实现差别工资不是工作的重新设计的对立选择,而是它的补充。许多按劳动成果付酬计划实际上都与企业内部的工作组或其他工作单位捆绑在一起的。工作的调整要求培训雇员,唤起他们的上进精神,雇主坚持认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对工厂改革并不是非常感兴趣,除非他们的努力能够得到补偿。同时,公司在雇员培训上的投资当然提高了劳动回报率的成本。

如果雇主对工资管制和弹性工资都感兴趣,那么,这些目的就会冲突,究竟哪一个更重要?选择将取决于产品战略和市场条件。面对紧缺的劳动力市场,瑞典的大型工程企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都优先考虑限制工资弹性。而面对相同的劳

动力市场条件,它们则选择了弹性工资,原因是它们的产品战略改变了。结果对总工会的分支机构构成了一个诱惑,它们私自采取单独行动逃避总工会统一的工资议价过程。私营部门中蓝领工人工会和白领工人工会之间有组织的竞争加剧了维持工资一致政策的困难。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创生出那些既不能说是蓝领也不能说是白领的职位。为了避免成员流向由有薪金的企业雇员组成的高级专业人员中央组织的分支机构,冶金工人工会随后不得不在其原有等级内接受了工资差距的扩大。^⑩

地区工资议价和按劳动成果付酬计划促使很大一部分雇员努力寻求“公司层次的联合主义”,这包括直接的雇员管理会议和在管理方所指定的范围内的共同议价决策。^⑪社会民主党1990年引入的病假工资改革实际上是这一趋势的另一步骤,它把第一个15天的病假工资的财政责任转移给了雇主。(劳资关系在此被调整的)企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对阶级一致定位的联合主义构成了明显的威胁。

从瑞典资本主义当前的这些改革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从瑞恩-梅德勒模式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劳工运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增长的疲软,这一问题源于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抉择。而从资本考察角度来看,这些选择看起来更像是对国家经济结构长时段的变革的被迫的政治适应,它是劳工问题的真实源泉。这两种观点并不是不相容的。产业复兴不就是生产力的增长。进一步的研究需要证实:瑞典的福特式生产结构重组究竟走了多远,其影响是什么。大规模的(在新科技、工作的重新设计、团队工作等等意义上的)产业复兴发生了,它在没有导致重大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破坏了阶级联合主义,这一点是可能的。把工厂改革转换为可持续的生产力增长(事实上,正是它驱使雇员努力实现差别工资)可能已经失败了。相应地,重要的复兴发生在那些不仅削弱了

阶级联合主义,而且加速了生产力增长的企业或经济部门中,因为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都远离政府的花言巧语,未受其影响。^②

不管这些假设具有怎样的合法性,由冶金工人工会研究部收集的资料已清楚地显示:作为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重组的一个结果,不需要太多的技术而包含大量体力劳动的工程类蓝领职位的比例实际上是增加了。机器工具和其他在工人技术上竞争的部门既对耐用消费品的大型生产商失去了重要性,又对那些不同比例地雇佣不熟练的蓝领工人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职员的高科技企业失去了重要性。^③

瑞典的经历是“后福特时代”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困境的一个具体化。如果福特式的生产力增长机制已经穷尽,那么,工人就必须在两种增长战略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一个以特别的产品革新和工艺革新为基础,另一个以工资成本竞争为基础。对社会民主党而言,第一个战略是惟一可以接受的长期战略,但对于维持或恢复短期的充分就业来说,降低工资成本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困境因为产业复兴过程倾向于削弱全国性劳工运动的凝聚力这一事实而有所增强。许多工人支持从工厂的后福特革新中获取利益,但是,这些好处的分配是不平均的,复兴过程倾向于取消集体议价的中央机制和产生更大的工资差别。根据瑞恩-梅德勒模式的逻辑,如果工会与提高工人技术和责任感的趋势相一致,那么,它就应当能够接受更大的工资跨度。但它们应当抵制那些反映了企业利益的多样性的差别,因为它们虽不侵蚀阶级一致,但却减少了公司从事革新的压力。事实上,在以技术为基础的工资差别和以利润为基础的工资差别之间进行区分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工会的地区组织并不像全国性工会那样有如此强烈的动机。



韧性和紧缩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前途将会是怎样？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它的直接选举前景居然很不错，这自然有些自相矛盾。自从比尔特政府 1991 年早些时候执政以来，它已经控制住了不断恶化的经济局势：普遍的财政破产、巨额贸易赤字、货币贬值，最触目惊心的是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比尔特政权非常自然地把这些前所未有的困难推到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管理无能头上，就像英国的撒切尔政府曾经成功地把责任推到工党头上那样。尽管这看似有理，但它并没有说服瑞典的选民。相反，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选举地位已经恢复到差不多接近历史最高记录了。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并没有像社会福利契约的失败那样，变成一种传奇。那么，如何解释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政治韧性呢？

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对于 1976—1982 年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彻底失败的政治记忆，无疑发挥了一种重要作用。政策失败的阴影和那一时期明显的政治无能，始终潜伏在新政府周围。严重的危机将公众的视线聚焦在直接的生存问题上，这种短期情形似乎使社会民主党获益匪浅。当选民对任何一届政府实施具有连续性的增长战略的能力都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社会民主工人党缺乏这种能力，也就不再是一种重要的选举因素了，特别是它对福利国家的突出贡献至今还令人记忆犹新。^④

对瑞典文化中的福利主义特征有所意识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其 1991 年大获成功的宣传战中不再讨论缩减福利的问题。相反，它们让人感到，它的“结构改革”纲领是维持瑞典人民已经适应的那些福利好处水平的一种措施。通过取消公共服务部门的垄断和鼓励私有企业参与，税收负担减轻了，社会服务设施成本降低了，市民被保证给予一种更加自由的利益选择。这些

政策可以确保选举同盟的持久性,而它也正是政府的目的所在。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比尔特政府引入不受欢迎的紧缩措施,这原本就笼罩在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预先占据了它的改革计划——这让人想起了许多左派政府的经验。例如,联合政府曾经许诺用现金提供丰厚的儿童保育津贴,以便让那些愿意自己养育孩子的父母可以留在家中,或者可以保证他们能够把孩子送到私人幼儿园,而不必担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财政危机阻碍了这一计划。由于不愿意通过裁减现存福利和关闭公共幼儿园设施,比尔特政府不得不无限期搁置它。公共开支已经失去控制。

由于预算赤字增长迅速,在1992年秋的欧洲金融风暴中,瑞典通货承受了巨大压力。政府用自己信誉来确保通货坚挺。为了恢复商业信心和避免贬值,它在紧急状况中被迫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协议。现在,福利供应必须被裁减。作为社会民主工人党支持大多数社会福利裁减措施的回报,政府引入新税率,搁置它的取消财产税并将公共失业保险的管理权从工会手中拿走的计划,答应在没有社会民主工人党进行协商之前决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私有化措施。当然,社会民主工人党也冒了重大的政治风险,以致承担了金融紧缩的连带责任,其交换条件就是保护工会的组织力量(失业保险的好处为雇员加入工会提供了重要动机),它也因此预先抢占了未来社会民主党政府所发现的很难扭转的结构改革。⁶⁹在相同的环境中,大多数欧洲左派政党都很高兴与对立的政党实现联合。1992年的危机协议是社会民主工人党对“执政党”观念的完美说明:即使下野,它也决不回避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它的处境因为公众支持的上涨而得到改善,这与反对加入欧共体的显著的社会舆论转向同时发生的。因为大多数选民都被自己国家的新的不安全因素所震动,社会民主党代表了最愿意坚持抵抗加入欧共体对瑞典福利国家

的潜在威胁的政治力量。

除了这种直接的危机关头,什么因素可以解释社会民主工人党的这种持久的政治影响力?人们常常强调国内资产阶级政党的经常性分化,^⑤根植于瑞典前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和具有独立性的农民,这些已经保存在选举体系之中,并成为瑞典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还是发生了。保守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翘楚,它代表了堪与社会民主主义相抗衡的新自由主义。它的崛起限制了社会民主工人党规定政治论战问题的能力。这对今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976-1982年的资产阶级执政经历验证了作为联合政府领导力量的中央党的迅速崛起,而它们这一次的经历则强化了保守党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领导地位。选举显示:主要是比尔特联合政府中较小的执政伙伴承受了政府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恶果。^⑥在这个意义上,1991年的大选应当被视为瑞典政坛正在进行的结构重组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暂时失败。

就其不可动摇的地位而言,社会民主工人党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历史性力量。瑞典社会民主党非同凡响的成功不能仅仅根据有利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加以解释。正如格沃恩·泰保恩(Göran Therborn)强调的那样,社会民主工人党精明的政治技巧和战略洞察力是不可缺少的。^⑦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内凝聚力。从任何一种比较的立场来看,与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进攻和20世纪80年代的向右转相伴发生的政治运动,其内部的政治冲突都非常有限。它们并不没有导致运动的衰落,而在别的国家(例如很有名的法国和英国),产生恶劣后果的类似冲突已经发生了。它们从来没有破坏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的理解,即它是一个有凝聚力的能够领导国家的政治力量。人们完全可以想象,像1991年那样巨大的选

举失败将会引发内部论战和领导权的更迭。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控诉和撤换卡尔松等领导人。

瑞典社会民主党何以能够具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凝聚力?对此目前还缺乏研究。⁹瑞典共产党(它现在以左派政党而闻名)的幸存,及其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向着左翼活动家的“开放式殿堂”的转变,帮助限制了社会民主工人党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范围和强度。该党在政府中的实际长期存在,也通过吸收那些公共事务领域或市民服务机构中的职业野心家而阻止了派系的形成,同时把内部争论聚焦在实质性的政策问题上,而非意识形态的争吵。就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工运动内部存在左与右的对比而言,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它日益与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组织分化同时发生。¹⁰当总工会研究部为那些同情左派的革新知识分子提供避风港的时候,总工会代表大会则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清晰地发出了要倾听普通群众的意见的号召。运动的产业组织和政治代表在组织上的二元对立,以及通过集中讨论政策问题、以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分歧的政治斗争手段,似乎促成了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实用主义。它也通过重新界定劳工运动两翼间的分工而方便了战略转换,而任一方面都没有彻底翻转它们的地位或进行额外的领导层更迭。20世纪80年代的向右转,意味着总工会对工会权能具有了一个更加狭窄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认为退却是可取的,因为它使工会摆脱了对政府政策制定的责任,使它们能够集中精力去捍卫工会成员的各种利益。

尽管有这些持久的力量,以及当前社会民主工人党支持率的上升,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前景看起来并不是非常有希望,因为福利国家的扩张已不再能够为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霸权提供行得通的工具,在商业周期的变化无常中,社会民主党的选

举胜利日益成为偶然的。资本的国际化破坏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侵蚀了曾与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连为一体的一致联合主义。当社会民主党从公众对加入欧共体的普遍焦虑中获取政治利益,并从中赢得那些对总工会持谨慎的观望摇摆态度的选民的时候,短期内,上述挑战确实为它提供了某种政治机遇。但不管怎样,当社会民主工人党力图在完全拒绝和完全接受布鲁塞尔指定的条款之间寻找一条安全航道的时候,加入欧共体对它来说总是充满了政治危险。对于瑞典劳工运动而言,暂时安排在1994年的全民公决或许就像挪威1972年的全民公决一样意味着一次分裂。长远地看,加入欧共体和取消工资集中议价机制将会使政府调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和劳工利益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下一次大选产生了一届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者由社会民主党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政策可能会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德国的经历表明:这种将导致大规模失业的道路是不可能为社会民主党的长期胜利提供秘诀的。



二 模式转换中的挪威

拉斯·穆塞特 阿德勒·卡普兰
简·法格伯格 本特·索福斯·川诺伊

在不少场合中,挪威都被认为是战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一个最成功的典范。这一说法并不过分。用严格的经济学术语来说,挪威在挪威工党(DNA)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比它大且更有名的邻居瑞典更加引人注目。从本世纪初欧洲边缘的一个农业小国开始起步,挪威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同时,它的文化传统是最讲究平等的,它的社会福利是最全面的。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未能解决或实际产生的特殊问题是什么?我们看到,挪威福利国家的基础是由1945—1965年间工党长期执政所发展起来的经济政策模式奠定的。外国人对挪威的兴趣总是集中在社会民主党引进的那些社会改良上。它们当然是重要的,但更关键的是,就像瑞典一样,战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这种增长所赖以实现的道路恰恰是挪威社会民主党的传奇的核心。但在今天,伴随着那对挪威工人运动的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模式的消逝,它已经不再是前进的动力而是发展的障碍了。⁶⁰

模式的起源

中世纪晚期以后,挪威就是丹麦王国的一个偏远领地。在

1814年战争中,丹麦失去了这块殖民地,从此之后,挪威就成为瑞典的势力范围,听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指令。那时候,挪威经济还主要是小庄园经济,土地上生活着大量农民和非本地固有的贵族。(由国家官僚、尽管弱小但不断壮大的资本家和一些富裕农民构成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是分裂的,虽然官僚们认为农民是他们忠诚的委托人,并给予所有自由农民和雇佣农民以选举权。在农民和其他边缘集团的努力下,1814年宪章制定了一种特别具有灵活性的政治体制,他们最终在19世纪30年代使国家获得了高度的地方自治权。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国家的知识精英开始挑战传统文化习俗。在这里,绝对戒酒主义运动和解放新教徒运动比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方开展得都要有力。同时,一场民族语言的复兴运动也开展起来了,其结果就是今天的挪威拥有两种官方语言:(与丹麦语同族的)标准挪威语和(19世纪40和50年代由乡村方言融会发展起来的)新挪威语。

19世纪下半叶,国家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政见分歧决定了议会斗争的基本态势。自由党是乡村和“反文化”集团的政党,它得到了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的大力支持。保守党主要代表了高级官僚和财团的利益。自由党领导旨在争取议会体制的斗争于1841年被接受。工党成立于1876年,最初是与自由党合作的。1905年,挪威终于从瑞典手中赢得了完全的独立。到1900年,成年男子已经基本获得了选举权,而妇女也在1915年获得了选举权。

19世纪的挪威经济主要还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同时还有很少一些资源型和基础型的工业:林业、采矿业、渔业和造船业。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国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刺激了挪威纸浆和造纸工业、捕鲸业和罐头制造业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挪威拥有了世界第三大商业船队。世纪之交的时

候,挪威已经能够利用水力发电技术,巨大的瀑布资源成为主要国家资源,挪威人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来发电。外国资本现在发现挪威是各种电力密集型产业(化肥制造、铝、锌和化学工业)的天堂。这些重工业生产企业都坐落在瀑布地区,特别是西海岸迎风坡地区。独立后不久,(主要是由自由党策动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农民对工业化的怀疑和社会改良运动保证通过了一项“特许权法案”,这一法案使挪威官方能够对国家资源进行控制,它要求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联营开发国家资源。挪威今天的经济结构依旧受到木材加工工业、金属和化学半成品加工工业和造船业等历史性基础的深刻影响。这些工业门类在依旧占据明显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了一些出口“飞地”。

工业的发展导致工人阶级的壮大,工党和传统政党之间的冲突开始成为议会斗争的主题。反社会主义阵线已经分裂。自由党和保守党没有能够实现合并;20世纪20年代,农民脱离自由党成立了农民党;20世纪30年代,在绝对戒酒运动和解放新教亚文化的运动中,一个具有天主教背景的政党出现了。从这个母体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政党结构:具有广泛支持的强大的工党与一个分裂为四党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相对立,后者的政策决定它们很难实现联合。

挪威工党的政策起初非常激进,但在大萧条时期变成了一种实用的改良主义。1933年,瑞典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而严重的农村财务危机则为挪威相同的联盟铺平了道路。1935年,工会联盟(LO)和雇主联合会(NAF)为了工业稳定达成了一项国内协议,几天以后,工党在农民党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在任期间,工党追求一种温和的发展道路,从而成功地以后4年与自由党和农民党的合作奠定了战略基础。

这些事件基本设定了挪威改良主义的模式,其后来的公式

就是:(由各种联盟实施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社会妥协,加上工党与农村集团和自由派集团的政治联盟。津贴和市场监管帮助强化了小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支持,这同时也反映了工人运动和从不投挪威工党赞成票的富裕农场主之间的暂时的利益集中。阶级妥协保证了工业的稳步发展,工党执政期间罢工减少了,工会和党的组织却稳步发展起来了:工会联盟的成员从1922年的84,000人发展到二战前夕的357,000人,挪威工党党员从1930年的80,000人发展到1938年的170,000人。但私人财团依旧控制着投资的决定权,工人希望执政的工党能够减少失业和兑现原来的福利改革。

战后的黄金时代

纳粹的五年占领使挪威人民形成了一种强烈要求国家统一的情感和政治责任感,这在1945年所有党派都参与的战后重建纲领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挪威工党是这一纲领的主要设计师。在当年的大选中,工党赢得了议会的绝大多数。那时候的挪威选举制度还不是比例代表制:这一胜利是由41%的得票率来保证的。坚持战时抵抗的共产党赢得了剩下来的12%的选票,这明确地表明了整个国家的一般情绪。冷战开始之后,工党吸收了共产党的绝大多数选票,在接下来的三届大选中,其得票率一直稳步增长,最终在1957年达到48%这一顶点。在50年代,选举体制越发朝着比例代表制方向发展,但直到1962年,工党都控制着绝对的议会多数,并一直组阁到1965年。在完全独立执政的20年中,它将挪威的经济和社会塑造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连贯体系。

工党的经济目标是快速稳定的增长、贸易平衡、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更加公平的收人分配。它们为人民消费和福利国家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反过来又巩固了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妥

协和政治联盟。^②挪威工党现在创造的结构的第一块基石是建立在工资与利润的长期固定比例基础之上的劳资关系的调控。从国家直接制定收入政策,到由津贴和税收补充的滚动的工资协议,再到把政府、雇主和工会拢到一起的“接触委员会”,政府施行这一模式的体制一直在变化。但不变的是如下这条原则:重要的工资增长范围应当由世界劳动力市场价格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的生产力增长水平来决定。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堪的纳维亚扩张模式”。

这一模式的第二个重要成分是经济的政治结构。挪威狭长的地形总是造成地区分化,这一点因为小农庄制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增强。挪威工党想方设法改变城市工业地区和农村农业地区的传统对立,它的一个基本做法就是利用地区优势,把农业地区改造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稳定的劳动力补给地,而又不减少乡村的人口。政府还制定区域性政策以补偿产业结构重组所产生的破坏性后果。工党面临的困难之一就是工业“飞地”的资本密集型特征问题。在那些单一工业城市,当地的工业经常是只与跨国公司形成垂直的单一联系。例如,铁矾土或铝土总是从牙买加或澳大利亚用船运到挪威,为的就是这里便宜的电解冶炼,然后这些工业半成品又被运到西欧某地进行深加工。这样,船运业就几乎与国内工业没有什么联系,直到20世纪60年代,挪威国内的船坞都比较小,船主们一直在削减国内投资以支持其海外船队。

这些进口和资本密集型的出口的宏观经济后果是非同一般的。既然是除了能源之外的资源地区在发挥作用,那么,挪威出口所承受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它们所导致的主要变化在于存货总量和出口总量。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整套自动稳定机制,^③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它使(除了狂热的凯恩斯主义者之外的)政策制定者从反周期性危机的重大任务中

解放出来。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年里,到处都是贸易壁垒,工业“飞地”的功能就是为挪威挣得最重要的出口外汇。另一方面,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国内制造业也产生了大量的雇佣需求。20世纪30年代晚期,挪威涌现了大量生产耐用消费品的小工厂。⁶⁴在从美国引进的新技术和福特制生产方法的刺激下,这些部门在工党保护下也获得了发展。60年代,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肯尼迪回合的建立使贸易自由化获得了重大进展,挪威中小企业被证明和典型的福特式消费品生产商一样具有竞争力。

挪威模式第三个也是最原初的基石是被称为“信用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体系。1951年,财政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的代表组织(后来还有保险公司)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它的职能就是控制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个接受政府领导的委员会允许工党推行自己的政策:低利率将对节俭的家庭有所帮助,并会将投资引向真实的生产资本,而非金融投机或食利行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信贷被定额管理起来了。委员会决定信贷规模和利率水平。人们很少担心会出现抑制物价水平的错误决定。挪威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工党政策的重要顾问和支持者——相信:国家能够通过各种控制手段促进经济运行。⁶⁵

当然也有其他的控制杠杆。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挪威的国家银行有很长的历史。挪威成立国家银行的目的就是为给投资计划提供信贷,成立于19世纪中叶、原本主要是为农民和渔民服务的挪威国家银行在20世纪初得到了加强,战后期间(1947-1948)它还为住房、教育和农业贷款,再后来又为地方工业发展提供信贷资金(1960)。它们所发放的信贷资金一部分由公共部门的预算盈余提供,另一部分则由证券收入提供。国家发售自己的证券,也为其他证券提供担保,但它们的

买卖都需要经过联合委员会的协商。既然证券发售制度保证了纸币市场的安全稳定,那么,政府就必须以立法的形式直接调控证券发售。在这样一个体制中,我们看到,私人信用机构只发挥一种从属作用:它们为数不多的任务之一就是参加委员会,为企业投资确定信贷比率。挪威的社会民主主义被设计成了一种“信用社会主义”。

在福利企划体系中,国家住宅银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按照一个具体标准以特别优惠的利率为居民建房提供贷款。公共或市政建房在挪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挪威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的)政策目标就是保证居者有其屋。在特定的中心城市,有一些合作建房,也有私人建房,较大规模的合作建房也依赖住宅银行的贷款,并要与市政当局密切合作。但与私人建房不同,合作建设的住宅的价格要由国家来控制。

信用社会主义体系的基本要素一直维持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但当联合委员会在1965年被一个复杂的货币与信贷管理立法框架取代的时候,实施它的机制就被修改了。新安排反映了凯恩斯主义的奥斯陆学派的技术官僚们的一个信念,即社团主义的协商机制效率太差,太不精确,妨碍了合理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潜能的充分实现。因此,银行的首要要求和第二位要求就颠倒过来了,它被希望能在任何特定时候都能提供最佳信贷规模。在有特别需要的时期,补充的颠倒要求可以或多或少地发挥调控的功能。新的立法使政府能够进一步调控非银行的借贷机制。有了这些章程,挪威模式就开始朝着自己的颠峰前进了。按照工资和资本水平自然增长的国民收入的份额因此保持了一种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信贷分配体制把投资引向了工业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基础建设和福利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财政政策控制相对较紧,这样,为公共信贷提供资金的预算盈余就可以

随时随地地进行出色的反周期调控。例如,国家将在价格暴跌的时候为出口飞地设立库存账目,又如,住宅银行将在需求疲软的时候刺激消费。一般地说,这确实是一种与其他北欧国家有所不同的模式。^⑥它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们对此绝对没有任何其他暗示。

这一模式的建成是挪威工党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它的优势并不是没有限度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经济图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两种发展破坏了这一模式的稳定性。第一种是政治的。挪威工党要比瑞典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内部结构更加独裁——“民主集中制”血统在20年间最终演变成了禁止党内不同意见。长期执政却导致党员数量的下降,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顶峰时期,党员人数是200,000人,而到了60年代末就剩130,000人。党内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党的少数领导核心手中:主席、书记、被信任的内阁大臣、总工会领导和党报的总编。党的文化强调团结和纪律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

冷战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本地区能够脱离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瑞典提出了一个北欧防御同盟计划。但挪威工党领导人却倾向于加入北约。一个数量稳定的少数派始终支持瑞典的计划,同时,一个行动集团却坚持反对挪威加入北约,就像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英国一样,它们得到了在反核运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支持。1960年,以顽固的冷战斗士哈肯·李(Haakon Lie)为总书记的挪威工党将这一集团开除出党。结果在工党的左边的中立化和裁军讲坛上,新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人民党(SF),它在1961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两个席位,从而使工党失去了议会绝大多数。社会主义人民党并非是昙花一现。虽然它更多地是一个由教师和政府雇员组成的政党,但也日益赢得工人阶级的重要支持。它的选举地图是依照工党的势力范围得到划界的:北部和东部强,南部和西部弱。1965年,它的选票翻

了一番还多。两个党合起来总共赢得 50% 以上的选票。在反复无常的选举体制中,社会主义人民党再也没有赢得新的席位,而挪威工党却失去了足以影响其议会大多数的席位,给了四个非社会主义小党。工党的连续统治被打破了。

新当权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是由中间党派——自由党、农民党和基督教人民党——而非保守党领导,总的说来,它是萧规曹随,没有大变化。它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工党颁布的干预主义货币政策,引入了与瑞典养老金计划类似的社会保险计划,使福利国家的普遍原则得到具体化。但现在,在战后建成的经济模式中,错误的路线开始出现了。在传统上,出口飞地被指定扮演工资领导者的角色,因为它与国际市场的原则最为一致。贸易自由化使中小型制造业也暴露在国际竞争下。结果与瑞典(采取审慎措施压缩最弱小的制造业企业)的瑞恩-梅德勒模式的逻辑相去甚远,因为挪威主要的出口企业拥有的不是高效的生产力而是低廉的能源。它们的利润不断为工资增长设定新的基准点,结果是,挪威剩下来的工业企业就很可能在压缩中被打倒。这种矛盾在 70 年代早期的衰退以前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是,福特制生产商正在把国家经济引向这一潜在困境。

同时,“信用社会主义”新的集中措施又产生了新的管理问题。它不鼓励社团主义合作,严格限制信贷规模,因为那种固定的极低的名义利率方便了政治障碍的形成。结果威胁到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不断地想方设法逃避监管,最终因企图操纵信贷供给而酿成大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民主党

20 世纪 70 年初,英国决定加入欧共同体,这导致挪威的政治体制突然陷入危机,从而使上述问题蒙上了阴影。英国这个挪威主要的非北欧贸易伙伴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变节,使国家

政治精英当场受到重创。资产阶级联盟开始谈判加入欧共体，但因为加入条件问题而搁浅，从而把这一任务留给了工党少数党政府。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提交给了1972年秋的全民公决，在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对运动之后，它以微弱劣势被否决。工党的大限来了，它的三分之一选民转而反对它。加入欧共体这一事件的结果就是其历史形成的领导集团分化成了两大块。赞同加入欧共体的集团由高级企业联合会和工会这两个社会合作者组成，反对加入的集团从农民、渔民、城市知识分子和
中层雇员那里获取自己的政治力量。它同时也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工人，这其中很多人都是被社会主义人民党发动的积极的说“不”运动从工党那里争取过来的。一年后，工党的得票率遽然下降到35%，这是它自20世纪30年以来的最低值。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历了那样的选举惨败之后，工党居然在1973年组成了一个少数党政府，这是因为由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其他反对加入欧共体集团组成的左派阵线，成功地抵制了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多数党政府。在野7年之后，它目前面临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深刻而持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与北海原油开采这个国民经济的意外收获同时并存。由于受到欧佩克在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发动的两次原油打击的刺激，1972年到1980年，挪威原油出口在世界原油出口中所占份额从0.1%飙升至3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挪威国民经济从天而降的一个恩典，在很多方面，原油部门都因此加大了对出口飞地的依赖性。以迅速出口为目的的原材料生产或半成品加工行业，既集中了大量资本又进口了大量先进设备，它们得到了国家资本或国外资本的财政支持。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银行相互竞争为原油开采融资。国家石油公司成了挪威国家资本主义新的高峰。

巨大的原油开采权很快就落入挪威政府的掌握中。应当怎

样处理它们呢？挪威国内就此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工党主张采取高歌猛进的开发战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治上，工党希望能在1973年的选举灾难之后重新赢得选民；在经济上，它相信衰退这个重症需要用猛药来治。当然，少数党政府是不能完全控制预算决定的。结果，经济总体中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原油的预期价格。慷慨的收入政策使得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增长率在1974-1977年间达到了创记录的5%。作为受到议会广泛支持的、平均制造业和农业收入的决定的结果，在同一时期里，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现在，工作时间变得更短了，退休年限变得更早了。公共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迅速膨胀，大量妇女占据了那些新职位。参与国际竞争的制造业企业则从对库存的慷慨的财政补贴和大大缓解的危机中获利颇丰。

在小心提防左派的挑战的同时，工党开始着手引进自己以前忽视的工业民主措施。该党在欧洲问题全民公决中招致的失败严重破坏了内部的文化一致性，令人关注的是，现在进入党的领导层的新生代都强调更大程度的文化多元性。⁹⁰挪威工党现在有了公开的左派和右派，并作为两者妥协的一个机构而存在。1975年，与产业工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左派得到了党主席的位子，同时右派的努尔利(Nordli)则占据了总理之职。新均衡的一个结果就是在1977年通过了一项旨在给予有组织的工人在健康、安全和劳动过程等问题上以广泛的共同决定权的法规。⁹¹法规的重点是工业问题而非经济民主，因为只要挪威还在建设信用社会主义，瑞典式的激进就会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一个修正过的公司联营法规定，在雇员50人以上的公司中，工人代表必须具有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同时它还要求商业银行的议会候选人的大多数必须是从雇佣劳动者中选来的，或者是由议会任命的。在这样的年代里，工党宣称“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已经在挪威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工人、政府和资本之

间的权力关系绝对是疏远资本的”⁸⁹。

工党的选举亏空终于还清了。1977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繁荣、实际收入的增加和一大堆社会改革政策让挪威工党重新赢回了4年前落入它的左派手中的绝大部分选民,并重新执政,现在它所缺少的就是当年的议会绝对多数。但现在它还有账单要支付。工党所做的,就是在战后历史上开出了一张最猛烈的凯恩斯主义自动吸虹(Pump - priming)政策药方。它这么做,是对挪威模式核心观念的愚弄。在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价格体系接轨的部门,工资以比生产力增长还要快的速度在增加,与此同时,出口飞地之外的工业企业成本压力却加大了:在总雇佣人数中,制造业所占份额从1970年的27%降到了1980年的21%。财政政策日益松弛,但利率却还是很低,信贷政策随之也就松弛了。既然利息支出可以从税前收入中扣除,那么,实际利率也就成为负的了,税前的名义利率就更是如此了。政策合并的结果就是消费的快速繁荣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中最大的现金赤字。到1978年底,外债净值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47%这个记录。

这是一个难以为继的过程。所以,一旦重新执政,已经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保守党人严厉批评的工党就立刻转向了紧缩政策。新路线的第一步就是调整信用市场,绝大多数利率因此被放开了。银行负责的名义利率迅速上涨,实际利率回到了零以上,虽然税后依然是负的。1978年9月宣布的工资和价格普遍冻结让进一步的生长停了下来。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官方信贷供给下降了,虽然这部分被半地下的信贷活动抵消了。导致普通私营企业的借贷下降的、更紧的货币政策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进一步增强了国家银行的权力,其未实现的信贷规模从1970年的27%上升到了1980年的35%。⁹⁰这种不是工党任何有意识政策的选择后果的增长,引起了私营银行关于不公平竞争的大声抱怨,并得到了挪威经济学家中日益增长的新自由主义舆论的

支持。

由该党政府自己发起的两次专业调查证明了这一变化。⁹¹ 这表明：低利率对中低收入家庭根本没有帮助，这些报告还批评国家银行过于庞大、经手的津贴数量太大，以及对银行市场的控制太严。作为一项妥协，它们建议由政府为银行业确定一个可以刺激市场的利率。面对这些建议，工党行动迟缓，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些举措，但也是非常不够的。尽管实际利率上涨了，但工党发现，想要显著地抬高它却不可能。与右派一起制定政策现在越来越困难，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不断通过那些受监管较小的“掮客”暗渡陈仓，这导致信贷供应过量。

为了提高挪威的竞争力，政府在1977-1978年间让货币贬值16%。为了堵住那些对进口价格上涨进行补偿的要求，工资在1978年被冻结了。对工人来说，直到1981年，紧缩过程都意味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住房市场现在也诉求直接的国家干预。公共监管和财政联手使（按照年资分配的）合作住房的价格始终低于市场水平，从而使得这一部分建筑商不能（像私房所有者那样）从货币贬值中得到实惠。为了逃避监管，人们想出了大量钻空子的办法，从而破坏了工党政府保持城镇住房市场价格低廉的目标的达成，政府因此试图禁止违规交易。这使得保守党能够纠集公众压力，要求取消价格管制。在1980年底的选举中，两党棋逢对手，各得三分之一选票，但对工党来说，这是急剧下跌，而对保守党来说，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了拯救时局，解决党内矛盾，工党于1981年初选出了第一位女性领袖：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并把社会主义重新界定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目标，同时降低了对金融机构社会主义化的要求，这使得党的纲领变得更加实用主义了。但是，调整收效甚微。1981年9月，工党再次

下野。保守党大获全胜,赢得的选票几乎是自己有竞争力的非社会主义对手的3倍。席卷西方世界的沮丧浪潮现在在挪威登陆。在农民党、天主教人民党的议会支持下,保守党领袖科勒·维洛克(Kaare Willoch)当选首相。天主教人民党因为反对流产问题而未加入政府。

1981 - 1986 年间的右派政府

新政府上台的时候,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新一轮衰退,1981 - 1982 年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足1%。但导致衰退的第二次能源危机却让挪威得到了实惠。天然气和原油出口增长迅猛,财政收入持续增加,积聚了大量的货币盈余。在这些有利条件下,作为挪威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新政权开始着手进行改革。^⑧

针对高收入阶层和私营企业的税收被迅速砍掉了,缺口由上涨的原油价格来补贴。迄今为止只具有边缘性重要意义的证券市场 and 政府的财政管理目的脱钩了,在此之后的1981 - 1983 年间,奥斯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额增加了4倍,股票的平均市值飙升70%。对住房市场的监管也取消了:监管价格以下的合作住房建设减少了一半,余下的房屋价值一夜之间翻了一番,私有化也扩展到了住房出租部门。允许从海外借款的政策使私营银行体系的资金流动性增加。4年中,国有银行贷款所占份额从35%跌至28%,80年代末的时候更是跌至18%。^⑨

维洛克政府实现的最根本性改变莫过于埋葬信用社会主义模式了。在解决这个已经建成的体系的时候,它开始还有些犹豫,1983年则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决定性措施。不准向中央银行进行短期借款的禁令撤消了,补充性的颠倒原则废止了,国库券的强制购买取消了,不准成立新的金融结构的限制也没有了。利率在1985年变得非常自由,但财政部要求中央银

行把货币市场利率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这迫使中央银行向市场提供巨额流动资金,为了实现这个自由化政策,它一年大约需要投放 60 亿克郎。

这些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刺激私营银行疯狂贷款。在 70 年代,它们的超标贷款一般不超过信用预算的 20%,这个数字在 1984 年是 50%,1986 年则狂升至 100%。1983 年以后国际市场有所好转,但它却被政府鲁莽的国内扩张夸大了。结果是一个人为的轻率的繁荣,1984 - 1986 年间,私有消费迅速扩张,失业现象也消失了。但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靠的。因为制造业的产量增加得很慢,雇佣几乎就没有增加。几次贬值只是让挪威公司的边际成本竞争力增加了,而同期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却始终在下降。另一方面,传统上提供就业机会并不多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雇佣却猛增 40%。股票交易繁荣,但新募集到的资金中却只有 12% 提供给了工业部门。1985 - 1986 年间,家庭储蓄率几乎是负的,1985 年底、1986 年初原油价格暴跌之后,出现了巨额现金赤字。这几年的行情的本质其实就是经济投机。因为投资证券、不断改变公司登记等等,都要比新的直接的工业投资更加有利可图。

对于参加 1985 年选举的维洛克联合政府来说,消费繁荣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但它并没有持续多久。与受西欧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挪威的经济周期受原油价格、克郎与美元的汇率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大。当这两种价格突然暴跌的时候,挪威政府被迫进行匆忙的经济刹车,与此同时,欧共体的经济发展却继续上扬。当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保守党再也忍耐不住了:在 1986 年春的工程企业的罢工中,它将工人堵在工厂门外,试图逼迫工人接受条件。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失败。针对挪威克郎的一轮金融投机,使维洛克政府的国际信任下降了,当政府已不能就一个很小的税收提案获得议会支持的时候,它如释重负地辞职了。

一个少数党的工党政府于5月初上台。

1986 - 1993 年间的经济萧条和财政危机

80年代晚期,挪威工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布伦特兰1981年当选党的领袖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和世代的交替。布伦特兰强调应当对党进行现代化改造并使它能够面向国际,这样她就在战略上挫败了以总工会为基础的、对70年代中期的工业民主化转变负责的左派。党的新领导集体与战后格哈德森(Gerhardsen)和布拉特利(Bratli)那群领导人不同,它与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没有密切的联系。它也少些意识形态的教条,更富有灵活性,愿意改变自己的政策手段,希望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能满足生产者的利益。1985年的大选后,它发动了一场自己称之为“自由运动”的运动,其目的在于通过探索挪威人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从保守党那里重新夺回自由理念的旗帜。但经济民主却不在其中——布伦特兰已经偏离对在公共公司的董事会中增加雇佣工人的代表席位这一建议了。运动的重点是强调顺应市场解决方式的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但它也对日益增长的双职工家庭问题表示关注,主张学校、劳动时间、养老金和其他领域的社会政策应当适应新的模式。

一种政治混合物就此被投入实践。布伦特兰政府是议会中的少数党政府,它再也不像70年代那样,有足够的社会主义左翼党(社会主义左翼党是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其他各种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结成的一个选举联盟,后来演变为一个政党)选票来帮它渡过难关,免遭失败了。但对它提出的向新的紧缩时期过渡的“转折行动”还是有广泛的议会支持的。在1986年5月克郎进一步直接贬值12%以后,政府确定了固定汇率,并为资本流动开辟了道路。财政政策继续紧缩,税收改革使得高收入阶层的信贷变得更加昂贵了。旨在鼓舞克郎士气的货

币管制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实际利率。最后,1988年春季,总工会被说服,接受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温和的工资协定,这一协定随后以法律的形式被普遍化,从而杜绝了总工会与其他非总工会系统的联合会达成更加优惠的协议的可能性。这些措施的后果逐渐积累,慢慢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最终到1988年,挪威的经济衰退达到谷底,开始回暖了。

工党的紧缩疗法是一种休克治疗,它产生了许多挪威工党政府没有预料到的后果。首先是大规模的失业。政府预计到在某些受保护的部门和建筑业将出现失业现象,但当“转折行动”导致大量暂时失业的时候,工党精英退缩了,可商界领袖开始认为失业是净化经济的一种必要手段了。⁹⁹到1989年,失业率达到5%,这对国际标准来说还算是低的,但对挪威人来说则非常高了。更富于戏剧性的第二个后果随后也降临:堪称模范的水电站也萎缩了。

降低实际收入、提高利率、税收改革使许多挪威人都紧缩开支以减少债务。房地产市场遭受直接打击。房屋需求下降,价格随之上涨。房产价值的下跌使家庭财产缩水,这使它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之中,因此它们也就更倾向于减少开支,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这反过来又使商品市场陷入更大的萧条之中。这使许多房地产投资者破产,因为其中许多人是从银行贷款的,所以,损失最后转嫁到了银行身上。更糟糕的是,随后资金又纷纷外逃。也就是说,取消对信用市场的管制并没有导致高效率,却使国家经济陷入更加不稳定的状态中。1990年底,那些最重要的银行都资不抵债了,这使整个金融行业差不多到了崩溃的边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信用社会主义的成功打击却以国家代管最大的银行而告终。现在,国家的收支体系面临着彻底瓦解的危险,政府别无选择,只有大量注入现金以拯救这些银行。取消监管所导致的不稳定性的积累迫使

政府再一次选择监管,这导致经济领域中出现了比以往还要多的公共所有权。到1993年,政府成了三家最大的私营银行的最大股东,总共投入了令人震惊的、超过国民生产总值3%的200亿克郎,以稳定金融系统。

“转折行动”积极的临时解雇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当挪威经济于1986年进入衰退的时候,国内需求却很旺盛。原油价格也在1986年后开始反弹。结果到1989年,现金收支达到平衡,这使政府能够冒险采取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以期抑制失业率的上升。1990年春,总工会和重组的雇主联合会就小幅上调实际工资达成协议,私人消费开始复苏。就在货币政策依旧紧缩的时候,出口却已经开始持续快速增长。

这样,我们在90年代早期看到了一个温和的复苏迹象,但这是不能与1974-1977间、1983-1986年的繁荣相提并论的。失业率依旧稳定在6%这个战后最高记录上,投资并没有恢复。但按照国际标准来衡量,2%的年增长率还是颇为可观的,通货膨胀率也始终保持在2.5%,出口继续保持盈余。当欧洲货币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不确定性的觉悟中爆发危机的时候,克郎被迫在1992年9月贬值。不过,当在先前的混乱中遭受灭顶之灾的瑞典和芬兰货币在贬值后继续下滑的时候,挪威克郎却保持相对坚挺。为了刺激住房价格和私人消费的实质性增长,名义利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今天,挪威是除了卢森堡之外,符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共同的欧洲货币所制定的趋同条件的惟一国家。

但长期问题依旧存在,特别是投资下降和就业下降的恶性循环问题更是让人头痛。工党试图用供应经济学政策回应它们。它们包括旨在增强水电企业竞争力的电力法,农业补贴的名义缩减,减税和税收检查,支持工业投资,把信息、来料加工工业、海洋农业、生物技术等发达部门确立为研究支持的对象。为

了工业的结构重组,挪威参与到了与西欧相关行业的竞争中去。⁹⁵但现在的结果还很不确定。挪威的研制和开发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下降,公共基金主要集中在挪威经济中的那些高科技部门,这看起来似乎是误入歧途,因为按照国际标准来看,那些能够带来高产出和就业机会的经济部门(食品、纺织、木材加工和纸浆)的研制和开发投入却还是比较低的。⁹⁶

较之于充分就业,工党1986年以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始终优先考虑外部平衡和价格稳定。用它自己的话来说,它是行之有效的。挪威社会民主党避免了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厄运。斯德哥尔摩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现在已经下台了,如果挪威工党还能依旧在奥斯陆掌权,那么,这个好运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两者的差别有关的。工党从保守党那里接受了经济危机这个烂摊子,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却处于繁荣之中,这使它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措施走出战后模式,并用国家的原油资源来弥补损失。瑞典社会民主党实行的政策与挪威保守党并无根本不同,但它本身是与1989年世界经济衰退同时发生的国内经济危机的制造者,在这个危机中,瑞典的制造业要脆弱得多了。挪威工党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政治适应性,但它还没有找到传统模式的现实替代品。信用社会主义已经被解构完毕了。今天,挪威政府通过自己的开支、与大公司的密切关系影响投资分布。这样政府就能够避免让它曾经拯救过的银行成为其积极的政策工具,同时,国家依旧还是一个积极的所有者。它曾与那些国有的和私营的大型企业达成非正式协定,试图找到一些可靠的合作者,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能够甘冒风险、逆流而上,为政府分忧。这些努力并不总是成功的,最近的兼并丑闻——挪威最大的保险公司试图借助官方兼并瑞典一家保险公司,但很不幸,失败了——更是证实了这一点。或许更加正式的安排要到以后才能出现。1992年初,

挪威雇主联合会表示：它正在认真考虑像瑞典的同行一样退出最大的公共委员会。但很快它的情绪就发生了转变，向另外一个巨大的社团主义幻想——“价值创造论坛”（用世俗的话来说，就是工业革新论坛）——屈服了。这个机构由商界精英、两个大臣、雇主联合会和总工会的代表构成，并由首相亲自领导。这种集中是否会取代以前那种非正式的联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国家行动主义伪装下的、某种形式的“Norway, Inc.”似乎就是工党现在的主要手段。

同时，布伦特兰政府决不仅仅是挪威经济的管家婆。从“自由运动”之初，挪威工党的新领导层就在为挪威新的社会福利战略摇旗呐喊。如果战后发展模式已经死去，但它为之服务的那些价值观念则没有。在挪威，北欧式的“平等激情”依旧盛行，但它的主要关注中心已经发生改变。现在出现在前台的是性别平等问题而非阶级平等问题。1986年的工党政府抓住了全世界的想象，因为它的内阁不仅是由布伦特兰领导的，而且18名大臣中有8人是女性。这种女人当权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挪威工党内的妇女运动进行斗争所赢得的审慎份额政策的一个结果。⁹⁰它对挪威政治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跟着仿效：时至今日，保守党（到1993年）和农民党还都是由妇女领导的。在政坛的高层，挪威有理由宣称自己是最讲究性别平等的国家。

但在社会领域，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挪威就像其他地方一样，6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安全体系的中心是男性养家、女性做母亲和家庭妇女。雇佣工人和临时工在福利国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照料儿童和老人并没有给予妇女（例如那些因为孩子已经长大而希望重新工作的母亲）获得疾病补助和失业保险的权力。所有公民都被给予一种基本的最低养老金，但与收入相关的追加养老金却预先假定只能给予正式雇佣的工人。

70年代开始,挪威的妇女就业比例迅速攀升,这种景象早在10年前就在瑞典和丹麦出现了。在北欧这种社会结构中,福利国家接管了(当然还是由妇女完成的)抚育职能,在欧洲的大陆国家,这通常是由妇女在家里来完成的,而在英美社会,这越来越多地由私营部门中的低收入妇女来承担。⁹⁸挪威和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位一样,妇女就业增长实际上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特别是健康和教育部门。但由于起步较晚,所以也就产生了一些差别。与瑞典不同,挪威的工薪母亲没有得到公共基金资助的日托幼儿园的帮助,她们必须求助于私人幼儿园或其他非正式的解决办法。⁹⁹

布伦特兰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积极的家庭政策来着手解决这些新问题。一系列向瑞典学习的改革措施已经引进,虽然日托服务体系还比不上瑞典,但对母性、父性和父母假期的慷慨补贴计划,已经使公众接受了父母都是职工又都是保育者这一观念。1992年,国家保险体系承认:照看7岁以下的儿童、老人、病人和生活有障碍的人等不支薪的看护工作等同于雇佣劳动,从而给予大量从来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以追加的养老金。这一改革的后果之一就是打破了传统的只有走出家门才能找到工作的社会风气,鼓励更多的妇女留在家里。

挪威妇女地位的转变就像挪威工人的地位转变一样没有彻底完成。在瑞典和丹麦,女性在福利国家中的就业集中导致就业市场的性别分离,这即使在精英层面上也都得到了反映:公共机构中有非常杰出的妇女,但私营机构中却没有。对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的激进批评因此认为资本依旧控制劳动组织、决定投资方向。同时它又在女权主义对现有性别平等的界限(有两个工资收入者的家庭并不就是有两个保育者的家庭)的批判中找到了自己的“同志”。¹⁰⁰妇女已经取得了实际的成果。但是,她们取得这些成果的社会情境却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不安全了。

福利国家现在承受的经济压力增大了。因为它原来与之相联系的、帮助它保证充分就业的模式,并没有计划要对大量家庭就业提供财政支持。就在挪威的性别平等的许多方面得到保存和巩固的时候,财政不稳定性和失业问题却增加了生活机会和收入的不平等。

90 年代的前景

新的工党领导层还有另外一个压力。从一开始,它就力图 为挪威塑造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形象。它无疑获得了成功,但同时也招致尚未显露的风险。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暂时衰落使得布伦特兰政府可以占据帕尔梅曾经占据的位置,充当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停战的调解人,调停波斯尼亚冲突,支持国际环境诉讼。这是一个在国内受到赞赏的记录。但工党领导层还试图承担欧洲统一的责任,而这个责任是很危险的。

1972 年的全民公决之后的 20 年中,与欧共体的关系问题差不多已经被人们从挪威政治中忘却了。但 1989 年 5 月,当欧洲统一市场初显形态的时候,在布伦特兰的激励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在奥斯陆开会,开始就建立欧洲经济区域(EEA)问题与欧共体进行谈判。在 9 月的大选中,总工会较年轻的成员对工党的紧缩计划进行惩罚,工党得票率于是一落千丈,议会席位跌至 1933 年以来的最低值。在保守党首相的领导下,三个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上台执政。联合政府极力主张完全加入欧共体,就像 1971 年一样,农民党起而叛变。于是政府在 1990 年 10 月垮台,这导致工党未经选举就重新上台执政。

布伦特兰等党的领袖们至今都坚信:加入欧共体对于挪威来说是必要的。它预计:冷战结束后,瑞典、奥地利和芬兰突然转变立场支持加入欧共体,这为欧洲统一主义创造了更好的群众基础。工党发言人说:受国民不断批评的失业问题、投资疲软

问题只有采取共同国际行动才能加以解决，北欧集团加入欧共体将能给予德洛尔(Delors)的社会欧洲眼光以强有力的支持。1992年11月，挪威工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提案，同意挪威完全加入欧洲共同体。但一小部分来自北部、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并没有被说服。

1993年6月，谈判在布鲁塞尔开始进行。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熟悉的、与挪威的特权法案一样历史悠久的问题。原油配额是其中的一个：工党希望维持国家石油公司的特权地位，把它作为将在几个月后很可能被欧洲部长级会议通过的“原油法令”的一个特例来处理。奥斯陆同样还坚持要求对广大渔场的控制权，布伦特兰甚至声称，渔业部长、一个欧洲统一的怀疑论者对谈判结果具有最终否决权。提出这样的附加条款无疑是想缓解挪威北部地区人民对工党道路的怀疑。挪威国内强烈抵制工党加入欧共体的倡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挪威国内，“对欧共体说不”运动现有拥有比任何政党都要多的成员。

欧洲问题现在成了挪威工党的一个可怕的危险。它的长期目标可以说野心勃勃：在欧共体范围内继续建设社会民主主义。但它让挪威加入欧共体的短期成本无疑也是巨大的。挪威的福利国家水平要比欧共体高，这不仅表现在社会服务的供应上，也表现在向比较贫困地区的倾斜的地区平等和对小农的补贴等上面。反对加入欧共体的运动在指出统一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牺牲问题上，一点困难都没有。而在争论的时候，工党领导层被迫站到一个与其实用主义风格不相吻合的意识形态立场上，^⑧在国内几乎没有共鸣。工党的传统呼吁过去在国内总是能够得到一致赞同。但它的新诉求却应者寥寥，就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挪威人民对于欧洲人这个新身份没有强烈的认同感。

可以想象，如果它过于强硬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它将冒大选失败的危险，有鉴于此，工党领导层在1993年9月大选来临之

前往后退了。在竞选中,它宣称:在谈判没有结束之前,加入欧共体问题是不会提上议事日程的,那时候,将举行全民公决来决定这个问题。它希望以这种虚以委蛇之计来解决欧洲问题。选举结果让工党如愿以偿。挪威工党收获了经济回升和利率下降的果实,重新赢得自己在1989年丧失的工人阶级选民,而又没有因为它倾向于加入欧共体招致潜在的政治损失。但非社会主义阵营却还是在欧共体问题上引发了动乱。在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安妮·恩格尔·拉恩斯坦(Anne Enger Lahnstein)的领导下,农民党登上了反对布鲁塞尔战斗的王座,其选民因此扩大了3倍,从而取代依旧热烈支持加入欧共体的保守党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从短期效应来看,反对派的分裂使工党今后的日子要好过多了。作为一个少数党政府,工党必须谨慎处理与两个主要议会反对党的关系:在经济问题上与保守党合作,在社会和地区政策上则要与农民党合作。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它的欧洲战略的前景则要暗淡得多了。按照挪威宪法,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需要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但1993年当选的议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加入欧共体。因此,即使公决结果——反对前一次反响积极,它也未必能保证通过。

工党的政治地位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忽视这些危险信号的程度。当工党在学院联盟(AF)和手工业联盟(YC)中寻找支持的时候,它与总工会的纽带就松弛了,而这正是它7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重要基础。总工会在雇佣工人中的组织率现在下降到了60%,它因为挪威工党对失业问题缺乏救治良方而遭受挫折。制定协议让工会成员集体加入工党的机会已经被延期。两方面都相互需要真实的分离,但合作已经排除在两者的关系之外了。同时,在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小部分反对领导层的左派反对派,他们的靠山不是工会而是反对加入欧共体的中间阶级。其



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奥斯陆的市长, 诺讷·格哈德森(Rune Gerhardsen), 挪威战后最著名的首相的儿子, 他领导着挪威工党和社会主义人民党联合执政的奥斯陆。这一公式可以被看作是真实地扩大挪威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希望所在。因为冷战结束之后, 曾使两党发生分裂的安全问题已经不再重要了, 当社会主义人民党跟着工党向右转的时候, 两者在社会问题上的差距也就缩小了。但尽管如此, 欧洲问题依旧是一个障碍。社会主义人民党依旧是反对加入欧共体的左派力量的领导者。如果工党在布鲁塞尔的谈判获得成果, 这必然会使它们分道扬镳。1994年11月, 挪威将面临就加入欧共体问题的第二次全面公决。在布伦特兰政府看来, 既然有芬兰和瑞典的先例, 挪威或许可以反转1973年全民公决的判决。如果这侥幸成功, 那么, 它将标志着20世纪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过, 即使失败也无妨, 因为布伦特兰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她知道, 加入问题将使反对派发生深刻分裂, 工党的优势毫无疑问将得到延续, 至少是在过渡时期。

三 丹麦：田园时代的终结？

尼尔斯·芬·克里斯蒂森

1982年8月中旬，丹麦人被告知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一份美国人写的报告对生活质量从地理、经济、社会、政治到文化的各方面进行了广泛调查，丹麦在全世界107个国家中名列榜首^①。几乎就在同时，欧共体国家举行了民意测验，丹麦人声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国家都感到相当满意。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所有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报纸编辑和相当数量的国外观察家都认为：丹麦正经受着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的阵痛，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用不了多久，在国际金融大鳄的操纵下，丹麦就会失去经济自主权。或者就像挪威一家日报用诗般语言所描述的那样：丹麦人正走向地狱，但他们现在还是上等人。

尽管众说纷纭，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也表明，1982年事实上是一个分水岭。1982年的危机包含着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整个70年代，福利国家和公共部门的扩张越来越依赖于向国际资本市场举债。80年代初期，丹麦就背上了巨额公共债务，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预算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被用于清偿债务和利息。与此同时，失业率增加了10倍，也就是说，有30万人（相当于劳动力总量的12%）暂时或永久性地找不到工作。在建筑业、农业和制造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企

业倒闭。尽管这样,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要素还是成功地击退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传统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和由摩根斯·格利斯托普(Mogens Glistrup)领导的富于攻击性的新自由进步党的进攻。自从该党1973年登上议会舞台,丹麦的政治制度就经历了严重的冲击。1972-1982年,哥本哈根政府七易其主。这其中有一次促使社会民主党(SDP)上台,组成由安克尔·耶恩森(Anker Jørgensen)任总理的政府。但1982年9月,社会民主党被保罗·施吕特(Paul Schlüter)领导的自由党-保守党四党联盟所取代,这一联盟执政时间长达10年之久。丹麦战后政治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就此到来。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丹麦劳工运动长期无缘于政权这一情形呢?

农民的民主

70年代早期的政治危机并不直接导源于国际宏观经济危机,虽然后者的确使政治问题恶化和加深了。更确切地说,政治危机源于那个从世纪之交到50年代都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阶级结构的解体。

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降临主要还是一个农耕社会的丹麦。从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丹麦就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欧洲工业大国特别是英国的农产品输出国。起初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谷物,但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它逐渐被加工过的畜产品所取代。大约1900家制造业企业的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尽管在国家生产总量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农产品出口始终占据丹麦出口的75%,大大超过制造业的20%-25%,直到二战结束,这一比例都没有根本改变。但丹麦的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却高达44%,这个比例似乎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⑨

在丹麦经济的定型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和对世界市场的紧密依赖性显而易见地发挥了重要的决定作用。同时，国家阶级结构、社会关系和政治生活也在国家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丹麦在18世纪末期进行了全面的农业改革，到了19世纪，它就因此见证到了少数农业资本家利用雇佣劳动发展农庄经济的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拥有自己的房子、或许还有一小块土地的农业工人都是丹麦劳动阶级中数量最多、受压迫最深的阶层。但在整个这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始终没有被良好地组织起来。^④

在形式上和产品上都大同小异的小农场主阶级拥有中等规模的农场，他们伴随着农业资本家一起发展起来了。这些自己参加劳动、同时还以农场工人和女仆为劳动力补充、偶尔也使用雇佣工人的农业小资产阶级占据了全国耕地的75%，在19世纪，他们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9世纪80年代农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工过的畜产品成为最主要的出口货物，这个阶级因此也就融入了国际分工中了。

丹麦的农场主阶级几乎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小资产阶级都不一样，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组织基础上形成了独立的身份。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农场主就积极地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知识分子）结成同盟，为资产阶级民主打下了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在1849年的激进自由宪章中得到预示。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基本上被保守的制宪运动和政治攻势所充斥；特别是在1864年战争中丹麦败给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后（丹麦丧失了荷因斯坦和石勒斯威格两块领土），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形成。尽管农场主的政党、自由党（自由民主党）占据了下院的压倒性多数，但大约从1870年开始直到1901年，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却依旧保持着行政权。这段时期内的阶级斗争相当激烈，斗争的目的是为争取议会民主原则，即行政权

应在下院的多数派中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丹麦的地主阶级利益可以与德国的容克阶级相比:如果不说其领导人埃斯特鲁普(Estrup)与俾斯麦是一丘之貉,那么也肯定具有俾斯麦式的特征。

整个农场主阶级的事务被紧密地组织起来了。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丹麦的农场主就建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和信用银行,稍后则是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合作牛奶场、屠宰场和食品加工厂的建立使农场主阶级实现了经济突破,这样,他们就完全独立于大地主阶级,并能够抵制商业资本家收购农产品加工厂的行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在合作基础上组织出口已经被证明是可能的。

农场主进行了两种形式的政治组织:在地方上,于1841年引入了地区自治政府,并在全国成立了“农场主之友”(自由党或“左派”的前身)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它包括农业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小团体。这是一种反对等级制度的、作为各个地方分支机构的选举委员会发挥作用的、政治组织形式,一方面它享有高度自治,另一方面,议会党团在制定其具体的政策时也拥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⑨

农场主为一种独立的阶级文化而斗争缘于一场反对国教会的理性主义及其神职人员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结构的广泛的宗教复兴运动。这场超越了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障碍的运动主要有两个目的。它一方面按照资本家的标准建立了学校教育体制,另一方面又建立了一个培养了个人责任与集体一致原则相统一的群众组织,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很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主流。从制度上讲,宗教运动还是停留在“人民教会”的体制里面,根据1849年的宪法修正案,“人民教会”作为绝对主义的国教会的替代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这种文化的主要阶级意识效果体现在对国家教育结构的影响上。通过为本阶级的青年男

女建立义务学校和人民高中，农场主阶级选择了另一种国家体制。从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这些学校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在教学中复兴与各种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宗教和丹麦历史教育，它为农场主建立了一种鲜明的社会文化身份。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丹麦的农场主都作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否定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农民不能使自己成为独立的、自觉的、有政治活力的阶级。通过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农场主阶级建立了一种其影响一直渗透到20世纪、不仅对政治前景而且对劳动阶级自身的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的自由民主模式。早在19世纪80年代，民主自由党和农场主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民主党就结成了一个同盟。它们之间的协定的作用就是聚集工人的投票，打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城镇的独霸地位。这一行动很快取得了效果。对于劳动阶级而言，他们较早融入资产阶级民主，并且已经确立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转型不可能通过其他手段来实现。

国家通过教育津贴和向地方教会直接选举出来的牧师支付工资这种形式为农场主阶级另外的文化实践提供财政支持，这是丹麦民主传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整个20世纪，即使在阶级斗争最严峻的时期，宗教、教育和政治组织（大多数是左翼）的绝大部分开支都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且用不着受制于任何意识形态控制。不用说，国家不是出于对当下运动的关注，而是出于统一或归化这些运动的愿望，而被要求表现出这种自由宽大的。

资本主义向着农耕社会——没有大的或有活力的工业部门——的突入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工业资产阶级。直到19世纪后半叶，制造业主在丹麦资产阶级中仍旧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其数量低于农业、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工业家才确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

济目标。其次是新兴的劳动者阶级——假如不考虑以上提到的农业工人——的核心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后封建的工匠。这样的工业结构不仅在商业界而且在工业界都是由小团体掌舵。除了几个大型企业（造船厂、工程机构、纺织厂和烟草厂）雇佣了100名以上的工人，一般丹麦工厂里工人的数量都只是5-20名。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资本主义背景下，在雇主和工人的紧密关系中存在着强烈的家长制特征。

劳动阶级形成阶段的最大特点是大量的农业工人和农村手工业者涌入城镇，特别是哥本哈根。1901年，丹麦首都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在农村出生的，直到今天，劳动阶级中还有许多人 and 农民阶层有着直接的血缘联系。由于是来自农村，所以这些工人很自然地常常受到农场主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支配。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小资产阶级观念转变为劳动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个意识将超越个人主义、以财产为中心的农民意识形态，同时保留其民主的潜能以巩固该党的改良主义地位。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里，工人运动被证明能够将大多数熟练工人、大批的非熟练工人以及相当一部分女工组织起来。从19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全国各行业之间逐渐形成了联合网络。这种组织上的推动力和那场在1899年的封闭工厂运动中达到高潮然后偃旗息鼓的阶级斗争有密切联系，这是第二国际历史上历时最久、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劳工大论辩。为辩论划上句号的是“1899年9月协定”，它为丹麦时至今日依旧发挥作用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的辩证关系打下了基础。一套特殊的司法制度被建立起来，以调节雇主和雇员、工会和雇主联合会之间的关系。新法庭包括审议中的组织所任命的人选以及一个“中立”的主持法官，它有自己的程序原则和制裁原则。它们所尝试推行的模式包括：在（通常是两年的）协议期

内保证工厂稳定的义务；对领导人和下属组织的行为负责的主要机构的责任。这套具有半官方的性质、覆盖面很广的司法体系的较早出现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它为工人和资本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打下了基础，同时又促进了两者的顺利合作，以及国家和阶级组织的合作。它所确立的趋势在整个 20 世纪始终在稳步发展。

内阁对下院负责的原则在 1901 年最终实现以后，民主自由党就成为自然的执政党，并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反社会主义形象。它打破了和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同盟，逐渐成为大地主以及在保守的上院中受到损害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言人。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建立起了自己通过逐步改良把社会重新组织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的战略。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很清楚，丹麦的劳动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实行独立政策的程度，它因此寻找和其他阶级和阶层的合作机会，最后与 1905 年从民主自由党分裂出来的激进自由党结成同盟。这个党的社会基础主要跨越了小农场主和进步的知识界，尤其是城乡学校教师。社会改良、反军国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是该党讲坛的主要话题。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激进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联盟都是丹麦政治的枢纽。从 1929 年到 1966 年它都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执政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自由保守党的两次短暂执政（1945 - 1947 年和 1950 - 1953 年）时期才中断过。1915 年成立的代表传统地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保守知识分子利益的人民保守党为丹麦实际的政党制度画了一个句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社会民主党就一直是第一大党：1935 年其选民支持率达到 46% 的历史新高。但与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不同，它从来没有获得绝对多数。其他政党的力量则发生了相对的变化，虽然它们之间的波动起伏总是很有



限。在地方政坛格局上,丹麦的特色是,民主自由党通常在农村选区地位稳固,而社会民主党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城镇。阶级结构和政党结构在整个这段时期(1905 - 1966)大体是和谐的。小资产阶级在各个政党中都得到了体现,从而作为各种政治改良和社会改良的基础的阶级合作催化剂发挥了作用。1915年宪法作了修改,妇女被赋予公民权,修改了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制度,增加了部分议席,其目的是确保各个政党的比例代表。尽管社会民主党竭力反对,上院还是保留了下来,直到1953年才作了彻底的改革,引进了单一议院制。今天的议会拥有175名丹麦成员,还有两位格陵兰岛的代表和两位法罗群岛的代表。比例代表制和较低的选举下限(进入国会的最低限度是2%)的融合对于丹麦政治制度的形成来说是关键性的。

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加深了社会对抗性,加剧了主要阶级、事实上主要是劳动阶级内部的对抗。尽管出现了规模巨大的革命工团主义潮流,但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依旧牢牢控制着丹麦的劳动阶级。1919 - 1920年,此起彼伏的革命潮流也在丹麦共产党那里发生了融合,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挪威共产党那样赢得支持。丹麦共产党只在1932年才第一次取得了议会代表资格。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攻击劳动阶级。社会民主党短暂的少数党政府(1924 - 1926)在其执政期间几乎无所作为。^⑧

1929年社会民主党和激进自由党联合成立了一个多数派政府,它上台以后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直到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丹麦。该联盟对经济衰退的应对政策取得了民主自由党的赞同。农场主和工人之间缔结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其用意在于保证丹麦的农业生产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一个稳固的地位,并使劳动阶级的最低生活保障得以实现。结果是公众对危机四

起的农业、社会改革立法的扩大、繁荣工业和商业的温和期望给予热烈支持。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眼里，这个举动背离了他们的传统目标，代表的是跨越阶级路线的“人民政策”，这是一种平衡（国家权力能够在其中成为一种推动力的）社会利益的努力。对于劳动阶级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期间，当（只有丹麦共产党被排除在外）全部政党联盟管理国家的时候，这一代价尤其巨大。在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罢工多少是非法的，社会民主党及其工会牢牢控制住了劳动阶级，使左派的反对意见几乎没有多大市场。

就这样，丹麦社会民主党发展了一种双重模式。一方面，持续存在着改良趋势和对劳动阶级物质福利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对这个阶级施加严格的纪律约束，压制左翼的批评意见和革命倾向。中央集权的工厂工会拥有较高层次的劳动力成员，加上30年代后进一步加强的工厂委员会制度，这二者构成了这种双重模式的决定因素。

丹麦的社会结构决定了这种形式上的阶级合作事实上必须进行福利改革。因为没有哪一个阶级或集团强大得足以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在瑞典，劳动阶级和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联盟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然而在丹麦，这样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根本就不存在，社会民主党和农业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使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受到了严重制约。二战之后社会民主党试图引进灵活的商业周期和工业政策，这么做的前提是工会愿意接受经济合理化的需要。实际上这个构想根本无法实施，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有了希望。与此同时，劳动阶级的激进分子也几乎没有人提出要对官员的权力加以节制。二战刚一结束，丹麦共产党的力量显出强大的增长势头。但是不久以后冷战开始，在举国上下反共的气氛中，加入北约的丹麦放弃了长久以来的中立立场，情况就大不一



样了。

1957—1958年,紧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丹麦共产党一下子从巅峰跌进深渊。在丹麦共产党前任主席阿克塞·拉森(Aksel Larsen)的领导下,丹麦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分离出来新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某些方面,这个新党的政纲预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某些内容。但它主要还是得利于反军备竞赛和中立主义,它的选举胜利——1960年赢得了9%的选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和核裁军运动以及丹麦国内其他一些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联系。新党努力想要给社会民主党施加压力,迫使后者从合作的框子里跳出来,执行能使丹麦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策。1966年,社会主义人民党赢得了11%的选票,在其后20年里,这支政治力量一直是社会民主党左派中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议会力量。³⁰⁹

阶级和政党

社会主义人民党的诞生第一次预示了丹麦传统政党结构的崩溃。它恰好顺应了丹麦经济和阶级结构的开始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历史潮流。从传统上讲,丹麦必然是属于世界上经济最开放的国家,因为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从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换和劳务输出中获得的。尽管和世界市场融合得很紧密,但直到1958年丹麦经济才开始享受战后大西洋繁荣的成果。

与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三党联合政府的通货再膨胀政策同时到来的经济繁荣,改变了丹麦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早在1960年,丹麦的工业出口就超过了农业,到了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来自出口,这当中制造业的出口占了近70%(在1950年,这个数字是27%),而农产品出口仅占约25%。出口产品主要是标准食品、飞地制造业、船舶以及瑞典和其他国际

公司的转包合同。在这个阶段,农业和制造业的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减税和补贴,投资增长很快;地区发展政策使得工业企业遍布全国各地。无论是新兴产业部门(电子和化工)还是传统大规模生产线(纺织品和家具)都倾向于转移到劳动力低廉而丰富的地方,但中小企业仍然占了主导地位,大型企业依然是少数。结果出现了很不一样的资本结构,自然也就产生了极其不同的商业效益要求。

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丹麦国内的阶级结构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1960年到1980年,劳动力总量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约有四分之三的增长发生在地方和中央的公共部门。时至今日,每3个丹麦工人就有1个受雇于国家。这当然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变化。在这个粗略的统计数据后面还隐藏着阶级内部和阶级之间更广大的变化⁸⁸。最显著的变化是农业雇佣劳动力比例的大幅度减少。农业工人数量全面缩减,独立的农场主和小业主的数量同样在减少,以致从事土地劳作的劳动人口不超过全部就业人口的4%。当然,农业依旧是丹麦经济的重头戏,机械化已能确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不会出现实质性的降低。丹麦的家庭农场依旧是劳动强度最大的劳动者,当丹麦加入欧共体之后,资产价值大幅度上扬,他们承受着随之提高的巨大的按揭还款压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执著于拥有不动产这个理想。年轻的家庭发现自己置身于艰苦的劳动和债主无可逃避的压榨之下。

农业劳动力和小资产阶级生产单位减少是与制造业的重大变化相伴发生的。哥本哈根和一些省会城市一度集中所有的工厂,而现在则是“多中心的工业结构”,日德兰半岛和西兰岛的中小城镇,乃至全国的农村,都出现了许多工厂。在一些地区,借助于先进技术和廉价的非熟练工人,发展起了新的工业中心。劳动力大军中,主要有过去的农业工人和小业主,以及大部分的

妇女。农场有时也被保留下来：丈夫在工厂里做工，妻子在机械联营公司和周末参加劳动的丈夫的帮助下经营农场。

另一方面，过去仰仗熟练工的主要工业，例如造船厂，已经衰落了，传统上它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随着中间阶层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新产业工人就只能出现在边远地区了，传统的无产阶级主力要么搬进了新建的独立住房，要么搬进了大城市边缘的公寓里面。这个重大的转变引起了建筑行业爆炸式的发展，在这里，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工匠已经很难与日益依赖非熟练工人的产业公司竞争了。

在丹麦，几乎所有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都很高。^②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会和雇主结合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挂钩的制度，就管理合理化和技术革新等问题展开合作。既然由科技所导致的剥削率的增长伴随着失业的总体消灭、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增长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公共部门的扩张，那么，在经济繁荣时期，工人也就很容易接受它们了。为了跟上社会民主党福利稳步增长的战略目标，劳动力的公共后备大厦尽力满足了资本家对精壮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要求，而工会和法庭则保证了工厂的正常秩序。丹麦的工会运动是这种制度的支点，因此也许是西方世界权力最集中的工会（惟一可以媲美的是挪威）。它用依旧带有农业社会痕迹的劳动道德——艰苦而持久的付出，防患于未然的谨慎^③，最后一批踏入工业社会的劳动者已经继承了它——来加强自己的支撑点。许多女工仍在没有组织起来的血汗工厂里辛苦干活，只得到低微的报酬，或者在商店和办公室里做一点兼职工作。过去的农业工人或小业主从事重复性的、碎片化的、工作过程中集体精神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劳动。新一代工人因此开始对工人斗争运动抱怀疑态度，工会的等级制度也让他们愤愤不平。所以，个人自主和劳资利益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观念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因为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衰退,再度出现的失业现象——假如没有公共部门的扩张,失业率将会更严重——成为劳动者的新的纪律。丹麦的失业金相对较高,原则上是过去收入的90%。然而,事实上较高收入的工人和中间阶层人士最多也只拿到了他们以往所得的60%。救济金的领取服从于严格的管制和鼓励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僵硬机制;自由保守党的宣传揭露,失业这一社会耻辱正是与目前的劳动道德相适应的。和别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害最深的是年轻人。在过去的15年左右时间里,一大批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找不到工作,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政治特点与工人运动的标准完全不同的亚无产阶级群体。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民众各个阶级的态度和观点的彻底分化。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公共部门和工会的作用上。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冲突表现为一场就艺术的公共补贴问题的文化论战。在一些刚刚实现工业化的地区,特别是日德兰,当地的议会受到反对资助现代艺术的抗议、请愿浪潮的强烈冲击。请愿书上签名的有新近沦为无产者的工人,残余的小资产阶级和新兴实业家,他们拒绝把他们纳的税用在他们完全不理解的,以及用他们的话说,嘲弄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文化价值的绘画和雕塑上。人们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与社会民主党和新兴的知识精英结成的联盟,拒绝考虑普通群众的利益,随时准备将他们压碎。⁴⁸

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左派加剧了这一矛盾。1968年事件给丹麦提供了和在德、法两国一样的榜样。不安定因素其实在早些年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就悄悄酝酿成熟了,“动乱”的核心则来自20世纪60年代陡然出现的大学生群体。尽管这样,传统的标准和假设的毁灭使“动乱”的后果大大超出了大学生的圈子。最重要的结果是,几乎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领域都

大面积地、公开地政治化了,这是一个刻画了丹麦直至今日的政治特点的一种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妇女运动无疑是支领导力量。骚乱最重要的短期效应是对大学管理结构的彻底重组,大部分学生、所有教师、最后连与教学无关的教辅人员都获得了决定权,使这条法令成为全世界最民主的一条法令。⁶⁹最后民主化进程传播到了校园之外,以致民间运动要求在很多日常事务活动中都拥有发言权。

在政党制度方面,新左派的互相冲突使社会主义人民党内发生了分裂,于是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党:左派社会党。仅仅几年时间,该党就几乎把所有的左派激进分子——从嬉皮士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召集到了自己的麾下。该党在劳动者队伍里基础比较薄弱,但是它在1969-1970年不计其数的疯狂论战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在辩论的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这次罢工浪潮暴露了自50年代以来,国家、雇主和工会领导的合作体制中形成已久的矛盾。20世纪60年代的后5年里,罢工次数增加了5倍,不少发生罢工的地方过去根本就没有过工人斗争的传统,有些还是女工占大多数的工厂。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发现自己处于雇主、国家和工会的三重压力之下,他们因此不得不建立独立的行动委员会和募捐机构。他们还努力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以取代官僚气十足的工会。⁷⁰

动乱说明: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开始有所削弱。至于削弱到了何种程度,只有等该党领袖、多年担任总理的茵斯·奥托·克拉格(Jens Otto Krag)决定就丹麦加入欧共同体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72年就此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时候才能见分晓。结果是在丹麦举国上下引发了自二战以来最激烈的政治论战。一切阶级和阶层都发生了分裂,尤以劳工内部的分歧最为巨大。劳动阶级一分为二,一半的社会民主党选民反对丹麦

加入欧共体，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骨干都起而反对。

对于传统的政党体制来说，一年之后的大选等于是一场大地震。自战后以来，4个所谓的“老党”——社会民主党、激进自由党、民主自由党和保守党——通常总能赢得80%到90%的选票，社会民主党一党就得选票达35%—42%；4—6个政党在下议院拥有代表议席。而到了1973年，4个老党的得票跌落到了58%，社会民主党损失了将近三分之一的选票，仅得25%。保守人民党的支持率从16%跌到9%；民主自由党损失略小，只从15%下降到12%。但这些损失并没有使左派得益，因为尽管共产党获得了3%的选票，重新争取到了议会代表权，而社会主义人民党却损失了同样百分比的选民。赢家是代表右派主张的两大政党：中央民主党（7%）和进步党（16%）。小规模政党，如基督教人民党、深受亨利·格奥尔格教义影响的正义党也赢得了代表权。这样议会就有了10个政党。^④

回顾历史，1973年的丹麦大选——当年爆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之中——可以视作20世纪80年代横扫西方政坛的反向潮流的预兆。搅乱了丹麦政治现状的两个党派预先抛出了10年以后成为新右派标准议程的议题。有着超凡魅力的艾华德·雅各布森（Erhard Jacobsen）领导下的中央民主党——这是一个从社会民主党分离出来的右翼政党——为那些拥有私宅和私人交通工具的业主说话，主张加强警察统治，严厉反对罢工。不过该党竞选的基调还是文化主题：对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制度的“政治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同时谴责了左派对大众传媒的渗透。该党的主要选民是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他们对该党关于住房、教育和文化等诸多问题的呼吁深有同感。

进步党则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业绩。其创始人和领导人摩根斯·格里斯托普于20世纪60年代曾建立了一个专门为那些



想逃避所得税的有限公司提供服务的成功的律师事务所。他曾在电视上简短地露过一次面,宣称他缴纳的所得税一年不超过100万克朗,自那以后他名声大振。用他的话来说,所得税既破坏国民经济,又是工薪者不公正的负担,避税的意义好比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不久以后,格里斯托普组建了进步党,1973年进步党就成为议会的第二大党。进步党号召武装起来,就是向社会民主党政府——代表了公共官僚、小公务员和领取高工资的大学毕业生的利益的瘟疫——的整个大厦发起平民主义的猛烈冲击,它向纳税的市民源源不断地散发传单公告和函件,其要求和原则是以一种普通老百姓难以理解的语言来表述的。格里斯托普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更是毫不留情,说它是社会工作者及其懒惰的赡养者的食槽,抨击前卫艺术家是在市场中养不活自己的寄生虫;指责学校里的教育破坏了家庭和工作的价值。国家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大规模削减公共部门,将公共部门里的雇员转化为产业工人。这样才可以减少税收,人们的实际收入才可以真正提高,才有工作和储蓄的激情,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民主党还有自由保守党长达几十年的苛政之后,重建丹麦经济。这些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虚构对丹麦人来说新鲜,但实际上许多都是西方世界很普通的东西。抗税运动从此开始了,最终导致了十三号动议的骚乱和撒切尔、里根的胜利。

中央民主党和进步党之间的亲和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两者都是讲法制和秩序的政党,都是私人财产的捍卫者。它们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几乎是如出一辙。两党都以各自的领袖人物为中心,两位领袖也都表现出了交流特别是电视交流的特长,这在丹麦政坛上是罕有匹敌的。格里斯托普是位言辞动听的演说者,他总是在创造一些很快就被大众所接受的新名词。与进步党不同,中央民主党对国家没有那么深厚的敌意,但事实上,它也同样鼓吹要对学校和公共媒体加强控制。(雅各布森最重要的论

调就是要建立一个“具备活跃的监听、监视能力的”、能在电台和电视上监控“赤色分子”的社会。)

格里斯托普更加自由化的反动倾向,赢得了广泛拥戴。进步党把小店老板、批发商、农场主、渔民、房地产经纪入、卡车和出租车车主、小企业家、部分私人企业雇员等各色人等聚拢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成分还是劳动阶级。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资产阶级会被它吸引过去。因为小资产阶级在生产和分配上长期受到垄断资本家的排挤(1960-1972年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小生产者被消灭),^⑨国家对他们施加的负担也是越来越重,如新的服务工作、申报增殖税、社会福利支出等等,都要他们承担。在他们的家庭中,丈夫和妻子都要全天候地工作,晚上还要为国家或地方当局服务。他们中有很多人对于福利国家已经完全疏远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运动的直接后台是担心社会民主党谴责他们破坏福利国家、因此大规模地扩张公共部门的自由党-保守党政府,3年内(1968-1971),它将国民生产总值内的税收比重从35%提高到了43%。

进步党致力于取消战后工人运动所取得的几乎一切成果,但是为什么工人们还纷纷加入或支持这样一个党?格里斯托普的支持者当中五分之一以上是无产阶级,1973年进步党成为国内第二大劳动阶级政党,那时全国工人有约10%的人投了进步党的票。进步党的选民多数是年轻的、非熟练的、低收入工人,他们常年累月地和他们的雇主在小厂里并肩劳动。因为大多数第一代工人都陶醉于他们的“发迹”史,所以他们把选票更多地投向了自由党或保守党。但社会民主党的遗赠物——丹麦工人身上的不平等的高额税收负担,以及内部竞争基础上的工资制度所产生的个人化效应——也对他们的想法有所影响。

70年代政坛上的另一处新景观是迎合受雇于公共部门中间阶层的政党的发展,社会主义人民党和改组后的丹麦共产党

是它们中的左派。这是丹麦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不仅包括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教育机构的公务员,同时也包括那些半国有的金融机构如银行、信用社和保险公司中的职员。丹麦公共部门的公务员队伍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大,其发展势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最后所达到的规模也许只有瑞典才能与之相提并论。^①

这一新兴阶层几乎与所有传统阶级都有渊源关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他们大多数人都已失去了原先的阶级根基。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没有历史:他们不能与其祖先发动的文化和政治斗争或当下其他阶级之间发生的斗争进行认同。从他们的职业来看,真是千差万别,有常任副部长、法官、警察和教授,层次低一些的有一般办事人员、走读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服务员。他们的收入、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也是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依赖于公共部门,都希望公共部门能得以保留甚而扩大。

在政治倾向上,他们理所当然地支持那些以保护或扩张公共部门为己任的政党。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是这个阶级的天然要塞,因为社会民主党一直把国家看作是它政治战略的中心支点。因为社会再分配、平等的受教育权、经济增长和反周期调控都是国家应当做的事,这同时也是控制社会的有效手段,进而可以规范全体的劳动者和人民。

从理论上讲,中间阶层可以看作是雇佣工人大军的一支分遣队。而事实上,这个阶层所从事的劳动却被古典政治经济学看作是非生产性、吸收剩余价值的劳动,可以肯定,它最终导致和传统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不用说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对立。越来越多的丹麦工人趋向于把公共部门的供职者看作是食利者,他们坐守从工业、农业、渔业、零售业等等艰苦劳动中抽取来的税收,但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

必然结果，在此情形下，这些雇员也必须忍受低价的报酬和艰苦的劳动。结果是：这批人——经常以可以理解的方式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资之外的目标——的好战性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要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更多财富的贪婪。另一个误解的源泉在于这个阶层的文化标准，他们总是想把私人领域全部政治化，甚至要比丹麦历史上一切传统工人运动做得更彻底。在这层意义上，该阶层对传统的劳动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价值构成了挑战，这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也得到了反映。

1973年大选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是一个警告信号。其直接结果倒不是使议会体系的重心移向右派，而是给丹麦政策带来了一种新的易变性。60年代末的推动力在左派那里还没有完全泯灭。处于社会民主党外翼的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丹麦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还继续吸引着10%—15%的选民。它们的成功和新右派势力的成功如出一辙，都反映了战后丹麦模式的发展正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危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民主在丹麦已经具有了相当发展的形式。在一个人口不超过500万的小国，自由的传统已深深地扎根于一切社会阶级。所有寻求议会代表的政党都平等地享有上广播和上电视的机会，即使那些没有议员的党派也同样如此，只要他们能召集2万名选民的请愿队伍，这对它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其实就上电视而言，小党和大党各自亮相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即使那些在竞选中无望获胜的党派也能够向世人展现它们的政纲思想，而在西方国家的标准条件下，它们的那些思想是不可能传播到全国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至今还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政治团体的领袖或候选人也都能够很快地闻名全国。丹麦政体的这个自由空间给社会底层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斗争提供了动力，使得外缘的左派政党和运动对政治论战能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它们力量所及范围之广，可以用丹麦没有绿党这个事

实来说明,因为像丹麦这样的国家原本是发展绿党力量的理想场所。

自由党领导的政府执政两年毫无作为,因此于1973年黯然下野,此时民众对左派联盟的支持达到了1945年以后的顶点,社会民主党因此重返政府。自60年代后半叶以来,社会民主党一直尝试着要推行一套作为其传统的福利增长政策的替代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计划。后凯恩斯主义计划重视收入政策、“经济民主”和公共部门的扩张的结合。计划很快遭到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批评,被指责说它容易助长官僚主义习气,庞大的工会机构也会因此被赋予过大的权限,于是这个一揽子计划在劳动阶级中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因而也未曾付诸实施。持抵触态度的中央各党注意到了这些。非熟练工人联盟的领袖安克尔·耶恩森于1972年出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并在整个70年代几乎没有间断地担任了政府总理这一要职。他有过硬的劳动阶级背景和清白的道德形象,这使他越过一切社会障碍赢得了举国上下的尊敬。但他为之人格化的战后福利传统如今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外债日益攀升,预算赤字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党能够周旋的余地已经大大缩小了。自一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在丹麦议会取得绝对的多数——所有的政府都是清一色的联合执政或少数党内阁。但随着70年代新党派的迅速增加,赢得议会多数变得容易些了。在耶恩森的大部分执政时间内,他领导的都是一个少数派政府,但始终存在着要求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合执政的驱动力。这些驱动力部分地根源于地方政府的局势,因为这是丹麦政治传统的权力基地和训练场所,而在这里,两大政党长期垄断政权。全国将近一半的市长是民主自由党人——而在议会选举上他们的得票从未超过10%,他们使当地有着百年历史的农业传统得以复苏。社会民主党人控制了另外三分之一的市政权力。这样的权力分配

使人们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但凡重大的政治、社会或文化改革都必须能调动这两大政党的支持。当70年代末经济形势恶化的时候,为了应付国家的财政危机,寻求一个稳定的政治局势,政治家们终于于1978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然而联盟存在时间并不长,原因是联盟双方就医治经济衰退的问题莫衷一是,工会非常激烈地反对政府,如果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发生分裂就会直接动摇丹麦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柱,而且这种危险正一步步向他们逼近。于是,联盟在1979年解体。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社会民主党竭力想凭自己的力量解决危机。但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反对新自由主义解决方案的呼声已经大大微弱下来了,因为强制节约的政策并没有使它得到任何好处。不过,仅仅这一点还是不足以减轻他们巨大的外债负担,或是赢得国际金融市场的信任。1982年,没有经过普选社会民主党政权就无疾而终。入主政府的是保罗·施吕特领导下的自由党-保守党联盟。丹麦的政治气候开始转型了。

反动的10年及其后果

进步党播下的种子,如今轮到保守党-自由党联盟来收获了。丹麦新右派的异军突起是70年代初的一道显眼的风景线,但它们与国际潮流格格不入,且与格里斯托普异国风情的人格特征认同过多,以致不能在政府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它也为市民社会态度的持续转变奠定了基础,而这一点现在已经在国家层面表现出来了。施吕特开始掌权的时候,外部的经济形势相当不利。撒切尔和里根为大西洋世界制定了主导性议程。最初很少有人认为哥本哈根的新政权能维持很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施吕特于是很快就受到这些预言的迷惑而不知所措了。1982年保守党-自由党刚一上台,就随即出台了工资冻结法案,宣布削减失业救济,实施大幅度的通货紧缩、取消管制和私有化

等一系列政策。政府公然侵犯雇佣工人的利益,反而使得社会民主党不知所措。社会民主党一味不相信别的政治力量不可能有能力统治这个国家,因此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相信事态迟早还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但丹麦的劳动阶级和工会运动却并不消极观望。一浪接一浪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在几场战后规模最大的政治示威中,示威者抗议政府对传统的自由的集体工资谈判的干预。在新政府统治下受害最深的公共部门的雇员和他们的工会站在了运动的最前沿,运动于1985年爆发的旨在颠覆政府的大罢工中达到了顶点。然而施吕特政府不为所动。丹麦政府在这场较量中的胜利可以与撒切尔政府击溃英国煤矿工人罢工的胜利相比。但和伦敦的保守党不同,丹麦政府没有进行立法反击。1985年春季危机过后,随着失业率的增长和工会内部的争论不休,工人的战斗精神也就日渐淡化了。

一旦公共部门驯服了,资本获得了更自由的发展空间,政府也就能够赢得一系列经济成就了。通货膨胀降低到了欧洲的最低水平,巨额的外贸赤字被消灭了,丹麦克朗紧随着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经济增长以较小的幅度稳步增长。当然,换取新自由主义成就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失业率无情地上升到全体劳力的12%,高于欧共体的平均水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提早退休和隐性失业的人。妇女受害最深,社会分化全面扩大,出现了大批的新贫民,特别是青年人和单亲家庭。很多人非但享受不到传统的福利待遇,反而堕入了一种亚文化中去,在这里,失业的不幸还伴随着道德的失落——他们常常吸毒和酗酒。

丹麦的福利国家在舆论中根深蒂固,以致施吕特政府根本不能解构。真正落到实处的只有救济金的有限缩减,更激进的措施则受到了联合政府所依赖的中央小党的阻挠。由于保守党

自由党政府在议会中从没有拥有绝对多数，因此它总是要依赖于其他力量的支持。施吕特施展相当精到的战略战术，将一系列反社会主义力量笼络在政府手中。在它们内部，劳工也存在着保守党和自由党之分，两者的分别好比撒切尔治下的保守党的两翼。保守党代表了传统的右翼实用主义，这已成为丹麦保守党的标志。施吕特最有名的一句格言是：“意识形态就是垃圾。”另一方面，自由党开始成为国际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拥护者。农场主的民主运动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一次性政党最终被直率的外交部长乌弗·埃勒曼-延森(Uffe Ellemann-Jensen)领导的、具有进攻性的极端资本主义理论家所吸引。自由党现在领导着一个由独立的农场主、工业资本家和大金融家组成的空前的联合体，并召集了一批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新生代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

如果说自由党在攻击福利制度——尤其是频繁地动用、甚至或真或假地滥用失业救济金——方面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而且设下了个人主义、不平等和利益驱动在其中变得合理的意识形态议程，那么，赢得了过去格里斯托普的支持者和其余联盟政党的选民的保守党则是政府选举的最大受益人。

施吕特政府信心十足的反社会主义攻势让社会民主党陷入了混乱，他成功地将社会民主党描绘成丹麦政坛上坚持陈腐的、团结一致和中央集权思想的保守派。朝野上下都指责社会民主党必须要为国家的种种不幸灾难承担责任，社会民主党被迫进行意识形态防御，但因为寻觅不到新的方向而倍感迷惑。它默默地接受了很多新自由主义的方针，正如丹麦在全球经济当中被动的地位所要求的那样。丹麦的工会在成员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失，他们的白领和蓝领工人的组织率世界上还是最高的。但是在1985年失利之后，领导层很不愿施展其潜在权威，部分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组织规模还不足以和任何的好战团体



对抗,更何况社会主义。他们的碌碌无为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缺少政治方向这一问题。

安克尔·耶恩森在1982年辞去总理职务后,继续担任党的领导职务达5年之久。尽管他享有广泛的声誉,但是他太拘泥于传统,在80年代形势剧变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对社会民主战略进行一番再思考。社会民主党因此于1987年选出了斯文德·奥肯(Svend Auken)来接替他。这个抉择是有争议的。44岁的奥肯出身于颇有声望的书香门第,在一所大学任职,他上台之后,给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新的作风。他在分析问题方面有着非凡的禀赋,并且凭借他高超的技巧在政治论战中所向无敌,然而他为人刻薄,使他在党外树敌不少,即使在党内不喜欢他的人也大有人在。由于他在社会民主党外早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因此自1990年开始形势就已很清楚:也许除了社会主义人民党之外,没有哪个政治团体会选择他担任未来的总理一职。尽管奥肯有这么多的缺点,他却怀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他领导下,社会民主党开始重新考虑其处境。耶恩森领导的运动领域在于外交政策,社会民主党小心翼翼地和平运动——和别处一样,丹麦的这个运动是为了反对北约和华约之间20世纪80年代新一轮军备竞赛而发起的——靠拢。现在,奥肯则就社会民主党如何面临90年代的问题发动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主题讨论。在1990年的大选上,他领导该党在选举中收复了很大的失地——得票率返回到37%。

不久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复兴之梦就失去了光彩,因为摆脱了金融管制的投机浪潮崩溃了,导致大批房地产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破产,泡沫经济使人们丧失了对自由党-保守党政府的信任。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盟似乎有机会卷土重来了。为了加大保险系数,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其主席免职。1992年春,奥肯的职务由保罗·尼洛普·拉斯姆森(Poul Nyrop Rasm-

sen)接替。拉斯姆森是一位出身劳动阶级的大学教师,以擅长解决问题而闻名,与决断相比他更善于妥协。当年秋季,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接受了该党的新纲领。还在讨论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随着东欧共产党政权的解体,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将很容易渗透到那些地区——对那些新获得自由的人民而言,选择斯堪的纳维亚式的福利制度以摆脱他们的苦难,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然而,事实却让每个人都意外地失望,“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眼在东欧声名如此狼藉,以致哪怕是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都不能为人所接受,相反,货币主义和民族主义在那里大行其道。这一震动的反响在社会民主党的宪章里仍清晰可辨。新的纲领完全接受了因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而人道主义化了的市场经济观念。市场的内在合理性在外在于自己的福利合理性中找到了自己的补充。宪章努力想在80年代的个人主义和团结稳定的旧思想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当然,人们也可以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字样已完全消失了。对工人运动的传统乐观主义已让位于对未来选择的冷静分析,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包括社会主义的。

在几个月之后的1993年1月,施吕特政府很不体面地垮台了。使它名誉扫地的是移民问题的东窗事发。和80年代其他欧洲右翼政体一样,丹麦打的是排外牌,但在丹麦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度内,这种事情毕竟不能像别的地方一样明目张胆地做,而只能偷偷摸摸地来。最高法院法官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施吕特的前任司法部长艾里克·宁·汉森(Erik Ninn Hansen)曾有司法舞弊行为,企图限制斯里兰卡政治避难的人数,施吕特则千方百计地掩盖丑闻,丑闻曝光后,政府黯然辞职。宁·汉森受到议会的弹劾,施吕特和保守党的其他一些要人因此失去了一切政治影响力。三个中间派小党改变立场,转而投奔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联盟,保罗·尼洛普·拉斯姆森当选为政府总理。

丹麦长达 10 年的右派占优时代就此结束了,自 17 世纪以来,丹麦第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欧洲政坛的中心。保守党-自由党政府参与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协商,现在条约需要所有缔约国的同意才能生效。然而在 1992 年 6 月的丹麦全民公决中,它却遭到了否决,丹麦扼杀了欧洲联盟。事实上,20 多年以来,关于欧洲共同体的态度使丹麦国内分化为势力相当的两派。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热烈地拥护加入共同体;将近一半的选民被劝说相信,如果不加入欧共体,丹麦将难以为继。但是从 1972 年就加入欧共体的第一次全民公决以来,大多数丹麦人都认为加入欧共体有悖于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可思议的是,劳动阶级的情感取向不断地被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误读。1972 年他们一再要求对这个问题说“是”,可是代表他们投票的大多数人却投了反对票,倒是其他社会阶级投了比较一致的赞成票。1986 年社会民主党号召人们反对单一市场,工会分化为两派意见,结果在劳动阶级的支持下,议案还是得到了全体一致的通过。1992 年,除了社会主义人民党,丹麦所有的大党都呼吁接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但由于 60% 以上的工人运动投票反对,这番努力又无功而返。

此时的欧洲外交界陷入骚动不安之中,社会民主党和激进自由党(现在已沦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跨出了重要一步,它们与反对条约的最大政治势力,也就是社会主义人民党——该党被认为是惟一能解开国家死结的救星——达成了一项协议。这个结果就是随后得到政府认可的所谓的“国家妥协方案”。1992 年 12 月在爱丁堡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丹麦单方面要求:丹麦不进入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最后阶段,不使用欧洲统一货币,不参与欧洲防卫政策,也不接受对欧洲公民的规定。大会接受了此项声明。一个月之后施吕特和埃勒曼-延森下野,此刻轮到拉斯姆森对修改条约的问题组织一次全民公决了。

于是,1993年5月,丹麦人为了是否加入欧共同体进行了第四次全民公决。结果是56%的多数持赞同意见。鉴于议会中除了进步党之外的全部政党都呼吁接受条约,因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可以说相当高了。在对待欧洲这个问题上,丹麦人往往与他们政党领袖看法相左。因为判定从来都没有改变,因此造成这个差别主要是两个因素。第一是社会民主党重返政府。很多社会民主党的基层选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反对条约就等于是向拉斯姆森政府投了不信任票,因为他们也不愿意刚出现转机就去冒险。因此,45%以上的社会民主党选民投了反对票。如果说这个数字没有进一步增长上去,那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人民党号召人们接受条约所作的努力了,这对最后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该党使赞成票合法化,打消了不少犹豫观望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顾虑。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全民公决的结果对于社会主义人民党自己却是一场灾难。该党的领导完全错误估计了其选民的态度,80%以上的选民投票拒绝接受修改后的条约。社会主义人民党惨淡经营了20多年,在议会中构筑了反对共同体的核心力量。仅凭爱丁堡的政府峰会上定下的只字片言是无法改变该党选民的思想的。

多年以来,欧共同体问题成了丹麦政坛上首当其冲的大问题,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作了修改但还是不能得以解决,也许这个问题就要一直延宕下去了。令人惊奇的是全体丹麦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超越各党派的门户之见,可迄今为止的多次全民公决也未能对政党制度发生任何触动。国家极大地卷入纷争,家庭及几乎所有经济和政治团体都发生了分化,但是在投票之后,大多数人还是回到自己过去的政党那里。现在,“国家妥协方案”改变了丹麦政治的一个重要参数。出于一切实用的意图,它清除了议会内部一切来自左派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参加妥协方案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政治上给自己缴

了械。社会主义人民党受到其选民的强烈批评,虽然没有损失多少党员,但已失去了往日的雄风,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今天的丹麦等于有两个社会民主党,分别代表了温和的和某种程度上更激进的思潮,而这两种思潮在别的国家是能共存于一个屋檐下的。这两个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对峙是选举制度的结果,是风格问题和历史的结果,而不是什么本质的政治差异。在议会之外,左派已不再强大。多数活跃一时的马克思主义小党和左派团体如今日趋衰落:青年人加入这些组织的微乎其微。有些团体想要聚集在独立的社会主义议程下,也有一些团体聚拢在名为“联合社会党”小组织里,该组织的基础是红绿结合的最低政治纲领。这样的小漩涡距离丹麦政治的主流当然很远。此时的社会民主党试图努力恢复社会干预措施,它们比即将离任的政府更为小心地谈论失业问题,巴尔干半岛的难民对它们则表示了更友好的欢迎态度,尽管这样,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前途也还不甚明朗。在丹麦,新旧左派都已成为过去了,重新建立一个左派可谓是任重道远。

四 德国：左派的停滞

斯蒂文·派杰特 威廉·帕特森

在过去的10年中，联邦德国——欧盟最大也是最强盛的国家——的左派政治已经停滞了。社会民主党在执政16年（1966—1982）之后，至今在野已超过10年。从1980年到1990年，其国内得票率从42.9%降到33.5%；选举腐败已深深地渗透进了其选民——体力劳动者阶层之中。在意识形态上，该党于1959年在巴德格德斯贝格通过的战后纲领的指导性原则现在大部分都已经过时了。80年代社会民主党“重新界定社会民主主义”的尝试已宣告失败，它只是暴露了党内新旧势力在社会文化上的裂痕。分裂必然导致内部凝聚力的丧失。两德统一及其他方面的后果使政治上的冲突更趋紧张，政策分歧也随之加剧，并且迅速蔓延到党内每一个阶层，包括一度紧密团结的领导精英。拉方丹（Lafontaine）、恩霍尔姆和沙平（Scharping）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始终处于过去以勃兰特（Brandt）、魏纳（Werner）和施密特为领袖的社会民主党的阴影中。

社会民主主义的全民党

回头看来，三架马车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卓越的。自从冲破了阿登纳（Adenauer）政府战后最初10年所限定的选区以后，以体力劳动者和新兴中间阶层的强大联盟为基础，社会民主党

最终成为进步的全民党的典范。它的选举胜利展示了其基本纲领的清晰性和凝聚力。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是由顺应联邦德国初年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这一需要而制定的。在西德,阶级政治在 50 年代的显著衰落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这是一个经受了“意识形态创伤”的社会,这一方面源于第三帝国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东德共产主义专制政权的建立。结果是从那种能够使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在主要西方国家曾削弱了阶级身份的社会同一性的影响增强的激进观念的退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爆发了来自东部的空前的难民潮——1947 年人数达到了 1,200 万。如此规模的人口巨变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社会传统和阶级关系,“这是西德全部政党发展的重要条件”^④。社会民主党另外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核心战略是对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及其巴伐利亚合作者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的、重建跨阶级的天主教政治传统的继承。这一传统经历了从威廉大帝到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已经与新教势力达成了—个跨信仰的政治联盟,由于它既扎根于工人又与资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因此已经变成了一个异常强大的选举机器。基督教联盟各政党其实就是奥托·克希海姆(Otto Kirchheimer)描述的全民党的原型,它不再强调阶级政治和公开的意识形态。^⑤

尽管在战后最初几年社会民主党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它与 1933 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传统仍然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到了 1952 年,社会民主党进行了一次果断而彻底的重新定位——最明显标志就是从“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从“人民的政党”。转变是在纲领、组织和选举三个维度上发生的。首先,1959 年的巴德·戈德斯勃格纲领明确放弃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转而强调基督教伦理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古典哲学和人道主义传统的折衷调和。它承认联邦德国自由的多元化和它

自己毫不妥协的西方定位。为适应社会市场口号的成功和资产阶级政党的程式,该纲领无条件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调节经济增长的“臂长”理论。

在组织方面,为了准备自己的选举动员机器,该党全面更新结构,加强了中央集权,缩小了内部民主空间。用洛舍(Lösche)的话来说,一个“团结的共同体”观念已经被淘汰,^⑨党员的吸收范围被深思熟虑地扩大到了专业人员和“新中心”的白领阶层。

表 4.1 1958-1982 年社会民主党新党员职业统计(百分比)

社会团体	1958 年	1966 年	1972 年	1982 年
白领雇员/公务员	21.0	27.5	34.0	33.1
体力劳动者	55.0	49.4	27.6	21.1
家庭妇女	11.2	9.0	9.0	13.7
退休人员	5.4	4.1	3.7	9.2
大学生	—	—	15.9	12.8

资料来源:苏珊娜·米勒(Susanne Miller):《巴德·戈德斯勃格前后的社会民主党》,波恩-巴德·戈德斯勃格 1974 年版;《德国社会民主党年鉴(1981-1983)》,波恩 1984 年版。

从表 4.1 可以看出,该党成员的社会成分变化是极其迅速的。

这个旨在扩大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支持率的转变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在波恩-巴德·戈德斯勃格纲领出台后的四届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持续稳定增长,从 1957 年的不足 32% 上升到 1965 年的 39% 以上,1972 年更是上升到将近 46%。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政治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它能因时而动,随着体力劳动者数目的减少和新中间阶层(Neue Mitte)的迅速扩大而适时地调整自身成员的构成。这段时期无产阶级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当它扩大自己在西德社会新兴中间阶层的份额的时候,无产阶级选民在社会民主

党选民中的相对比重就下降了,这样就导致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阶级平衡的根本改变。新中间阶层在其身份上总是矛盾的:该党最可靠的支持即来自这个阶层既是世俗(不受宗教影响)的又参加了工会的群体,而其最容易发生摇摆的支持者是这个阶层中世俗的但没有参加工会的群体,在1965-1972年它曾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来源之一。^④

1966年底,自由民主党人——基督教民主政权中资历浅的合作伙伴——退出了埃尔哈特(Erhard)政府,这使基民盟-基社盟不再占联邦议院的多数。借着这个机遇,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越过党内种种最初的反对派,和它的老对手谈判后一起进入了波恩大联合政府。在以后的3年中,社会民主党的执政赢得了信任——它控制着联合政府的经济部和外交部,但在1969年大选后,它转而与自由民主党(FDP)结盟并建立联合政府,勃兰特出任总理。1972年基民盟试图在议会发难推翻该政府,选举的结果适得其反,社会民主党的总得票率超过了联合政党的总和,这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由此控制了西德政坛的下一个10年。

在冷战的高峰时期,社会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无论它如何努力,都无望与基民盟-基社盟强硬的反共和亲美路线相抗衡。欧洲缓和措施的出台为社会民主党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环境。勃兰特以极高的政治技巧执行国际开放政策,三年有力的东方政策使西德与苏联和波兰缔结了条约,划分了战后的领土边界,并与东德建立了外交关系。政府这一时期的创造性活动为其赢得了国际声望和国内支持,保证了联盟的长期执政。但它们也消耗了社会民主党大量精力。因为勃兰特本人孜孜以求的国内改革搁浅了。在最初的一些福利政策之后,政府所有(包括社会、财政、教育和工业等领域的)重要改革动议要么遭到了自由民主党的阻挠,要么受到参院多数联盟的

否决的威胁。

1973年,当大西洋国家也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的经济衰退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稳定成了政府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74年,赫尔穆特·施密特任政府总理,在他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集中精力应付经济危机。公共开支的增长得到了抑制,货币供应紧缩。为了就业和选举的目的,偶尔也曾有过优先刺激的措施,但总的政策方向还是传统的。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结果还是很成功的。西德经济的强势发展遏制住了其下降的势头,出口依然十分活跃,尽管增长程度并不大,但还是超过了欧共体的平均水平。施密特临危受命,领导德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典范,因此,他作为一个强力领袖的地位在整个70年代始终非常高。社会民主党向选民展示“德国模式”这一形象,以此作为其执政能力的明证。

然而到了80年代早期,第二次经济萧条接踵而至,德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抉择。那时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逐步升级,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并继续增长。1981年夏,在自由民主党的压力下,政府决定削减社会开支,降低商业税。该党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受到了其1980年选举得票率上涨的鼓舞,它目前正放肆地向右转。在公布预算案的时候,财政部长汉斯·马特霍夫尔(Hans Matthöfer)声称国家再也不能保障充分就业。施密特同意这个一揽子计划,但此时他正处于党内部不满和自由党合作者与日俱增的敌意包围之中。当自由民主党发出信号要求政府执行更严厉的措施,并打算策略性地转向基民盟的时候,施密特解散了联盟。1982年10月,在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赫尔穆特·科尔就任联邦总理。6个月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联盟在选举中获得令人满意的多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社会民主党的下野当然不是一段孤立的德国插曲。它属于

80年代北欧政治的总体模式,是右派复辟潮流相继横扫社会民主主义政权的一个结果。但联邦德国的左翼政治却面临着别样的困境。社会民主党此刻要解决的问题还不是从它的宿敌(保守主义的德国版本)那里收复失地,而是要与它的另一侧的全新的激进主义达成妥协。因为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德国的政治版图已发生了变化。现在它要去看看这一变化究竟有多大。

左派的新挑战

80年代突然闯入国内政坛的新兴力量起源于60年代社会民主党当政时采取的路线。60年代初期,社会民主党就强行驱逐了大学生联合会,因为它批评了该党官方政策的懦弱性。如今已成为一个独立组织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DS),在60年代末成为反对联邦共和国现行制度的反抗运动的核心,它动员了数量庞大的反叛青年抗议美国的侵越战争和西德官方的文化独裁和政治独裁。大联合政府中两大政党合作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紧急状态法(此法案是基民盟同意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招来了议会外反对派(APO)的责难。这次运动是国际新左派发动的骚乱的一部分,它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下层的普遍同情,在社会主义青年团(Jusos)内也有不少追随者。

虽然这次运动很快就解体了,但它对社会民主党的冲击却非同寻常。社会民主党的规模还在继续扩大,激进青年的加入则在改变该党的构成。议会外反对派所鼓吹的价值即最重要的政治参与观念被社会主义青年团所接受,而后者在社会民主党的基层——即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的活动,使业已麻痹的基层组织恢复了活力。勃兰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时时提防者来自左派的竞选威胁,因而跟一切议会外活动严格划清界线,力图尽可能地团结新一代。但是,对社会民主党充满恶意或敌意的活跃的激

进亚文化此时已在大城市中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

1972年，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通过一项限制左派分子进入公共部门的法案。从任何标准来看，该法案都是一种过激反应，它使得新左派与执政党更加疏远。反恐怖主义措施引起了公众关于侵害公民权的抗议。不久之后，社会民主党就不再受制于这种窘境了。因为6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已经过去，进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的小团体也被轻易打败了。在党的内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失去了和劳工派的联系，跌进了严重削弱其组织的宗派争斗中去，从而使得社会民主党有理由将其导入中的好战分子清除出去。

随着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1969年和1972年的规模扩大，左派首次在议会党团中亮相。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最初在16楼（他们在联邦议院大楼的位置）安营，后来迁入勒弗库森（Leverküsenener）一派，其代表人数达30-40之多，有时还得到其他派别20来人的支持——当该党议员拒绝执行本党的投票命令，或在议会党团中寻求职位的时候，他们就提供一致支持，设法战胜中左派别。^⑩这样的小团体倾向于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发挥一种稳定作用，为自己的成员谋得仕途并使他们汇入社会民主党的主流。^⑪在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的时代，左派在联邦议院中的出现从未根本动摇过右派的领导地位。

党外的不满情绪也并不是十分强烈。社会民主党的权力在形式上集中于它的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从1958年开始，就是这个小小的机构决定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方向并进行重大决策。^⑫在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联盟的年代，常委会与政府保持紧密一致，但凡由总理或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常委会都予以支持。执委会更精确地反映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构成，左派人士通常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议席。有时候，执委会也会采取和政府不一致的立场——例如，它曾在



1977年敦促停止开发原子能；但它的主要活动还是调解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使国家政策和社会民主主义相一致。从理论上说，党代会才是社会民主党真正的决策者。但现实并非如此。执委会控制了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议程，从而保证了领导层所作的决定能不受干扰地得以贯彻。其实领导层在那段时期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驾驭党代会了：勃兰特和施密特都一再动用他们的选举托管权和国家责任，以使自己能够逃避责任，虽然在执政晚期，施密特面临着日益强大的反对派。

70年代中期，党内派别之争有所缓和，党外的不满情绪似乎也平息了。但是社会民主党与60年代骚乱的遗产之间的隔阂依然存在。70年代末，两个事件使反对现存政治的抗争精神得以复活，并且成为二战以来左翼运动发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历的最严峻的政治挑战。第一个事件是施密特政府受石油危机的压力决定扩大德国的原子能生产。这一计划的反对情绪在社会民主党内部迅速扩散，然而，在连续召开的党代会上，它却勉强一政地被否决了。结果使左翼激进分子，尤其是青年人清醒了过来，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党外迅速扩大的公民自发组织中看到了希望。

施密特联合政府第二件激起抗议浪潮的事件是向美国请求在德国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在1978年苏联拒绝将SS20s撤到乌拉山区以东的事件中，部署成为北约的官方政策。里根上台后不久，就着手进行全球军备建设，此时对社会民主党执政能力的疑虑又一次在该党内蔓延。但只要施密特就任政府总理，基层反对中央的活动就只能有所收敛，尽管这样做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在整个西德社会，一场抵制部署导弹的难以抑制的大规模和平运动开始出现了。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及环境问题和和平运动的促进，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绿党——诞生了。这段时期，

生态问题引起了西德公众日益广泛的注意。但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一种政治力量,这对联邦德国而言还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但只是在10年之后,绿党成员参加大选角逐逐步成为西欧的一个相当正常的现象。德国的这场运动却绝不仅仅是这种现象的一个先行者,其仍旧是国内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在规模和职能方面,在80年代才站稳脚跟的绿党都可以和早已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颇具特色的政治景观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相媲美,它不断地在外围和社会民主党发生小规模争夺战。在联邦德国,60年代末的骚乱的爆发较之北欧国家更为激烈,反文化的后果也更为深远。西德是个高度工业化、军事化的国家,因而生态问题和安全问题也就更加突出,所以浪漫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就更深入。绿党与众不同的特色正是由这种基因而来。

在维护生态环境和争取和平的背景之下,绿党分散的组织早在1979年第一次直接选举产生欧洲议会的时候就存在了,这次选举提供了建立一个全国性组织的直接动因。绿党的参政得到了足够的财政支持以维系其基础结构的永久存在,因为任何参与竞选的政党每赢得一张选票就会得到3.50马克的国家津贴。3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联邦代表大会,大会一致同意首先成立一个政党,另类政治联盟:绿党(SPV)。为顺应西德的法律制度,绿党也推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但是在选举纲领或组织框架方面绿党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SPV在欧洲选举中获得了3.2%的选票,1980年1月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代表大会上,90%的与会代表接受了建立绿党的动议,3月在萨尔布吕肯的另外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它的建党方案。在这几次讨论中,运动的保守派都靠边站了,最后的纲领明白无误地将绿党定位为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在1980年的联邦德国大选中,当许多潜在的支持者转向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代表基民盟-基社盟的总理候选人弗兰茨·约瑟夫·施特

劳斯(Frans Josef Strauss)对绿党选民进行了挤压。尽管如此,到了1983年,绿党在不少联邦州都拥有了自己的代表;在全国选举中,尽管绿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下野,但它们还是赢得了5.6%的选票,在联邦议院中赢得27个议席。在4年之后的1987年大选中,绿党的得票率高达8.3%,其议会代表人数增加到了42人。

绿党的选民普遍都比较年轻(80年代早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到35岁)并且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绿党组织主要坐落在60年代激进主义力量强大的大城市,因为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所以绿党与社会其他阶层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绿党的中央委员很多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激进分子,他们曾想把社会民主党推向“1968年议程”,然而社会民主党-自由党时期的僵硬体制阻碍了他们这一想法。他们决心要改变这种以波恩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既定政党模式,以一种新的结构取而代之,通过高级官员和党的机关的开放性和时效性来确保“普通党员对所有权力机关、高级官员和公共机构的长期监督,并确保永久保证组织机构与政策的高度透明性,避免个人与他们的基层组织相疏离”⁶⁹。他们还特别强调议会外行动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联邦议院是惟一合法的权威。

绿党所采取的原则就是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绿党内不支薪的官员的比例低于全国的水平。议会代表通常只能得到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薪水,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其任期内将交给党的基金。他们还有“轮换”的规定,以在议会任期的中途为被指派的继任者开道。该党组织结构相当宽松,参政因此比较容易。一切会议大体上都是公开的,所有党员都可以出席这些会议。但在党内身兼数职或者染指其他党派事务都是绝对不允许的。7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所青睐的强制委任制度要求议员们遵循将他们送入立法机构的地方党组织的指示。

绿党的组织原则体现了对人性的一种乐观理解,但是将之付诸实施却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轮换制被证明问题非常大,最终沦落到了联邦一般政党的水平,虽然这期间那条关于党员不得连续担任制务超过一届这一规定依然未变。从地方上来看,在某些地区,如法兰克福,“轮换”还是受到鼓励的;但它在其他地区却被忽略了。要那些不付薪的执行委员去控制享受全额薪水的绿党议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1989年3月的明斯特代表大会决定给所有11个联邦执行委员都支付薪水,虽然为了平息党内反特权的情绪,薪水标准要低于议员助手的标准。^{④9}

绿党因其结构松散,所以享受的参政津贴很少,按理说,绿党党员的参政热情应该比较高的,但与此相矛盾的是,绿党党员与其投票人数之比却是联邦议院各党派之中最低的。而且党员参加活动也没有比过去更加积极。海塞州1982年的代表大会旨在确定该党的竞选纲领,但2500位党员中出席此次会议的仅80人,其中10人还是州执行委员会的成员。^{⑤0}绿党党员也有大规模参与的活动,但他们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单问题和直接行动上。在这样的境况下,指望削减议会党团的自主权肯定是难以奏效的。当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党内的不统一就意味着:如果议员们不重视地方的指示,那么,它们就会互相抵触,各个小团体就无法步调一致地行动,这样,强制委任制也很快被人遗忘了。但不管怎样说,入党条件都太宽松,这给那些反对任何责任的统一行使的好战的活动分子创造了可以制造干扰的基础。常常与议会党团发生冲突的联邦执行委员,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削减绿党议员随着自己在联邦议院的经验的增加而不断增强的自主权。这样的事情尤其容易发生在那种财力和付薪职位都集中在议会层次的政党身上;但是这同时也反映了新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和平运动的衰落,因为8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运动的势头就越来越弱,已不再能给议会党团制造持续的压力了。^{⑤1}

不过,通过严格禁止身兼多职,绿党在控制党内权力分散问题上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尽管如此,他们对集体领导的尝试却并不特别愉快。绿党从未有过一个惟一的领袖,历来都是一国三公,三方都握有同等的权力,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宗派之争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内部选举的结果表明,往往是那些对小团体忠诚胜于对党的忠诚的人当选。存在于党内“现实派”和“基础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使得绿党的发展机缘稍纵即逝。现实主义者高度注重议会的工作,因此十分关注——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以达到共同的政治目的,他们也很愿意与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盟关系,最初还只是联邦州的层次,后来就扩展到国家的水平。基础派受议会政治的影响不大,他们认为联邦德国真正的权力中心不在联邦议院和州议会,而在商业集团和官僚机构。与此相适应,在他们看来,既然议会胜利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幻觉——在一个发达工业社会里,议会是决定性的遭遇战的场所——之上,那么,就应当避免以妥协来谋求议会胜利。这派人士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的任何合作,他们声称社会民主党的长期战略意图在于吸干绿党的生命源泉,绿党绝不应引狼入室。

这些立场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或绝对的,个体党员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一派转向另一派。绿党的决策机构的公开透明性意味着其成员会经常变换,以不断调整两派之间的平衡。大多数党员都是现实派,他们在议会党团中势力强大。基础派在一些联邦州(如汉堡)和执行委员会中比较盛行。尽管两派的争斗所产生的不团结和保守主义作风已经威胁到绿党的生存,但迄今为止,绿党潜在的活力尚能阻止该党走向严重的分裂。尽管绿党自己的出版机构作为不大,但是绿党的主张已通过反文化出版物、地方杂志和《日报》——一家以柏林为基地的日发行量10万份的日报,也是绿党最重要的宣传渠道——等多种途径广

为流传。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根本无法与绿党匹敌,它的《前进》周刊所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虽然社会民主党也出版一种获得好评的刊物,即由彼特·格洛茨(Peter Glotz)主编的《新社会》,并赢得了名义发行量总计达到150万份的工会报纸的支持)。因此,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文化攻势上披坚执锐、勇往直前的是绿党而非社会民主党。

绿党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还在于性别政治。1986年绿党正式采纳了党内和公共机关候选人的拉链政策,也就是说,男女候选人轮换入阁。于是在绿党的议会代表中,妇女比例立刻从36%上升到1987年大选后的57%——这个比例在欧共同体国家中是最高的。在1986年的汉堡选举中,所有的绿党候选人都是清一色女性,考虑到在绿党全体党员中女性仅占三分之一,在其他党派中女性仅占四分之一,因此这个比例显得很不相称。而在这一时期,绿党的选民男性比例实际上比自由民主党和基民盟-基社盟高,差不多与社会民主党相仿。绿党关于妇女解放的最具特色的规定还体现在它是对西德政治正常秩序的一种叛越:一个政党的权力金字塔越靠近波恩,参政的女性就越少。但绿党的议会党团不仅仅是女性多于男性的问题。1985年和1987年间,女性占据了绿党议会党团的所有领导位置,1988-1990年,这个比例则是三分之二。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当时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个特点就更为突出了:当时除议会以外的职位都没有薪水,因此绿党每组织一次活动都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而对于妇女来说,这种情况尤为不利,因为她们大多生养了孩子,参加政治活动就必须支付照看孩子的费用。

社会民主党的两难困境

异军突起的绿党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首先,左派对手迫使该党反思自己的主要原则,促使它加入“关于

它在德国社会中的目的和地位的讨论”。^⑧其次,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制定选举战略以赢回失去的选民。第三,既然在联邦德国的政治版图上,各个政党都倾向于建立联合政府,那么,如今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能不厘清它与其面对的日益壮大的诸党派的关系,尤其是要解决面对中间派的全新的开放姿态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赢得绿党的好感这一问题。

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面临的最直接的难题还是该党的竞选危机。1983年的大选结果使社会民主党遭受沉重打击:它的右边有160万张选票流向当时的基民盟-基社盟,左边有75万张选票流向绿党,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为38%,是1961年以来最低的。4年后,社会民主党再受重创——尽管那时基民盟-基社盟也受了一点轻微的损失,但倒向绿党的选票却又增加了60万张。^⑨社会民主党所受的重挫是由西德选民的长期社会变化所引起的。体力劳动者阶层人数的相对减少以及其内部凝聚力的降低严重削弱了该党的核心选举力量。1950年,雇佣工人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是79%,1969年下降到58%,1986年更降低至42%,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劳动者中外籍工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他们并没有选举权。另一方面,社会的飞速发展不仅使中间阶层日益壮大,而且也突出反映了政治上的细微差别和选举的变动情况。50年代形成了工薪阶层和职业阶层,60年代和70年代则出现了一批与前所未有的富足相伴产生的新的阶层,他们的主张更具有“后物质主义”的色彩。

社会民主党的困境是双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70年代中期以来,该党选民横跨了从老产业工人阶级的传统壁垒到新近出现的后物质主义的中间阶层前哨的诸多阵营。^⑩如今它既要面对对后者具有诱惑力的竞争对手即绿党,又要面对前者(当中也包括相当一部分的工薪阶层)价值观的转变,因为他们现在追求的是个人价值的实现而非社会的稳定团结,这一点对

于那些结盟政党倒是十分有利的。80年代的竞选战略围绕的主题就是竭力顺应这些不同支持者日趋多元化的需求和利益。结果,旨在夺回青年选票的努力夭折了,同时社会民主党还作出了其他一系列努力,为的是巩固体力劳动阶级,争取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然而这些努力也都陷入了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这种四面出击的努力在1987年大选活动中达到了顶峰,原本代表该党传统的工人阶级基础的总理候选人此时却被迫极不协调地高举新左派政纲,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仍拒绝了与绿党进行合作的任何可能性。⁶⁶

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同样迷失了方向。在70年代,该党通过压制或中立左翼反对派而取得了官僚政治的稳定,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党的基础机制严重发育不良,缺乏活力。结果是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号召力大打折扣,再也无力向整个社会宣传其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左派激进分子投靠绿党这一事实有效地阻止了由于失败而清醒的领导层的激烈动荡,一如英国工党1979年之后的经历。1982年施密特下野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当时勃兰特的主席任期正接近尾声。社会民主党理所当然地需要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但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虽然在野党都有向左转的倾向,然而其最高层还是一切如旧,“老资格后卫”如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和约翰内斯·拉奥(Johannes Rau)——他们分别在1983年和1987年参与了总理竞选的角逐——等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权威。

整个这段时期,联合战略的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从全国来看,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绿党的挑战的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在1980-1984年这个阶段,社会民主党主席维利·勃兰特鼓吹应当通过政策的绿色化和与新党合作的法令来重新整合社会民主党这个“失去的孩子”,这是一个旨在建立“联合政党的左派多数”的战略。这个设想遭到了右派的反对,他们咄咄逼人地

重申社会民主党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根基,攻击绿党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分子。1984年以后,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疏远了,拒绝任何与后者合作的建议——这种态度到1987年拉奥参加大选时达到了极致。社会民主党的新目标——“自己人的选票优势”——到最后成了镜花水月:虽然在此前联邦州的中期选举

表 4.2 1988 - 1993 年社会民主党在各州的得票统计

联邦州		社会民主党 得票份额	相较于前次 选举的变化
柏林	(1989年1月)	37.3	+5.0
萨尔州	(1990年1月)	54.4	+5.2
下萨克森州	(1990年5月)	44.2	+2.1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990年5月)	50.0	-2.0
巴伐利亚州	(1990年10月)	26.0	-1.5
黑森州	(1991年1月)	40.8	+0.6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1991年4月)	44.8	+6.0
不来梅	(1991年10月)	38.8	-11.7
石勒斯威格-荷斯台因州	(1992年4月)	46.2	-8.6
巴登-符腾堡州	(1992年4月)	29.4	-2.6
汉堡	(1993年9月)	40.4	-7.5

表 4.3 社会阶级对各政党的支持细目分类(%)

政 党 1987	旧中间阶级		新中间阶级		工人阶级	
	1980	1987	1980	1987	1980	1987
基民盟-基社盟	64	63	39	46	35	36
社会民主党	28	13	47	31	58	54
自由民主党	7	18	13	14	6	4.5
绿党	1	5	1	9	1	6

资料来源:卡尔·克内(Karl Cerny):《德国民意测验》,杜翰出版社,北卡罗莱纳州1990年版,第284页。

中获胜,但社会民主党的破产却在联邦大选中暴露无遗了。

这次惨败之后,社会民主党开始实施其面向中间派的重新定位。社会民主党已经默默正视劳工选民的分裂,听任后唯物主义左派倒向绿党。在这个新生的政党面前,社会民主党的竞争优势风光不再,联合策略已调整为争取一个“组织上的大多数”——即是说,要营造一种大选的形势,使社会民主党在政府组阁时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社会民主党应该尽可能地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对绿党的观望态度在以前是毫无效果的,而现在则获得了一种战略联合的外观。

表 4.4 1950 - 1985 年西德选民的细目分类(%)

	1950	1961	1970	1979	1981	1985
工人阶级	51	48	46	42	42	40
新中间阶级	21	30	38	45	46	48
老中间阶级	28	22	16	13	12	12

资料来源:卡尔·克内:《德国民意测验》,杜翰出版社,北卡罗莱纳州 1990 年版,第 274 页。

注:这里使用的分类基础是标准职业定义。“工人阶级”指的是体力劳动者及其家庭;“老中间阶级”指的是业主、职业人士和自我雇佣者;“新中间阶级”指的是白领阶层及其家庭。

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的关系相当复杂,无论在地方还是国家层面上,都不受联邦行政管理的制约。联合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的选举态势和地方的政党成分构成。当社会民主党为了平衡议席的时候,它允许甚至指示投机分子与绿党达成协议。这是一回事。但与绿党建立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获得跨越两党在政纲和组织上的分歧的能力,这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地方联合的经验表明,只有新左派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占绝对的

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设想才能变为现实,而这样一来,红绿联合又会比其他联合优先存在。^⑭

对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而言,最棘手的问题还不是他们对绿党含混而曲折的态度,而是他们无法猜透选民变化的规律。一方面,确实存在两大集团的对抗,也就是左派阵营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传统政党之间还是存在某些共同的基础的,即是说,有望再度形成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或者一个大联合。这里有一个明确的事实是:80年代的选票计算不能再计入左派的大多数中去。在1983年的联邦议院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得票率为43.8%,1987年增长到45.3%。尽管进入由极右的共和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该党没有资格成为联合的对象)把持的联邦议院能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但面对这样的局面,社会民主党领导层还是不愿致力于建设一个红绿联盟。另外也没有迹象表明自由民主党想要改变它与基民盟-基社盟的紧密关系。

以上就是社会民主党所以要制定新的纲领来重新确定本党身份的背景。社会民主党是在1984年展开这项工作的,两年以后出台了第一份草案。该草案受到了左派的很大影响,呼吁走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来调节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草案认为,生态的现代化要求研究开发出洁净的和可持续的技术,从而创造出动态的发展来促进出口、增长就业。这个设想的可行性取决于是否得到社会民主党劳工派的支持,因为这派大多数人都对“绿化”政策持敌视态度。草案取得了一向态度强硬的化工工会的认可,可谓是重大突破。良性发展被视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改革为世纪末贡献的最重要的杰作”而受到热烈欢呼。^⑮尽管如此,该草案由于没有更多地涉及新左派关心的问题,所以还是没有得到更多选民的回应。

在草案关于国防安全的部分中可以看到对左派的进一步让

步,它顺应 1983 - 1984 年科隆和埃森代表大会的决定,对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开发计划进行了谴责(对此施密特深为震怒),同时呼吁改革北约战略。在无核地区的中欧,“前进防卫”战略没有被通过,人们还呼吁最终而彻底毁灭东西两大军事阵营。假如这些倡议在右派听来不堪入耳,那么,草案中的一些经济观点就让他们更加难以接受了。草案中宣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改良资本主义,还要以一种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取而代之……经济应当有专门为它制定的明确框架。”⁶⁴这些断言迅速燃起了社会民主党主要经济发言人的热情,他们后来也参加了制定纲领的工作。抛弃了“那些与现实不再相关的模糊观念和落伍的原则方案”⁶⁵,他们声明,他们与草案对市场的敌视态度和对政府的空想般的信任无关,他们强调了对“经济现实主义”的一种更有效措施的需要。他们的反对意见被无条件地融入政纲,至于他们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和监管的弦外之音则被抹去了。戈德斯勃格的信条“尽可能多的竞争,尽可能必要的规划”在此被一再重申。尽管纲领在努力寻求新的价值,但在这些方面,它还是以重复人们熟悉的惯用语结束了。

在对纲领的历史回顾部分的最激进的干涉中,还夹杂着来自以奥斯卡·拉方丹为核心的、被称作“勃兰特的孙辈”的组织对社会民主党正统派空前猛烈的抨击。这场运动意在吸引选举分析所指出的“绝大多数”的“目标群体”,它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工业秩序,并把削减工作日和缩小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结合起来。“只要欧洲左派能抓住一个机会,它就会任意制造一个足以打动上百万人的具体的乌托邦;缩短工作时间,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一种人文思想,能把社会不同阶层融合联结起来……使工作和休闲达到一个新的平衡”⁶⁶。在这个问题的选择上,有一种灵巧的处理方法。一方面,缩短工作时间很投合后

物质主义者及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的心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紧密联系着传统的劳动者的需要。80年代中期见证了一次工会运动,包括冶金工人在内的罢工工人要求法定的一周35小时工作时间。但拉方丹的计划激起了德国工会联合会的强烈抵触,后者反对鼓吹无加班费的弹性工作时间制。这个穿越左与右——它遭到了党内左右两个极端的批评——的创造性计划是对工会正统派有计划的攻击,而且有意把社会民主党跟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另一“孙辈”解释说,社会民主党必须对全社会负责,也就是要对企业主、职业阶层、高级公务员以及工会负责。^⑥

最终,拉方丹的一些建议终于包含在1989年11月柏林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中了,尽管在对工会的限制和让步方面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这份新的文件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重新定义,然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戈德斯勃格纲领的核心内容的移花接木而已,新嫁接的只是一系列许诺——对环境、对工作条件的人道化、对性别平等和对“当选代表与公民之间的批评对话”的许诺。鉴于它的各个派别团体都纷纷出动,在新纲领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所以,这个延长的演习在根本上突出强调的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分化。在合并同类项之后,这个纲领的最终结果就像是“一个商店门市部的商品目录……风格和论证都互相矛盾……更像是内部的计分卡面不像是政治宣言”^⑦。1989年11月草案出台时适逢民主德国瓦解,草案所产生的影响就因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爆发而被完全忽略了。

始料未及的统一

在柏林召开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47岁的萨尔州总理奥斯卡·拉方丹被指定为该党角逐1990年大选的总理候选人。拉方丹是位敢作敢为的活动家,他被提名标志着党内新旧交替

的完成。然而社会民主党的困境并未因此得到根本缓解。1989年夏的局势已经十分清楚：即使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和派会投多少票还不甚明了，在下届联邦选举中，执政的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再度胜出已成定局。虽然联邦总理科尔在民意测验上采取了一种低姿态，但左派也不太可能在日趋好转的西德经济和见者有份的税收改革中占到便宜，它只有在这个选举周期结束的时候再图谋收获了。

东德政权的解体，立刻带来了一个问题。随着剧变的发生，似乎社会民主党拥有解决一切难题的灵丹妙药，能够使德国获得真正的收益，甚至自民党也大有跟它的联盟伙伴分道扬镳之势。但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的每个阶层和西德的左派对于统一的前景都歧见迭出——从工会组织者到知识分子，从红派到绿派，从官员到激进分子，从现实派到基础派，大家心情都差不多，都指望能够收益良多。对于这样的反应可以有多种解释。战后寄居于民众心理的民族主义情绪非但没有消除，相反还在持续抬头，可是却一直被低估，这种心理可以追溯到第三帝国——当然，它们的用词是截然迥异的。^⑨社会民主党自己对这个民族问题的回答与70年代的回答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它主要集中于努力敦促民主德国政权改善人权和民间的自由交往，以换取西方社会的称道——这条路线在80年代与第二条东方政策一起积极地被施行，为的是缓和东西方冲突。在贯彻这条路线的过程中，这种姿态在两个德国都是积极求新并受到欢迎的。但一俟突破冷战高峰的僵局，社会民主党就放慢了脚步，以适应东欧剧变、民主德国的瓦解和对它的接受。^⑩在党外，部分人对联邦德国把宪法强加于东部深感疑惧，在他们看来，第23款尤其生硬。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评家认为，应当由东西德国分别派出代表组织大会起草一个新的宪法，并由公民投票通过，只有这样才显示出更民主更平等的程序。

1989年9月,由于事件不断,社会民主党领导决定立刻取消与其旁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惯常会晤。在联邦共和国内部,拉方丹作为泛德主义狂热的代表而成为批评的众矢之的。他多次建议要修改德国的国籍法,也就是以色列模式的回归法,这样有利于区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公民权这个重点工作。因为受联邦政府鼓励,大量东德公民涌入西德,由此给联邦共和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开支,拉方丹对此颇多微辞。

在昂纳克(Honecker)政府垮台的最初阶段,东德的政局由新论坛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所组成的松散团体所操纵,其目的在于改革民主德国,但没有提出与联邦共和国统一的要求,西德的左派对此保持赞同。不过,东德民众的反对意见立刻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强烈呼吁与西德统一。随着匈牙利和捷克边界的开放,对统一的渴望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在莱比锡和其他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使统一势在必行。

历史上,战后东德建立起共产党政权之后,社会民主党就饱受压制,被迫与执政党合并。这样,在昂纳克政权解体之后,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重新组建。东德的社会民主党直到1989年10月才形成,但是它立刻就赢得了支持。然而东德社会民主党新成员中自一开始就存在两派不同的要求,一派要求保持东德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另一派则强烈要求与西德社会民主党合并,但它们共同面临这样的一种意见潮流:最好还是要在东德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国家,因为直接的统一不啻于被联邦共和国吞并,对此,西德社会民主党也不知应如何反应。在1989年12月的柏林大会上,维利·勃兰特吁请社会民主党接受彻底统一德国的议案。这个原则得到了认可;但是接下来拉方丹强调了实际操作困难。因为鼓吹中立而屡屡被保守的反对派批判为德国民族主义的绿党,甚至认为制定一条连贯的政策都很困难。他们与新论坛很多持不同政见者都有密切的联系,后者和绿党

遥相呼应,也认为统一困难重重。比起社会民主党来,绿党摇摇欲坠的决策结构更难以迅速地实现一个战略转变。

出乎意料的是,最初国籍问题似乎对社会民主党很有利。在西部,拉方丹好像并不缺少统一德国的热情:他对社会开支问题的警告之声是对工会呼声的回应,在选民中可能引起了共鸣。在东部,1990年2月召开了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多数的早期投票使它为3月18日的选举赢得了先声夺人的优势,甚至有人断言,该党将以绝对多数获胜。这样说当然有其充分的历史原由,考虑到东德将被证明是社会民主党选举的自然有利地区,勃兰特统一德国的热情就有了理性基础和情感基础。早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普鲁士和萨克森就是劳工运动的桥头堡。东德人口中,新教教徒占了压倒多数——而在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宗教势力大大地受制于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改革派(所以它在北方势力强大,而在南方相对单薄)。最后一点,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相较于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的社会结构更多地是由产业工人阶级构成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的有利因素表明社会民主党将成为易北河畔的霸主。

然而1990年3月的选举却让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大跌眼镜。结果是德国同盟大获全胜,该同盟的成员有东德的基民盟、民主党醒党和德国社会联盟党,总得票率高达48.1%。同盟实际上是西德保守党和科尔总理在东部的势力延伸。与社会民主党不同,基民盟始终在形式上寄寓于民主德国,就像高压政权下一个驯服的下级陪衬一样,尽管如此,它可是拥有一个政党应有的物质设备:机关、财政、党员,这就给它提供了实质的优势。共产党政权易手之后,民主社会党还出人意料地取得了16.3%的得票率,社会民主党得票率仅为21.8%。拥护联盟的投票潮流归根结底是对在西德政府制定的条件上(包括货币联合会对两种马克1:1比价的实际承诺)的立刻统一倡议的支持。它在此基础

上吸引了数量特别庞大的体力劳工的兴趣：同盟的得票有 55% 是来自产业工人阶级。

波恩政府完全不借助任何政治手腕就牢牢地控制了时局。民间反对派势力以较大规模在东部抬头之时，基督教民主党对最终统一的承诺历史性地落实到了实际政策中去了。当科尔决定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时，他也能责成联邦银行遵守货币联盟制定的旨在巩固东部对基民盟的支持的政策。只有社会民主党在对统一政策上显得吹毛求疵，要求政策应当是自发的、宽大的、负责的和能被“国际共同体”接受的，以合法地令人满意地解决长期分裂的德国统一问题。此时的左派对民族主义情绪充满怀疑，因为许多投票者都认为重新统一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家庭内部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首鼠两端的态度很容易被怀疑为不足取的投机主义。

1990 年 6 月，围绕着社会民主党是否支持两德国家条约这个问题，统一大业走到了其最关键的阶段，根据这个条约，两德的货币、经济和环境体系都要融合到一起。反对货币联合会制定的 1:1 比价在西德赢得广泛的附和，因为调查显示：对这一比价的结果的畏惧心理流传很广，如此一来，就给社会民主党准备了经济问题上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反对国家条约会被看作是蓄意阻挠民族统一这个伟大历史事件，它在东部会播撒下怀疑社会民主党意图的暗影。社会民主党坚持：西部选举必须提前在统一之前进行。结果，国家条约公开地将社会民主党一分为二。拉方丹号召人们反对国家条约的现存规定，但是党主席福格尔和经济发言人沃夫冈·洛特(Wolfgang Roth)认为这样做将是个错误。这场冲突以拉方丹的失败而告终，接下去，福格尔当选为“新”全德党的主席。即将来临的大选前的这段插曲不可避免地打击了拉方丹，削弱了社会民主党。

绿党发现自己的处境更糟。这个党被公认为联邦共和国的

后现代政党精英,但党内很少有人知道统一的德国是怎么回事——不像社会民主党,老一辈的人都团结在勃兰特的旗下,绿党从没有参加过联邦议院6月17日的官方纪念会。他们的大多数代表都持一种两国论的观点,理由是要结束东西方的敌对状态,只有认可现有的边界。惟一支持统一的声音来自以阿尔弗雷德·梅彻斯海姆(Alfred Mechtlesheimer)为首的少数派,他们采取了一种民族中立主义的立场。”绿党因而同时既反对德国经济与货币联盟,又反对国家条约,其依据是东德民众有权自行决定他们的去向——可是这种姿态在1990年3月民主德国大选上的集体表决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绿党决策过程的虚弱性在迅速进行的统一过程中暴露无遗:正如黑森州州长约什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所指出的:“我们是在把床罩套在自己头上。”正当选举活动在秋季紧锣密鼓展开的时候,统一正顺着政治议程安排在讨论环境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拉方丹的呼吁跟别人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左派而言,战后的第一次全德大选就是一次全德灾难。社会民主党的得票跌落到了33.5%(西部得票率为35.9%;东部得票率为23.6%)。它在统一后新加入的五个联邦州里的可怜的战绩,和鲁尔地区——它昔日大本营——的沦陷,令社会民主党烦扰不堪。绿党在西部得票率是4.7%,不足扩大后的联邦议院代表资格所要求的5%得票数,但90同盟和绿党在东部缔结的协定给后者带来了轻微的补偿,东部5.9%的得票率使他们赢得了8个代表名额。(虽然西部绿党没有拒绝与东部绿党合并的建议,但他们也无法共同列在一张表上而携手进入议院)虽然民社党的总得票率仅为2.4%,但它却依仗东部9.9%的得票率赢得了联邦议院17个议席。它之所以能在东部取得年轻投票者的支持,完全在于一位新的能干的领导人格利高尔·吉斯(Gregor Gysi),他是一位律师,曾保护持不同政见者免

受昂纳克政权的迫害。在这个方面,由于民社党根植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便对它持敌对态度。东德的社会民主党人对他们所遭受的迫害记忆犹新,在西部,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忽略社会民主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混淆以后所带来的危险。所以,民社党在新近选出的联邦议院的出场无疑给德国左派添加了一道新的分裂的暗流。相比较之下,自民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则是波澜不兴地收编了东德的前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批党员和颇有价值的财产,后二者都曾经忠实地追随过昂纳克。事实上正是东部党员构成了自民党的大多数。

统一后的矛盾

社会民主党在1990年11月大选上的全线崩溃不可避免地迫使该党物色一个新的领导人。在次年的不来梅党代会上,比约恩·恩霍尔姆当选为党主席。他和他前任是同一辈人,有着同样的背景——都是勃兰特所保护的孙辈,他们的领袖人物在联邦州日显重要:拉方丹(萨尔州)、恩霍尔姆(石勒斯威格-荷斯台因州)、施罗德(Schröder)(下萨克森州)、沙平(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60年代就形成了气候,70年代在青年左派中更是头角峥嵘。这些新左派的领导人之间的亲和关系被一种强烈的实用弹性倾向冲淡了。在个人风格上,恩霍尔姆处事要比魅力不凡、雄辩机智的拉方丹更加冷静,也更倾向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常有人说,老一辈人如勃兰特、施密特、维纳尔是硬质材料制成的——而他们的孙辈“是由柔软得多的材料制成的;更本色、更独立、更愿意当众承认他们的疑问;他们喜欢文化消费,对歌剧的兴趣远远大于地区党大会上的劳工报告和讨论”^④。他们的崛起反映了社会民主党运作机器作用正在降低这一变化,与新左派类似的态度已彻底渗透进了中级官员阶层中去了。

在这些批评之中,还有对党的组织机构的封闭性和决策分的暗箱操作的批评。在恩霍尔姆的领导下,有人建议引入初选制以便为大选挑选候选人;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小组和文化协会,以加强党政机关和党员及支持者的联系。因此,工作小组的地位在党内戏剧性地增强了,同时,它们也不断地获得一种制度性的身份。它们之中的佼佼者有服务于雇员的工作小组(AfA)和服务于社会民主派妇女的工作小组(ASF),前者的成立是社会民主党劳工派用来应付崛起的新左派的,后者在党内赢得了份额制度——1994年妇女在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和当选代表中占了40%的名额。另一方面,更加非正式的小组则是社会民主党选民的创造,最初成立小组是为了召唤知识界和文化界的首要人物对本党的支持,因为小组已经成为了党内左派知识界的讲坛,在那里可以举行文化活动,人们可以踊跃参加纲领的讨论。近来工作小组甚至获准可以吸收党外的成员,还有人建议批准小组拥有向国会的提议权以正式确定其地位。

不管这种输入新鲜血液的做法是如何值得称道,社会民主党内诸多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累进的制度化融合极可能威胁它的生存。社会民主党内部机制被人称作是“松散的双重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各种不同私党、派系、宗派集团和利益团体形成了短暂而不稳定的联盟。⁶⁹但这些人主张的社会和组织的多元化对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不再新鲜了。过去,这些工作小组都处在一个纪律严明、高度集中化的机构的控制之下,领导人都是相当有凝聚力的党内精英。新一代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缺乏他们前辈的集体意识:是由着性子来的个人主义者,这样的处事风格是不能解决个人或政治矛盾的。

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弱点使它自1990年大选上失政之后在施政方面遭受到重大损失。统一后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后果本来对社会民主党本来应当是很有利的。科尔曾许诺在不大幅度

增加西部税收的前提下,要在东部迅速而全面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这个许诺的确很动听,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多就被证明是空谈。大规模的灾难和不幸开始降临到前民主德国民众头上,工业全线崩溃,西部经济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急速增长之后,即刻跌落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去了,利率急速上升,政府被迫课以紧急税。雪上加霜的是,波恩大联合被内部的冲突、丑闻、政党之间的争吵和继任部长的辞职弄得四分五裂。1993年,失业人数上升到330万(西部失业率为7.1%,东部为14.7%),经济下降了2个百分点,财政赤字继续失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阶段的经济低迷既不是统一带来的短暂问题,也不是国际商业循环的问题,它深刻暴露出了新德国的经济结构问题。对经济前景不看好的一些人在目睹了国内社会动荡和中央政府的权力真空这些现象之后,悲观情绪加重了。然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依然无力撼动右翼势力的霸主地位。社会民主党之所以无法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是因为它自身正受到厌恶政治的综合症——对整个“政治阶级”的强烈不满——的困扰。

从政治上看,社会民主党至少可以在联邦参议院(即联邦共和国的上议院,由各联邦州政府的代表组成,16个联邦州政府中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达11个之多)凭借其参议员人数的优势获益,因为联邦参议院在修改宪法和财政立法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科尔也能够诱使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联邦州打破政府的等级和投票,从而削弱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参议院的地位。1992年在布兰登堡表决通过了增加增殖税的政府措施,这样就消除了社会民主党借以谴责总理的所谓“纳税谎言”的口实。社会民主党无力向执政的联盟党发起有效的攻击,相反,它日益发觉自己必须与执政党为国家的经济治疗政策——1993年春天参政的联邦社会民主党与国家政府为稳定财政而达成的“一致协定”——负连带责任。此刻,对某些社会

民主党党员来说,出现了一次绝好的未来大联盟的预演,这场预演需要的是对科尔总理阿谀亲近的策略,而不是强硬的反对姿态。于是,尽管科尔本人不受欢迎,但他还是能长久地在谋略上胜出社会民主党。

在这方面,科尔大大得益于社会民主党的内讧,因为该党内部诸多宗派在德国统一后产生的一些问题的意见分歧上纠缠不清。总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政府的内部分歧转移到社会民主党的不团结和纪律涣散上去,从而一再把反对派赞同的矛盾的措施变得对自己有利。¹⁴⁹外界强烈指责社会民主党在相当多的德国城市爆发种族暴力活动之后,还制定严格限制政治避难的政策,对此,社会民主党的反应是图解般的说明。形势变化所要求的宪法修正案在全党上下引发了痛苦而且使该党日益虚弱的内耗。中间阶层是势力最强的反对派。议会代表和党的行政人员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分歧。最强烈地要求改变现有制度的呼声来自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联邦州和对收容避难者负责的城市官员。

这场冲突的曲折盘旋使党主席处境尴尬。最初恩霍尔姆还能远离争论,不必挖空心思去采取措施争取多数人的支持。可他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一时相当被动,直到这时,他才改变了态度,敦促社会民主党接受限制性规定。最后,在1992年11月的特别大会上,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修宪原则,但是附加了条件。当科尔总理要求修改宪法以使德国武装力量能够在北约以外的范围执行行动的时候,同样的混乱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再度发生了。社会民主党没有能力反对波恩政府在巴尔干地区大胆的、在欧洲其他国家首都广受指责的军事行动,只得苍白无力地解释德国的新安全政策。

结果不久就要出来了。同气连枝的党派精英们以非正式默许所达成的决定,如今牢牢地受制于严厉的公众批评,其中还夹杂着个人的敌对与私怨。¹⁵⁰1992年,汉斯-乌尔里希·克洛塞

(Has-Ulrich Klose)艰难地当选为议会党团主席,就已经是这种险恶气象的征兆了。东部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迹象尤为彰显,他们和绿党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把共享民主奉为圭臬,热衷于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和各种各样的明争暗斗。¹⁹社会民主党的东西两翼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张,因为该党在新加入的5个联邦州里组织十分不力。正是在党内上下人心涣散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主席恩霍尔姆在1993年5月突然提出辞呈,其时议会委员会调查了1987年石勒斯威格-荷斯台因州的选举中包围恩霍尔姆的反对派的丑闻,他治下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暴露出的大量琐碎问题已使该党积重难返了。恩霍尔姆领导社会民主党向着政治中心的努力一再受挫,又受困于党内的派系斗争,他已丧失了对这些事件的承受力,于是黯然淡出。

在接下来的后继人的竞选中,两位候选人各自默契地代表了冲突着的战略目标。下萨克森州总理盖尔哈德·施罗德主张与绿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他在莱茵兰-普法尔茨的同僚鲁道夫·沙平则力主为建立和右翼政党的联盟而努力。这两条路线的选择使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在历史上第一次团结为一个整体。选举结果是沙平令人信服的胜利,他低调的态势和中庸的观点对于举棋不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个安全的选择。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来自德国西部边境的同一个州——这对于新统一的德国权力的再集中不是一个好兆头。

在版图扩大后的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依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其党员数量达90万之多,为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所望尘莫及。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实支持者数量已经跌落到全体党员三分之一,但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联邦宪法保障了该党不至于沦落到英国工党那样的惨况。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仍在三分之二的联邦州保留了办事处,在联邦参议院也保持着大多数议席。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为该党源源不

断地提供拥有足够行政管理经验的领导人——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削弱了联邦德国领导层的连续性：沙平是10年之内连续第五位与科尔竞选的候选人了。在过去，社会民主党总是能够左右逢源地适应看起来于己不利的新形势，建立起自己有关全民党的种种变体，开拓东方政策，在合并绿党的议程方面至少取得了部分的成果。然而，在野10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却回天乏术，再也想不出重返联邦政府的策略了。

90年代整个欧洲的左翼政治普遍发育不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窘境只不过是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缩影而已。该党选举上的落败反映了在日益后工业化的社会中，惯常的社会构成正在分裂，因为这个时代为某些阶层创造了新机会，而另一些阶层则边缘化甚至迷失了方向。依据时代和文化的主线，传统的和后现代的环境越来越泾渭分明。我们横向地解剖一下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构成，就会发现社会民主党背负了两个无法实现的重任——一个是要在不断向上的热望和社会缺陷的不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并使两者和谐起来，另一个是要把惯常的价值与后现代的文化潮流结合起来。

社会团结的价值（尽管这个定义很不准确）还是社会民主党源于阶级政治和工业社会的遗物，它特别表现为该党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他们对传统的归属抑制了他们对大众的富足和强调工人成就的社会思潮等现实状况的适应能力。社会民主党的两难处境与奥斯卡·拉方丹的政治作为如出一辙。作为一个政治代言人，他竭力鼓吹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热烈支持创造有利于个人竞争的环境；但是作为萨尔州的施政总理，他又惯于向本州长期亏损的矿冶和钢铁企业持续发放高额的联邦补贴。他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行正是今天社会民主党受到方向相反的两股张力作用的明证。

哪一股潮流能主宰德国呢？1990年原本支持社会民主党

的许多体力劳动者倒向了基民盟,使前者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传统大本营鲁尔工业区,还有东部萨克森州的无产阶级堡垒,但它们此时却被基民盟所控制。自从1990年的联邦州选举以来,有迹象表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选民正滑向共和派的边缘。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也正在稳步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左翼选民,这体现在该党纲领性的呼吁中、该党对领导的选择上和该党的选民上。1990年,社会民主党重新夺回一度被绿党占去的失地。自从像尤塔·迪特福特(Jutta Dittfurth)这样的青年领袖离去之后,绿党在经历了最初一段相互指责的时期后就开始恢复元气了。该党在多个联邦州选举中获胜,如今在5个州(不来梅、布兰登堡、黑森、下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1993年春,西部绿党与东部绿党90联盟合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他们1994年重返联邦议院的前景相当乐观。

绿党的恢复和社会民主党的再调整使两党在地方的联盟更容易了。但是从国家高度来看,选民对红绿联盟的支持还缺少数量上的优势。1994年夏,经济的恢复——归功于新任联邦银行行长汉斯·迪特麦耶尔(Hans Tietmeyer),过去曾是科尔的亲密助手,在他的领导下,联邦银行谨慎地降低了利息——再一次改善了基民盟在民意测验中的地位。随着民社党的左翼阵营逼近东部,沙平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寻求对右翼的开放。如果自民党在1994年10月不能突破选举的起点,和基民盟的大联盟无疑就能成形了。如果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大选中再次落败,那么,不少领导人肯定是会欢迎这个大联盟的。假如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人的再结盟方面、纲领的定义方面和组织的再建构方面能更默契地、灵活地处理问题,重新执政这个账单就迟早会兑现。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如果要把自己表现为人主政府的潜在政党,就必须完成这些任务。

五 英国：劳工和选举改革

彼特·迈尔

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联合王国政府的政体相当特别。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英国的下院从来都不是依照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在这方面与英国最相似的是法国，自从1958年第五共和国缔造以来，法国绝大多数时期都保留着复选制，而更能体现比例代表制精神的体制却被废除了。然而，在1986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国却重新引入比例代表制，并在1988年恢复了多数当选惯例。第二，英国下院一贯实行西欧国家议会中惟一的单一议员选区制。在这方面法国也同样体现出最类似的特点，但当1986年它临时引入比例代表制的时候，它也必然采用了多议员选区制。单一议员选区制也存在于德国，但是他们在联邦议院中只占一半席位，其余名额按照地区性的政党名单来分配；而在意大利，他们占有75%的席位。

第三，联合王国政府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控制议会多数但却只代表少数民意的政府之一。少数党政府在西欧并不罕见，通常它们的支持率不足一半，而且也只掌握议会的少数议席。今天，只有西班牙和联合王国的政府有能力把选举支持率的少数化为议会的多数。英国的情况更为惊人，因为在这里，多数派的



议员甚至都不能控制自己的选区。例如在 1992 年大选中,40% 的议席不是通过完全的地方选举多数产生的,于是在像因弗内斯、那恩和洛克巴这样的选区,赢得胜利的阀限已经降到了投票率的 26% (其选民支持率仅为 19%)。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议会统治原则一旦和最高行政权力的实施结合起来,就可能造就一个尽管代表基础相对薄弱,但比欧洲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效、权力更集权的政府。这是一个不受制于成文宪法或权利法案的种种限制的政府;也不会受到由选举产生的上院的挑战;由于不存在强大的地方或地区政府,所以它也无须应对另外一个政治权力中心的反对压力。^⑩最后,比较次要的一点是,联合王国所推行的政治制度在西欧是惟一的,该制度自 80 年代以来就不含有政府政党构成的最低限度的变化。

从两党制到三党制

政治和体制的独特性的长期累积促使联合王国在 80 年代末引发了一场关于宪法改革的新讨论,因为正是选举制度的运转,及其将选举支持率的少数转化为执政的议会多数的举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和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轮新的批评潮是令人惊异的,因为在今天选举制度的不公正早就是明摆着的,它和早些时候的不公正现象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事实上,战后的政府从来没有赢得过选举的多数:凭借选举多数获胜的最后的一次选举还是发生在 1931 年,那时的一个政党赢得了全体选民的多数。人们值得回头看看保守党在前四届选举中获得的平均选举支持率(42.6%),因为这个数字大大高于工党在 70 年代中期选举获胜的得票率(38.3%)。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第三党的选举实力和它的议会代表名额严重不足这一事实将政治制度

的不公正性映衬得十分突出。

尽管英国的选举制和政治制度很不健全,但50年代、60年代、勉强地说还有70年代都似乎还能四平八稳地运行起来,那时候选民的注意力相对集中在两个主要大党身上。虽然两个党谁也没能获得整体的多数选票,但它们的联合支持率明显高于任何其他政党的联合支持率。英国国家的宪法结构在西欧诸国中非常古怪,它的独特性看起来好像非常适合它相当独特的政党体系,因为西欧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两个主要政党合起来能占据这么庞大的选票。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例如在50年代,工党和保守党平均共获94%的选票,大大高于

表 5.1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西欧各国政党体系下
两个最大政党的联合平均得票率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奥地利	87.1	90.2	93.1	87.6
比利时	81.0	63.3	47.3	34.4
丹 麦	63.1	59.1	50.2	50.4
芬 兰	48.8	46.7	43.5	48.0
法 国	43.4	56.4	46.5	57.2
德 国	78.0	85.8	91.0	85.2
冰 岛	63.9	66.4	61.3	51.6
爱尔兰	74.1	79.1	81.2	79.1
意大利	63.9	64.7	69.2	58.4
卢森堡	75.0	70.1	57.9	63.5
荷 兰	61.4	55.0	52.4	63.5
挪 威	65.1	64.9	59.7	65.5
瑞 典	68.2	65.1	66.1	65.5
瑞 士	50.2	48.6	46.7	43.8
联合王国	93.9	88.7	80.1	71.6

西欧任何其他体系的两大党的联合得票(见表 5.1)。60 年代,它们共得票 89%,仅次于奥地利。到 70 年代,两党的联合得票降至 80%,低于奥地利、德国和爱尔兰,到 80 年代,继续下降到 72%,这个数字即使跟多党制国家如荷兰、挪威和瑞典相比,也不是非常突出了。⁶⁹

80 年代两党联合得票率的下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支持的分化,因为剩余 30% 左右的选票已经零星地落入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小党那里去了。相反,这个积累了很长时间的选举转变实际上是两党制向三党制转化的结果,因为在此期间,自由党(和它的联盟)的平均支持率从 50 年代的 3%、60 年代的 10% 增长到 70 年代的 15%,到 80 年代更是迅速增长到 24%。实际上,在 80 年代,自由党联盟在联合王国的支持率几乎已经超过了西欧所有其他体系下的自由党的支持率,但它的议会代表数量却远远低于后者的大多数。⁷⁰作为英国选举制度的作用结果,选举层面上的三党制在议会层面上却依旧是牢固的两党制,保守党和工党在 70 年代总共获得平均将近 95% 的下院议席,80 年代则获得 93% 以上的议席——这个曾持续反映了它们过去拥有的政治安全感的联合议会代表体制如今显然已经落后于现实的选举优势了。

只要比较一下各个党派得平均得票数及其议席数(见表 5.2),这种失衡就能得到最清晰的反映。例如,在过去的三届选举中,保守党的每个议席平均耗用 37,244 张选票,工党的每个议席平均耗用 42,379 张选票。另一方面,自由党或它的联盟的每个议席则要耗用 325,399 张选票,几乎是保守党的 9 倍,工党的 8 倍。

表 5.2 1983 - 1992 年英国选举中三大党的
得票数和议席数统计

	总得票数	总议席数	每个议席的得票数
保守党			
1983	13,012,316	397	32,777
1987	13,760,583	376	36,597
1992	14,231,884	336	42,357
工 党			
1983	8,456,934	209	40,464
1987	10,029,807	229	43,798
1992	11,619,306	271	42,876
自由党/联盟			
1983	7,780,949	23	338,302
1987	7,341,633	22	333,711
1992	6,083,661	20	304,183

比例代表制和政治分化

50 年代欧洲和美国都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比例选举制的优缺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魏玛德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是如何为法西斯上台打开方便之门的。结果普遍认为比例代表制原则会导致多党制的产生,而多数当选制或(英国式的)复选制则会产生两党制。选举制度类型和政治分化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就这样想当然地成立了——与此类似的是,它的方向也想当然地成立了:选举制度是因,政党制度是果。然而在历史现实中,这种关系并不明显。事实上,毋宁说,多党制是比例代表制的因,而不是果。这些国家之所以旗帜鲜明地选择比例投票制作为典型的模式,是因为它们的政治联合已经发生分化。



西欧过去或多或少普遍存在的多数当选制的废弃是与男性普选权的广泛引入相伴发生的,它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④在第一个阶段,比例制首先被那些存在着重要少数派的——无论是种族、语言还是宗教的——国家所采纳,因为如果要求少数派不断保持忠诚,那么,政体就必须能够保持长期政治稳定。假如这些少数团体从公众决策体系中被排斥出去,其充分的代表权在刚刚民主化的立法机关中被否定,那么,它们很自然会或迟或早感觉政权本身对它们构成了合法性威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宗教和语言呈现高度多元化的比利时和瑞士成了最早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尽管它们也是最后给予女性普选权的国家。

比例代表制的第二轮浪潮影响到了现存社会精英派别已感受到正在崛起的多数派的威胁的那些国家,例如现代南非。更具体地说,引进比例选举制国家都是这样的国家:早先在严格的管辖权基础上掌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集团被迫给新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和无产者,也就是被认为即将建立一个“自然”的选举多数的社会集团以选举权。^⑤在那些资产阶级集团因为地区、宗教或经济部类而分裂为不同政党的国家,对新的多数派的存在尤为恐惧。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感到多数当选这种显而易见的趋势很容易使一个相对团结的工人阶级团体运动获得独占鳌头的政治地位。事实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给予工人阶级的选举权将能引起其内部的下层分裂,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反工人阶级政党;要么,采取不会影响较小党派政治利益的比例代表制,这样,各个分散的少数派将能继续保留,现存的中产阶级政党也能继续存在下去。总的看来,一般国家都采取了后一种路线。例如荷兰、挪威或瑞典,接受比例代表制都是扩大选举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这两种环境下,政治分化实际上都发生在采纳比例投票制之前。然而,当联合王国在扩大选举权的时候,这种关系就不

甚了了了。就伦理、语言或宗教少数派而言,在 19 世纪末真正起到重要作用的团体只有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但由于他们的地域分布比较集中,因此多数当选制也没有什么大不利。⁶²在选举权的觉醒中,也不存在内部严重分化的资产阶级集团将会被自然的工人阶级多数取代的可能性。事实上,真正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英国在 1867 年第一次大范围地给予工人阶级选举权,那时候一个组织分散的工人阶级政党还没有建立起来,群众政治的威胁也还不明显。⁶³因此,联合王国在给予广泛的男性普选权的时候没有相应采取比例代表制的形式,这一独特性并不令人惊奇。因为英国缺乏政治分化,因此也就像别的地方那样缺乏引人“选举妥协”机制的压力。

尽管延迟了一些时候,但是政治多元化要求采纳比例代表制的历史趋势毕竟不可阻挡,英国的选举格局显示,随着两党选票的下降,选举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更为明显的是,这种压力不仅来自自由党选区名额严重不足,它们要求一个更公正合理的选举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这种压力还来源于工党内部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⁶⁴之所以要改革选举制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民主原则的精神不愿看到自己过去的政敌——比如自由党——受到恶劣的歧视,同时也对这种绝对排他的统治要求(不管这要求是出自保守党还是工党之口)的合法性深表怀疑,因为这样的要求只能在少数派选民那里得到响应。这个观点表明,施行一个更能体现代表制精神的投票制度是民主化的要求,尽管这样做极可能使得工党在议会中的压倒性优势不复存在,而且其矛头将直接指向联合政府。

工党的衰落

构思选举制度的改革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个原因是实践性的而非原则性的。它源于左派的某种需要,左派一直试图要找

到一条能够阻止保守党政府连绵不断的重复选举和同样连绵不断的排斥工党入主政府的顽固行为的途径。考虑到自由党的支持力量和保守党与工党选票上的地区倾向的增长,即使那些仍然追求工党的全面多数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也越来越怀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

这种担心是有充分依据的。从表 5.3 可以看出,70 年代和 80 年代,联合王国左派的平均支持率如今已经严重下降,大大低于西欧很多其他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支持率,70 年代,英国在 15 个国家中名列第九,80 年代名列第十三,

表 5.3 西欧各国 70 年代至 90 年代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平均选举支持率和执政记录

	70 年代的 平均得票率	80 年代的 平均得票率	70-90 年代左派政党的 执政时间百分比
奥地利	51.2	46.1	98
比利时	29.5	29.4	52
丹 麦	36.6	32.8	48
芬 兰	42.7	39.8	96
法 国	43.1	47.4	33
德 国	44.2	39.4	59
冰 岛	38.5	32.4	53
爱尔兰	12.7	8.9	51
意大利	45.1	44.7	77
卢森堡	43.5	37.4	58
荷 兰	35.3	32.1	38
挪 威	39.8	38.3	66
瑞 士	48.8	50.0	76
瑞 典	28.1	22.1	100
联合王国	39.1	29.2	28

* 不包括新左派和绿党。



仅仅排在瑞士和爱尔兰之前。工党的执政期限记录就更是凄惨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整个西欧其他国家的传统左派政党——无论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无论是独自执政还是联合执政,在选举期间无论是强还是弱——都比英国工党执政时间长得多。

鉴于整个西欧在战后时期左右两派势力始终保持均衡这一事实——这与普通公众的印象正好相反,工党近年来的相对衰落就越发地引人瞩目。例如,50年代,整个西欧的左派政党平均获得40.6%的公众选票,80年代获得38.2%的选票,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假如绿党的支持率也可以算入左派的话,那么80年代西欧左派平均得票率就达到了40.5%,几乎与50年代持平(见表5.4)。当然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80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左派的全面得票获得大幅度增长,与此同时,芬兰、法国和挪威的左派得票却是大幅下降。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变化像联合王国这样显著,也没有哪个国家的左派政党发生过如此戏剧性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经历是相当特殊的。

表 5.4 50 年代至 80 年代西欧左派的选举成绩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80 年代
奥地利				
SD	43.3	45.0	50.0	45.4
CP	4.3	1.7	1.2	0.7
G				4.1
合 计	47.6	46.7	51.2	50.2
比利时				
SD	35.9	31.0	26.6	28.0
CP	3.4	3.7	2.9	1.4
G				6.1
合 计	39.3	34.7	29.5	35.5

续表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丹 麦				
SD	40.2	39.1	33.6	31.9
CP	4.5	1.0	3.0	0.9
NL		7.7	8.3	14.4
G				0.7
合 计	44.7	47.8	44.9	47.9
芬 兰				
SD	25.9	26.9	25.1	25.4
CP	22.1	21.6	17.6	13.9
G				2.7
合 计	48.0	48.5	42.7	42.0
法 国				
SD	25.9	26.9	25.1	25.4
CP	23.9	21.4	21.0	12.4
G				0.9
合 计	49.8	48.3	46.1	38.7
德 国				
SD	30.3	39.4	44.2	39.4
CP	1.1			
G				5.1
合 计	31.4	39.4	44.2	44.5
冰 岛				
SD	19.5	15.0	14.8	17.1
CP	16.4	16.3	23.7	15.3
NL				7.8
合 计	35.9	28.3	38.5	40.2



续 表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爱尔兰				
SD	10.9	14.8	12.7	8.9
NL			1.4	3.9
G				0.4
合 计	10.9	14.8	14.1	13.2
意大利				
SD	18.0	19.4	14.4	16.4
CP	22.7	26.1	30.7	28.3
NL		2.2	3.3	4.0
G				1.2
合 计	40.7	47.7	48.4	49.9
卢森堡				
SD	37.1	35.0	35.4	32.3
CP	11.6	14.0	8.2	5.1
G				6.8
合 计	48.7	49.0	43.6	44.2
荷 兰				
SD	30.7	25.8	31.9	31.0
CP	4.4	3.2	3.4	1.1
NL	0.6	3.0	4.0	3.7
合 计	35.7	32.0	39.3	35.8
挪 威				
SD	47.5	45.4	38.8	37.4
CP	4.3	1.8	1.0	0.9
NL		4.0	6.9	6.8
合 计	51.8	51.2	46.7	45.1

五 英国：劳工和选举改革



续表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瑞典				
SD	45.6	48.4	43.7	44.5
CP	4.2	4.2	5.1	5.6
NL				2.9
合计	49.8	52.6	48.8	53.0
瑞士				
SD	26.0	26.0	25.7	21.2
CP	2.7	2.6	2.4	0.9
NL			0.9	3.5
G				3.9
合计	28.7	28.6	29.0	29.5
联合王国				
SD	46.3	46.1	39.1	29.2
合计	46.3	46.1	39.1	29.2
西欧				
SD	32.2	31.7	30.5	29.5
CP	8.4	7.8	8.0	5.8
NL	0.0	1.1	1.7	2.9
G				2.3
合计	40.6	40.6	40.2	40.5

注:SD = 社会民主党;CP = 共产党;NL = 新左派;G = 绿党。表中各党都至少获得1%以上的选票或一个议会议席。

资料来源:米歇尔·加拉夫(Michael Gallapher)、米歇尔·拉沃(Michael Laver)和彼得·迈尔(Peter Mair):《西欧代议制政府》,纽约1992年版,第60-68页。

用工党所享有的左派垄断投票的术语来说,联合王国也是一个例外。19世纪晚期以后的欧洲左派历史可以用四个选举动员阶段来概述,每个阶段都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派别相联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和最持久的见证了社会民主党的诞生的阶段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时间长达30年,在这一阶段,每一

个单一国家的工人阶级政治都有效地团结在一个单一政治形式下。第二个阶段经历了1917年俄国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以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运动所赢得左派多数地位的发展。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开始,它引发的效应更加边缘化且更加不平均,因为那时新的规模较小的左派政党在许多国家都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党派融对马克思主义一定程度的忠诚和学生运动所要求的更加自由化的价值观于一体。最后一个阶段发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整个西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生态主义政党,它们——即使它们仅仅从外部与传统的左派政治相联系——已经越来越被视为基于更广泛的左派激进政治选择的潜在构成。

这些不同动员阶段所导致的左派分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几乎每一个西欧国家的特点(见表5.4)。在一些国家,例如丹麦、意大利和瑞士,四大党的代表近年来都参与了全民选举的角逐,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其他国家四大党之中至少有三个参与了选举。然而,只有联合王国是个例外,左派的投票被单独的一支左派力量所垄断,而其他力量如共产党、新左派或绿党都未能获得哪怕1%的选票。

从一种角度看,这种垄断是有利的,因为它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目标统一和战略统一,而在西欧政治分化严重的国家,这一点则很难做到。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这则要为左派的选举失利承担部分责任,因为人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在联合王国,工党对左派卓有成效的垄断就意味着:一旦人们对工党这一个政党失去信心,就等于对整个左派整体失去了信心。工党一个党和全体左派是一回事。但在西欧的任何其他国家,人们对一个左派政党的不满不一定会导致他们转向中间派或右派。与此相反,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如果选民面对的是左派的各种不同的政党,当他们放弃其中一个党的时候,一般都会转向同一个阵营

的另一个党,而不是投奔中间派或右派的哪个党,这样,选民对整个左派集团的支持相对来看还是稳固不变的。⁵⁹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大多数西欧国家左派的多元化特色使选民对全体左派的支持保持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而在联合王国,左派的投票机会只局限于工党一党,这是该党近来日趋虚弱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与欧洲众多其他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相比,工党的虚弱还充分暴露了其组织结构的薄弱。工党从来都不是一个进行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政党,它现在拥有的党员数量只相当于全体英国选民的0.7%,相比之下,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和挪威社会民主党的平均党员数量占据了全体选民的2%-4%,显然大大超过了英国。在奥地利,社会党党员数量接近全体选民的八分之一,在瑞典这个数字达到了六分之一。只有荷兰和法国社会党党员与全体选民的数量之比和联合王国相近。⁶⁰

工党和选举改革

因为意识到了该党的近期失败,并已对阻碍该党单一执政的因素有所认识,所以,工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一个选举制度工作委员会,以比较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选举制度,考虑对各种制宪机构进行选举改革,这些机构包括下院、有可能选出的第二议院、欧洲议会以及拟建中的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1991年7月出版了一份对各种选举制度进行评价的过渡时期报告。1993年,工党在深思熟虑之后,拟就了该报告的最后定稿,其中对选举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执行具体事务的工作班子又被称作“普兰特委员会”,左派热烈欢迎它,认为它是宪法改革中的分水岭。因为这个理由,那份过渡报告充分论述了支持和反对选举改革的各种主张,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特别认真的审查。

普兰特委员会的过渡报告中有一件事必须要加以强调，¹⁵⁷尽管工党是讨论选举改革相对的后来者，但是该报告通篇在暗示：虽然是最后，但工党却正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普兰特在该过渡报告的前言中说：“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再没有什么比改革选举制度的提案更重要的了，我们很有必要来评价这些改革的原因，评价我们认为合法的选举制度所必须遵循的标准，我们也必须依照这些标准仔细检验主要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这个报告的战略。选举是民主政体最重要的部分，其性质不应该由简单化的口号来决定。”然而，也许是因为工党扮演了一个后来者的角色，所以委员会本身某些时候又显得对它所援引的事实和诉诸的标准所知甚少。¹⁵⁸委员会说，该报告所犯的比较明显的错误是很容易得到纠正的，因为如今有大量可资参阅的文献讨论了选举制度和它们潜在的后果问题。¹⁵⁹

然而，在不少场合，报告却由于信息不充分而得出了一些具有严重误导作用的结果。例如，报告曾经想着手解决不同的选举制度所产生的比例结果的程度这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议席分配与公众投票的分配紧密相称的结果问题。但在比例代表制一大堆可能的结果中，报告只援引了一种，而且这个指数只应用到了每个国家得到评价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去。结果，一方面报告强调英国政体中的不合比例制的现象，而另一方面又声称较之法国（复选多数投票体制）或西班牙（弯曲的比例制），联合王国的政体更能体现比例制的精神。事实上，报告所援引的特别指数，以及其他地方经常使用的数据都不适用于联合王国与其他欧洲政体的具体比较。因为这个指数夸大了多党国家（如西班牙或法国）的非比例程度，随之也低估了非多元政体下（例如联合王国）的非比例程度。¹⁶⁰一种两者择一的、经证实更有效的标准，仅仅应当建立在英国三大主要政党赢得选票和议席的不成比例的程度基础之上，这样才能控制住不同的分化水平；这个标

准不能仅仅运用到一次大选中,而应当运用到80年代所有大选中,这样就可以控制时间的变化,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英国的政体比西欧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缺少比例制的特征——这段时期其弯曲程度是西班牙政体的两倍多,几乎是法国采取的多数当选制的两倍(见表5.5)。

更广泛地看,不管采用了什么指数,如果想要衡量建立在对选举结果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选举制度的比例制程度,就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可能性,即选民的选择会通过公众对制度规定的限制的优先意识反映出来,这样就在无形之中掩藏了弯曲的重要来源。例如,有提议主张小党派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处于初创阶段还不成气候就要去承受既定选举制度下的弯曲的负面影响,但这个建议忽视这种可能性:那些已经赢得更多选民的党派已经使制度向更高的比例制迈出了第一步。于是,普兰特报告中的数据指出了英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选举结果的比例制程度较70年代和80年代更高(第45页),但是这与前面所述的选举制度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与选民们不愿把选票投给那些看似很弱小的第三党的心情有关。

我们应该看到,选举制度本身在简单的选举形式之外,对它们自己的权利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普兰特报告一开篇就正确地指出,“不同选举制度下的重大议题首先并不是技术性的议题,而是针对代表的性质、政党的地位作用、议会的性质及规模所提出的某些最深入的问题”。它也正确地指出了并没有“完美”的选举制度,但是应当在选择和常常发生冲突的标准——平等、明确、稳定等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所以说,有人以为选举制度本身就能治愈好各种各样的政治疾患,也有人认为投票程序的改变一定会实现某种意向结果,然而这些论调都不切实际。报告多次强调,选举制度至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影响效果要通过其他一系列的公共机构的和文化的因素才能

得到最终体现。¹⁶

表 5.5 80 年代西欧各国的选举非比例制的平均水平 *

德 国	0.50
丹 麦	0.83
瑞 典	0.94
荷 兰	0.95
奥地利	1.07
比利时	1.28
意大利	1.81
瑞 士	1.95
冰 岛	2.08
爱尔兰	2.15
挪 威	2.44
芬 兰	2.61
卢森堡	2.90
葡萄牙	3.31
希 腊	4.05
法 国	6.17/8.06 * *
西班牙	6.75
联合王国	14.12

* 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各个国家不同选举中,三个最大政党所获议席百分比和得票百分比之间的平均误差。数字越高,平均误差就越大,非比例程度也就越高。

* * 第二个数字仅指采取多数当选投票制度下的 1981 年和 1988 年选举。

尽管普兰特报告在其框架设计和结束语中承认了这些事实,却在对现行的英国政体评论中以及对其主要的选择的评论中忽略了它们。对爱尔兰的单独可转让投票的评述可谓是切中肯綮。报告说,作为现行英国政体的另一种选择方案,单独可转让投票有时是可操作和更可取的——只是因为更具代表性,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批评它鼓励“赞助人客户或地区选票集中政策”(第 71 页)。没有人怀疑这是爱尔兰政体的特色。报告中

的妇女代表席位或少数团体代表席位问题了。

但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很可能想象在单独可转让投票制下,竞选对手的主张不是用地区选票集中利益的措辞来表述的,而是用性别的术语(例如在某个政党内部女性候选人与男性候选人的角逐),甚至是意识形态的术语(例如左翼候选人与同一政治团体内部的右翼候选人之间的角逐)来表述的。换言之,要争取党内第一的排名只能凭着个人的品质,而跟哪一个地区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甚至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为建立代表制的更公平的模式创造有利的条件。这里的问题是,同一政党内部的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是单独可转让投票制产生的逻辑结果,这种竞争所采取的精确形式有更多的偶然性,我们不能因为爱尔兰的情况就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它具有普遍效果。在另一种环境下,促进了爱尔兰的地区政治运动的机制也会促进少数派的政治运动——只要政党愿意在初选中提名少数派的候选人,然后选民接着又投了他们的票,那么,少数派代表当选是完全可能的。对这种方式的批评在有关单独可转让投票制的文献资料中随处可见,⁶⁴惟独普兰特报告的作者忽略了它。

在对当前英国选举制度的讨论中出现了同样的论调。报告承认它有很多错误,但是又争辩说,它的好处是它为投票活动和组织政府这两者之间保留了直接的联系。众所周知,很多比例代表制下的选举,都没有能使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议席,组建内阁的问题在选举结束之后遗留给了不同政党的领导,他们为此争吵不休。所以,政府的问题与其说取决于选举结果,不如说是——常常是秘密地——取决于政治阶级的谈判。实际上有些时候,例如1989年的爱尔兰,这样的协商结果就导致建立政府的任务落到了在选举中失势的政党肩上。另一方面,在英国的政体下,普兰特报告坚持认为,“政府的诞生就是投票活动的直接成果;而不是议会或者立法机构里的政党精英

的联盟建筑的结果；联盟伙伴态度的变化也不足以毁灭政府”（第53页）。

不幸的是，这虽然在实际操作中同样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却不是英国政体运作的合理的和必然的结果。例如，80年代的保守党政府根本算不上是“投票活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它们那时一共只获得大约40%的选票，但却获得了50%以上的议席，这无论如何是碰运气得来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1951年和1974年2月的大选就足够了，那时候获得选举多数支持的政党反而以在野党的身份告终。即使撇开这点不谈，关键问题是联合王国不曾有过联合政府，因此也就不存在选举后的协商，它不应太多地归结为选举制度的本质，而应当把特殊的政党支持模式考虑进去。在英国的选举制度中并没有什么干扰联盟的因素，也不存在什么必然会引起一党多数的因素。实际上，联盟不仅在票数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下是可以想象的，即使在所谓没有多数党的议会，联盟也是必然的。反过来说，在比例代表制下很可能形成一党多数的政府，许多国家都这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比例性，如希腊、爱尔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

这又一次说明了不仅选举制度本身事关重大，而且政治支持的特殊平衡也非同小可。没有哪一种政体能保障少数派的代表权，无论是地区选票集中政治、一个更稳定的政府，或者别的什么，因为到最后所有这一切都要取决于选民的态度、反应、结构以及政党制度。

选区的联系

普兰特委员会首先肯定了英国多数当选制的优越性，但它还是对此表达了极大的疑虑——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投票活动与组建一个政府之间的未经证实的关系，它坚持认为这一制度是党员与他或她的选区之间的代表纽带。委员会用相当热情洋

溢、几乎是浪漫的语言描述了这样的纽带关系。报告中说,议员与选区的“有机”联系(第30页)是众所关注的问题,选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认为体现着一致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第71页)。在稍后的内容部分中,报告区分了它所说的“立法”议会和“审议”议会,前者召开的目的是通过法案、选举和支持政府,后者旨在修改和审阅政策(报告认为这个角色比较适合想象中的民主的第二议院),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前者的核心特色应该是“在立法者和明确界定的民众群体之间的一个明确的责任联系。反过来它又要求单一议会选区,这一选区规定了一个被明确界定的、它的代表必须对它负责的民众团体”(第30页)。

既然单一议员选区的个体代表及其责任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就不免使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在西欧只有极少的国家采用这种办法。比如在德国的体制下,有一半议员是在单个议员选区的多数当选制投票中选出的,另一半是采用比例制的形式从政党的名册中选出的,尽管德国的选区人口更加密集,但德国体制就包含了这种类型的关联;普兰特报告高度赞赏地提到了这一点。在法国的复选制下,只要有可能,选区也会实行单独议席制;它也能保障——不同于联合王国或德国——当选的议会議員能够在选区中赢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在意大利现行选举改革中,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四分之三议席是按照单独议员选区制选出来的,其余席位按比例制选出;这样做效果如何,目前还未得到检验。但是意大利的确已经走到了这一步。爱尔兰的单独可转让投票制让人大可怀疑,因为个体成员和他们选区之间那种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化合在普兰特报告看来相当褊狭而不足取,因而遭到了否定。

报告再次指出,对英国政体的大众争论有两个核心缺陷。第一是在各自选区由少数派投票选出的议员所占比例过大

(1992年高达40%),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即这些议员对广大选民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就和执政党对更广泛的选民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什么差别了。在一个单独议员选区,如果个体议员的个人意见被认真对待,这就会和多数制度不相吻合,因为个人意见经常是与多数冲突的。报告并没有无视这些困难,也对两者择一的投票制度进行了一些考察,这种制度和单独可转让投票制一样,也包括最受欢和受欢迎程度较低的选票,但与单独可转让投票制不同的是,它仅仅是在单独议员选区被使用。⁶³

第二个问题就更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普兰特报告没有说明:谁可以质询议员并通过什么途径可以确保个别议员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或者说,在这种义务体系下,政党的作用怎样?事实上,个体议员的责任只是简单的臆想,而未经证实(或证明合法的)。现实情况是,对英国选举动向的各种研究显示,个体议员对投票的倾向性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即使有,也是寥寥无几。相反,不论是对某一政党进行了长期心理认同,还是通过对一系列特殊问题的关注,或者作为经济环境和经济前景的一个结果,联合王国的选民归根到底是政党的选民,他们对政治的反应主导性地是以政党的作为和意识形态为中介的。只有在这一层意义上说,议员才是负责任的——也就是说是对他们的党派负有责任,反过来说,对该党的选民也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个体议员在选举中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当然不是绝对地——取决于他们所属党派的成败。英国民主是政党的民主,同样,英国的政府也是政党的政府。非政党代表模式是极其虚弱的,假如下院里完全没有英国本土选区的独立议员参与的话,该模式的虚弱性就暴露得尤为突出。

一种个体议员的意识形态如此狂热地保留在一个实际上完全是党徒操纵的政治结构中,这一点恰好是对英国民主莫大讽

刺。无疑，每个政治派别中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会有持不同意见的政党议员；也有不少议员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一种选区工作，如果换一种别的制度，在更具有地方性特色的代表制层面下，这种工作将更见成效。最近发生了一起关于下院的政治责任和英国民主的“党性”⁹⁴关系的典型事件，这与前工党议员戴夫·奈利斯特的经历有关，他曾经不知疲倦地为选区工作，在议会里也获得了显赫的地位，然而他却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境地，排斥他的政党固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地方的部分选民——虽然只是少数人——也拒绝给他独立的候选资格，而宁愿支持新的“正式”的工党候选人。

但如果实际情况中公众对于个体议员的优缺点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注，那么，理论上就不能证实普兰特报告对坚持保留单个成员选区的立场是否站得住脚。报告在开头部分作了一些引证，但并不是十分重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认为“舆论和地方选区之间”并没有逻辑的联系，因此，“如果一个选举制度能够代表个人主义的意见，那么选区就应该是自己选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地理区域先行决定下来的”(第29页)。这实际上等于说，按照“纯”比例代表制的逻辑，选民与其代表的联系，以及与责任模式的联系都完全是由政党中介的每个政党的选民共同构成了“自我选出”的意识形态选区。普兰特委员会无疑觉得这样的操作方式有失“自然”或“有机”；但很显然报告没有对此给予太多的注意。

事实上，英国选举秩序的缺陷已经越来越深了。可以说这样的制度非但没有激励起每个议员的真正的责任感，反而适得其反——因为人们无法在选出一个理想的候选人的同时，再选出一个理想的政党，在今天，实行这种选举制度的国家已经非常少见了。但如果要把议员的责任和政党的责任区分开来的话，候选人和政党的分开选举就势在必行。假如一个选民倾向于—

个政党,那么他就必须要接受其候选人;如果他无法认可这个候选人,那么他就必须放弃这个党。这两者形影相随、不能分开。这样,公众即使有呼声要求给女性和少数派候选人以更公正合理的代表机会,目前它也只能通过一条对选民的政党倾向造成重大影响的途径来表达。

在德国的单独议员选区,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选举权的人的第二选票可以投给别的党,这个党的候选人极可能与第一选票无缘;法国的情况也不是这样,第一投票是公开的,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了解到候选人和政党的受欢迎情况。即使在美国,也保留了简单多数当选制,而且规定一张选票只能选一人,投票者至少有机会参加第一轮选举的投票,来表达他们对众多党派候选人的喜好选择。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对政党候选人的选择在各种比例代表制下也有可能进行,这不仅包括单独可转让投票制,也包括那些多政党名单制,在这里,选民可以通过党内偏好投票,有权更改候选人表上的“政党提名人”次序。^⑨然而在联合王国,党员数量异乎寻常地少,所以挑选出来的候选人就难以体现出公众参与的意义来,候选人与政党融为一体,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如此出众的政党民主制下,普兰特非常看好的个体议员的概念无非是一个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罢了。

改革的后果

无论工党有没有转而支持选举改革,也无论它是否被迫进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在未来没有多数党的议会中,接受自由党的支持,但只要英国选举制度在可预见的将来要进行改革,形势就要求工党对此持赞成态度。保守党坚决反对改革,这并不出人意料,而同时自由民主党的力量还很微弱,仅凭他们自己还不足以影响整个局势。

普兰特报告也赞成改革,尽管是有保留的。但它始终不愿放弃单独议员选区制,这样就排除了采用单独可转让投票制或比例代表制下各种直接的政党一览表方法的可能,甚至也排除了允许选民对表上的候选人表示出喜好不同选择的可能。报告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能够保障下院的稳定性和政治权威,报告对这样一种情形感到非常担忧:即更多体现比例原则的制度会使过多的新党参与进来——这种情绪无疑也存在于工党内部积极鼓吹改革的那些人中。报告一方面承认新党在现行的英国政体之下很可能被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援引了一种论调,认为“既然现存的政党运作良好,那些新党就可有可无”(第63页),此外报告还宣称:“新参政的小党是否能够真正代表民意,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多数当选体制下,各党派都急于把所有的愿望和政治主张纳入自己的价值和政治主张范畴中去。”(第75页)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小党不应该去寻求自己的使命,而应该打出问题的旗号,等待比他们更强大的、已经存在多年的政治对手来解决,从而体现出民主精神——就像商界中各色小商号要向大公司展示它们在产品级别上的差距一样。当然,不管时下政党的想法有何局限,工党毕竟还是支持对某些选举程序形式作更公平的改进,这无疑会增大联合王国进行选举改革的可能性,一旦更具比例制精神的结果出现了,这反过来就能改变政党竞争的结构。

当然,这一切都还不确定。普兰特报告的最后定稿递交给了工党1993年9月举行的年会,报告支持在新的上院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也主张在苏格兰和威尔士拟建中的议会采取这种制度,但在下院他们还是不愿接受比例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全部保留单一议员地区,只同意作小小的更动,也就是介于法国复选制和两者择一制之间的唱票制。这种制度要求投票者选出第一和第二候选人。如果所有人得票数都没超过第一得

票的绝对多数(50% + 1),那么除了票数领先的两个候选人之外其他人都要被取消;被取消的候选人原本属于两个领先候选人中任何一个的第二选择将加入他们的最后得票数当中去,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最高得票的就是选举的赢家。1993年秋紧随着报告提交召开的工党年会,就将来组建工党政府举行了全体复决,代表们可以在保留或改革现行体制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不确定因素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首先,无法保证委员会所推荐的大多数改革一定能赢得公众的赞同。第二,在选票方面无法保证席位的公正合理分配。实际上,惟一能见成效的改进只是减少个体议员以少数选区得票当选的机会。第三,如果这样的体制为下院所采纳,而在上院和拟建中的两议会上仍采用比例制形式,那么,这两种不和谐的制度将给进一步的改革带来新的压力,为所有选举制定一套更公平的制度的努力也将化为泡影。最后,必须注意到,在其他选举中推行比例制原则不如在下院推行比例制有成效,因为后者本身就足以改变政党竞争的格局。

对英国左派的潜在影响的转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是关于联盟的长期问题,因为联盟对选举委任的原则构成了挑战。最近的形势表明,一个政党如果带着某个政纲参与竞选,一旦获胜之后,它就会在台上继续推行它的政纲;联合王国的政府都是一党政府,一般不会牵涉到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即使有过,也是极少数。投票者知道什么是有风险的,也清楚另一种选择的底细。然而在联盟的情况下,政党的政纲也许为公众所知,但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是谁也说不准的,因为政党之间的磋商很容易导致在执行宣言中某部分内容发生延宕。投票者因此处在黑暗中,他们无法知道,在竞选后的讨价还价阶段,他们所支持的哪些政治因素会落空得不到实施。简言之,这就是选举后的折中妥协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既迫切又棘手:出于想通过磋商建立联盟的动机意味着急于上台执政的政党将不可避免地牺牲他们的政治主张,以赢得执政机会,而至关重要的政策又很可能从议事日程上消失。这也许是令人遗憾的,但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合理的代价,因为它可以换取更多的议会支持。实际上,如上所述,如果未来的选举不能让单个的政党获得绝对多数,那么在现行投票制度下,这一切都可能发生。

从另一层也是更重要的一层意义上说,折中妥协问题反映了它在一个已经建成的领域的转向。尽管目前的英国政体很少需要选举后的讨价还价,但选举前的讨价还价却成了势所必然——也就是说,事前要折中地讨论决定以后将真正执行的政党纲领。英国政党都在积极寻求上台执政的机会,在现行的竞选体制下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尽可能广泛地投公众所好。通常,政党在制定政纲的时候都应该直截了当地面向核心问题,避开激进的主张,免得使潜在的支持者转而倒向与自己敌对的阵营。当然,这种模式也有例外:撒切尔主义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英国政治所受到的常见压力——这种压力已经使工党将自己内部的激进因素边缘化,有时甚至都将它们清除掉了——迫使政党想尽办法面向寻找中间战略。80年代早期,撒切尔主义促使保守党进一步向右翼靠拢,工党则向左翼靠拢,被这两党丢下的中间派立刻被自由-社会民主党联盟占领,联盟在选举上的作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表明了保留一个两厢情愿的联盟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撒切尔夫人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她的极端政策并没有使她的党丧失多少支持。然而保守党在1979年、1983年和1987年获得的选票明显降低(平均在43%以下),低于具有双边合作意向的麦克米伦(Macmillan)时期的历史最高纪录(1959年达49.4%),这个投票效应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继续扩大了,一是保守党势力大多集中在英格兰南部地区,一是

由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制度本身的诸多缺陷而加剧的非保守党选票的分化。

英国的这个标准结果在于,在比例制度下,通常在选举后发生的讨价还价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在选举前就开始。这样就使得激进的主张提早从议事日程里完全取消。在正常的联盟情况下,激进的政治主张都要在投票结束后才有所抑制,但至少还有机会向选民们展示。在这个意义上,联盟政策代表了该领域一种不受欢迎的转变,党派间的讨价还价被延迟到了选举之后,这样,选举议程就可以为了另一种更大胆的选择而放开手脚干了。

左派的另一个潜在的变化是对多元化政治联盟的担心,这种多元化政治联盟起源于对比例代表制的沿用。比例代表制并不能产生多元化,任何多数主义之外的制度都会妨碍多元化,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异:后者比较“强大”,即是说,它们会对投票选择施加很大的限制,而前者比较“薄弱”,只能施加最小限度的限制。¹⁰⁰所以说,如果存在着政治多元化的趋势,多数主义制度就一定能将其削弱,而比例代表制在这方面的作为却是极为有限的。

保守党-工党联盟总得票的下降和自由民主党及苏格兰、威尔士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加上在绿党推动下,1989年选举中试图加入欧洲议会的突然但又短暂的运动,共同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联合王国正涌起多元化的政治潮流。引入比例代表制将给多元化清除更多的障碍。在英国,形形色色的政治主张的出笼,只能看作是民主进程步伐加快的表现。假如这些政党在联合王国的4张选票中能获得1张以上——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他们可能受到的欢迎程度,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取消他们的全部代表权会引发怎样的异议。

如果把票数最多者当选的限制加之于两大党之上,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有人担心会使工党一分为三——将有一小股势力

建立左派的激进党，一部分右派分子投奔自由党，残余部分较之今天的工党将显得更为潦倒。向右派蜕化的可能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向左派的分化未必是什么坏事。在今天的西欧，工党差不多是惟一享受全部左派得票的社会民主党（见表 5.4），而在西欧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以一个以上的激进党派为伴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些党派可以是共产党、绿党或新左派。实际上这倒有助于过激的政治主张被囿限在公众范围之内，也能提供一种新的选择，使左派阵营能保持住全部选票。假如选举改革能使联合王国的主要左派政治团体——工党面目一新，增强选举信任，那么它一定能产生相似的影响，这样一来上述两种后果也还都是不错的。

在英国的右翼政治版图上，同样会发生分化。极右政党最近在比利时、法国和德国拉来了许多选票——意大利北部保守的 *Lega* 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大突破。近来在丹麦和挪威获胜的进步党以及在瑞典获胜的新民主党也是这方面的例子。比例选举制会给这些政党获取民意带来便利，⁵⁶ 也能保证它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如果认为仅仅是比例制就能解释它们在竞选中获胜那就太幼稚了——同样，那种以为魏玛共和国的比例代表制造就了德国法西斯的上台的想法也是十分幼稚，甚至是有害的。

上述情形的基本选择是：要么通过立法的或制度性的手段将这些小党挤出去——比如，保留多数制，或者在比例制度下设立高的选举起点，要么就在政治上击溃它们。如果普兰特报告中关于新党在政界中的作用的讨论内容都被接受的话，那么，任由这些极端的党派在独立的基础上自行发展还是非常可行的，即使将来会受到这些政党的挑战，因为这总比它们被强大得多的、也更令人生畏的对手吸收掉好得多。

结 论

选举制度充其量属于中介机构。政策的模式通常更多地应归因于政党的性质和政党制度的类型。没有一种制度仅凭自身就能阻挡政治的多元化或者阻挠成立联盟政府,因为这两种行为也取决于政党的竞争方式和它们的组织形式。实行比例制的奥地利长期以来保留的政党体系,比起多数主义的联合王国更缺少多元化的因素。多数主义的法国经历过的联合政府比爱尔兰更多,而挪威和瑞典的比例制议会几乎拥有过与威斯敏斯特一样多的一党政府。

出于这层原因,我们在讨论宪法和公共机构改革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不仅是存在于英国的现代政治特征,而且也是比利时、法国、以色列、意大利和日本的现代政治特征,因此我们要超越选举改革的问题,强调政党本身的作用。现代民主政府多数是政党政府,现代民主大部分也是政党的民主。但政党在政府代表体制中的传统优势——不止在英国——现在却遇到了挑战。一度在民众和他们的政府之间建立起了重要联系的大众政党,现在正慢慢地、然而却是不可阻挡地退出这个社会,虽然这个党过去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几乎所有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党员都在减少,尽管党员与大批选民的比例较之绝对数字更为明显。选举策略现在越来越多地依靠个人化的运动和争取特权进入大众媒体,而不再依靠现实的党员动员。在很多国家,政党越来越多地依靠公共基金作为它们的财力资源,它们以这样的依赖方式寄居在政府里面,以致用官方机构而不是市民社会的代表来形容它们更为合适。¹⁰⁹

政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同时政党自身的合法性也在弱化。令人惊奇的是,新的极右势力不仅公开地高喊排外的论调,而且也在向它们一贯称之为特权、赞助人和传统党派精

英的私利表示敌意。与许多同时代的投票者持同样的论调早就成为过时的手段了。但在过去的一年，这在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以及意大利北部的 Leghe 那里，这一手段居然收到了奇效，这些党派都对大联盟的政党制度啧有烦言，由于它们的抱怨又确实有根有据，令人难以辩驳，因此成为种族主义以及新法西斯政治主张重新抬头的最好掩饰。

和其他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一样，英国的政党迫切地需要注入新的活力。一方面，英国的党争之烈为许多其他西欧国家所不及，另一方面，下院充满高度敌意的交锋也使建立一个精英联盟的可能化为乌有，因为各党派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党员数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比任何欧洲国家少；党派的社会势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比任何国家微弱；党内民主的积极参与程度以及在大范围的政治制度的参与程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最低的。英国的政党还凭借着它们过去在威斯敏斯特打下的根基苦苦支撑着。除了工党这个可能的例外，其他政党都只关心议会事务，与社会的联系也多半局限在寻求短暂的选举支持方面的需要。一旦议会自身的权威也发生动摇，或者转移到超国家的欧洲机构中去，那么，这些传统政党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因为仅在选举工程上下功夫，无论怎样都是不能解决这种深层次的混乱局面的。



六 法国：胜利和悲剧

乔治·罗斯 简·延森

对法国的左派而言,1993年3月的立法选举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几乎所有的派别都声称自己代表着与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的、更勇敢的、进步的政治形式。“社会民主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用以取消那些不敢“与资本主义决裂”的人的社会主义者资格的、不名誉的术语。但1981年以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连任两届的总统,在此12年中,社民党控制国会长达10年之久。紧接着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执政的法国左派改弦更张,将其路线改为旨在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结构调整(紧缩和货币主义)。

1993年3月是该结账的时候了。议会选举结果是现代史上最糟糕的一个。所有左派力量加起来也不过赢得三分之一的选票,社会党的得票率更是跌至20%以下,而在1981年,这个数字差不多是40%。很显然,这次挫败昭示了公众力图对左派的是非功过进行奖惩的强烈愿望。左派最严重的过失莫过于大规模的失业了,官方统计说失业率是10.5%,但在这样一个城市安全日益降低、仇视移民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的社会里,失业率肯定大大高于这个数字。官方对医院使用受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持不闻不问的态度,更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丑闻,与此同

时，竞选基金上也是疑云密布。当权的左派已经堕落成了一群就知道争权夺利的职业技术官僚。社民党与人民之间的传统纽带断裂了。法国工会成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社会党放弃了成为全民党的理想，似乎更像是一个为那些相互争吵的总统候选人服务的广告商。计划、纲领和关于另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都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一个失控世界的宿命论。

法国左派有一些共同的命运线索，它们将左派共同编织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历史画卷。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左派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其基本设想是：动员传统的国家资源，促进经济的加速增长，然后对其成果进行再分配。但这个战略刚一触及经济全球化这块礁石就沉没了。左派接着又试图利用公众杠杆作用来增强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现在则又试图通过预算、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确定必要的经济参数，并在可能的地方限制社会成本。这样做即使颇有成效，却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它自己的群众基础。“弹性”工作制度使工人运动变得脆弱，同时更是侵蚀了那已经被后工业时代的职业结构和消费文化冲淡了的工人阶级身份。早先忠实的左派支持者如今已发生了动摇。因为既然他们看到左与右的差别不过是边缘性的、偶然的，那么，当他们愿意参加选举的时候，也就跟着感觉走了。这当然不是说左派不再能赢得选举了。选民会像对左派那样，对右派的是非功过进行奖惩的。但这样的变化说明，左派（但决不仅仅是法国左派）历史上漫长黄金时代已经终结了。

尽管如此，从某种角度上看，法国左派的历史确实又是相当独特的。1920年、特别是冷战以来，历史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挖掘出了一条鸿沟。在第五共和国1958年之后的选举体制下，左派要想获胜，就必须减少或者克服两者之间的隔

阂,建立有效的联盟。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是这样的产物:1981年,“在左派内部解决这些隔阂”这样一个战略难题,为社会党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计划。在长期的战后经济繁荣中,作为一个总体,左派从来没有上台执政,这一事实就使激进逻辑变得更加激进了。60年代,领导国家进行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是右派;70年代,在国际经济不景气中继续执政的还是右派。政治的边缘化滋养了基于左派反对立场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最终战略。不过理性地看,这样的好处是:左派世界从日常的政府事务中或行政管理“现实主义”的繁文缛节中解脱出来了。结果是,等到左派在80年代最终上台执政的时候,它就推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改革计划,这是西欧4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同时,国家的宪法框架又赋予其另外的自由:对总统任意决策行为的控制,和立法中的绝大多数——要达到国民议会的70%。一个强有力的政纲和一个强大的国家以如此强有力的方式结合,这在战后欧洲是极其罕见的。但命运决定了这样的结合必然要受到席卷一切民族国家的全球经济衰退的考验,任何激进的方案也必然受到阻挠。面对这场全新的挑战,法国左派要么发挥出极大的创造性坚持原有的目标不动摇,要么机智地加以规避,免得引火烧身。可是到头来,它两者都没有做到。要弄清楚为什么1981年的胜利成果到了1993年便消耗殆尽,就有必要回顾一下左派在野这么多年以后是如何取得政权的这段历史。

现代化的阵痛:1945 - 1968 年

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末,法国仍旧残留着农业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社会特征,这些都是19世纪的印记。在农场和林场里的劳动力数量要比产业工人多30%。在后来的20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⁶⁶这段时间里,经济

如雨后春笋般地飞速增长：国民生产指数从 1938 年的 100 和 1949 年的 109 增长到 1970 年的 333 和 1975 年的 400。工业全面迅猛发展，传统行业被现代行业所取代，生产力持续上升，就业人数激增。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国人以惊人的速度在盖房子，装中央空调，安装室内自来水管，购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汽车。贸易伙伴也不再只局限于过去的殖民地，而是扩展到了欧洲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世界。^④

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的是政治家。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法国历史上的经济转型是因为摒弃了法国资本家，而非依赖他们才实现的。行政管理精英被传统企业家的惯性激怒，他们于 1944 年以后推出了一个进行过部分规划的现代化方案。由于第四共和国缺乏稳定的政治多数，他们的设想受到阻挠，于是他们尽可能地绕开议会，寻找政府行政代理。^⑤第五共和国诞生之后，权力实际上从立法机构转移到了总统的执行机关和高级民事服务机构中去了，这最后为实行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管理经济战略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框架：指导性计划、工业政策、动员公众热情与人力资源和信贷控制。在这个领域，从声誉卓著、成绩斐然的国家行政管理学院（ENA）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占领了执行机构和政治集团本身。具有超凡魅力的戴高乐将军，把他的政治砝码压在了技术官僚提供的战略上。但戴高乐全然还是一个 19 世纪的政治家，此时他需要 20 世纪的手段来实现他的地缘政治理想。为了能与美国保持必要的战略距离，法国急需独立的军事高科技。此外，法国还需要发展工业，借此建设一个以法德为核心的自治欧洲，从而最终解除雅尔塔协定。^⑥

然而，第五共和国早期的进步在其深层却是自相矛盾的。政治技术官僚与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精英，以及资本小团体的现代化联盟，不得不与行动迟缓的商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妥协。更糟糕的是，这些变化并未因其引起的社会后果而受到人们的



关注。将军本人则在两种策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是相信民族主义修辞学的抚慰效力，二是支持天主教社团主义的参政观念，而这与将军自己的政治联盟主张的决定性部分是对立的。⁶³技术官僚与同时代的人一样认为，经济的增长和良好的管理将能够消除社会矛盾。因为资本这个小集团自身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的，所以，它们坚决拒绝与没有进行阶级对抗的劳工达成任何妥协。很多有思想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因此绝望地企盼法国社会还能停留在19世纪。

将劳动力从农村驱逐出来是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总体水平大大超过了同期工资的增长。⁶⁴因为所谓发展通常都是以农村的劳动力向半熟练工人的转化为基础的，许多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无所适从。由于得到国家的支持，并且面对的是软弱无力的工会以及缺乏调控的劳动力市场，雇主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要给工人提供更好的报酬或工作条件。戴高乐政府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自觉意识，觉得有必要实现像学校和大学这样的机构以及司法系统和警察机关的现代化。尽管将军还是一个早熟的出众的电视政治明星，但法国官方的政治文化却依旧在技术官僚的权威主义和古老的家长制之间徘徊。

坐失良机的共产党

现代法国左派是从戴高乐政权的运转方式中找到自己的发展起点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戴高乐为核心的保守派议会大多数的巩固，恢复了单极的政党格局，这限制了非共产党左派的战略选择空间，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合作增添了压力。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赢得了约五分之一选民的支持，以及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忠诚。它控制了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拥有一支由勇于斗争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它掌握地方政府的实权，拥有广泛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的社会主

义宿敌——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由于其冷战期间的战略和第四共和国时期血腥的殖民镇压而把自己完全毁了,如今更是一落千丈。它的得票不足法国共产党的半数,党员人数差不多只相当于法国共产党一个支部的规模。10年来,法国社会党循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右派之实,已经信誉扫地了。^[6]

戴高乐现代化的结构和病症所提供的机遇,现在一开始就落到共产党面前了。法共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战略抉择问题。它的口袋里有两套方案:一是像人民阵线时期那样组成左派联盟,另一个则是摆出1928-1934年间“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时代那样的战略姿态,在冷战时期重新选择军事自治。^[7]由于法共认为全面参加选举政治是可能也是可行的,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联合阵线战略。在此情形之下,法共认为自己的孤立状态将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打破。

联合阵线意味着要与非共产党左派达成某种认同。在最初的形式中,人们设想它是一种可能达成一些重要的然而有限的改革目标的手段。阵线这一战略源于列宁主义,和后者一样,它在深层机制上是中央集权的。这是一种关于操纵和改变国家的政治家能够完成社会转型的幻觉。主张恢复这个做法的人——党的领导层已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初步分歧——也许会罗列出一大堆事例,证明人民就像在孕育它的人民阵线和抵抗-自由运动时期那样发自内心地支持它。动员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对苏联的向往,对于人民阵线30、40年代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但在60年代,它们都已经作用不再了。这里也有另一个差别。早些时候联合阵线的目的还是相当简单的:只是对法国外交事务和有限的国内改革进行具体的政策调整。^[8]即使这样,它们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现如今,该党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在法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就是要建设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30年代的战略可以拿到60年代来用,这样一个轻而易举的假设是与法国共产党人一个好战的判断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判断拒绝承认法国社会在过渡时期已经发生了变化。1955年初,总书记莫里斯·托雷兹(Maurice Thorez)就开始发表一系列声明,重申法国工人还在忍受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这事实上是在号召共产党人忽略而不是分析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就在他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后果。^⑨他们在爱国就应当多生育的名义下表达了自己对计划生育的敌意,这说明他们对于那些使家庭和劳动力市场发生重要变化的社会变革的认识同样是盲目的。^⑩最糟糕的是,曾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骚乱的法共领导层,拒绝了那些要求对——长期存在非民主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党组织进行非斯大林化的呼吁。托雷兹的最后一次清洗,与1961年对早熟的欧洲共产党者的清洗和稍后对“亲意大利”学生的轻微打击一起,把党内那些有可能提出更好动议的人都清洗掉了。^⑪

尽管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反应既毫无新意又具有破坏性,但阿尔及利亚战争后的大选形势和学生运动的发展,对法国共产党转向联合政策却是十分有利的。如果说共产党在第五共和国巩固时期的战后选举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选票,那么,到60年代它们的得票率则还稳定地保持在22%左右,与此同时,社会党的支持率却在直线下跌。社会党的选举惨败,和戴高乐政府对比例代表制的废除,都迫使社会党对它们迄今以来对共产党人所采取的缺乏相互理解的绝对拒绝进行反思。于是,因为法国共产党不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重新考虑自己的地位,所以它就只能以缓慢然而却坚实的步伐迈向自己的直接目标——与非共产主义左派就那个尽可能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张和意愿的“共同纲领”达成协议。

1965年的总统大选给法国共产党带来了契机。当社会党

没有能够说服加斯通·德费尔(Gaston Deferre)这一反共名将代表社会党参加竞选——德费尔已经决定作为中间派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时候,弗朗索瓦·密特朗则立刻宣布自己将代表左翼联盟参加竞选。作为第四共和国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老手,密特朗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恶劣的岁月中曾担任过内务部长和司法部长。但在戴高乐1958年在军队的支持下夺取了权力之后,他是少数几个拒绝与新政府合作的中左派领导人之一。在总统竞选中,他巧妙地打破了社会党人和反对戴高乐的中间派议员之间的僵局。⁸⁹尽管密特朗对法国共产党没有做出多少纲领性让步,但对于法共新的总书记罗歇(Waldeck Rochet)来说,密特朗愿意结束共产党的孤立状态这一姿态本身就足够了。密特朗对竞选的精良策划,加上法国共产党的忠诚支持,使他在最后的角逐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次空前的胜利使人人都明白,戴高乐已经是强弩之末,左派更加正式的联盟即将成为可能。在随后两年里,有关协议的框架越来越清晰,选举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1968年5-6月间的戏剧性剧变将原先所有预计都打乱了。所有已经成立的政党都在法国社会所承受这次大地震中疲于挣扎。那种看起来更加革命的姿态给法共带来了莫大的挑战,法共也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严重不足。汇聚巴黎街头的大学生中最具有战斗性的人,很多是法共大学组织的前领导人,他们曾经作为异己分子被清洗出党,如今对该党更是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令人吃惊的是,法共居然声称:大学生的这种正当的不满情绪如果不是被警察收买了,就是被玩着垄断资本游戏的左派激进分子滥用了,这只能让法共声名狼藉。法共对首都政府突然垮台的反应在总工会获得通过,它呼吁进行总罢工。⁹⁰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爆发了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全法涌起了占领工厂的浪潮,大有颠覆政府的趋势。但党和



工会终究是比学生更懂得如何去应对工人的爆炸性能量。最后,总工会通过谈判平息了罢工运动,条件自然还是像过去那样,政府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就这样,戴高乐终于平安度过了这一危险期。

1968年危机充分揭示:在戴高乐执政期间,法共与各种社会反对力量脱离联系到了何种程度。它无力应对学生运动是它不能适应形势的最明显的征兆。但它处理工人问题还是自有一套的。总工会对现代化采取了一种妥协的姿态,以取之不尽的战斗性语言抨击资本主义,并随时准备发动罢工。同时它又坚持法共制定的理论框架,它让工人明白:当左派力量掌管了政权以后,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就会自上而下地形成,另外他们必须关注他们工厂中的传统的经济要求——这样的说教使得总工会的日常工作显得和其他任何地方的温和工联主义没有什么差别。此外,联盟认为需要用简单的意识形态主题来统一工人阶级,所以,它对于那些与主流不相适应的地方斗争总是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同时也忽视了法国正在发生变化的工厂内的新的斗争要求。因此它日益显得老气横秋,官僚气十足,这些都是能让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它的前天主教盟友和现在的竞争对手获得优势的缺点。

从戴高乐主义的现代化到危机

1968年的危机改变了法国资本主义的政治世界。戴高乐一年后的突然辞职使它失去了人格魅力型权威,两者都削弱并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⁹⁹将军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更注重实际也显得更保守。他努力降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让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更多的决策自由。不是在教条的自由主义而是在中央集权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促进下,自1968年以来,新政府试图通过劳工关系的非政治化,对日益壮大的工会进行回应。为了降低1968

年以来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蓬皮杜政府的第一任总理沙邦-戴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首次让法郎贬值，他接着就从右面推进了一种温和的社会民主化改革。在雅各·德洛尔——他的左翼天主教社会问题顾问¹⁹⁸——的指引下，沙邦鼓励在公共部门解除中央集中的集体议价体制，实行一种新社团主义的收入政策。

这一举动遭到了劳资双方的抵制，其中很多内容很快就夭折了。¹⁹⁹在经济快速膨胀时期，商贸面临着来自好战的工人阶级的持续压力。蓬皮杜在任期间，高投资、高增长的突然爆发，甚至已经超过了戴高乐时期的情形。不过如今，繁荣还伴随着实际收入和通货膨胀率的快速增长。企业利润开始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提高生产率的努力经常引发工业冲突，新招收的工人和半熟练工人抗议劳动强度的增加和工作环境的恶化。²⁰⁰

在1973年之前，法国其实就已经乌云密布了。被政府强行拽入20世纪的法国资本，在没有根本提高竞争力的情况下就实现了现代化。经济现在更加依赖国际贸易。一旦世界经济长期繁荣的起点环境突然消失，争夺国际市场的诸侯混战就变得更加明显，但认识不到自己的障碍、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法国企业的反应总是很迟钝。第一次石油危机让法国资本家略略明白了自己正在趟过的地雷阵的险恶。但政府和雇主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很冷漠，仿佛这只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短期调整所引发的可以接受的周期性低迷。结果失业率急剧上升，通货膨胀率更是大幅攀升，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就此完结。²⁰¹法国工业并没有创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而政府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则因为福利支出的上扬和税收收入的减少而受到限制。失业率的增长要想足以降低有组织的劳工斗争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而罢工依旧相当频繁。在这种气候下，法国左派重新取得自己的政治优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成功失之交臂：1974 - 1981 年

1968 年法国共产党坐失了战后以来最好的一次机会。在那以后，机会落到了它的对手那里。1971 年，在密特朗的推动下，当时已经分裂并受到削弱的非共产主义左派进行了重组，在埃皮内成立了新的社会党。³⁸新成立的社会党是一个在设计得非常巧妙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内的力量完全取决于从党外动员起来的支持——中由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的联盟，它鼓励每一个派别发展自己的政策和进行对话。这种多元性使得法国社会党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游刃有余，能够同时触及左派和中间派。能把各种力量在一个共同目标下聚集到一起的，是密特朗对党的领导。他的策略是保持左派联合。1972 年 6 月，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谈判并签署了联合纲领。

除了在防卫和外交政策的问题上不明确之外（在这里，两党同意保留分歧），共同纲领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法国共产党多年来鼓吹的主张的复制品。新联盟发誓要扩大福利，提高工资，大幅度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实现公司层面的管理民主化和面向全国的计划制定的民主化，增加工会权力，提高普遍参与的水平。这一文件比传统的共产党纲领要温和多了，但从任何一个可资比较的角度来看，其激进立场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密特朗当然是在周密的盘算之后才接受它的。他的目的在于以共产党为代价来强化社会党的选举实力，并以此为跳板赢得总统选举。共同纲领只是实现那个目的的一个手段，而绝非它的权力中的义务。他向左派靠拢，和法国共产党在纲领问题上达成妥协，等于是在购买一张促进行为端正的证书，以此模糊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差别。他把赌注压在了这上面，指望以此将法国共产党选民中的温和派别和 1968 年以后一直在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持不同政见的、年轻的中间阶层吸引到社会党这一

边来。

这个赌注的代价是社会党被绑在了一套强大得超出了党内各种派别所希望的改革机制上。密特朗非常清楚,包括他自己的社会党在内,法国的左派都是两种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其中与共同纲领中与解放时期相关联一翼是正确的,而另一个则是落伍的。他断定,通向权力之路意味着只能选择第一种文化。这不仅能使共产党就范,让社会党能够阻击法国共产党的选民,还能够从具有不满情绪的中间派那里捞取选票。密特朗知道,联合的逻辑只能是这样:当作为一个整体的左派的力量有所增长的时候,一个党派的得一定就是另一个党的失。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从自己的处境出发,也认识到共产党在联合阵线中的前途,完全取决于自身状态的急速现代化。党在理论上的当务之急就是把最近以来的极其可笑的观点扭转过来。党的组织要求放宽,吸收新党员的标准随之也放松了,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日常问题的讨论上。它的国际同盟关系也作了调整:痛苦而局部性地拉开了与苏联模式的距离。这些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大量新生党员尤其是中间阶层党员的增加,各方对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关注也有了重大增长。到1970年中期,法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法国左派大党所赢得的合法社会声望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刻。

但优势的平衡最终还是倒向了社会党。在1973年的立法选举中,法国共产党依旧超过了社会党,但这已经是最后的辉煌了。一年以后,执掌整个左派联盟帅印的密特朗在1974年的总统选举中以1%的劣势败给了右派候选人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在现在回头看来比后来还是有利得多的环境中,左派还是以微弱劣势丧失了胜利。那时的联盟生气勃勃,前途被人看好。但社会党现在有没有从中特别获利呢?假如吉斯卡尔入主爱丽舍宫,法国共产党领导层就会不安。

自从法共转向联合阵线开始,党内就出现了不同意见,认为新战略必将导致冲淡工人阶级的纯洁性。在经过党内最高层几次模糊然而又非常真实的争论之后,宗派主义的反应因选举忧虑有所增强。该党试图借助自己更新了的激进形象,找到削弱社会党选举优势的途径,结果是一个不稳定的妥协。在其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社会党都被指责为不可信赖的合作者,接着它就沿着相反方向踉踉跄跄地、手忙脚乱地投入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怀抱。¹⁸法国共产党一时非常活跃,招收了越来越多的成员。但是,当党内对批评苏联的言论极为仇视的亲苏分子在莫斯科的指使下和联合阵线的反对者达成了联盟的时候,向欧洲共产主义的转变就使党内矛盾尖锐化了。¹⁹一股要求与社会党分离的压力在党内逐渐形成。然而,法国共产党并没有另寻一条可行的战略。对“阶级对抗”的现代版本进行模棱两可的重申和独立自主的姿态,对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民众正在下降的支持来说,可谓是一条灵验的秘方。党内两翼的纷争把法国共产党逼向了两条完全不能调和的方向,导致80年代一系列不协调的公众立场和战略失误。

与此同时,社会党人在实施他们的新策略。1974年,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社会党与统一社会党(PSU)的罗卡尔一翼联合,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CFDT)的代表从工人自治的立场出发,强烈地针砭社会党的政策,声称工人的掌权比国家的经济走向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大多数主张工人自治的人都对共同纲领持怀疑态度,并对法国共产党怀有敌意。但密特朗仍然认为不改变自己的战略就可以把这些人拉进自己的阵营,他预见,他们的加入可以扩大社会党的选举基础,并在人人都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政府更迭中,使他能够更自如地对付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可想而知变得非常恼火。但从外表上看,联盟还是抵挡住了这些压力。

1977年的市政府选举表明，左派联盟在法国取得了选举多数。到了下一年，仿佛1978年的立法选举也要把法国左派推向国家的权力中心似的，虽然他们和右派的总统同床异梦。但是从地方选举中人们也不难看出社会党在和左派的党际竞争中所体现出的明显优势。因为欧洲共产主义的改革也无力制止法国共产党的相对颓势。结果是打破了党内领导阶层不稳定的均势，对社会党持敌意的力量赢得了上风。1977年夏，法国共产党突然退出了左翼联盟。15年的政治工作付诸东流，法国共产党向社会党发难，气势汹汹地指责他们子虚乌有地背弃了共同纲领。此时左派的注意力似乎更多地集中于相互攻击和暗杀要人，而不是对国家的统治，于是在1978年立法选举中落败。

这一自找的失败对左派两党的伤害程度是不相等的。坚称自己为了两党的共同利益而奋斗并始终如一地坚持共同纲领的密特朗和社会党，保住了自己的体面。可以想象，耻辱灾难性地落到了法国共产党的头上。在它的选民和党员的众目睽睽之下，法国共产党倒向了法国式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使它们完全丧失了大多数人的信任。^④在后来的3年中，它失去了四分之一的选民和三分之一的党员。对左派联盟20多年的不懈追求，把很多共产主义好战派变成了联盟主义的热情拥护者，并且把成千上万的新成员，尤其是来自知识界和城市中间阶层的人吸引进了党内。与左派联盟的突然决裂是上层决定的，同时还伴有齷齪的蛊惑，从而激起这些力量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党内动乱。^⑤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即刻出面，动用其全部专制手段弹压持不同意见者。结果是上万名忠于联盟的激进分子，连同差不多全部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都被驱逐出党。留下的全是那些最墨守成规的工人领导主义的信徒，准确地说都是些平庸无能之辈。法国共产党遭受的这次道德的和组织的灾难，使它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978年之后，它持续地向法国左派的

次席滑去。

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决裂导致双方都陷入了工会运动中去。法国总工会(CGT)原本想要促进与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的联合行动,此刻却让位于上述想获得它的支持而改善选举前景的竞标。工业行动的过度政治化还伴有两大联盟关系的恶化,因为此时法国总工会公开站在法国共产党的一边,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则半公开地站在社会党的一边。当法国共产党把它的新路线贯彻到法国总工会、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从它早期的激进主义抽身而退的时候,1977-1978年就已开始滑坡的工会成员数量和政治动员力更是每况愈下,其中法国总工会受害最深。⁹⁹但反对左派联盟的强大政治冲击力并不只局限于共产党。

在社会党内部,密特朗被米歇尔·罗卡尔攻击为只知道抱残守缺地照搬“老左派”政策的“老古董”,这些话是罗卡尔在一次由风靡一时的进步的巴黎新闻界和知识界支持的竞选集会上说的,他们在罗卡尔宣布自己参加总统竞选之后为其摇旗呐喊。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经过艰苦的斗争,密特朗不得不改组他的派系,给予左派集团更大的权限,后者又给社会党强加了比该党大多数成员的倾向更激进的纲领。

尽管左派处境艰难,不过掌权的右派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战后的繁荣已经过去,留下了一系列经济失调、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难以继续控制的列车。保守派的优势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左派纵然有一大堆毒瘤,可它毕竟还是处于多数的边缘。像钢铁、造船这样的部门显然是需要动大手术的,然而右派惟恐造成失业大军而不利于选举,故迟迟没有下手。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亟待遏制,但是政府投鼠忌器,生怕引起强烈紧缩而丧失民心。贸易赤字有待削减,但政府又怕引起货币贬值。甚至1979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右派还是谨小慎微,因为1981年的总统大选已经为期不远了。未失业的

法国工人的生活标准伴随着社会开支一起继续上升。但当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当选总理后,他主张紧缩的公开呼吁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落实。没有一个有效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再加上行政管理对降低失业束手无策,意味着资本无法以传统的方式“净化”自己,而定价过高的法郎则使那些具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的出口前景大打折扣。别处的资本那时一度重新评估自己的战后策略,但是多数法国实业家对此却充耳不闻。

在这种病态的气候下,政策争论和人事竞争使右派分裂了。雅各·希拉克(Jacques Chirac)希望能够利用对德斯坦的不满情绪,于是他以戴高乐主义候选人的身份、作为德斯坦的对手参加了1981年的总统大选。他最终被德斯坦击败,得票率仅仅名列第三,而在最后一轮选举中,他只给德斯坦以一种不冷不热的支持。代表社会党竞选的密特朗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赢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而代表法国共产党的马歇只有15%的支持率。但是到了第二轮,不满的中间派选民要么弃权,要么转向密特朗,最终使他获胜。这次胜利对于很多左派而言是一个“非凡的意外”。但它的确迎来了民众的喝彩,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气氛。新总统解散了国民议会,但并没有引起进一步的骚乱,在一个月以后举行的立法选举上,左派又一次获得议会大多数。

结果充分展现了左派两党力量对比的彻底改变。社会党的得票率稳固在37.5%以上,而法国共产党的得票率仅为16.1%,还不到社会党的一半。这样,在国民议会中,选举体制把这种比率转换成了社会党对共产党的代表席位之比,即7:1,社会党取得了绝对议会多数。几乎和4年前差不多的形势现在却把法国共产党逼人窘境。它原本可以和密特朗平等磋商成立政府,现如今却只成了后者统治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为

了避免与共产党一刀两断,同时也为了笼络总工会,密特朗任命了4个法国共产党部长。在发表了一篇抨击“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演讲之后,法国共产党毕恭毕敬地加入了新的“总统多数”,但决不是一个合作者,而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执政的左派

现在领导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在执政方面有着自己的特别优势。第五共和国宪法赋予任何一位在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的总统以巨大的实权。不管怎么说,密特朗都是一位强有力的而且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他的党掌握了将近60%的议会席位,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德斯坦领导的右派现在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左派自有一套酝酿已久、涉及面颇广并已经获得决定性的公众支持的计划。虽然在70年代饱经忧患,但法国此刻却已经成为欧洲第二经济大国,也是第二富国,并且拥有完全独立的核能力。

尽管如此,社会党上台执政的环境决定了它下车伊始就危机四伏。共同纲领曾一度是动员民众的有效工具,是希望的源泉。但由于其具体主张既没有受到广泛的理解,因此也就没有得到支持。左派信誓旦旦地保证的很多措施都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没有落到实际的改革方案中去。在1981大选中获胜的社会党因此与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讲坛右派很有几分相像,那些自诩为人民公仆的野心勃勃的政治精英对权力的兴趣远胜于原则。与左派以微弱劣势丧失执政机会的70年代中期相比,国际大环境对于法国的激进改革已经相当不利了。到1981年,世界经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严重衰退的问题了。对这些困难的蓄势已久的反应就是英美的向右倒风潮,这一风潮很快就蔓延到了北欧的多数地区,与此相伴而生的是20世纪以来非常罕见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卷土重来。外交环境也朝着更坏的方向来了

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里根上台之后,新的冷战开始,它基本被美国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和指使北约与作为被假想为扩张主义威胁的苏联对峙所支配。在法国内部,70 年代末期也发生了意识形态的大转折,曾经支持 1968 年学生运动的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转而接受冷战事实,重新认识到那是“新哲学”的夸大其词。所以,尽管左派拥有可以自由支配的制度杠杆,可是经济、外交和文化环境都对左派政府相当不利。

密特朗 1981 - 1984 年的尝试

社会党的改革设想源自共同纲领所承诺的那些基本义务。法国经济的核心垄断部门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工业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提高工人对公司的控制权的重大变革。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公共企业的新领导班子和自上而下的经济计划部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研究和革新的浪潮。这些将使法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活力和竞争力,并且重新占领国内市场。更快、更公平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使社会纲领的扩大和民主化成为可能。

在很多方面,这就是早期社会民主主义在 40 年代末期其信心在不断发展的战后重建中达到顶点时所设想的。⁶⁶它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控制经济环境,并要把资本重新配置到合适的渠道里去。然而,这个策略是高卢人特有的结绳手法。这下而隐藏着大剂量的雅各宾主义乐观态度,它相信中央政府能够使这些革新合法化,这反映了法国受到启蒙的技术官僚对他们自己管理能力的充分自信。但同时,这个方案又不无自相矛盾地设想:选举的胜利和促进社会参与的立法将极大地激发民众的热情,由此把政府带向新的成功和进一步的改革。

一旦有了立法保证,密特朗就言出必行。法国成为重建后的欧洲史无前例的改革战场达一年之久。国有化来势凶猛:国家接管了 90% 的银行业和三分之一的工业,包括国内 20 家最

大公司中的 13 家,这样政府就能对法国国内 60% 的工业和能源投资负责了。劳动法的改革增强了工会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批准了年薪交易,保护了车间一级的“表达权”。颁布了大胆的社会再分配纲要以刺激内需:多子女家庭的补贴增加了 40% 到 50%,退休金增加了 15%,低收入者的住房补贴增加了 50%,最低工资提高了 15%。现在,周工作日更短了,假期更长了,退休时间提前了。大一点的预算问题和例如文化活动、性别平等和国家教育等重大问题都被提交社会讨论。

然而不到一年,这艘改革巨轮就触礁沉没了。密特朗政府低估了企业的虚弱程度,很多国有化以后的部门都濒临破产。由于为了保存不必要的体面,政府拒绝让法郎贬值。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猛力保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周边国家的通货紧缩环境的影响一直被忽略了。结果,大部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导致大规模的收支平衡危机,国内生产跟不上收入增长的幅度,通货膨胀加剧,内需被进口所吞没。⁶⁹ 面对难以为继的贸易赤字——1980 年的外汇收支还能基本保持平衡,而两年后赤字则高达近 800 亿法郎之多,财政部长雅各·德洛尔不得不在 1982 年 6 月实施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严厉的银根紧缩政策。法郎贬值了,改革停止了,税收提高了,增长经济的雄心彻底化为泡影,现在还要采取措施来降低因通货膨胀而上升的工资指数。最初,政府费尽心计地实行面向穷人的收入再分配承诺。结果,蓝领和白领的中等工薪阶层,也就是左派最依仗的支持选民群体,成为“紧缩”的最大受害者。⁷⁰

新的紧缩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加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迫在眉睫,所以政府在 1983 年春完成了它的政策转向。接下来又是一次外汇危机,与德国的贸易赤字继续破坏法郎的稳定。社会党政府如今面临着如下基本抉择:要么让法郎重新加盟欧洲货币体系 (EMS),这将不得不接受德国对法国预算政

策的约束；要么完全脱离欧洲货币体系，这对于欧共体将是一个潜在的恶兆。一段时间内政府里争论不休。社会党内部的左派激进集团、共产党部长、一些重要的社会党部长以及总统顾问，^⑧主张法国经济应该脱离欧洲货币体系，采用意大利式默许形式，以扭转贸易逆差，寻求一个主动的工业战略，并扶持国内市场。受中间派议员支持的德洛尔认为，这条路径有通向民族主义的危险，将给法兰西带来灾难：不管法国国内暂时的社会成本有多大，都必须接受全欧一体化的竞争性原则。

短暂的犹豫之后，密特朗最终还是采纳了德洛尔的建议。结果是对德国马克进行再评估，以直接挽回法国的面子，另一方面则进行一次基本的方向调整。社会党放弃了过去的观点，即为了国家的重建战略，要优先考虑劳工和穷人的利益，从此以后积极寻求国际市场的份额，国内社会问题因此退居其次了。^⑨法国共产党拒绝仿效，并在1984年辞职。“现代化”意味着一种新路线的发明。巴黎《自由报》在1983年的葡萄酒节以“密特朗的全新登场”的通栏大标题对此大加赞赏。举国上下对企业独创性、公司的向心性和利润动力的狂热追求日甚一日，逐渐取代了重新分配、社会平等和公正这些旧词汇。如今法国混合经济的任务是现代化、合理化和发展高科技，以对抗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经济巨人。国有化公司曾被设想为是社会公正和集体控制的代言人，现在则重新致力于不体面的跨国经营。社会党开始以一种新的激情来捍卫自己的决策权和市场分配的合理性。

这样的花言巧语反映了政策方面所发生的迅捷而富于戏剧性的变化。社会党政府凭借事实上的货币主义和建立坚挺的法郎这样一种信心，果断地采取行动，降低通货膨胀。预算赤字是减少了，但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公共支出份额也急剧降低了，社会纲领面临巨大压力。1984年，政府撤回了在洛林钢铁工业的投



资,并拒绝为一家大型企业支付保证金:公共基金再也无法用来维持日趋衰落的部门的现有就业程度了。肩负着到国际市场锻炼竞争力使命的国有化公司也未能幸免:公共部门就带头削减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

没过多久社会效应就显现出来了。失业率还在不断上升,像洛林这样的钢铁地带突然停止了工业化进程,大量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人口统计、资历和任期规定的牺牲品——根本不能进入劳动者的行列。同时在最近一段时段里,股市的改革已经在巴黎交易所里开足了马力,达到了全盛。⁶⁹车间层次的阳光法规意图使公司民主化,但由于工会十分疲软、不断改变的雇主策略、政府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从尖锐对立到亲切宽容的转变,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不同。新的表达权和公司内部的交流权常常为雇主所利用,他们想方设法要让工人引入日本式的对话,从而战胜工会,提高“灵活性”。然而新的代表形式意在把积极分子改造为“准官员”,这一官方的使命使他们凌驾于继续扶持工会这样一个使命之上。⁷⁰

在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清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社会党政政府的改革推动力是否在公众和文化领域里得到了补偿呢?确实有过降低专制的严酷性和法国的自大情绪的真正努力。但合法改革早就过时了,左派现在比右派更加自由化。死刑已经被废除,警察、法院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仔细检查。女权保护和生育管理方面也取得了进步。这些成绩其实是很温和的,但由于它们是一种复仇主义式的权力剥夺,所以还是引发了政治反坐。地方政府被巴黎赋予了更大的自治权——这是一个当然必要但却不是基本性的变化:它的主要的直接结果是给保守的省级国家机器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分段的空间。⁷¹改革学校体系的努力受到宗教势力的百般抵制,左派就教会-国家关系问题,与教会毫无节制地打了一场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现在居然

可耻地寸步难行。³²拥有媒体而坐失良机的戏剧又一次重演,而且更不名誉,损失也更加惨重,因为正是社会党的电视“现代化”为愚蠢的重商主义和政治操纵打开了大门。³³外交政策的记录也不再那么显著。戴高乐所宣称的法国民族独立性植根于自由法国和解放运动的实践中。密特朗的见解形成于第四共和国,那时候,他因为反对加入北约而丧失了部长职位。但1981年之后的法国,与华盛顿的关系要比德斯坦执政时期更加亲密。密特朗成为里根最信赖的盟友,在敦促西德接受开发欧洲导弹计划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代价也是颇为巨大的:法国社会党与德国社民党的关系因此疏远了。臣服于美国,就使法国用不着领头对抗戈尔巴乔夫的俄国了,如果是戴高乐,情形则一定是相反的。但在与里根的交易中,密特朗并没有太大获益,后者的货币政策——高利率和美元超值——给法国经济带来了无情的巨大压力。社会党政府在处理南北关系时所扮演的角色比它在处理东西关系时更保守。尽管口口声声大谈自己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但法国依然是南部国家的主要武器输出国、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宪兵、太平洋的核试验者。

1985 - 1989 年：稳定政局

1983年政策变化的规模和尖锐性不可避免地给政权的支持结构造成了剧烈挫伤。想方设法调整到新的路线上而又不失去政权,现在是社会党统治面临的最大挑战。这当然不容易:谁也不能毫无风险地废除几十年来被奉为圭臬的政纲和观念。但是法国左派版图所发生的变化竟然不可思议地促进了它与过去的脱离,而在其他情况下,这极有可能威胁其生存。70年代早期以来的剧烈变化,如今在旧的激进主义的资源 and 制度的戏剧性的崩溃中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最使人震惊的事件还是法国共产主义的命运。法国共产党在它参与执政期间一无所获;当它引退时,也未能从反对党那里

获得任何好处。它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力量一度是一个异常强大的综合体,不管好坏,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以其具有鼓动性的前景和力量为左派提供了强力支持,可现在它突然萎缩成某一个党四面受敌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短短几年时间之内,法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选民,1986年的得票率不足10%。从传统方面来看,对维持党的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政府中的职位不断缩减:党员数量不到70年代后期的一半水平;内部的朋党之争使该党的残存力量也奄奄一息了。⁹⁹

与此同时,工会也在忍受着长期内部摩擦。党派纷争也通过工会运动折射出来,从而使总工会和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发生分裂。经济危机对核心工业部门的冲击使劳工力量进一步弱化。尽管据称政府的态度十分友善,但大多数工会的力量在80年代依旧不断地削弱,与此同时,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开始放弃左派身份,像第三大工会、工人力量总工会(FO)那样搞中庸之道了。80年代中期,工会成员只占劳动力总量的10%强,这个比例大大低于美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集中于把缩减和强硬的收入政策作为目标的公共部门。¹⁰⁰法国工会成为西方主要国家中最式微的一个。罢工活动减少了,真正参加行动的积极分子也减少了,工人只能越来越听任雇主或政府的摆布。国民收入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利润。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人把工会称作自私的社团主义者,对此工会也无力辩驳。80年代中期,一本名为《总是索取更多》的书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

文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衰落表现得更加彻底。还在社会党上台之前,巴黎的知识界就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左派的其他信念还依然拥有各自的追随者。可现在他们也纷纷改弦更张。70年代早期出现过很多鼓吹地方分权的革命行动的工人自治者,他们的演进过程具有象征性:10之后,他们断定,

法国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市民社会”的复兴。普鲁东和罗莎·卢森堡起先让位于尼采，然后让位于托克维尔和亚当·斯密。

在一种消极意义上，所有这些变化都给1983年之后的社会主义试验的剧变扫清了道路。法国共产党的衰落使社会党从它的左翼压力之下解脱了出来。工会风光不再使得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的合理化成为可能。有所醒悟的知识分子都急于帮助实现中间派议员的标准化。⁶⁰⁰但是这些都不足以为政府提供一个积极的动力因素：一项对它的支持者具有足够吸引力、能够抵制右派放肆的反对的计划。左派动员机制的源泉枯竭了。什么能够取而代之呢？密特朗以微弱优势赢得了1981年的总统大选，他的追随者随后使社会党占据了国民议会的议会多数。但两年以后的市政选举却以左派的失败而告终，这标志着右派全国阵线的突破。1984年末，政府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左派超越紧缩的替代政策依旧不明朗，而此时它的经济政策正在以非常直接的方式伤害其大多数选民的利益。

这是一种社会无序和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它给拥有高度灵活的政治技巧的密特朗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制定精致复杂的政治战略也正是他的长处所在。总统的任期是7年；国民议会的任期是5年。这意味着1986年之后，密特朗将不得不和右派占据多数的议会“同床异梦”。但这样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假如总统在重要的权力领域、特别是外交和防务政策上拥有合乎宪法的特权，密特朗就一定会要求与拥有新的权力的右翼政府发生正面冲突，社会党强烈地希望密特朗能在这场决斗中获胜。因为如果他能在两年之后的总统大选获胜，那么，社会党就可以解散议会、从中获利，从而在1988年的国民议会中重新取胜。较之以前，如今的一切或许都更加仰仗于密特朗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技巧了。因此，1984年开始他就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他的

部署。

总统优先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控制左派在 1986 年大选中失败的范围。第一步是任命一位新总理,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这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理。法比尤斯 30 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的楷模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殷实、能言善辩,与前任总理、技工出身的狂热的老左派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有天壤之别。政坛上任务变化不断,换人是密特朗的主要策略之一。更重要的一步棋还是选举制度的改革:即引入旨在降低右派占据国民议会大多数的可能性的比例代表制,并减少勒庞(Le Pen)的国民阵线对其侧翼的威胁。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被密特朗当作一种战术上的走卒加以利用,以确保最大化地保留它自己的总统职位和社会党的权力。

不管代价多么高昂,密特朗利用巧妙的手腕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到 1986 年 3 月进行立法选举的时候,向财政原教旨主义转变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惯常的果实:通货膨胀率降到了 5% 以下,外贸出现顺差,投资被拉动。然而这些都不足以逆转政治潮流:左派的得票率从 54% 跌到了 43%。但也正因为新出台的规定,国民阵线得到了 32 个议席,所以温和右派仅获得勉强的议会多数。因为左派选举失利,所以密特朗和右派之间的政治角逐就明朗化了。密特朗现在最大限度地运用他的政治天才和总统特权来击败右派,并给新任总理雅各·希拉克这位 1988 年总统选举中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制造麻烦。

希拉克政府的种种作为帮助了他。尽管新政府成立以来,经济还在轻微地恢复,但其政策已经不能继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实现实质性增长了。1986 年末对学生示威运动的粗暴处理又使人们丧失了对政府的政治信任。1987 年 10 月的股市大崩盘更是摧毁了经济复苏的希望。国民阵线领导的新右派非但没

有能够弥合戴高乐主义分子和德斯坦主义者之间的分裂,相反在其压力之下分裂愈演愈烈。结果是内部乱成一锅粥:强硬的新自由主义,守旧的戴高乐式的社团主义,把人引向种族主义的法律与秩序的杀气腾腾的言论,保守的天主教家长制,你争我斗,各不相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密特朗毫不费力地就抓住了希拉克的把柄,后者的朝秦暮楚和缺乏长远目光使他声名狼藉。²⁰。

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密特朗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如果说在1981年他是人民热切希望的根本改革的承担者,那么现在,他则是“中间道路”的基石、“静默的力量”、所有人的大叔。密特朗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外部形象上,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饱经风霜、多谋善断又德高望重的长者,让公众相信,他的经验将能把动乱中的法兰西领入一个安全的港湾。他的策略就是认真的暧昧,对诸如总统的职责、福利国家的重要性、法国在欧洲的命运等问题,发表老生常谈式的评论。除了虔诚的感情,密特朗还让公众知道,他的对手们反复无常,没有坚定的信念,热切希望法国力图根除的朋党永远存在下去。这次竞选是社会党“新政”模式的一个演示,它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密特朗以较大优势胜出,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他的得票率是54%,对手希拉克只有46%。

密特朗乘胜前进,希望获得新的立法选举的胜利。这一次,社会党的候选人们以总统的支持者的形象亮相,而不再是某个具体纲领的承担者。对社会党来说,重要的是获得管理权,以在变动中的世界市场格局中重建法国经济。这一次密特朗的赌本还清了。

1988 - 1993 年的调控是否充分?

密特朗精于长期盘算的特长并不仅仅局限于大选。这位总



统心里非常清楚,对于法国来说,1983 - 1984 年所采取的行动还远不是一次足以使法国经济就此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手术。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有有一个规模更大的建筑规划。他的战略选择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复兴。这个行动的效果是把法国重新卷入欧共体的大潮中去了,同时恢复了法国和德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这是欧洲建构的传统轴心。对 1983 年 3 月的重大决定负责的政治家雅各·德洛尔在 1984 年末当选为欧洲委员会主席,这绝不是偶然的。⁹⁹在新职位上,德洛尔直接着手为重新发动欧洲一体化运动制定一套精致的计划。1985 年末,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统一法案,不久又通过了一个涉及金融、农业、行政和社会措施的一揽子计划,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被称作德洛尔-1。除了一个将在 1992 年实现的统一市场计划外,新的货币和政治联盟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到 1988 年,共同体的新机制已成为欧洲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议题。

密特朗朝向欧共体的政策倾斜是建立在多方位考虑基础上的。从经济上看,统一市场能给法国的公司提供广阔的空间,并促使它们通过规模经济和新技术实现合理化,使之更具国际竞争力。从政治上看,有选择的主权共享能够创造一个管理有序、或许带有某些社会民主主义特点的欧洲,这样,欧洲才能够与美国和日本抗衡。从外交上看,这样一个紧密的联盟能够为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提供一个崭新的舞台,因为尽管是经济领头羊,但德国从不想执政治之牛耳,英国则因为撒切尔夫人对共同体的敌视态度而失去了这种领导资格。从意识形态上看,一个强大的欧洲框架也许能改变法国国内的政治游戏规则,从而为因为旧的计划、组织和选民团体的崩溃而狼狈不堪的左派提供一条出路。一方面,欧共体也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免对困难决定承担政治责任;对于紧缩措施的指责可以被转嫁到布鲁塞尔那里去。另一方面,如果欧洲的选择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这

样,左派就可以以极大的热情,重新确立 80 年代早期被社会党抛弃的那些目标。

密特朗为他自己设置的欧洲总体战略,和他为第二次就任法国总统制定的战略一样高瞻远瞩。鉴于国内行政管理水平的低下,在再度就任总统之后,密特朗特地挑选了他所极不喜欢的政治家米歇尔·罗卡尔为他的总理。⁹⁹这个选择有两层含义。它表示:总统对管理内政的政府的授权与大战略的距离并不远,在这个层面上,他愿意选择最杰出的人才来实现“新政”。罗卡尔早就谴责左派的传统抱负太落伍了。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中,法国只能选择一种中等程度的混合经济。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将自己的魅力建立在政治宽容和政治透明性、管理的创造性和社会同情、市民社会的资源而非雅各宾式的国家冲动基础之上,这是社会党的责任。阶级划分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民意测验、公关技术和电视的专业运用都是达到由流动的人群所充满的选举市场、抵制各种各样的右派产品的道路。

罗卡尔主义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改良主义。在罗卡尔第一次对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他就反对大的目标,认为它们无法实现,相反,他强调解决具体的、局部问题的种种好处。他的政府致力于开设一系列可以试行具体改革的“车间”。这些改革包括一个因为必要的结构重组而失业的那些人提供的“经济复兴的最低收入标准”,以避免他们的边缘化;¹⁰⁰一些以解决城市问题为目的的、由新成立的城市部协调处理的措施;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公共服务设施中的职业结构的重新调整。这就是说,尽管对法国人的自由行动作了些限制,但一些有节制的事情还是被改变了。

然而,相对于这些改革,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的意义更为重大,其核心要义就是致力于完善的货币制度和物价稳定,使法国有能力与德国竞争。要建立一个坚挺的法郎就要求一个能有

效地抑制失业率的抬头的高利率,法国劳工的失业率多年以来徘徊在10%左右。但是整个欧洲已经开始经济复苏,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88年和1989年都令人满意地增长了4%以上,虽然1990年经济再次衰退,这个数字跌落到2%。在这种相对繁荣的背景之下,罗卡尔执政的3年——直到1991年5月——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

当罗卡尔在国内施展身手的时候,密特朗也在推行他的欧洲战略。一时之间大家都相安无事。1989年德洛尔提交了经济和货币联合会的计划,以及修改罗马条约的商谈计划书,此举得到巴黎方面强有力的支持。1990年,密特朗和科尔说服了欧共体其他国家就“政治联盟”、一个围绕着一个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出来的模糊的观念进行平行对话。最后缔造了法德联合军团,这表明:与他第一任总统时期执行的路线相比,在欧洲和美国关系问题上,密特朗更加倾向于戴高乐主义了。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统一货币作出了承诺,这是欧共体自它成立以来向着欧洲一体化跨出的最大一步。

在这个节骨眼上,事态突然急转直下。这一年春季,密特朗解除了罗卡尔的总理职务,接替他的是埃迪特·克勒松(Edith Cresson)。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总统在任期内更换总理本来是件平常事,通常是因为现总理的政治信任已经失尽,总统急需一张新面孔来使自己脱离与中途出现的问题的干系,并为下一届的立法选举作准备。然而,罗卡尔却是深孚众望,大可以很好地继续干下去的。他的解职原因只能到别的地方去找。罗卡尔的成功意味着如果他继续留任,那么,在社会党内部谁将入主爱舍丽宫的角逐中,他将遥遥领先,而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昭然若揭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将罗卡尔解职给密特朗和众多反对罗卡尔的社会党领袖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遏制这股苗头。但这个决定实在是个严重的错误判断,它由此葬送了社会党的经济

前途。克勒松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上任后不久就被证明不是个政治高手。她的政府出尽洋相，屡屡遭受到社会党内部对手的暗算，很快就难以为继。当经济萧条加剧后，总统和他的政党的信任度都降到了最低点。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她就被长期担任财政部长的皮埃尔·贝雷戈瓦替换下来。但克勒松的失败是一个大转折点，从此社会党的国内信任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然而，对密特朗战略的最致命的打击却是来自国外。他的欧洲策略框架是现存的欧共体。1990年两德突然统一把他的梦想彻底粉碎了。他意识到，联邦德国对东德的吸收消化将会改变欧共体内部传统的力量对比，密特朗试图制止柏林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的短命政府，这是他在适应东欧新形势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愚蠢错误的第一个。科尔很快就跟着学，完全不顾法国的保留意见，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采取了注定要倒霉的行动。两国继续要求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一个欧洲联盟条约，但在共同防务政策问题上两者的分歧比以往更大了，同时，英国破坏了对新协定的现实社会范围的希望。欧共体向新的政策领域的迅速扩张加强了其工作方式的不透明性和精英决定论的声势，暴露了它的“民主赤字”。但此时的密特朗的敏锐性要比梅杰(Major)差多了，他一心想要借欧洲联盟之力来为法国在国际上树立起一个庄严形象，他根本就懒得过问立法结构的民主化，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倒是得到了德国人的支持。磋商的结果是一堆难以理解的草案和协议，语义模糊，行文复杂，令人不明所以，非专家不能解读，以致最后在忙乱中精疲力竭地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³⁹

条约的明确承诺中有一条是把欧共体所有国家都向着单一欧洲货币过渡。这一条很不得人心。条约准备以德国联邦银行为蓝本而建立起欧洲货币权威，比这更令人吃惊的还是德国联

邦银行自己的直接态度。联邦银行本身面临着巨额的预算赤字,科尔政府又不愿大幅度提高税收来支付德国统一的费用,所以联邦银行不得不把德国马克的利率提高到了萧条后的最高水平。此时世界经济都处于不景气状态,这个举动无疑封杀了投资,限制了就业,整个欧洲为之骨寒。在法国,在没有任何内部必要理由和大规模的失业的情况下,贝雷戈瓦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法郎汇率的稳定,但即便如此,一浪高过一浪的投机交易还是摧毁了法郎。80年代中期的欧洲宏观战略至此偃旗息鼓,法国经济因为德国的手脚而遭受惩罚。

1992年6月,丹麦的全民公决结果显示,多数人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密特朗决心在法国也就条约问题冒险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虽然这在宪法上并不需要。他的这个决定毫无疑问地反映了他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执著追求,这项事业其实也完全归功于他的心血和努力。当然他也估计到:既然最近的民意测验中,将近70%的选民都在名义上赞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且右派也就这个问题发生了分化,那么,赞同票也就会转化成对他的总统任期的公民投票支持。然而他的这个想法却是一厢情愿的。当正式讨论条约的时候,公众对此的抵制态度与日俱增,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整个亲欧盟集团,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都不得不硬撑到9月20日,最终赢得了微弱多数(不足52%)。这种对密特朗的赤裸裸背叛和对欧洲联盟的颠覆所带来的灾难,总算是过去了。然而出现这种局面毕竟是密特朗的失败,对于即将参加立法选举的社会党也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本来他们还踌躇满志,志在必得。那些投票赞成条约的人多数家境富裕,本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众口一词反对条约的都是左派的核心选民。那些贫困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法国无产者害怕失业面扩大,社会安全度降低,也不相信国家有能力缔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他们因此投票反对马斯特里赫特协定。

6个月后,社会党在民意测验中再次面对选民。贝雷戈瓦政府没有采取多少行动来改善自己的形象。失业率已经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点10.5%。社会党内部就未来总统候选人问题的不愉快争执早已公之于众,这起党争被称作“象群的战场”。他们争论的不是理念和原则问题,而是职位和权力。现在又加添上了种种丑闻。受污染的血液造成了数百人不必要的死亡,但法比尤斯的卫生部官员却拒绝对此事负责,还千方百计地试图操纵司法部,逃避法律指控。密特朗自己则被其他的丑闻困扰:内部的人情交易、对报纸的非法窃听、秘密机构的可疑阴谋等等。在政治上,最严重的事件是对社会党非法敛财行为的一系列控告:他们的典型手法是在社会党执政的地区虚设一些机构,然后伪造发票,把钱汇到社会党的账下。这样的丑闻不胜枚举,社会党越来越像一伙不法之徒,为了赖在台上不择手段。

如同人们预想的那样,选举的报应来得迅猛而激烈。在1993年3月的选举中,社会党一下子失去了半数的支持率,总得票仅为17%;议会议席从258席缩减为53席。作为一个团结阵营而战的右派,在国民议会中以将近80%的议会多数上台执政。

两次失败得出的结论

法国左派最后的辉煌还是在80年代。战后资本积累的逻辑并没有完全像经济自由还原论的狂热鼓吹者想象的脚本那样运行。因为经济强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脚本既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徒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叛徒所授意,而很可能是出自有左派经济还原论者的手笔。可以肯定地说,法国左派必须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走向作出选择,但它已经选择了。通向90年代的悲剧结果的阶梯其实是两套战略选择的

结果,这两套战略不是帮助实现而是加深了法国创造一个较为公正的社会的梦想的难度。

1981年,法国左派上台之后,始终没有能和战后的消费资本主义和解。政府里较小的执政伙伴共产党,仍然抱着对法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念。作为政治大杂烩的社会党,他们非常看不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张,而是鼓吹和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设法“从左边退出危机”的联合体能否让法国再一次领导欧洲呢?执政的法国左派着手制定一个后世界重组时代无人能比的激进的改革方案。10年以后,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到了1983-1984年,左派突然放弃了这条路线,当时法国正在努力想在残酷的国际经济大潮中分得一杯羹。这个选择的失误并非环境造成的,因为在1981年之前很久,领导人就既出于使命也出于疏忽作出了决定,这些决策断绝了以后诸多的发展可能。特别重要的是,左派联盟的破裂改变了共同纲领背后的力量均势,致命地削弱了其原有的动力;但竟然没有一个党认真地考虑过,世界经济的萧条和法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问题。1981年后作出的选择就因此排除了依旧残存的一切希望——群众动员被有意识地回避了,临时保护措施从来就没有检查过。实验选择了一种最不能抗拒外来压力的政治模式。

1984年,当第一批左派退出政治舞台后,另一支大不相同的左派登场了。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很快被人遗忘了。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但主要还是出于社会原因,因为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力量的进步运动虽然一度蓬蓬勃勃,但很快就被遏制住了。随之湮灭的还有超越资本主义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力量。后者的基本前提是,在开放的全球化中,“现代”左派是国家给任何一届政府所设置的不可回避的政治环境。一旦法国人明白了这一点,公众的注目焦点就会集中到那些负责

极其有限选择的人的效率和创造力上。这样一个忠诚于左派的新的民众团体就会在一个明晰而行之有效的管理下形成，这将在恰当的范围内促使左派的团结稳定，推动改革向前发展。如今只有一个宏大设想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逐步实现欧洲联盟。但如果我们说这是“左派”的一个宏观设想，这就太不明确了。

新的战略认为，对于共同体、车间和地方协会的传统忠诚已经下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人主义的选民阵营，对他们来说，政治“生产”必须以严格的投票选举和精细的政策来量体裁做。当总统通过电视来展示形象的时候，个人魅力就要比具体问题重要得多了。当80年代中期，大家都接受现代主义的时候，社会党内部由来已久的“传统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了。1993年，社会党就自食其果了，因为选民也像他们一样反复无常。但是用更传统的话来说，不利于社会党的选举结果是再合理不过的了。社会党所承诺的一切——时髦的人性化管理和欧洲未来——跟中间派和右派能提供的没有什么两样；伴随着它经年累月地重复的政治宣言，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城市的安全感越来越低，腐败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保守的政治派别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后工业主义和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像在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引起法国的社会变化，那么，法国左派没有能够跟上时代步伐，没有有效地适应新形势，他们的失败还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在过去的10年中，连续两套战略无功而返，其毁灭性的后果可谓积重难返。在法国的政治版图上，左派一时萎缩成一片无人问津的荒漠。法共还在它的贫民窟里过着自给自足的放牧营生，它还拥有约10%的选民。劫难余生的社会党一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者倒向右翼阵营，一面力图在罗卡尔领导下重整旗鼓。同时，国民阵线机会主义人民党分子又在诱惑群龙无首的工人和变色龙般的绿党去开垦一度为左派牢牢占有的牧

场。经过这次劫难之后,法国左派再也不声称自己的政治品质迥异于北欧调和的社会改良主义了,因为他们对现代性的单纯崇拜到头来被证明还是空中楼阁般的幻想。但人们可以相信的是,这次失败的打击将再一次诱发左派更具独立性的思想和更富创造性的政策的出台。

七 意大利：新的议程

托比亚斯·阿别斯

在战后欧洲左派政治地图上，意大利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因为它的历史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背反性。在西方社会，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持续不断地从基层爆发激进运动，其猛烈程度不断让观察家吃惊；也没有哪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保持了那么漫长而具有连续性的彻底的保守统治。45年来，意大利始终是一个社会动乱、政治动荡的国家。最早的左派政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在其法国的兄弟党——一个非常不通融的政党——被重新接纳进巴黎政府之后很多年依旧被排除在罗马政坛之外，与此同时，与之非常接近的西班牙社会党却牢牢控制住了马德里的政权。在1993年的政治大地震中，统治意大利长达半个世纪的政府最终垮台。一时之间，意共的继承人们都认为——他们不少政治对手也这么认为——这下该轮到他们上台了。结果，旧秩序崩溃的结局却是根本相反。左派非但没有能够上台，第二共和国的政权反倒落入了极右势力的手中。如今在罗马担任部长的不是葛兰西和陶里亚蒂(Togliatti)的后代，而是墨索里尼的子孙。如此悲惨的一幕是怎么发生的呢？只有结合战后意共的长期发展历史，我们才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抵抗运动到中左派

虽然意大利共产党早在 1921 年就成立了,但是直到 40 年代它才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它从一个相对较小、然而不乏热诚的组织发展成为了一支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本质上是 1943—1945 年深刻剧变的结果;因为在相对安定环境中,陶里亚蒂相当厉害的政治手腕并没有多少可用武之地。1943 年春天爆发了群众罢工运动,这表明在墨索里尼将近 20 年的独裁统治后,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从强制休眠中复苏了,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后,更是给国王及其军队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与“元首”决裂。从 1943 年 7 月 25 日—9 月 8 日为时 45 天的国王军事独裁使挑起罢工浪潮的共产党有可能在半合法化的情况下重新聚集,并赢得逐步释放共产党政治犯的机会。1943 年 9 月—1945 年 4 月的德占时期对共产党在左派意识形态斗争赢得主导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它又接着取得了左派政治的主导地位。无论是抵抗运动期间还是 1944 年 3 月的大规模罢工运动期间,起决定作用的都是意共而非规模更大的、很早就脱离意共的社会党。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意共的发展无疑是最成功的。

从选举上看,社会党直到 1946 年仍然是左派第一大党,但共产党拥有更多忠诚的积极分子,其内部决策部门也还远远没有僵化。陶里亚蒂对北部抵抗运动的革命梦想采取的是抑制而非鼓励的手段,他很善于借此把群众运动的能量纳入到他自己的“进步民主”计划之中,这个计划在本质上和 1935 年首次提出的人民阵线大同小异。意共和社会党一起加入了战后由天主教民主党领导的第一个联合政府。共产党自从那时起就成为执政党之一,直到 1947 年 5 月被德·加斯贝利(De Gasperi)驱逐出政府,尽管那些内阁成员没有能够表达对陶里亚蒂所要求的改革的支持,可这还是足以把他的进步民主和传统民主区分开

来。然而,1948年4月的冷战使大选出现了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共产党和社会党携手对抗天主教民主党及其盟友,这一行动抹去了社会党过去碌碌无为的记录。不过左派却在选举中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惨败——只获得31%的选票,而天主教民主党获得了48.5%的选票,但经过这次失败,革命的工人农民与意共的联系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加强了。1948年7月爆发了半暴动性质的总罢工,这是对谋杀陶里亚蒂企图的自发反应,虽然共产党在取消这次罢工活动的时候遇到了些困难,但这起事件却说明,即使最极端的好战分子也无法超出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存在所设置的边界来构想政治主张。

整个5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加强了他们的政治霸权和那个使1948年4月的选举胜利锻造成为一个政权的执政联盟,而共产党则成了被剥夺了谈判权力的工人阶级所有造反激情的象征中心。在共产党——还有资历较浅的社会党,也就是共产党较小的合作伙伴——被冷战压力所驱迫进入的亚文化中,那种相对温和的党纲已没有多大意义了。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南尼(Nenni)才采取措施使社会党和共产党疏远开来,而在天民党决定将共产党彻底清除的7年之前,它还认为意共是中左联盟中可以接受的合作伙伴。1960年,坦波里尼(Tambroni)政府转而依靠“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MSI)的议会支持——结果激起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动,这次暴动声势浩大,强调它们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传统的继承与意共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同时,1958—1963年的经济奇迹,连同其令人瞩目的增长速度和来自南方的汹涌的移民浪潮,一起导致了北方罢工运动的复苏。²⁹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民党的一些明智人士觉得,现在正可以抓住时机,把分裂的工人运动中的温和分子吸收进来,并且把社会党拉入政府。然而,直到1963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才算正式进入了莫罗(Moro)内阁。在此之后,经济增长放

慢、部分保守的工业部门的抗拒和国家机器的原因使得意大利社会党在1963-1968年发动的改革难见成效,而作为一个显然不妥协的反对党,共产党的声望却在增长。

1967-1968年的学生风暴

60年代末,意大利面临的普遍的社会危机就是这个样子。最重大的事件是1969年秋达到高潮的工人暴动。但引起工人暴动的直接催化剂还是在大学校园里。⁶³意大利的学生运动比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早一年多。最早的运动于1967年1月分别在比萨、博洛尼亚、卡里亚里和卡麦利诺发生,时至2月,激进运动就扩大到都灵和那不勒斯。随着1967年11月新学年的开始,运动扩散到了整个意大利大学系统,覆盖了特兰托、米兰、热那亚、威尼斯、帕多瓦和其他一些地方。1968年比萨重申了它在学生抗议活动中的风暴眼地位,2月,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卷入了斗争。冲突升级,学生与国家和大学当局对峙。最严重的事件是1968年3月发生在罗马朱利亚区的街头械斗,在这次械斗中有500名学生和大量警察受伤。学年结束的时候,有将近3000名学生被指控有攻击国家的行为。

这样一场广泛的学潮的爆发还波及过去那些调和主义者和看起来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这归根到底要归结于大学的扩招,事实证明这样的扩招带来了很大的危险。1968年在校大学生数量是1951年的两倍。入学学生数量的增加相应地要求毕业生也要增加,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兑现。例如,1968年,意大利大学共招收了50万名新生,然而毕业的只有31,000人——这样一个失衡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非个性化的权威主义教学模式,以及人满为患的图书馆、实验室和教师。与1945年以前的做法不同,意大利的大学没有为小范围的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再生产保留有效的机制;而是大批量地生产出了边缘化的、没有希

望获得他们及其望子成龙的父母希望获得的职位的知识分子。1967—1968年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因此迅速走向极端。同时运动还受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误以为是自由主义者自发组织的）、越南春节攻势和法国五月运动的重大影响，许多好战分子的思想从挑战传统的大学结构发展到了改造意大利国家结构。由于意共在这次运动中完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所以过去和右派政治势力挂钩的学生都转移到了极左阵营中来，他们还没有体会到共产主义教条的全面影响。

1968—1970年的工人造反

从根本上说，在意大利，点燃工人暴动导火线的惟一因素就是学生风暴。与此相反，在美国、英国、甚至在西德学生运动都是暂时的或孤立的。在法国，当法共和法国总工会允许戴高乐在学生和工人阶级之间插入楔子之后，富有传奇色彩的法国五月运动也偃旗息鼓了。意大利的情况之所以不同还是因为1968—1969年意大利北部的工人暴动，这次暴动至少动摇了资本家的权力达10年之久。这次运动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自发性，这与斯大林时代流传下来的共产党传统大不一样，所以，最初它也意味着对工会领导层的威胁，如同它对资本家的威胁一样。工人的兴趣焦点并不在于工资，而是集中在对生产过程的监控上。在工资问题上他们始终想超越地方主义，他们异乎寻常地采取了一种平等主义的方式，要求在某个工厂所有层次的劳工的报酬都得到统一的提升——这是一种1919—1920年比耶诺·洛索（Biennio Rosso）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的要求。但冲破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压力的第一个征兆并没有出现在左翼激进分子的据点，而是出现在维内托传统的消极的天民党地盘里，在那里意大利总工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1968年4月，从该大区调动了上千名警力来镇压在瓦尔达亚诺突然爆发的暴动。在

都灵,菲亚特的工人向雇主施加压力,要求把工作时间压缩到每周40小时,取消义务性的加班制度。在波尔图,马尔盖拉的工人拒绝把日常的罢工组织委托给工会的官员,相反,他们以当时学生集会的模式为蓝本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集会制度。

时至1969年春,都灵的非亚特厂已经成为了暴动的中心。²¹来自南部的移民得到的都是最差的工作、最差的房子和恶劣的公共交通条件。²⁵那一年,菲亚特被迫招募了大量的新工人,当地的警察和神职人员事先又没有对这些工人作持久的调查,因而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没有能够被排除在工厂大门之外,这在战后的意大利是绝无仅有的。结果,那些比普通人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及那些和西德工会有过接触的工人在来自梅佐乔尔诺的非熟练工人群众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场激变持续了将近一年,彻底改变了菲亚特的形势。激变始于3月,当时米拉费奥里厂的工人拒绝接受加速生产的管理条例。4月,菲亚特全体工人举行罢工,这在1948年以来还是第一次。50天的持续斗争在1969年7月3日到达了顶点,那时工会号召在都灵举行总罢工以抗议该城市过高的地租——结果引发了工人和警察之间大规模的街头械斗。这样的冲突在米兰始于菲亚特,在波尔图始于蒙太提松,在米兰始于马尔盖拉和比雷里,从1969年9月起很快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现象。卷入那年秋季罢工的共有550万工人,超过了全体工人的四分之一。直接损失总计达5亿2千万个工作时,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这都是惊人的数字。1969年11月,2000万意大利人加入的总罢工迫使政府不得不改变养老金制度。

1969年和1970年初赢得的协定代表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可观的胜利。100万以上的冶金工人和机械工人所签订的工业联合会条约开创了先例。它包括:在二三年内将周工作时间减少到40小时;限制加班,承认加班只能是偶然的而不能是正常

的周工作时间；在雇员 15 人以上的工厂，工人每年有权在工作时间内召开 10 个小时的集会；承认工会代表的合法地位，他们为工会工作，每个月有 8 小时是支薪的，其他时间则不支薪；工会合同的基层批准制度；在培训活动中工人有权保护自己；平等主义的工资增长必须超过通货膨胀率等。意大利工厂传统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苛刻的——黑名单、政治监控、由于在生产流水线上交谈或由于午餐时间浏览报纸而被立刻解雇、成立所谓的“流亡部门”以便把那些偏激分子和其他工人隔绝开来，而这些政策变动无疑代表了生产第一线的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这些还仅仅是开始。当 1970 年有 43 种其他类型的协定被更新的时候，早年的成功记录被持平或被刷新了。

这一时期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是新的工场代表形式的发展——一个由基层代表和议会构成的制度。早在 1969 年末，同一个群体的工人以不记名方式推选代表就已经在实践中普及，在选举中不管是工会成员还是非成员都有投票权，代表也不必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然后各个团体组织就必须从这些代表的序列中选择他们自己（新近被允许的）的工场代表，建立一个由这些代表组成的工厂议会。到 1972 年，这已经成为北部意大利大工厂的标准团体组织结构——这是一个引起工会成员迅速增长的转变。三大组织（意大利总工会、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意大利劳工联盟）的会员总数从 1968 年的 450 万发展到 1973 年的 600 万。最后但不是次要的一点，大规模的工人叛乱迫使中左政府在 1970 年通过了《工人权利法》，这项由社会党律师朱尼（Giugni）起草的法律直到今天还被视作是西欧最亲工会的工业关系法。该法律使 1969 - 1970 年一系列协定所获得的成果合法化了，它允许让工会提出几百起错误解雇或其他错误行为的案例来反对雇主。由此产生了一种偏向于工会的司法解释体系，形成了意大利工业关系的新的司法基础。^⑨

意大利共产党在 1967 - 1970 年间的反应

对于这场剧变,意共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最初,共产党面对 1967 - 1969 年风起云涌的动荡事件不知所措。它对校园骚乱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传统的学生联合会上,然而学生联合会很快就被学生运动的激流冲散了,之后它徒劳地号召成立一个“群众联合组织”。但是到了 1968 年 4 月,由于大选临近,共产党出于争取选举胜利的考虑,才改变了对激进学生的态度。共产党总书记隆哥(Longo)对学生运动在使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正式欢迎,宣称共产党应当提出“意大利革命运动中更普遍的问题”,他还在黑暗大楼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欧瑞斯特·斯卡尔佐尼(Botteghe Oscure)——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未来的领导人。针对隆哥这些言论,共产党右翼领导人阿门多拉(Amendola)作出了愤怒的反应,他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和学生运动:两条路线斗争的必要性”的著名文章,文章指出,学生运动的总体政治主张与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不相容的,它受到中国大辩论的影响,是一条极左路线。

尽管阿门多拉竭力反对,但隆哥的灵活政策似乎在选举中得到了回报。1968 年 5 月,意共的得票率从 25.3% 上升到 26.9%,而反对和天民党结盟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从意大利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一支左派的力量,其得票率仅为 4.5%。一个月后,爆发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事:意大利工人斗争的爆发、法国五、六月的骚乱、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这样的背景下,1969 年 1 月在博洛尼亚召开了党代会,许多人以为意共将会向左倾斜。尽管阿门多拉取代隆哥成为党主席的希望很渺茫,但共产党内更偏激的左派人物——阿门多拉的对手——皮耶特罗·因格拉奥(Pietro Ingrao)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作为隆哥的继任者、撒丁贵族出身的恩里科·贝林格

(Enrico Berlinguer),把他的升迁归功于他调和矛盾的技巧——他向大会指出,“近几个月的事态表明,我们有可能同时发起激进运动、扩大我们的基础和社会联盟、建立统一的工会、甚至在互相最为冲突的民主力量之间达成部分一致”。共产党内的左派相对力量较弱,其核心人物是因格拉奥,他批评共产党在博洛尼亚所采取的公开立场,认为意共的作为无论是对苏联在布拉格之春的霸权主义行径,还是对西方世界的社会暴乱都不能造成足够大的影响力,他们继而出版了一份独立的《宣言》杂志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在这份杂志中,鲁西奥·马格里(Lucio Magri)、洛姗娜·洛桑达(Rossana Rossanda)、鲁伊吉·平托(Luigi Pintor)、阿尔多·纳托里(Aldo Natoli)和其他一些人都撰文主张强烈抵制勃列日涅夫主义,并对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建立在为“进步民主”赢得中间阶层这个含混的希望上,而是把希望放在了工人阶级及其真正的同盟军:科技专家、知识分子和边缘阶层可见的反抗身上。对官方教条的挑战受到了意共领导层纪律制裁的威胁,当宣言团体坚持自己立场的时候,它就在1969年11月被开除出党——贝林格还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对此进行了谴责。1967-1969年动乱对意共造成的最终影响是:曾经对工人和学生运动作出积极反应的意共党内力量被清洗了。⁶⁵这为共产党整体向右转扫清了道路。

同时在党外,到1968年已形成了大大小小各种革命小团体。意大利极左势力随之问世,其成员数量和发展势头都是其他西欧国家所不能企及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支各拥有15,000名左右成员的组织,它们分别是:先进工人、继续斗争和宣言派。这些组织里的年轻激进分子所表现出的能量和革命热情令人惊叹,他们直接接触的遍布全国工厂和城市的持续骚动,更是激发了他们的干劲。但是从1970年开始就有苗头显示,极左势力在抗议运动和罢工活动中的作用并不能帮助它们取得选

举上的突破——将自己合并为一支全国性的力量并重挫共产党。在这些年里,所有极左势力的全部得票都没超过2%。它们的躁动往往在社会动乱中能大显身手,但却只能强化领导政坛的群众性政党的保守反应——这也正是它们毫不留情大加挞伐的对象。

“历史性和解”的起因

60年代末的大规模骚动对于意大利的特权阶级及依附于它们的阶层是个不小的震动。一个直接的现象是新法西斯党的得票率迅速增长——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率从1968年的5.8%增长到1970年的10.7%。结果则对天主教民主党产生了加农炮效应。天民党害怕其支持者永远倒向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自己向右转了。在这样的情形下,1968年以来一直苦苦挣扎的中左派终于偃旗息鼓了。1972年的大选之后,由天民党组建了一个不包括社会党的政府,在范范尼(Fanfani)的领导下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共才在1973年秋季发出了“历史性和解”的要求。贝林格在《重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这个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阿连德(Allende)政府的倒台作出的反应。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不是意共领导人目睹智利人民团结阵线的失败所生产的兔死狐悲的心理。但作出“历史性和解”的根由其实早就放在共产党面前了,这一策略的最后落实还是出于对意大利政局的反应,而不是对在南美发生的事件的反应。

这个策略的起源要追溯到陶里亚蒂的最后岁月,他在1964年去世前几年就开始谈到建立一个“新的多数”的需要。显而易见,这个暗语有三种可能的解释:意共和整个天民党的联盟;意共和天民主党的一部分的联盟;或者是完全脱离天民党的一个多数。陶里亚蒂倾向于第一种可能,这个看法在中左派成立之

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呼应。但意共的普通成员并不作如是想。用意共“一方面,另一方面”的经典术语来表述的话,这样的说法一方面继续意味着共产党基础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意味着正在兴起的领导层的修正主义。60年代后期,很多共产主义好战分子都认为,一旦天民党内的左翼少数派从该党中分裂出来,就有望形成一支新的左翼力量,继而和意共相结合。但是在领导层的头脑中占了主导地位的想法(尽管是个人的意见)却是要争取和整个的天民党达成一致。到1970年,共产党的公开立场已经在其对外宣言中表明,他们愿意与天民党的中左派取得认同。

也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天民党却向右转了。意共对此的反应不是要设法制止这个转变,而是自己也向右转,希望以此和目标中的合作者保持一致。1972年夏季,纳塔(Natta)——后来成为贝林格的继任人——批评中左派政府经常在“抽象的最高纲领”问题上犯下重大错误,由于这样的错误使得社会的一些阶层深感不安。现在“应急政府”的语汇,包括一切“民主的党派”等都进入了意共的词典。这样,天主教民主党和共产党——意大利社会的两支基本政治力量——制定长期协定的动议的舞台就搭建好了,贝林格在1973年9月正式将之命名为“历史性和解”。智利事件在人们心头引起的余悸——意共领导人把它形容为:社会在战争状态中“垂直断裂”成的两大阵营——使共产党的普通党员对这种前景表示欢迎。实际上,智利的国情与意大利的国情相去甚远,所以,这样的辩解很快就撤回了。在以后几年,更经常讨论的问题指向了意大利右翼的“紧张战略”。跟天主教民主党达成有机谅解,对于孤立和中立化政治舞台上的新法西斯主义狂热者来说是必要的,它通过剥夺新法西斯主义赖以繁荣的社会温床,再一次为有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提供了安全保证。

黑色恐怖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1969年到1984年间,除了不计其数的有针对性的政治谋杀和对具体个人的行刺案件之外,还发生了五起重大的指向不明的恐怖爆炸案件,作案者都是新法西斯主义者。较之红色旅最恶劣的行为,整个这段时期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行动都要显得更任意妄为、精神变态和虚无主义。意大利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多少行动去逮捕和监禁爆炸案件的法西斯肇事者,而且少数几个已经被逮捕的人都无一例外地离开了监狱。⁹⁹今天,红色旅、“前线”有重要历史影响的领导人和部分“工人自治”的领导人都已锒铛入狱。可那些真正对法西斯屠杀行动负责的人却逍遥法外。那些臭名昭著的元凶如弗瑞达(Freda)、文图拉(Ventura)尚未被绳之以法,人们至今还对此记忆犹新。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至少有三个议会议员,包括平诺·罗蒂(Pino Rauti),要么与恐怖活动有染,要么列入了警方的搜捕名单中,要么两者都是。新法西斯主义从来就不是明确地游离于意大利国家机构之外的一支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未经过重建。控制了议会的天主教民主党政治家与该党的代表厮混在一起,结果以程度不同的方式帮助掩盖了黑色恐怖。

这样,不仅是制造了米兰喷泉广场惨案的凶手——旨在引起公众的恐惧,并强烈抗议“热秋”——一直没有落入法网,而且调查始终在内务部内遇到重重障碍,但70年代后期发现的P-2小屋显示:那是法西斯主义金融家和内阁部长、军队首脑、记者和代表一起共谋的结果,结果虽然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但肯定有腐败和暴力行为卷入其中。¹⁰⁰黑帮和政治上层人物的勾结并不是天主教民主党惟一的阴暗面。像辛多纳(Sindona)或卡尔维(Calvi)——他们与P-2有联系——周围的小派系的财政运作,就把黑手党的犯罪分子和梵蒂冈红衣主教这样的要人串联到了一起,于是天民党的政治家离罗马教廷就更近了。¹⁰¹这种

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庞大关系网和高度隐蔽的暗箱操作，贯穿了整个意大利人生活的制度领域，使得意共对黑色恐怖主义——它直接威胁到历史性和解的合法性——的揭露不免时断时续，而且没有成效。共产党不可能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运动来反对刽子手和他们的幕后支持者，同时又与该党寻求和解的巨大利益不发生冲突。任何旨在遏制对抗策略的力量，或者根除黑手党的力量都被错误地——往轻处说——移交，成了天主教民主党精英或现存意大利国家机器的任务。

在这种意义下，在历史性和解的积累过程中，右派的行动只是第二位的因素。意共在70年代早期重大转变的首要原因却在别处。因为要考察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大规模合作关系的策略，所以就必须要考虑到意共所处的选举形势。战后，意大利政局稳定下来之后，这就成为共产党的核心现实。意共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但意大利左派的联合选举力量却相当单薄，尤其是1947年社会民主党从意大利社会党中分裂出来之后。就是在1948年，意共和社会党最团结的时候，两党的总计得票也不过31%。10年之后，这个数字上升到37%。到60年代中期，意共一党的得票仍然只是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强，而此时社会党已解除和共产党的同盟，加入了和中左派的天民党同盟——这个发展趋势是意共所无力阻挡的。70年代初，整个政治局势都被1967-1969的社会大动荡所改变，内部分裂且方向不明的意共被天民党排除到政府的边缘。这就是意共此刻制定其战略部署时所处的基本格局。面对风起云涌的新的社会运动和日薄西山的中左派，共产党很策略地放弃了跟社会党重建联盟的打算，而选择了向天民党靠拢。

但这个决定并不是历史性和解的真正要害所在，其依据本质上还是议会政治的。如果意共想要进入政府，它就必须要寻求联合的机会。那么是什么促使意共青睐于天主教民主党的呢？



我们知道,在领导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两大党之间有很长的互相对抗的历史渊源,在冷战期间这种对抗部分地平息了,然而到了中左派时代又再度复燃。到70年代,意共有一大堆的理由——且不论这些理由成立不成立——不信任社会党。社会党在构建和天主教民主党的联盟之时已经表现出机会主义倾向,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又充分暴露出其虚弱性。他们重新统一了萨拉盖特(Saragat)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再次从中分裂了出去。这就是该党腐败的开端(虽然他们的腐败和天民党相比不足挂齿)。同时,该党又进行了民主改组,该党的多数原则和内部组织的活力使黑暗大楼的官僚主义当权派无法容忍。因此,贝林格上任伊始,面对的形势就是对社会党的冷淡态度和含沙射影的批评,认为该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根基正在迅速地萎缩。另一方面,从1972年开始,意共更有针对性地强调天民党在民众中“享有声誉”,吹捧说天民党由于在天主教工人和农民中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全国获得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支持,它已经不是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所能比拟的。事实上,天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得票并没有超过西德基民盟的得票,也没有超过法国戴高乐党在它的黄金时代的得票,就是英国的工党得票也超过了意大利天民党。其实,像天民党这样吸引选民的普遍注意的能力是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成功的保守政治的小伎俩。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依靠的不是无产阶级选民,而是其庞大中产阶级选民,特别是在南部,它总是严重地依赖于附庸制形式,并且往往卷入政府腐败,涉嫌和黑手党或黑衫党的勾结。^⑥当然,在意识形态上,天主教民主党总是在强调其社会使命和基督教精神——对于这些话题,意共日益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同时所到之处,也都引起了人们对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传统的亲和性的关注。意共曾投票批准了拉特兰(Lateran)协定,该协定是墨索里尼和梵蒂冈签署的,然而1947年意大利社

会党却投了反对票。这样，共产党就得到一个可以一举战胜社会党的重要机会，因为它们只需直接和天民党达成协议就可以了。

但是，不管天主教和共产主义者的公开演说如何娓娓动听，它们之间的社会和道德方面的接触点都只不过是美丽的妆扮，而根本没有触及历史性和解的核心方略。意共的选择中有两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和社会党的普通结盟将使左派仍旧得不到议会多数——它们两家的总计得票是40%多一点。要争取到更多的投票，使自己的得票超过50%，就需要推行一套共同协商而且持久的目的在于动摇战后稳固下来的主要选举政体的反对派政策——通过传媒的连续多次运动，鼓吹一个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从而把选民从中间派和右派那里吸引过来。但是，1948年的受挫还使共产党心神不安，那时他们和社会党一起被赶进了贫民窟，意共非常缺乏勇气去执行这样的路线。而与天民党的联盟结果正好相反。在传统的选举地图上不会引起大的改变，而且一旦联盟结成，立刻就能带来议会多数这一成果，而再也不需要在国家制造骚乱，共产党也无需趁乱起事。尽管这个方略投射出长期的太平盛世的景象，但历史性和解的很多构想还是与安全和短期效益联系在一起的。比起一个雄心勃勃、养精蓄锐以求有朝一日真正掌握政权的反对党形象，这个选择似乎立竿见影，且没有太多的负面效应。

1972 - 1981 年的世俗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意共宣布它希望寻求和天主教民主党的长期合作关系，声称在国内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之间建立的民族和谐关系是意大利广大民众最深切的愿望，但它却从根本上误解了人民群众的实际情绪。共产党急于调整它和天民党的关系，但民众中间却存在着与日俱增的一个愿望，那就是要打破

它所代表的蒙昧主义,但这两者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共产党和民众的分道扬镳。社会党议员洛里斯·福图纳(Fortuna)在1965年中左派联合的早期提出了一项离婚法案,但当时并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1968年的多事之秋,福图纳法案得到了意共的认可,并在它的支持下于1970年12月写入法律条文。梵蒂冈和天民党立刻组织了一次意在撤销这项法案的全民公决,他们深信意大利有着深远的天主教传统,老百姓一定会排斥议会里面反教权分子和无神论者的胡作非为。默默支持福图纳法案的意共在这种局面下陷入了尴尬,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回避全民公决活动,不仅仅是担心在公决中落败,而且还担心天主教派和非天主教派的分裂会使历史性和解的努力付之东流。在这样的情形下,共产党于1972年接受了提前一年解散议会的决议,这样,危及它改善和天民党关系的考验就往后延迟了。但是由于范范尼把持着大局,所以全民公决势不可挡地进行,最终在1974年5月举行了。在这次斗争中,社会党和议会外左派,特别是继续斗争组织在捍卫世俗价值时作出了巨大努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共产党,意共最后惊奇地看到,离婚法案得到了59%以上选民的认可。全民公决是60年代末社会骚乱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的一次明确展示,也体现了70年代初女权主义的兴起。^⑧这标志着意大利社会世俗化进程已经开始了,官方天主教和共产主义之间达成的协定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的变化,这同时也表明,社会潮流对激进的堕胎政治是非常有利的。

在后来关于堕胎法案的斗争中,意共又一次重复了他们在离婚法案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勉强和后知后觉。由于教会对节育持有敌视态度,数十年来,意大利的堕胎率一直居高不下;主张禁欲的神职人员的说教和大量意大利妇女的活生生经历之间的隔阂绝不像教皇所说的那样,是“现代堕落”的产物。这一期

间,激进党——一个代表公民权利并加入了左派阵营的小党——要求撤销法西斯宣称堕胎为非法的法令,以解除对堕胎的所有限制。天民党之所以支持一项新的、受到严格限定的堕胎法案,是因为他们担心除了采纳激进分子的建议以外别无出路。许多别的党派都抛出了自己的动议,但没有一项符合并肩工作的女权主义者的口味,也没有能和激进党达成完全一致。1975年11月,5万名妇女徒步到罗马游行,要求堕胎合法化。这次纯粹由妇女参加的游行活动在意大利历史上开创了大规模女权运动的先例。亲意共的意大利妇女联盟(UDI)拒绝参加这次活动。然而,时至1976年4月,大约10万名妇女聚集罗马进行第二次游行活动,意大利妇女联盟却决定加入,因为她们认识到这样的活动再也不可能被轻易取缔。与此同时,社会党致力于激进分子和女权主义者所要求的法律变革。为了争取举行关于堕胎的全民公决,人们征集了50万以上人的签名,莫罗政府想避开全民公决,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提请普选。投票活动结束后,议会就此问题继续用了两年时间起草法案——在他们旨在削弱法律的计划失败之后,天主教民主党人相继提出了破坏性的修正案,共产党跟他们中的多数人保持相同的基调。1978年1月,女权主义者和意大利妇女联盟成员联合抗议意共以妇女的利益为代价和教会达成妥协。共产党想要和梵蒂冈和解的愿望导致了它失去了对意大利妇女联盟的控制能力,后者最终跟意共完全脱离了干系。最后在1978年6月,议会通过了相当自由的堕胎法案。天民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和罗马教廷发起运动抵制该法案,他们看到关于离婚的公民公决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就把问题推给了选民。1981年5月的投票表明,赞成该法案选民大大高于指责离婚问题的选民,达到了惊人的68%。

1976 - 1979 年的民族团结

尽管共产党在 1967 - 1969 年抵制工人和学生的骚乱活动,并对 1974 年离婚问题的公民公决持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他们在选举中居然从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好处。由于除了左派之外,选民们没有第二支值得他们信任的政治力量,并且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对选民们构成了巨大压力,许多选民最后都不得不把他们现实的、任重道远的改革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为在意大利腐败堕落的社会风气中,只有共产党还算是一个廉洁的执政大党。1967 - 1969 年的事件在意大利社会引发了一连串的“根本危机”(葛兰西的术语),这种危机既不是意共希望出现的,也不是它一手造成的,但它们却是共产党 1975 - 1976 年大选胜利最重要的因素。⁶⁹这是因为共产党能够从它开始所反对、接着进行调和的抗议运动中获得政治利益。在 1975 年 6 月的地方选举中,18 - 21 岁的公民第一次获得了投票权,公民权的这次扩大可以看作是 1968 年动乱的一个后果。1972 年以来共有 500 万名以上的新选民注册登记,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性增长。1975 年是 70 年代意大利经济状况最糟糕的一年,青年人大多受到不断增加的失业的威胁。意大利共产党赢得 32.4% 的选票,比 1972 年高 5%。许多地方和大区政府发生更迭。皮耶蒙特大区、利古里亚大区和埃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涅、翁布里亚一起成为了红色地区。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热那亚和都灵都选出了共产党市长。1976 年的大选更是推波助澜。意共的得票达 34.4%,这是一个创记录的数字。在通向共产党自我超越梦想——意共一心要在得票数上超过天民党,成为意大利的第一大党——的这几个星期里,左派的许多团体,包括那些对意共持保留态度的一些团体都深受鼓舞。

1976年的大选结果意味着：历史性和解不再是黑暗大楼隐秘处的一项思辩计划，而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可能性。议会新的选票计算方法意味着单纯由天民党和中右派小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组成的多数已不再可能。社会党明确表示：它不参加不包括共产党的政府或议会多数，因为社会党不愿意因支持紧缩措施而倍受指责，而共产党却独自反对它们并拉走社会党更多的选票。结果，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至少是弃权，天主教民主党就不能组建起一个政府。天民党特别希望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得到工会的合作，它相信：如果它表示出和意共商谈它们的政策的意向，它们和工会之间的对峙就会缓和许多。另一方面，他们的策略自由也受到了美国的限制，因为美国对“共产党人”这个字眼一直讳莫如深。从华盛顿传来毫不含糊的声音，美国不希望在意大利出现共产党内阁。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共产党所能希望的最多只能是在多数派中保留一席之地，而不可能获得政府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处于从属地位的执政联盟，共产党称之为“民族团结”政府。按照贝林格和他的战友后来修正了的提法，最初强调的“紧急”不是后来恐怖主义分子对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威胁（虽然从理论上恐怖主义似乎会干扰政治部门的正常运作），而是正在损害意大利资本主义活力的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各行其是的左派和右派将产生重大分歧的问题。

1976年大选之后立刻就发生了惯常的政府危机。但是在这场传奇剧结束以后，朱利奥·安德雷奥蒂就组建了一个完全由天主教民主党构成的内阁，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和自由党都被排斥在外。但1976年8月-1979年1月，该政府继续从共产党那里得到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在民间它被称为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而不同政党又给它贴上各种各样繁复晦涩的标签。为了在意大利建造一个短期稳定的资本主义政

府采取了值得信任的合理化措施。在这些年里,里拉和收支状况都得到了改善;1979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率达5%,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仍旧是老大难问题。政府通过向工人阶级征收重税总算是应付过了直接的经济危机。1976年10月,政府引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经典的紧缩通货一揽子计划。利率提高到了3.4%以压缩信贷,大量由政府控制的物价——汽油、供暖、油料、燃气、烟草、邮政收费和铁路运费——都上涨了,最贫困阶层受到了最严重的影响。工厂工人属于所得税直接从收入的源头被榨取的少数几个社会阶层之一,而商店经营者、餐厅业主、律师和许多中产阶级职业人士就完全是被财政当局巧取豪夺了。5天的法定假日被取消了,这说明,雇主和国家渴望收回它们在1972年法律中失去的各种利益。对此意共只是稍稍作了几次象征性的抗辩,几乎未做什么改动就让一揽子紧缩计划通过了。

历史性和解就这样变成了天民党赞助制和通货紧缩政策的常规政体。“民族团结”取消了来自议会政治的一切实质性不同政见或反对意见。六大党协同一致的“宪法支撑”在议院中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普遍注意到,天民党在创造历史,共产党则是刻意寻求妥协,这样清楚分工是不可能酝酿一个富有成效的改革的。随之给国家带来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在这种政治格局下,60年代后期的骚乱残余根本不可能完全停止发挥作用。一个封闭的政治制度换来的代价被证明是暴力和镇压愈演愈烈的辩证法,它最终导致了红色恐怖主义的疯狂行动。这个过程的结果比其开端更有戏剧性。最初在大学新生中出现了不安定因素,随后它就溢出校园,在从小资产阶级、边缘化阶层到工人阶级的各个城市青年群体中蔓延。较之于1967-1968年的学生动乱或1968-1969年的工人暴动,1977年的运动一开始还只是一种意向不清的现象。经济形式的变化跟这种差别

有密切的关系。1967 - 1969 年的运动在战后经济繁荣即将结束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它动员起了北部工人无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意大利的工人贵族。1977 年骚乱却是经济萧条的产物。它的参与对象——人数要少得多——主要是未找到工作的青年人:拥有相对较稳定职业的工厂工人不愿在衰落的经济形势中拿自己的工作去冒险。可以肯定地说,抗议活动是对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的疲软表现的一种反应。在地缘上,叛乱主要有两大据点:博洛尼亚和罗马。当时,两大策源地的活动都是由共产党当政的市政机构发动的,但是两者都没有出现工厂工人的大批集中现象。由于运动没有能够与北部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建立起真正的联盟,于是就把共产党对他们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强烈仇恨还施彼身,不久就展示出他们幼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种种表现及其虚无主义,正是这些为恐怖主义团体扫平了道路。反过来,这些行为又起了弱化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作用,因为在此形势下,为重新获得 1969 - 1970 年的权益已经等了很久的雇主和国家机器发动了反攻。

麻烦出现在二月份,那时上百名法西斯主义分子闯进了罗马大学,开枪打死了一名抗议政府新教育法的示威者。第二天,几千名大学生聚集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罗马办事处外面。警察向人群开枪。这些事件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罗马、帕雷尔默、巴里、米兰、都灵、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比萨、卡里亚里和那不勒斯等地的校园都相继被学生占领,给人产生一种印象,仿佛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死灰复燃了。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工人自治”的一个少数派在罗马的大学校园里挑起了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激烈冲突;在博洛尼亚的大学校园,一名无辜的“继续斗争”成员被警察开枪击中背部,接下来就发生了街头流血事件和围攻,在罗马举行的离婚问题全民公决周年纪念游行中,一名手无寸铁的年轻的女权主义者被一群暴徒开枪打死。

从根本上看,1977年初的学生运动是大量意大利青年人异化而绝望情绪的一种困惑而真诚的表达,是对经济危机环境的反抗,也是对民族团结政府的因循守旧的反抗。这些最初表现已经掺杂了不少后来英国朋克文化的因素——比如对稀奇古怪的事物任意但无害的爱好,它采取了“印第安”(指美洲印第安而非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式的魔幻形式。运动很快就被“工人自治”的代言人所左右,“工人自治”比较难以定性,它的前身是极左思潮中早期主张工人利益至上的团体。在“工人自治”的领导下,随后的游行示威就动用了火器。它的理论家认为,包括大学生和长期失业者在内的大量社会新阶层都应该被定义为无产阶级——而工厂工人已经另外构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如果说“工人自治”在雇佣工人当中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那么,它在边缘化的、收入很低的工人群体——比如罗马的医院工人——之中就更加深入人心了。“工人自治”的领导人的狂热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他们煽动失业者去反对产业工人,好像后者是他们的敌人一般。“工人自治”陷入了这样一种空前绝后的尴尬处境,他们当中的最强硬分子用“恐怖主义的广泛蔓延”)——低水平的暴力——来对付跟新纳粹主义分子有瓜葛的反对者。但是运动的混乱和无政府性质说明:它聚集起了许多过去从没有参与血腥活动的青年积极分子,试图找机会痛陈他们所目睹的意大利社会的诸多缺陷。

与此同时,一种值得注意的恐怖主义形式登上了政治舞台。红色旅脱胎于60年代后期学生运动,本身是个教条的、好战的、替代性组织。虽然挂着工人阶级的幌子,但实际上从不与工人阶级发生联系,他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持枪暴力行动,但并不杀人,直到1974年,他们在帕多瓦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办事处外刺杀了两名该党的好战分子。但在1976年政府监禁了红色旅的创始人雷纳托·占乔(Renato Curcio)之后,⁶⁹红色旅真正邪

恶的阶段才开始了。红色旅的成员一部分来自从前天主教左派，一部分是理想破灭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些人则没有任何政治经历。这个团体规模很小，但是其组织纪律和目标专一的作风使它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在1977年一系列枪杀和抢劫案件之后，该组织又在1978年绑架并杀害了阿尔多·莫罗，这件事震动了意大利政坛。那时莫罗正在和意共就他们跟政府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的市中心被绑架了。莫罗的被害引起了社会各届的愤慨，意共在五月举行了总罢工表达了他们的义愤。

在这样的局面下，意大利政府已经开始的镇压迅速加剧了。1974年11月，天民党的内务部部长里尔(Reale)提出了一项加强安全防卫的法案。那时社会党和共产党已经否决了授权警察将嫌疑犯单独监禁48小时的条文。1975年5月，里尔法案最终获准通过，意共投票表示对此完全否决，声称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严重侵害，而且将会为压制工人运动大开方便之门。但在1977-1978年间，共产党改变了立场。它不仅大力支持对里尔法案进行更为严厉的修改，甚至还主张为警察立法，允许在被告律师缺场的情况下对嫌疑犯进行讯问。1978年6月，激进分子强制举行了一次意图抵制里尔法案的全民公决，意共则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保留住该法案。1980年2月，议院通过了几项法案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法案。根据这些法案，警方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嫌疑人，并不经起诉就将他们扣留48小时，而地方法官甚至可以不经审判就下达命令将嫌疑人关押10年以上。它还为电话窃听、私闯办公室和民宅、关闭政治组织、在街区或建筑群区进行搜捕等行径开了绿灯。对这些措施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激进党人、PDUP和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党人。

这些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暴力机器的滥用，意共对普遍惩戒



性恐怖气氛的推波助澜,都在反对“工人自治”领导人的事件中被曝光。1979年4月,警方在与意共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法官的授意下,在帕多瓦逮捕了“工人自治”领导人安东尼·内格利(Antonio Negri)。据推测,内格利很有可能亲自参与了帕多瓦“工人自治”发动的暴力活动,这样的罪名如果证据确凿,就会被判处严厉的徒刑。但是,证据问题被当局完全抛到脑后去了,内格利被指控自1969年以来一直在意大利图谋组织叛乱活动,操纵指挥红色旅,策划绑架莫罗,未经审判就将其监禁达4年之久。后来,激进党人在1983年把他选人议会以期引起人们对这起事件的注意。当议院剥夺了内格利的议员豁免权之后,他就逃往法国,而和他一起被拘捕的难友则愤怒地等待着下一年的严厉判决。帕多瓦审判反映了对其组织者和发起人同等程度的不信任。地方法官试图把“工人自治”跟红色旅联系在一起,以适应意共言辞确凿的指控,但却没有任何社会事实基础。实际上,这两个极端主义的差别正是红色旅失败的一个原因。红色旅被许多政治家神话化了,其实它不如这些政治家所描述的那样,它的成员人数非常少,而且也很封闭。后来,当它暴露在悔过的自白和德拉·基萨(Della Chiesa)将军领导的宪兵的突然袭击面前的时候,就迅速崩溃了。

菲亚特的反攻

1979年1月,意共退出议会多数派,理由是安德雷奥蒂没有履行他的改革承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即使是惟一的退休法案也构思得远不够完善,它所引起的问题和它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而且它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意大利的住房短缺问题。尽管如此,意共退出政府的直接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内阁职位。但天民党觉得最可怕的危机已经度过,他们也不再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因此也顺水推舟。结果是6月的全国大选,共产党的得票

直线下降：从34.4%下跌到30.4%。这些年来真正扮演了在野反对党角色的激进党的得票数上升了3倍——在罗马和都灵大约得到7%的选票：“民族团结”让几乎所有青年左派选民都失望了。

但意共没有改变自己的路线。在7月份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贝林格肯定历史性和解继续有效，他平静地告诉人们，现在轮到社会民主党去让党的战略目标服从于选举目标了。过了一年，共产党又回复到它原来的路线上去，因为他们认为尽管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还是应当实现与天主教民主党的共同执政。但是，在选举中毫发未损的天民党已经没有兴致向刚刚被它们削弱的党派让步了。于是在意大利，两大力量的平衡就完全改变了。最大的改变在工业。因为商业已有回缩的迹象。1969年秋季开始的时代如今要在1980年秋季结束了。9月，菲亚特宣布准备裁员14,000人。冶金工人联合会随即号召举行无限期罢工，罢工实际上共持续了35天。这是解放以来意大利大工厂历史上历时最久的一次罢工。斗争一开始势头很不错。共产党很快发出声援，贝林格赶赴工厂大门，甚至提出支持他们占领工厂。来自其他城市的工人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人们纷纷向罢工活动基金会募捐。接下来的行动——虽然只是象征性的——是皮德蒙特历时一天的总罢工和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会（FLM）历时一天的全国罢工。1980年10月14日，30,000—50,000名菲亚特管理人、保安人员、技术员和办公室工人在都灵市区举行示威活动，他们打出标语表示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会不能代表他们。在这当中又加入了几百个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大多数是皮德蒙特产人。当夜联合会向菲亚特妥协，签署了一份协定，允许公司的裁减工人数目达到23,000，而不是原先的14,000。

联合会的领导人，包括总工会和意大利冶金机械工人联合



会的最高官员,立刻召集了工厂委员会代表和菲亚特工人对这个协定进行商讨。代表们的反应极其强烈——面对这样一个来势凶猛的 180 度大转变,他们的反应并不为过——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CIS)的书记皮埃尔·卡尔尼蒂(Pierre Carniti)和意大利劳工联盟(UIL)的书记乔治亚·本韦努托(Giorgio Benvenuto)被人们痛殴之后侥幸逃脱。因为工会领导人要求菲亚特在都灵的各个分厂都明确表态,告诉人们每个分厂的多数人都认可了这项协定。但事实上,这个集会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下召开的,如果说存在过一个多数意见的话,那也是持反对意见的多数。联合会领导人一口咬定他们是出于实际的判断得出罢工斗争即将破裂,才作出那个决定的。造成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很可能是 40,000 人的大游行。都灵街头声势浩大、满怀敌意的力量一定是把联合会吓坏了,以至于他们对他们与技术人员的未来关系深感忧虑。

菲亚特斗争的本质和英国 1984 - 1985 年的矿工罢工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属于政治斗争而非经济斗争。如果菲亚特真的想要削减劳动力人数,他们的管理部门只需接受联合会的轮换解雇的提议就可以了。因为菲亚特本身就有每年自动裁减 12,000 名工人的计划,这对管理部门坦率承认的意图来说应该是足够的。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重新收回 1969 年失去的对劳工及生产过程的控制权。菲亚特完全冷酷无情地利用了他们的胜利。从工厂开除出去的 23,000 名工人并非随意指定的:他们之中有数量非常不成比例的政治积极分子、妇女、年轻人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选择有失常规。对于留下来的幸存者来说,厂里的气氛立刻就彻底地改变了。在 1981 年的罢工斗争中,菲亚特损失的仅仅是 100 万个工作时,而上一年它们的损失则高达 1350 万个工作时。工人们再次害怕成为冗员,对监工也是胆战心惊。在新的工厂纪律下,消极怠工这一著

名的社会学现象即刻消失了。罢工之前，旷工率一度高达14%—18%，现在降低到了3%—5%之间——甚至低于以屈从而闻名于世的日本汽车工人，他们的平均旷工率高达约8%。产量一年内增长了20个百分点，公司回到了令人满意的赢利状态。在罢工后的最初18个月内，菲亚特本部施加压力，关闭了几个分厂，继续临时解雇工人，短时期裁员经常一次就多达40,000人。生产线上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人。到80年代中期，菲亚特已经可以夸耀它们是欧洲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汽车生产厂，在国际市场上阔别多年的份额又被他们夺了回来。意大利权势集团的这场胜利的代价是由意大利全体工人阶级来支付的。都灵是1968—1969年工人暴动的要塞，也是整个70年代武装斗争的温床，可是现在这个城市比米兰还要平静。都灵工人在1980年所遭受的毁灭性打击是整个意大利劳动者的一个转折点。菲亚特发生的事件为后来定下了不祥的基调。

克拉克西当权

对于意共而言，他们再也不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装聋作哑了。贝林格对菲亚特罢工的反应是一个信号，表明意共最后接受“民族团结”的时代该结束了。一个月后，意共领袖借着公众对坎巴尼亚大区地震——再一次暴露了当地的天民党当局的无能与腐败——纷纷表态的机会公开声明：共产党从此与执政的天民党势不两立。这个被称作第二次转变的决策受到了基层党员如释重负的欢迎，这些人向来对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亲善政策没有抱过好感。然而，人们还是没有找到另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路线。正当意共的基层欢迎共产党和执政联盟的破裂时，一些官员却还在幻想找到某条路径重新加入执政联盟；在共产党踏进政治深水时，贝林格试图以他雄辩的、富有战斗力的说教来调和这些矛盾。

1980年以后,意大利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1982年6月,雇主联合会宣布他们将在1983年1月单方面取消底薪制。随后召开了延长的磋商会议,联合会、雇主和政府签署的牺牲了工人利益的协议削减了反通货膨胀的一些保护措施,允许公司提高用人的灵活性——这是联合会的两个重大胜利。到目前为止,严峻的经济气候并没有让执政联盟幸免于难,1983年6月的大选是五党联盟内部的一个重大转折。在经济衰退时期,天民党的得票率从38.3%降至32.9%,这是该党历史上最惨重的失利。与此相反,社会党的得票上升到了11.4%。结果为本尼托·克拉克西问鼎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社会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自50年代中期以来,很少有首相能像社会党主席那样在随后的4年里有效统治政府。今非昔比,80年代的社会党再也不是10年前共产党嗤之以鼻的那个党了。

克拉克西于1976年成为社会党主席,那一年似乎仅仅是由于社会党选举不利,因而对党的领导层进行了改选。起先克拉克西看起来跟他的前任们没有什么两样,都领导着党内影响最大的思潮,随着各种思潮势力的消长,党的各种领导机构总是要作周期性调整。可不久以后势态就很明朗了,克拉克西决意要按他自己的形象来改造社会党。克拉克西认为,社会党的成功之路就在于将自身塑造为一个现代化的、反共的世俗政党,这样的形象无论是北方城市实业家还是多数中产阶级,包括像克拉克西的家乡——米兰这样的城市的知识分子圈子都能够接受。在历史性和解时期,社会党人因为被两个最大政党的联盟排挤出决策阶层而普遍心怀不满,克拉克西则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在这一时期,共产党领袖更多地是在所谓红色城市或地区花费大量时间与天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与自己的社会主义同志社会党——磋商。克拉克西比共产党更清楚地知道,

意大利社会正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听命于教会。任何采取进步的反对教权的政党都会招来越来越多的拥护者。社会党曾经投票决定撤销1947年的宗教协定,在1972-1974年的离婚法案运动中更是一马当先。现在,它采取了首先由激进党发起的要求堕胎合法化的倡议,在那几年非常时期,它还间或表现出对市民解放运动的关心。克拉克西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完全是权宜之计。后来他与班科·阿姆布鲁西亚诺(Banco Ambrosiano)的交涉以及对P-2分子的庇护都是以旧式的天民党风格进行的,这些情况很快就清楚了。^④但在那个时候,这条路线在外表上看却更能使人信服,社会党比共产党更加自由化,实际上克拉克西本人却在他的党内秘密地打造一个新的专制统治秩序。社会党内的所有思潮都合为一体,组织大权全都集于他一人手中。到1981年,局势已经表明,强烈反对克拉克西的方法和政治主张的政见都不再能被容忍。强迫一致的做法要求意识形态随之变化。1976年,社会党名义上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现在克拉克西把党旗上的镰刀斧头改为康乃馨,不仅全部放弃了党的传统语言,而且还打着市场价值和西方自由精神的旗号向党的这种传统语言发起全力攻击。正当社会党变成克拉克西的政治机器的时候,它的新闻喉舌也变得越来越像美国报章,它的知识分子成了法国新哲学家的意大利孪生兄弟。

此刻,历史性和解的两大赞助人各自都遭受了损耗——共产党再次下野,天民党则失去了选民阵地,克拉克西以一种强者的姿态趁势而起,向世人表明他有能力有条不紊地把意大利引入现代化的轨道。这股强大的舆论开历史的倒车,对极权表现出了忠诚,其最前锋如今也不再指向宗教的蒙昧主义,而是再次指向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身;国家不再受到真正有力的批判,受批判的是工人,他们被指斥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最大障碍。克拉克西的特别贡献就在于他把世俗化力量改造为反对传统的工

人运动的力量,同时又促进了与意大利甚嚣尘上的与调和论知识分子不谋而合的市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共产党在70年代没有积极采取反对教权的姿态使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它所追寻的历史性和解的最后结果是让社会党从底下或自己左边的牢笼中窜了出来,接着就眼看着它占据了共产党孜孜以求的位子——天主教民主党享有特权的合作者。从70年代末起,坐失世俗化运动良机的意大利共产党向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高度重视它们以前不喜欢甚至是恐惧的政治家的利益。

在意大利总统府站稳脚跟后,克拉克西向两个目标——工人阶级组织和意大利40年来的生活标准——发起了持久的攻击。新政府靠着不逊于撒切尔夫人的言辞,赋予抑制通货膨胀的行动以绝对的优先权。克拉克西和雇主联合会一起要求对底薪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大幅度的削减。工会联盟不能就谈判事宜达成一致,于是各行其道。克拉克西从来不会错过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他迅速颁布了一项政府法令,将工资指数降低38%。意大利劳动联盟、意大利劳动人民工会联合会和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CGIL)中的社会党人都接受了此法令;只有共产党和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的左翼势力持反对态度。从社会底层涌起了抵抗运动,而且扩散得越来越远。发生了数周的罢工、群众游行和工人聚会,运动的高潮是1984年3月70万人的罗马大集会。唤起民众义愤和会议代表战斗精神的很多次运动都由无产阶级民主党发起,这是70年代后期残留下来的一个规模不大但很严肃、对80年代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比较左的组织。

作为对民众对于工业三方关系中共产党基础的情绪的回应,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民主党一起跟着克拉克西在议会内宣扬第一底薪法令,然后将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发生在罗马的3月大游行上。这些未曾被人留意的好战精神如今已经超过了共产

党的影响,它之所以能发扬光大,部分得益于人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民主党在北部城市工厂议会中的影响正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意共也屈服于来自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右翼的压力,而在这种处境下社会党人则处变不惊。党的总书记鲁西安诺·拉玛(Luciano Lama)是共产党右翼集团众望所归的领袖。意大利工业总联合会中避免分裂的工会政治如今已成为适应社会党要求的主要调节点。拉玛毫不掩饰他本人对意共对工资指数态度的不满。这支更大的反对力量作用的结果是意共允许克拉克西的第二底薪法令在议会通过,他们说:阻止这项法案达6月之久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胜利了,现在是可以做交易的时候了。

无产阶级民主党并没有受到共产党这次退让的影响,他们为召开关于底薪问题的全民公决进行签名征集活动。在1984年的欧洲大选上,选民们出于对贝林格死在演讲坛上的同情,而多投了共产党的票,使意共首次以微弱优势超过了天民党的得票,然而意共的好心情并不能持续多久,他们在1985年的地方选举中得票回落到30%左右,因此很可能希望全民公决不要举行。但是来自基层的压力使得和克拉克西妥协的希望落空,6月份,全民公决如期举行。结果是45.6%的人拥护指数,54.4%的人表示反对——这是个人专制统治下结果最接近的一次全民公决。意共对克拉克西的胜利深表悔恨,以致在新总统的大选中意共完全拜倒在天民党的脚下——把第一选票投给了天民党候选人科西嘉(Cossiga)这位70年代臭名昭著的内务部部长。执政的五大联盟党都公开支持科西嘉,为了合作,共产党只有让步——不过,它还因为是同心协力推举国家新元首的一分子而再一次对自己得到的尊敬表示满足。

权力的交椅坐稳之后,克拉克西就开始有意识地转向他的长期目标——把共产党压制到从属地位,让意共变成左翼第二

大党,而不是第一大党,这将能够允许他脱离天民党,建立起一个类似密特朗的法国那样的社会党政体,它将得到作为下级合作者的独立的共产党的支持。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五党联盟内部加强社会党的政治地位,提高它在国家机器中的影响,从而有可能扩大其社会基础。克拉克西是幸运的,因为当他上台的时候,正赶上世界经济摆脱了1981-1982年的萧条。在对指数问题获胜的鼓舞下,意大利实业家表现出极大的干劲,80年代中期意大利出现了消费热潮,克拉克西执政的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最高点——与1979-1983年的经济不景气时期相比,1983-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2.5%以上。股市交易活跃,金融投机旺盛。受益最多的阶层深深陶醉于物质文明的建设成就,如北方城市的暴发户就深受媒体的喝彩,他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被媒体誉为迟到的现代性繁荣。

正当雅皮士文化在社会上日益繁荣的职业和商业阶层迅速传播的时候,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却在逐渐萎缩。1951-1971年间工业无产阶级的规模——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在整个劳动阶层中所占的比重——还在不断扩大,而现在却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后尘开始减少了。1977年占总劳力29.7%的第三产业,到1985年雇员已占38.6%。很多新部门出现了增长势头,但并不都发生在工业三角地带的米兰-都灵-热那亚,而是“第三意大利”——特别是在处于天民党控制之下、工人阶级的亚文化从没有什么声势的维内托和龙巴蒂北部地区——的小公司身上。从全国来看,1977年到1986年工会组织率降低了15%,底薪受挫后,工厂议会就隐退到幕后去了。80年代后期,工人积极分子越来越多地来自无固定组织的、向公共部门——尤其是铁路、机场和学校——的雇主联合会的权威发起挑战的基础委员会(COBAS),他们不加掩饰的地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受克拉克西政府及其意识形态鼓励的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

的表现。

与此同时，克拉克西的政治机器正在意大利拜占庭式的国家结构中扩张地盘，大量社会党人侵占了高级行政系统、半国营集团和视听媒体的重要职位，他们作为追逐实利的政客参与了行政当局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传统交易，从而越来越多地赢得了商界的支持。在经济火热增长的年代，社会党掌握有雄厚的资金，在南方，它的追随者队伍扩大了，在北方，支持它的民众和中产阶级人数也都在不断增加。1983—1987年间，克拉克西在大选活动中宣称要扩大意大利的经济成就，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三经济大国，社会党为此赢得了100万以上的选票，而共产党则因为得票不足100万而落选。社会党似乎在朝着克拉克西的最终目标稳步前进。无论在选举还是意识形态方面，社会党都占了上风。1988年5月，地方选举结果发生了更有利于他们的戏剧性转变。共产党的得票灾难性地下降到22.8%，社会党的得票则飚升到18.1%，这是1946年以来社会党所占的最大选票份额。依附于社会党的诸多小党的战绩也不错，社会民主党得票是4.8%，共和党是5.1%——即使这样，他们拒绝被克拉克西全部吞并的短期决心反而更大了。这些数字合在一起令共产党色变。法国的教训似乎为期不远了。

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变

1983年贝林格逝世之后，共产党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如果说菲亚特的发难葬送了历史性和解的努力，广泛动员则迫使它为工资指数苦苦奋战，党的领导层缺乏凝聚力、方向不明。在底薪全民公决的较量中落败后，共产党的第一反应就是试图和社会党重新讲和。在1986年召开的第17届党代会上，共产党新任总书记古典主义者亚历山德罗·纳塔发表演说，他呼吁要在“工人运动已经分裂的两大力量间实现和解”的基础上进



行一次民主化转型。在克拉克西执政早期,人们还在为了社会党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共产党现在的口径改变不可谓不戏剧性。新的前景被仔细修正过了:纳塔解释说,共产党不是要把天民党赶到对立面去,尽管这是“正常的民主状态下的一个可能的举措”。共产党现在包括一支新的左派力量,其最高领导人还是因格拉奥,但它已经合并了由马格里和卡斯太里那(Castellina)领导的前宣言团体,马格里和卡斯太里那在贝林格放弃历史性和解战略之后重新加入了共产党,这样做的还有阿尔曼多·科苏塔(Armando Cossutta)领导的亲苏势力——这两股力量的代表成员合计约占30%;那不利塔诺(Napolitano)和拉玛领导下的右翼“改良”集团则占了10%。尽管发言分歧明显,但投票却还是无可更改的大一统,正式议题得到了1000名代表的一致通过,总共才17人弃权。只有一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而这也是为了点缀门面,这种状况表明共产党非常缺少个性。共产党党代会一度以绝对多数赞成开发核能——只是为了看一看社会党再次手忙脚乱的样子,但是几个月后社会党就巧妙地利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为自己重新赢得了支持,反而是共产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无产阶级民主党、激进党和绿党的倡议下,召开了反核能的全民公决,这次活动最后把共和党以外的所有政党都争取过来了,因为结果无可争议,所以共产党劳而无获。

1988年,克拉克西被迫把政权交到天民党手中,但是社会党已经拥有了空前重要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在春季大选中的落败蒙羞使纳塔的领导走到了尽头。他的健康状况在运动中大大受损,他推荐他的代表阿其勒·奥其托(Achille Occhetto)接任他的职位,然后宣布退休。奥其托是共产党前任青年领袖,60年代早期与因格拉奥的左派关系密切,共产党右翼对他极不信任,在此前一年曾投票反对他的提升。1989年春季在罗马召开了

第18届党代会，意共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克拉克西给了他们两条出路，要么成为社会党的附庸，要么被压缩为孤立而虚弱的宗派小团体，但无论作哪种选择，共产党的选举成绩都会继续下跌。如果社会党在1989年6月即将到来的欧洲大选中取代共产党，共产党就会逐步但或许不那么快地消亡，这个念头占据了代表们的头脑，这由此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图变愿望，而在以往的几十年里共产党都是拒绝改变的。然而在目前的特殊形势下，亡党的危险使得全党上下齐心一致共御外侮。

奥其托的新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是它对新社会运动的开放性。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以全世界生态问题为开头，然后将这些问题联系到工业发展的模式，断言说“不走红色道路，绿色的生态环境就只是梦想”；接着他强调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声称“只有在我们这支政治力量中，两性差别才被当作全社会和人类关系的标准来对待”。奥其托热烈称颂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和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的作用，他似乎要把意共的定位转换到接近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地方。奥其托宣布要完全抛弃民主集中制，在领导层选举中他策划了一次秘密投票，还承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将出现彻底的变化。新的领导班子中，一半以上的成员是年轻一代，他们都感受过1968-1977年运动的冲击力——他们也是奥其托最亲密的战友，如马西莫·达勒马(Massimo D'Alema)，都才只有40多岁，正当盛年；30%的位子留给了妇女，在最高层领导层也给她们留下了同样的比例份额。因格拉奥关于女权主义、生态和内部民主的左派主张似乎最后都被接受了。在因格拉奥演讲结束之后，奥其托发表讲话，以谦恭虔诚的态度接受了他的讲话内容，充满了对新的社会运动的期待和对社会党的质疑，与会代表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很多人将这次大会看作是共产党重新振作的一个开始。

可想而知，克拉克西对奥其托的革新不屑一顾。在他的极

权统治下,没有谁能幸免。在5月的地方选举中,南方的一些城镇给社会党投了18.7%的票,给共产党投了17.1%的票,他的傲气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仿佛这足以证明他领导的党已经开始在欧洲大选中超过共产党。在6月19日的欧洲投票中,意大利的选举形势发生突变,意共由于1987年的表现得票上升——增加了1个百分点,达27.6%,而社会党的得票仅为14.8%。意共、社会党、无产阶级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力量总共得票达49.9%,而天民党则跌落到了32.9%,这使共产党创建另一个左派阵线的长期可能性拥有了相当好的选举信用。

克拉克西不断强调意共并没有改变,它们依旧是耻辱的第三国际传统的产物,但是这些丝毫不能动摇奥其托。这一年秋季,东德爆发了危机,他决定意共不能再和中欧正在崩溃的共产党保持哪怕是名义上联系。柏林墙倒塌后不到24小时,他抓住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博洛尼亚发表演说,告诉人们他决定改变本党的名称。意大利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超越传统形势、能够把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左派制宪会议”。奥其托的这个突然举动震惊了他个人圈子以外的所有人,包括意共领导。“制宪会议”的提议没有得到任何响应。绿党和激进党对此都不感兴趣;天民党左派表现出同等程度的冷漠——巴勒莫的激进市长奥兰多(Orlando)退出天民党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路线”;社会党完全持一种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修改党的名称这个提议,在共产党内部也招来尖锐的反对。

结果是一场从1989年11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91年2月的马拉松式的争论。奥其托并不想强加于人,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科苏塔的小团体从党内左派的其余势力中孤立出来,并允许选民表达他们对新改革的赞同,延缓了的过渡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内发生分裂的危险。可这些都估计错了。在1990年3月的第19届党代会上,就共产党改名问题奥其托获

得了67%的支持,然而6月的地方和大区选举对名义上仍然同一的共产党却是当头一棒,共产党损失了6个百分点的选票,社会党和绿党都有所收获。随着海湾局势的紧张,共产党内部的争端也加剧了。奥其托最后对沙漠风暴行动采取了微妙的反对的姿态,部分原因是他想稳住党内的大多数左派,但希望全党全力支持布什的右派则对此极为不满。但是在博洛尼亚讲话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的路线冲突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定型了,1991年2月在里米尼召开的第20届党代会证实了这一点。

在关键的投票中,奥其托又一次赢得了65%的多数,因为新组织接受了新名称——“左派民主党”这个名称沿用了美国模式,刻意地避开了任何有关“社会主义”或“劳动者”的字眼。因格拉奥和科苏塔由于持反对态度而联合起来,他们赢得了30%代表的支持。左派民主党的拥护者希望这一新变化能给公众舆论带来一个新形象,但他们都清楚中央委员会极有可能发生分裂。还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见证了他们的观点的其他反对派将服从党的纪律并在新组织内形成一个少数派力量。

不出人们所料,科苏塔在大会上力排众议,宣布已经为在2月初重建共产主义的运动准备就绪。没有料到的是反对左派民主党的群众反抗会有那么大的规模。3月“重组”组织有了11万成员,4月初达12.5万人,当年年底达15万——他们遍布全国600多个部门,实质上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基础的政党。^④显然不是所有重组成员都是过去的意共活跃分子——无产阶级民主党自我解散并加入了这个新运动,被意共排斥出去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极左小组织和个人为了保持意大利的共产主义传统,也决定求同存异、加入其中。^⑤但绝大多数人还是来自意共。他们包括宣言左派,其领导人马格利和卡斯特利那4月才加入该组织。解散的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在一般情况下,左翼政党一分为二时,大多数前意共党员不会加入任何政党,同时

也放弃了一切与政治相关的行动。纳塔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但意大利共产党在1990年就正式新吸收了130万名党员。而到1991年底,左派民主党才只有约40万名党员,其总体规模还比不上“重组”。

意共的变化并不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从一开始,奥其托的奋斗之路就屡遇不测。左派民主党第一周表现就跟闹剧无异,当时奥其托得票不够,按照他制定的规则不能当选总书记,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只是因为党内右翼分子蓄意弃权以报复他在对待海湾战争问题时跟左派同气连枝的表现。这时共产党急需达勒马的所有技巧和手腕来帮助自己摆脱窘境。接下来,他们又跟“重组”就意共的党旗和财产所有权问题发生了诉讼纠纷。千辛万苦加入共产党的后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此刻又毅然退党了。1992年4月的全国大选不啻是一场考验,结果灾难小了些。意共在1987年获选票26.6%——1963年以来的最低点。左派民主党获选票13.6%——最终超过了得票始终保持在13.6%的社会党。“重组”得票率是5.6%,预示了左派得票的净损失。至于天民党,它的得票在30%以下,这是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些数据留下了巨大的鸿沟。靠投机取巧登上意大利政治舞台的新派力量是北部联盟。由乌姆贝尔托·博西(Umberto Bossi)领导的运动赢得了全部选票的8.7%,成为全国第四大党。

“肃贪反黑”和第一共和国的死亡之痛

随着北部联盟的崛起,整个意大利战后政治格局开始解体了。数月之内,在解放和冷战中诞生的共和政体就陷入了垂死的痛苦之中。^⑨1992年4月大选后随即爆发了非同寻常的剧变,大部分传统的政治阶级、国家许多政府和商界精英都在一系列的重大经济丑闻和与刑事案件的牵连中名誉扫地。这些大大小

小的事件构成了一出情节离奇的活剧，剧中演员阵容强大，有的是声名狼藉的恶棍和大无畏的起诉人，豪门寡头的腐败和公众的愤慨充斥其间。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越过法庭的滔滔雄辩去考察一下造成旧政体下种种危机的社会结构的缺陷。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发生的四个重大变化最终埋葬了这个旧政体。

第一个重大变化是意大利传统的权力润滑机制的隐性转变。早在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霸权不可动摇的整个50年代到70年代，腐败就在政治赞助制度中埋下了根，而天民党在选举上的得势恰恰乞灵于此。在地下政府的天地里，如同其名称一样，是一个次要的、不全面的领域——资金流入天民党的金库，为的是交换合同、机关职位以及天民党对投它票的人所承诺的好处。有时，巨额的贿赂全进了罗马要人的私囊，当然这种事情发生得比较少而且停留于外表——如洛克希德(Lockheed)向鲁墨(Rumor)和列奥那(Leone)的慷慨贿赂。天民党是一个群众性政党，它的力量最终根植于其广大的社会基层之中。当改弦易辙的社会党重入政坛的时候，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克拉克西的政党缺少深厚的社会根基，规模也不及其他党派，所以，急需弥补后来人这个不足。这就助长了党内贪污之风。社会党的发源地在伦巴第，那里的社会党领导人，尤其是出身于农村或偏远地区的领导人，比起天民党的上层人物来对现代商业有更强的认同感。所以它的敲诈勒索是在一种新式的、独具工业特色的范围内进行的。考虑到五党联盟的相互依存关系，不可能把——米兰人的而不是那不勒斯人的——腐败的行为和收益仅仅局限在社会党一党之内。所有的执政党都沾染上了像瘟疫一样的腐败，这些党派都比过去更需要资金，因为在80年代，媒体操作(不是靠群众作后盾)的竞选运动要消耗大笔资金。于是资金在更高等级的政府阶层流动，个人——与政党截然不同——的暴富也就变得越来越正常了。当然，各方面的非生产

性支出都急剧膨胀。意大利国家传统的寄生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克拉克西执政的年代,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公共债务也在无休止地增长。1992年债务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09%,其中三分之一是政府对整个欧共体所欠下的债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条约在马斯特里赫特签署。根据条约,意大利必须将其公共赤字削减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0%。要执行这个计划——这是使用统一货币的前提条件——就需要在意大利的公共财政部门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对国家中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大规模净化。饱受政党政治压迫的大银行家、技术官僚和商人如今强烈地感受到欧共体的压力:再不改革,意大利将难以为继。但就意大利自身来说,外部局势的变化还不足以促使其内部的自觉调整。上层人物已经意识到整个体制需要彻底的革新,但他们还缺少政治的打击力量。突然之间也是事有巧合,民间底层反对体制的暴动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北方联盟,最初叫做伦巴第联盟,80年代后期在乌姆贝尔托·博西——一位天生叛逆的煽动家——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他们抗议中央政府的腐败和政治舞弊。⁹⁹它所传递的信息既是地方主义的,又带有反集体主义的烙印:意大利北方背负了沉重的赋税负担,养肥了南方手伸得很长的官僚并赞助了窃贼和罪犯,如果免除了这些苛捐杂税,北方将成为欧洲最富庶的低税自由企业区。全部统治阶级都应该被扫地出门,国家应该打散重新组合为自治地区的邦联,如有必要,这些地区都应享受退出邦联的权利。联盟的经济纲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精神:降低税额、私有化和低福利。地方主义已接近种族主义的边缘,它看上去和勒庞的国民阵线更接近,而不像是威尔士或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温和的地方自治政策。¹⁰⁰也许与之最接近的是类似于佛莱芒地区的组织,因为它的种族主义敌意指向了一般意义上的同

—国家的人——西西里人或卡里布里安人,就像在过去10年中他们对非法进入意大利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仇视一样。博西对所有现存政党的毫不妥协的敌意以一种粗糙而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他故意打破了官方讲话中得体的措辞方式——一套无懈可击的迂回说法的言辞,立刻赢得许多人的响应。在过去天民党的要塞——如布雷西亚或维琴察——站稳脚跟后,联盟的势力迅速扩散到伦巴第和维内托,成为大小城市里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这些地方的政治气候。

当然,最根本的变化还在于意共的消亡。如果把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比作一堵墙,那么反共就是把墙砖粘合在一起的水泥。从1948年开始,超稳定的战后政体就建立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基础之上,由此把有产阶级和他们的选民团结成一个防御性的集团。当然,意共其实早就停止了扮演革命性在野党的角色。但是不管它的国内政策如何温和,也不管它和苏联保持多远的距离,只要它的领导继续秉承葛兰西和陶里亚蒂的衣钵,只要它的基层民众坚持要改变社会秩序,它就不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分得一杯羹。左派民主党的诞生从形式上埋葬了共产主义传统,随后苏联解体,打消了人们对共产党的传统恐惧心理。意共的继承者在选举上的疲软表现更使人放心了。但一旦反共的胶结材料化为无形,现存权力大厦也就或迟或早要倒塌了。

从表面上看,1992年伊始,一切似乎还都正常。大选之后,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建立了四党联盟,但在克拉克西的“中尉”丘利亚诺·亚马托(Giuliano Amato)领导下的议会多数大大低于他们的期望。几乎在同时,政治阶层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合法性危机之中。米兰的调查提早几个月披露了当地的社会党政客涉嫌各种形式的小型勒索。随后米兰丑闻逐步升级,对腐败的揭密一直延伸到社会党的国家总部,执法

官表示愿意用这些政客的不法行为的证据与他们质证。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随着克拉克西的亲信纷纷落入法网,竭力想渡过这个难关的他对外界声称他们的胡作非为都与他无关,是个别阴谋集团企图借此败坏他的名誉。但1993年2月他最终接受了失败,辞去了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职务,卷入到与刑法制度的长期交战中去了。在“肃贪反黑”的最初阶段,社会党成为公众发泄愤怒的主要对象,夜间电视节目里常有执法官把戴上手铐的政客带走的画面,社会党人在这些伏法者中扮了主要角色。如果落入法网的是天主教民主党的议员或干部,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竭力为自己辩护而将责任推给合伙人,克拉克西、马尔泰利(Martelli)和德·米凯利斯(De Michelis)似乎都已经变成了以权谋私的典型。1993年3月,担任过七届总理、本世纪最后25年里声明显赫的政治家朱利奥·安德烈奥蒂收到了正式警告,巴勒莫的执法官正在调查他与黑手党的长期交往。不久,那不勒斯天民党有头有脸的人物,无论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牵连进了对黑衫党的调查案件中,其中包括前内务部长加瓦(Gava);前总理、平民主义老卫兵兼新自由主义榔头西里亚科·德·米塔(Ciriaco De Mita),目睹他的兄弟被指控巨额贪污地震赈灾款项而被捕。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首脑都纷纷中箭落马。到了本年夏季,945名众议员和参议员中就有305人的豁免权被要求撤销,执法官将这些请求整理入档。同时,调查还在商界和政界大面积地进行,埃尼公司(国家碳化氢公司)和伊利公司(工业复兴公司)的首脑银铛入狱,劳尔·加蒂尼(Raul Cardini)——福鲁资帝国的前总裁——被迫自杀。

出现这样的局面已经够得上是奇观的了,但它不能再升级为“意大利革命”——这是一家报纸最喜欢用的术语,在该报的系列连载中,勇敢的执法官维护法律的尊严,毫不畏惧位高权重的罪犯,彻底清除所有声名狼藉的规章制度。⁶⁶没有联盟的攻城

槌和共产主义的结局,北方的调查就很可能陷入困境。意大利的执法官不是盎格鲁-萨克逊人所想象的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英雄,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官方部队,往往怀有特别的司法野心,跟社会的隐蔽角落和新闻机关都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还有任意发布逮捕令和恐吓的权力,这在欧共体的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的许多权力都已超出了物权法。调查的模式是以人们可以想象的任意方式展开的,其中表现出的庸俗兴趣和崇高理想一样的多。在米兰,“干净的手”众多起诉人当中的人民英雄、浮夸的安东尼·迪·皮耶特罗(Antonio di Pietro),在罗马公诉人对奥利维特巨头卡罗·德·本尼迪特(Carlo de Benedetti)的起诉案中败诉了,因为本尼迪特的父亲碰巧是出版业帝国的第一号人物,他的最主要的两份出版物《快报》和《共和国报》,狂热地为他的儿子喝彩。另一方面,面对四个天民党的内务部长——他们是罗马检查官所属的天民党书记处的成员——证据确凿的腐败行为的指控,检查官就把调查枪口只对准已成为落水狗的两个,宣布第三个人——在职官员,“改革”政府的一名成员——无罪,最后不仅不再对第四人进行调查,反而指控证人犯有“颠覆罪”,理由是提出了不利于此人的证据,“不管他们的陈述是不是事实”。原因何在?原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1993年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奥斯卡·鲁伊吉·斯卡尔法罗(Oscar Luigi Scalfaro),他是众望所归具有完美道德形象的人。据《著名遗址》直接披露,左派民主党——显然不知道科西嘉对此的支持态度——和众多报纸、电视一起大声赞同新的法制典范。在旧法规下,“肃贪反黑”往往是舍卒保车,但这次克拉克西、安德雷奥蒂和法拉利(Forlani)轴心——受人咒骂的CAF——却招致毁灭,而其他次要人物——亚马托、斯卡尔法罗、斯帕多利尼(Spadolini)——却被保全下来了;不过一个新的法制并没有从中诞生。



创立第二共和国的主要冲击力还是来自另一个方向。从1990年以来,6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总统的儿子、长期出任天民党议员的马里奥·塞尼(Mario Segni),曾经为取消意大利的比例代表制呼吁进行全民公决,他自己赞成具有盎格鲁-美利坚传统的票数最多者当选的选举制度。塞尼说,改革目前的选举制度可以提高意大利政界的信任度,建立起稳定的意识形态:英国和美国的投票制度之所以倾向于其他形式,那是因为它们有着最为持久、最为保守的两党制度。从技术上看,塞尼的提议并不是全民公决的提问形式所能决定的,所以宪法法院最初拒绝授权组织这样一个全民公决活动。但是随着媒体吵吵嚷嚷要求对选举制度进行从根到叶的全面改革,法官们——他们对时代的影响一点不亚于行政长官——到1993年初终于改变了口径。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执政党都一致支持塞尼的建议,全国知识界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把意大利的民主按威斯敏斯特-华盛顿的格式进行标准化。左派民主党立刻放弃了过去的原则,跟着学样。过去,它总是打出民主的旗帜来捍卫比例代表制,甚至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对意大利可能出现的票数最多者当选制度表示关注。尽管它坦率承认了它对法国传统的复选多数制的偏爱,却没有大张旗鼓地为全民公决的正式日程奔忙过。对全民公决持反对意见的只有“重组”、绿党、“网”的左派的和极右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塞尼的建议如期付诸实施了。

全民公决活动刚刚发动起来,亚马托政府就辞职了。整个欧洲对意大利的局势越来越关注。政局不稳对里拉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 响,德意志联邦银行和意大利银行的官员们都认识到,要解决意大利的慢性财政赤字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削减福利和私有化,至于能否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意大利的盟国对此都不再抱有幻想了。现在冷战业已结束,美国方面再也没有兴趣拯救天民党,亚马托想在秋季用一揽子紧缩措施努力迎合德国

人的口味,但是他的内阁——共有4位部长先后卷入调查风波——犯了一个时代错误。政府出台了更严厉的紧缩措施和更强硬的肃贪反黑计划。为应付当前的形势,意大利银行行长卡尔洛·阿兹格列欧·钱皮(Carlo Azeglio Ciampi)就任新总理,负责向第二共和国转化时期的管理工作。到目前为止,政府有两大任务:一是配合全民公决时期的结果,通过一项选举制度;二是编制预算削减赤字。

即使在议会关心的全套法案通过以后,选举改革的原则也没有带来塞尼或左派民主党所预期的具体成果。根据通过的法令,75%的两会议员可在单一议员选区根据票数最多者当选制度入选,剩余的25%议员则根据党员名单的比例代表制继续接受选举,单一议员议席的胜利者的人选阀限已经相对降低(“重组”的鲁奇奥·马格利提出的一项别出心裁的创新),只要有4%的得票率各党就可以进入议会。这个四不象的改革的后果令各党都难以揣摩。新制度在1993年的市政投票中暂时出现一些阴影,但是其精神仍能在各种不同的规定下坚持下去。在早些时候的改革中,人口在15,000以上的各个市镇市长都可以按照法国的模式选出,也就是直接地一人投两张选票。5-6月,最显著的结果出现在都灵和米兰。在意大利的这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重组”的第一得票超过了左派民主党,成为左派的第一大党。在第二得票方面,都灵的左派民主党与塞尼和菲亚特联手击败了本市受人尊敬的前任共产党市长,在“重组”支持下与“网”竞争的迪戈·诺维利(Diego Novelli);在米兰的最后一轮选举中,左派民主党却和“网”的候选人、德拉·基萨将军的儿子结成同盟,但后者被联盟党击败。整个北方,博西的政党向人们显示,以四党联盟的损失为代价,他们的力量正与日俱增。

如果这些结果给了商界名流当头棒喝,那么,11-12月在

罗马、那不勒斯、帕雷尔默、热那亚、威尼斯和特里斯特的选举结果就是爆炸性的了。雄踞意大利政坛首席连续 45 年巍然不动的天主教民主党,这次落马了。在最后一轮的角逐名单上,天民党支持的候选人竟然榜上无名。在北方,联盟党的得票几乎增加了一倍,俨然是单个的第一大党。在南方,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不止翻了一倍,超过了任何全国性政党。但是到了第二轮,不论是联盟党还是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都未能保证其他政党对自己的继续支持,他们的候选人在所有大城市的最后一轮角逐中全都败阵。最后的胜利者全是清一色左派民主党支持的候选人。它的命运之所以发生如此惊人的逆转,不是它凭着自己一个政党的力量达到的,因为它的力量并不见得比去年国家大选时强,而当时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对它极为不利,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有能力根据地方力量的平衡,在代表左派或中间派的候选人身后缔结同盟——在帕雷尔默、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与“重组”结盟,在罗马、热那亚和特里斯特与塞尼结盟。出现这样的选举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天民党衰落之后,如果没有政治力量来接替它,意大利就会一分为二——左派民主党协调领导中左派,联盟党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则存在着无论是地域意义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无法修补的裂痕。在这样的情形下,新选举法规定,票数最多者当选的胜利者将获得 75% 的议席,这看起来似乎已经为左派民主党在 1994 年春季大选中获得议会大多数准备好了足够的条件,因为左派民主党在任何地方都比它的对手更有能力聚集盟友。

很快人们就意识到,单凭天主教民主党的残余力量根本就无力阻挡左派民主党的节节胜利。塞尼虽是一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前天主教首脑,但他却在自已现在的位置上忽然变得无能起来,显得极不称职,他既没有本领自己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又不知道怎样去缔结一个有力的联盟。天民党士气低落,仓

粹间与萎缩了的意大利人民党结盟,孤注一掷地乞灵于选民们对堂·斯图尔佐(Don Sturzo)的美好回忆。两支党派谁也不愿与自己的右派或左派达成协议,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势如冰炭。不久,意大利社会的保守力量中普遍存在着强烈害怕左派得胜的阴影。在这样的局势下,加上人们担心重蹈1948年逆流的覆辙,意大利娱乐圈的巨擘开始步入右派留下的政治真空。拥有三家电视台、报社、杂志、出版社、超市、房地产、广告公司和全国最有名的足球俱乐部的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宣布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意大利力量”,这个组织由他的财政帝国的执行官来管理,套用了他的会员制俱乐部的网状系统形式。贝鲁斯科尼的媒体势力几乎保证他在民意测验中总能大获全胜。有了这个基础,他就开足马力,运用各种手腕建立起了一个有能力赢得大选的右派联合阵线。联盟党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水火不容的矛盾是一个相当大的、也是难以调和的问题,两党对中央政府和国家统一的态度截然相反,因而互相憎厌对方。贝鲁斯科尼却不受任何历史问题的制约,他分别和两党都达成了协议,把北方的四分之三的席位都给了联盟党的候选人,在南方和民族同盟——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体面的别名——缔结了地区性的盟友关系。从战术上说,这意味着贝鲁斯科尼牺牲了自己对两党相对微弱的优势。但是从战略上看,这使得他稳居“自由中心”的政治管辖地位,他是两党之间惟一的调停人。这样的安排使联盟党和民族同盟能汇合在一起而相安无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与“意大利力量”结成联盟。

贝鲁斯科尼的行动按部就班地上路之后,他很快就战胜了团结在左派民主党周围的“进步中心”。在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的角逐中,他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得了宝贵的满分。政治上,贝鲁斯科尼的卡特尔以一支绝对的新生力量的面目出现,他的企业联合由三个政党构成,这三个党都没有受到第一共和国政党

政治的贪污受贿和串通共谋等腐化行为的玷污。联盟党和民族同盟事实上都是在旧秩序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局外者。假如贝鲁斯科尼是P-2组织中的一员,并把他的成功归因于他和克拉克西的友谊,那么“意大利力量”——他这样反驳——就将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全新的将给意大利政坛注入新鲜血液的组织,面目一新的天才也将有机会在其中崭露头角。与此相反,左派民主党只是丧失名誉的政权当中一个不断翻版的中心支柱而已——共产党却在其外围永久性地构筑了工事,并且非正式地融入其全国社会公共机构之中。奥其托对这个反诘无以辩驳。自从他就任左派民主党主席以后,这个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陷入党外追赶时髦的知识分子的包围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呼吁要和工人运动的传统以及战后意大利式的民主完全决裂。在德·本尼迪特帝国广泛的舆论支持下,塞尼也受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在1993年的全民公决上,他以极大的热情鼓吹要把选举制度盎格鲁-美利坚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知识分子和塞尼并肩战斗,打出了“训练民主”的旗帜。他们的观点或许用他们为形容第一共和国的整个政治阶级而挑选出来的、并已经用滥了的那个术语——术语表——来表述将更加清晰,换句话说,就是把旧秩序,包括诸如多党制和平等代表制等等令人憎恶的诸多方面,用隐喻的形式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左派民主党一心要把它的“进步中心”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敢把“重组”排除在外,因为它的可能得票数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如果没有“重组”,在票数最多者当选的制度下他们与右派的角逐很可能会落败,他们承担不起这个风险。“网”和绿党是左派阵营里另外两支重要的同盟军。但是左派民主党最看重的盟友还是“训练民主”小圈子,不带兵的将军在红色地区分得了一大把可靠席位,在那些红色地区,左派民主党铁定要选它们。“训练民主”的智囊将充分利用他们在媒体的

职务之便,继续向“重组”猛烈开火,攻击的矛头顺便也指向左派民主党,指责它至今还没有完全跟它的过去一刀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其托根本无力对贝鲁斯科尼的诘难发起有效的回击,何况他最亲近的谈话者都在附和这些指控。在绝对的“新”和“现代化”名义下对战后共和国进行否定的狂潮中,左派民主党注定不敌意大利力量,最后的下场就好像是旧制度下一个满面羞惭的退休老者。

更糟糕的是经济战场上的纷争。左派民主党遵循墨守成规的老套传统,竭力使自己呈现为正统财政最坚定的捍卫者,它不顾危机时期的具体困难,始终要求削减公共支出,降低财政赤字。奥其托飞往伦敦,向国际投资者证明自己的可信度,并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强调紧缩政策的好处。这种姿态导致的后果是又一次刺激了“训练民主”,左派民主党开始公开地盘算:如果左派赢得大选,他们就让钱皮担任“进步中心”的总理。这个选择空前地可怕。钱皮是资历最老的保守派银行家,他竭力奉行一套严厉的预算政策,而毫不顾及民众的需要:如果有哪个人同时既代表了经济紧缩政策,又代表了官僚政治的延续性,这个人就是前意大利银行行长。扶植这个人,把他作为左派民主党尊敬的象征,不啻于自杀行为。这个选择为贝鲁斯科尼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他曾经承诺采取积极措施要向失业宣战、减免并简化赋税,从而刺激投资,使经济迅速走出困境,稳步上升。他的这个计划的基调和方向都小心翼翼地模仿了里根,而不是撒切尔——开出的药方不是猛药,而是悬浮乳胶液,借用10年前里根的电视口号,叫做“早安,美国”。里根的政治宣传固然大胆,但贝鲁斯科尼也毫不逊色,而且他所承诺的经济收成更见成效。左派民主党的因循守旧被残酷地曝光了。

这两次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失败导致了选举灾难。1994年当意大利人走上选举台时,贝鲁斯科尼的联盟已经横扫众议院

的绝大多数,在 630 个席位中赢得了 366 个,只在参议院未能如愿,在 315 个席位中只争取到 155 个。这样大规模的胜利并不能如实反映意大利政见的分布情况。这只不过是左派民主党所认可的选举机制结出的果实。如今的左派民主党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贝鲁斯科尼的联盟共赢得全部选票的 42.9%,支持他的泛希腊主义运动得票率是 3.5%,两者相加右派共得票 46.4%。左派得票 34.4%,由 PPI 和塞尼构成的中间派得票率是 15.7%,两者共得票 50.1%。如果还推行比例制的话,构成多数的中左派就能建立一个政府。除了这一重要的事实之外,政治地图上还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变化。“意大利力量”的得票达 21%,占了全部右派得票的一半以上,而民族同盟得票是 13.4%,联盟党 8.3%——虽然议会的力量分布差别明显,但是各党在议院的代表名额都相当接近(博西有 106 名代表,贝鲁斯科尼有 155 名,塞尼有 105 名)。

荒谬的联盟模式形成以后,“自由中心”赢得了它的胜利——在本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也就是北方的工业区和南方的不毛之地同时都高奏凯歌。它以一边倒的声势,席卷了伦巴第的 74 个票数最多者当选选区中的 73 个,维内托 37 个选区中的 36 个,皮德蒙特 36 个选区中的 31 个,击垮了以米兰和都灵为中心的左派,在那里传统的“红色”工人阶级占领区也都倒向了右派。在意大利最发达的工业中心,紧随博西之后,贝鲁斯科尼对现代化选举制度的要求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同时另一方面,“意大利力量”在西西里赢得了它最高的票数,这个票数占全体票数的三分之一,支持者多为前天民党势力地区里与黑手党有染的人;在南方大陆的拉奇奥、康帕尼亚、阿普里亚、阿布鲁佐和莫利斯,面目一新的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位居第一。天民党分裂瓦解后留下的古老领地被贝鲁斯科尼和费尼以同样敏捷的方式占领。只有共产党在意大利中部——艾米利亚-罗

马涅、乌姆布利亚和图斯卡尼——的传统势力范围还在抵抗右派的蚕食。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选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自由中心”争取到了最年轻的选民。18-24岁的男青年中有55%的人给右派投票,全国平均比例为43%;只有25%的人给左派投票,全国平均比例是34%。这是因为贝鲁斯科尼所承诺的要治愈这个时代最猖獗的顽疾——失业——并没有流于空谈。另外有两类人不合比例地赞成右派,一类是家庭主妇,众所周知,她们整天沉湎于贝鲁斯科尼的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另一类是个体职业者,他们为降税的诱惑所打动。这和里根主义的境况极为相似。

在“训练民主”和左派民主党的梦想中,意大利民主的“标准化”就是要建成一个第二共和国,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空中楼阁。今天贝鲁斯科尼统治下的意大利,连同后法西斯主义的部长、经济实力和政治机关结合的个人联盟,使这个国家看起来离人们所期盼的资本主义标准更遥远了——现在它对标准的偏离毫不含糊地倒向了右派,但在过去它至少承诺要偏向左派。意大利共产党的后继人再一次但更残酷无情地成为国家基础改革的对象而非主体。1945-1964年间,共产党掌握着全意大利社会的最为动荡的力量的忠诚,并且引导他们的行动。1968年之后,情况不再是这样了。从此之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或政治风潮的发生都不再有共产党或其继承者的参与,这样的事件一次次令人意外地重演。1968年的学生骚乱、1969年的热秋、1974年关于离婚问题的全民公决、1977年的自治运动、1985年底薪斗争、1987年核动力问题全民公决、1992年四党联盟的流产、1993年的选举改革——每次事件都诞生了新的组织:自发主义者团体、工人利益至上者团体、社会党、无产阶级民主党、绿党、联盟党、塞尼。第一共和国的毁灭并不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却导致了它的最后垮台。一时间,共产党

的未来,甚至整个意大利左派的前途都是一片黯淡。在有关方面的意愿之外,意大利进步政治的命运将取决于来自底层给政府造成史无前例的压力的激进势力的持久性或死亡。



八 西班牙：社会主义的幸存？

帕屈克·卡米勒

在过去的10年里，西班牙社会党创造了西欧其他左派政党都无可比拟的选举记录。它四次大选获胜，迄今为止已经连续执政达12年之久。如果说在80年代初，新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拉丁语系国家的崛起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今天，这则已经成为历史了：法国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已经萎缩，意大利社会党也从这个国家极度混乱的腐败丑闻中黯然消失，葡萄牙社会党则早就下野了。只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建立了一个持久的政治统治。它的成功提出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问题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传统的背景下，我们应当怎么理解西班牙社会党所取得的骄人战绩？另一个问题是，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实际政绩如何？

70年代初期，西班牙左派中广泛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佛朗哥政权的解体使得过去由他控制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独裁者身故之后，无论是西班牙主要反对党鼓吹的激进民主，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思潮所预言的革命形势都没有实现。经过以上所提到的政治派别激烈的探讨和期盼，向新西班牙的“转型”在平稳中有条不紊地展开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就在这个时代诞生了。阿道尔夫·苏亚雷斯(Adolfo Suárez)、佛朗哥国民运动中的一个公务

员,是怎样恰当地结束了统治西班牙 40 年之久的军警镇压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苏亚雷斯的成功秘诀可以在佛朗哥政权漫长的统治岁月中找到。在其统治基础发生转变的同时为自己的继续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个问题上,20 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个独裁政权能像佛朗哥这样手段高明且大获成功。在人民阵线政府的非常时刻,佛朗哥的历史使命就是镇压严重威胁到西班牙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生存的猛烈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暴动。捍卫私有财产是超越一切地区、社会和意识形态差别将民族主义运动团结起来的最大驱动力。这也是葡萄牙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共同目的。军事独裁者的逐步微调显示出了西班牙的两个独到之处。第一点,尽管在德国的压力下西班牙参加了轴心国的战争,但从此之后佛朗哥就坚决从外交或殖民地冒险中抽身,这不仅使他 1936 年最早的赞助人泄气,而且也让希腊政务会扫兴,就连葡萄牙的独裁者也间接地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1956 年西班牙平静地撤出摩洛哥,1969 年撤出伊夫尼,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二点,也是更根本的一点,萨拉查的统治以明显的、刻意的缓慢增长而出名——这是一种被不顾一切地崇尚社会风气和货币稳定的社会和财政意识形态神圣化了的成就,而从 50 年代开始,佛朗哥政权就积极领导了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持久、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旅游业、移居外国移民的汇款和廉价劳动力是资本积累的发动机,这一切都在欧洲创下了新记录,并彻底改变了西班牙曾经诞生了第二共和国革命性挑战的社会结构。^④1962—1975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 7% 的比例递增,工业化扫除了旧有的农业秩序。1959 年西班牙的农业人口还高达 40% 以上,20 年后农村劳动力人口则降到了不足 20%。同期人均收入增长了 10 倍,从每年的 300 美元上升到了 3,000 美元。^⑤尽管分配不均——收入分配显然是非常不平衡的,但当专制政

权就要终结的时候，这种勇往直前地仿效北欧就业和消费模式的努力所带来的益处，却必然地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葡萄牙4月革命的政治格局。人民对镇压性警察国家机器的愤怒和不满、对缺少投票或结社的基本权利的愤怒和不满的确是在不断增强。但大量西班牙人都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所创造的物质转变中得到了实惠，因此，他们对政治秩序的拒绝也就没有必然地上升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极端怀疑。对于大商业集团以及那些在经济增长年代中迅速扩大的新兴中间阶级来说，西班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安全的环境气候。那个既隐匿又听任一个更稳固的社会大厦的建设的政治框架是一个直到现在才能解构的时代错误。

佛朗哥1975年辞职之后，有产阶级中只有极少数人对前途怀有绝对的信心。70年代的产业工人阶级比起他们30年代的前辈来境况要好得多。他们的人数扩大了一倍，约占全国人口的37%，而且很不听话。受劳动力市场紧缩和缺少政治权利的综合影响，工人骚乱事件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在1966年的罢工风潮中损失了约150万个工作时。到1970年为止这个数字上升到870万，1975年达1450万。佛朗哥去世后的第一年，西班牙工人表现出了欧洲大陆上最高程度的战斗精神：1976年，有1亿5千万个工作时消耗在政治辩论上。如果说工厂斗争复兴了的话，那么，流亡政党也同样不能让当局省心。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是西班牙右派的眼中钉——致力于和整个佛朗哥主义的体制决裂，前者甚至准备彻底消灭社会化纲领。这样，一旦解除军警控制，就似乎再也没有现成的或可靠的渠道来疏导群众可能的激情和能量了。在巴斯克地区，民族主义组织埃塔的武装抵抗为全国其他地区树立了坏榜样，他们还公然干涉中央政治事务，于1973年暗杀了佛朗哥的指定接班人阿德米拉尔·卡雷洛·布兰科(Admiral Carrero

Blanco)。

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中,西班牙资本的前锋部门无疑正处于国家政治结构的欧洲式现代化过程中,这也是自国内战争以来的社会演变所必然导致的众望所归的结果。还在1976年骚乱之前,产业工人就越来越多地加入工人委员会和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UGT),它们现在是工资谈判的中心,有时雇主急于避免发生生产纠纷也常常求助于它们。对于银行和大财团而言,惟一的选择就只有委屈求全地在国家政策中把劳工的需要考虑进去,这条皮诺切特(Pinochet)式的途径目的在于为下一代消灭工人运动——西班牙加入包括重要的旅游贸易在内的欧洲经济的进程使得这一过程事实上变得不可能。他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欧共体的一员,为此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就要瞄准西欧式的议会制度,以使工人阶级的激进潮流不再给新的政体留下任何永久性的印记。

独裁制度的解体

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国王于1976年夏季任命苏亚雷斯为首相,其后3年,苏亚雷斯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他首先争取到了主流官员对政治改革的支持,接着就把这一议程强加给群众性工人政党。在此过程中,他得益于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的佛朗哥政权的杂交特性。在国内战争中取胜的民族主义势力无论在外表还是起源上都比德国、意大利、葡萄牙的法西斯阵线显得更独特。虽然四五十年代为个人前途苦苦奋斗的君主主义者、西班牙王室正统派成员、长枪党党员、天主教徒的职业军人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相对地取得了最高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在军事独裁者的眼皮下进行彻底的组织或政治联合。到了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这样的混合产物给政府注进了全新的血液——最重要的是那些在60年代设法实现了西班牙经济自由化的技

术官僚。其结果是在西班牙资产阶级内部，非正式的或半正式的反集团纷纷涌现，这些人的政见与政府的路线并不完全分离——其中不少主要成员在政府机关担任职务，而前政府官员则被打发到边远地区去了。这样，政府就被一种不确定的、一直延伸到市民社会中相对自由或开明的资产阶级圈子的“缓冲地带”包围起来了。⁸⁸在这个意义上，独裁统治从来都不是西班牙社会内完全封闭的城堡——“缓冲”是专为那最顽固的部分设立的，它加强了独裁统治的其他行政部门与在独裁统治的帮助下形成的资本主义“公共领域”之间联系网络。

苏亚雷斯最初的突破点有一个秘密。他原本可以快捷而轻易地建立一个由缓冲地带的首要人物构成的内阁，这些人——主要是固步自封的改良主义者和天主教民主党人——既是独裁统治的连续性的捍卫者又是标准化未来的希望。引进普选权的政治改革法案最后在顽固的国会中被强行通过，并在1976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获得批准。非共产主义政党于1977年正式合法化，4月，国民运动解体。不仅如此，苏亚雷斯计划的成功——还有新秩序的普通确立——还明显地带来了另一枚胜利果实，那就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合法化。这一步对于军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但苏亚雷斯几乎没遇到他所想象的抵抗，1977年4月顺利地贯彻了他的计划，那时西共领导层已同意放弃共和事业，接受了佛朗哥恢复波旁王朝这一事实。7月国会解散，开始大选。选举体制的基础规定，那些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充当西班牙自治权利联盟（CEDA）的右派堡垒的省份尽管城市化程度不高，却拥有过高的代表比例名额——例如索里亚每34,000名选民就有1位代表，而马德里每13.6万名选民才有1位代表——选举还给最大的政党颁发了大笔津贴。苏亚雷斯新缔造的民主中间派联盟得到35%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有47%的议席。这个政治艺术的胜利以1977年10月签署的蒙克罗协定告终，该



协定以对福利和其他改革措施的承诺为代价限制了工会的行动自由,并使工会最终在1978年初接受了新宪法。

一年多后,在苏亚雷斯的领导下,西班牙这个法西斯国家平稳地实现了软着陆,国内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一般议会制民主。除了某些垂死的纵向辛迪加的职位空缺需要有人填补之外,上层政府的民政部门、司法系统和军队中的人事任用几乎保持了近乎完美的连续性。新宪法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承认军队的作用是“保卫宪法秩序”,君主对军队有至高无上的支配权,任何政府都必须跟教会保持合作关系。这就是西班牙左派为争取共和所作的安排。实际上,改革路线一旦在政治统治集团中站稳脚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层就要在实施范围和时间表问题上听命于它了。共产党虽然在选举中得票不多,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记录使他们在世人眼里成了最主要的反政府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规模大,党员比较富有战斗性,因此他们拥有更大的独立行动能力和控制工人委员会的能力。苏亚雷斯一手炮制的两大左派政党之所以能被世人接受,是因为在40年的专制统治之后,西班牙迫切需要一个民主政权,并且,任何针对佛朗哥的继承人提出的方案的异议都会导致武装干涉和所有公民自由权的丧失。换句话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根本就不可能采取什么能负得起责任的或现实的方针政策去抵制既有政治安排。

认为这些和1943-1949年间意大利共产党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的论调缺乏说服力,但许多对政治解决持赞同态度的观察家都忽略了这一点。^⑥因为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不能与右派和平相处,他们就会向右派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后者作出真正的让步,而不是仅仅说些客套话,因为右派既没有展现其力量的政治意愿,也没有建立足以展现其力量的中等

规模的阵容。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没有这样做，反而谋求一个限制工资以发展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改革等的社会一致，并于1977年末与民主中间派联盟达成了著名的蒙克罗协定。其结果对商业发展极其有利，这也证明它分批解除佛朗哥主义外饰的基本决定的正确性。曾经是欧洲之最的罢工次数很快就回落到西德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就在雇主利用工会的政策灵活性，绕过了那早在独裁早期就引进的旨在保障就业的立法之后，失业率迅即飙升。西班牙共产党称颂蒙克罗协定是未来开明的社会协作关系的楷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虽然对蒙克罗协定没有太大责任，却倾向于采取一种低姿态，等待解决问题的好时机。1977年和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苏亚雷斯都在运用政治技巧以便为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共产党塑造一个同舟共济的形象，而卡里略（Carrillo）则使人想起了资产阶级和工人政党联盟的时代，那时候，这个联盟曾差不多将西班牙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对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来说，其领袖冈萨雷斯的视线主要集中在了将合法地改变社会党和中间派的朝野位置的德国政治体制上。与此同时，它也将能允许卡里略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安排与左派的成功和解。

在全民公决批准新宪法之后的第三个月，苏亚雷斯于1979年3月举行了新的大选，结束了过渡期。在投票前夜，他转面反对前三年他建立的忠诚的社会党和共产党联盟，警告说其中蕴涵着威胁民主秩序和家庭的崇高性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在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的合作期间，苏亚雷斯在给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拔牙方面颇有成效，同时也孤立了政治改革的右翼反对势力。但不管苏亚雷斯自己态度如何，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显要人物从来没有想过，与工人政党的协定能为他们的掌权打下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基础。1979年3月对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因此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在自己的经历上划一条明确



的分界线；二是为民主中间派联盟吸收人民同盟的极右选民创造条件。人民同盟的领导者是前佛朗哥政府的内务部长曼努埃尔·法拉格(Manuel Fraga)。这些目的大都达到了,虽然选举结果没有显示全体右派有什么实质性进展。民主中间派联盟随后在议会中获得48%的议席,使苏亚雷斯能够放心连任。

左派方面,1977年的大选结果确立了社会党对共产党的绝对优势——社会党(30.4%的得票)又一次赢得了3倍于共产党的选票(10.7%)。但是新西班牙社会党的性质和方向仍不明确。在反抗佛朗哥独裁统治的地下斗争中,社会党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战后,共产党在西班牙国内大力进行组织重建工作,然而,以鲁道夫·伊约皮斯(Rodolfo Llopis)为首的被驱逐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虽然在图鲁兹重新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们离国内出现的工人阶级和知识界的反对派已经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他们对后者还往往持一种病态的怀疑态度。直到60年代末期,党内才引进了新生力量。在塞维利亚,一位青年工人党律师菲利普·冈萨雷斯和一位戏剧导演阿方索·格拉(Alfonso Guerra)——这两人都在国外呆过——现在紧密合作,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地方环境。他们的合作伙伴很快受到他们的极大影响,在此过程中格拉施展了他令人惊叹的组织才能,冈萨雷斯也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游说本领。1970年在图鲁兹举行了24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党代会,会上“内部”力量成功地控制住了全局,并把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行为责任权移交给了外国移民管理机构。两年后,伊约皮斯失势,改革者实际操控了该党。在1974年的第26届党代会上——仅比佛朗哥去世早一年,冈萨雷斯当选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新的总书记。那时他才32岁,全部党员数量不超过4,000人。

然而,在西班牙之外,还存在着重要的联盟。一般性的有社会党国际,特殊性的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它们对西班牙培养一个

现代的、在佛朗哥去世后能迎接共产党挑战的社会民主党起了决定性作用。1974年从波恩源源不断地流出大笔资金，正是靠着这笔资助，社会党才能在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后，在全国各地设置办事处，最后连结成规模可观的庞大网络。一年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西班牙召开了自国内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一项似乎将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定性为欧洲最激进的社会党的新党纲——“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的工人阶级政党”。新纲领拒绝“任何向资本主义妥协的道路”，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夺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社会主义化”。在巴德·戈德斯勃格纲领出台后的第17年，这恰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不愿意看到的。已经再度合法化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从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极左组织内地位急剧上升的激进人士中招募了不少新成员；与苏亚雷斯的谈判认真地开始了；但就像密特朗领导下的法国社会党一样，冈萨雷斯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各政治力量与他们各自左派的动态竞争。而此刻的西班牙共产党还没有用他们后来施展的谋略与苏亚雷斯达成妥协，它们现在的滞后使得它们除了随大流之外，一时间别无选择。

国内战争后的第一届自由大选产生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使人们没有理由后悔自己的选择。1977年，社会党凭着跟共产党略有不同的施政纲领赢得了29.4%的选票，而对手共产党只赢得了9.3%的选票。两年后，社会党的得票仅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尽管它已经吞并了恩里科·铁尔诺·加尔万(Enrique Tierno Galvan)所领导的人民共产党，这个较小共产党在上一届选举中赢得了4.5%的选票。1979年3月的挫折导致了党内严重的两极分化。一个月后，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等总共50个省的27个省会的市政选举中，社会党-共产党联盟赢得了多数票，社会党左派因此认为与共产党的激进传统式的合作

是本党最好的前途。另一方面,以冈萨雷斯-格拉为首的领导层认为,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形象已经在全国范围的选举中成为尾大不掉的重负。1979年5月召开的28届党代会是党内左右两派一次历史性的碰撞。冈萨雷斯和他的追随者提出要在党纲中删去马克思主义的字眼,左派发起了猛烈的还击,并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冈萨雷斯迅速作出反应,提出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如此一来,他的反对者——他们显然对换一个领导人的心理准备不足——就陷入了被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在幕后指出,他们的政治和财力资源都投资到菲利普的领袖形象中去了,现在还不能轻易地移作他用。⁶⁶

当年夏季,在格拉有力的指挥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通过引进新的制度改变了党内局势,从此以后,党代会代表不再由地方组织选出,而要全部在地区选举中产生。这使得压力最大化地集中在战略问题上——一些地区代表大会因为不合乎规定而被取消,接着被勒令停止活动。9月底又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代表们为冈萨雷斯再次当选总书记欢呼喝彩,5月大会上的抗议声再也没有响起。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全部理想主张中还是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并不比“基督教社会主义或一个从具有生态学、克劳泽主义或人道主义变种的人类学境遇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具有更大的特权地位。⁶⁷这样坦率的声明就此打住,并没有作进一步褻神的发挥。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党内中央执委会中每一个最后的批评者,其作法立刻暴露出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作风,当然这在西欧已有几个先例了。

右派的危机

就在同时,民主中间派联盟已经显现出了其后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联盟1982年大选崩溃的危机的最早迹象,当时他们仅获得7%的选票,议会中获得11个议席。那时候已经表现出多方

面的破败迹象,有些方面仅仅是偶然的,甚至带有个人的因素,但最重要的还是至今都还发挥作用的西班牙政坛的某些结构性特点。

就在1977年6月大选前一个月,民主中间派联盟还被人看作是一个专为选举而临时成立的联盟,同盟的一方是苏亚雷斯的佛朗哥改革派,另一方是14个从打着“社会自由”旗号的基督教党、人民党和社会民主党到扎根穆尔西亚、法语地区和加那利等地区的小党。许多小党在佛朗哥时代就是粉饰民主的花瓶党,除了在当地政要的小圈子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时至1977年大选,它们再次面临做陪衬的命运,这一次它们把赌注押在了早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就混得很熟的老政府官员身上。在它们看来,佛朗哥派作为民主中间派联盟的第一大党,需要一个听起来更现代、能在大选之前掩盖它们过去足迹的名字。但它们同时也知道,它们只有为运动找到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才能像过渡时期大选那样,把名单一分为二,赢得民主中间派联盟的三分之一议席。接着,苏亚雷斯着手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旨在把民主中间派联盟改造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拥有统一的成员结构的政党的计划,尽管这项计划受到了某些部门的强烈抵制,但到了1978年秋季还是得到了实行。

这股大一统的驱动力对于民主中间派联盟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在反对人民同盟的内部体制构成问题的讨论中,苏亚雷斯尚能力排众议把握住局面,对表面出现的裂痕加以掩饰。可一旦宪法公决和1979年3月的大选开始启动,来自右派的压力就一发不可收,党内离心倾向不断出现。苏亚雷斯觉得既然民主中间派联盟要把自己建成一个全国性统一大党,那么现在出于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竞争的需要,在诸如离婚、财政改革、国家机器的现代化等问题上,中心就应当向“左”移。民主中间派联盟的特别构成,还有它的主要支持者的保守性,都成了这个主

要目标的惹眼的障碍。苏亚雷斯没有停下脚步。他的政治经验和个性都决定了这位老练的管理人会奋勇向前。

第一个要点是税制改革。在佛朗哥时代,西班牙的财政制度是全欧洲最不公平、效率最低的。苏亚雷斯在西班牙历史上第一次推行了累进所得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利息税和企业财产税。尽管这些作法还不像北欧的福利制度那样极端,但还是留下了需要西班牙中央银行发行钞票来弥补的持续的公共税收赤字,这样就招来了西班牙雇主对他的长期忌恨。他们建立了类似于英国工业联合会(CBI)的 CEOE 加以还击。在那些对工薪阶层相当宽大的雇主看来,商界对苏亚雷斯的敌视经过这些年轻微的通货膨胀变得更厉害了。离婚是第二个重要问题。在佛朗哥时代,离婚是非法的,那时的立法坚持天主教的传统价值观,一心要把乡村人口和来势汹涌的世俗化浪潮隔离开来,这在国会那里也激起了部分名流的强烈反对。苏亚雷斯政府经过内部多番调整,终于通过了离婚法案,这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事件之一,其代价则是民主中间派联盟部分议员的骚乱。

同时,历史问题遗留地区应当获得什么性质、何种程度的自治权,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第三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也是西班牙整个国家政策中的一个敏感话题。苏亚雷斯再一次表现出他的果敢和灵活的政治手腕,他不顾本党中央集权主义者和福拉加的人民同盟的反对,与巴斯克还有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给予了他们相当广泛的自治权。巴斯克法令通过后,埃塔并不满意,相反,在此之后暴力行动逐步升级。向这两个地区出让主权的事例在其他省份引起了雪球效应,那里的人们也纷纷要求自治独立,于是反对地方分权的势力再次强硬起来。苏亚雷斯即刻与(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的)安达卢西亚大区政府达成一项地方法令,但民主中间派联盟会议却否认了他的这一举动的合法性——原因是它被安达卢西亚地区的选民抛弃:

在它号召该地区选民在下一次全民公决中投弃权票的时候，选民们并没有听从。

其实，这一时期所暴露出来的不连续性和混乱状态，正是政府的转机。作为政府缔造者和代理人的苏亚雷斯，此时他的能力远逊于他作为党的领袖或议会保民官所表现来的能力。由于受到苏亚雷斯个人敌对势力的蛊惑，加上对地方寡头政治的向往，民主中间派联盟内部的不同政见很快扩大化了，不久就葬送了苏亚雷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党的梦想。苏亚雷斯本人远离党内的派系之争，也没有投入多少精力去建立一个有现代意识的群众性组织，或者甚至去建立一台个人化的政治机器。他很少在国会亮相，即使到场也很不起眼，他跟王室的接触也减少了——这也许反映了他个人的一个看法：他的副手其实和国王差不多。结果是处在权力巅峰上的他与外界日益隔绝，而此时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新贵正在秘密酝酿暴乱。在这样的情形下，苏亚雷斯失去了方向感，完全不知所措。到1981年春季，该党的破裂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以上种种现象只是冰山一角，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暗流更深地隐藏在水面下。在西欧，起源于世俗势力并具有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只有两个。英国的保守党当然是历史最悠久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戴高乐主义还是最近的新创造，它从来没有独当一面地代表过右派；保卫共和国联盟（RPR）至今还与那更加无组织的法国民主联盟（UDF）共享选举份额。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没有保守传统。在其他地方，如奥地利、西德、低地国家和意大利，构成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根基的都是基督教传统势力。70年代初，西班牙原本希望成为这一模式的未来候选人，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许多构成因素，包括很有影响力的“缄默”组织，都自认为是天主教民主党。平心而论，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核心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受了基督教民主党方针思想的影响。但无

论它的影响波及哪里,也不可能对该党构成绝对的领导地位。从对离婚问题的处理来看,苏亚雷斯本人是比较热衷的,而他的很多部长也都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自由党人”。对照之下,民主中间派联盟(由其天主教派别触发的)迅速解体使人深切感到,西班牙缺少一个覆盖面广且强有力的天主教民主党。

为什么以反动的盲从力量和天主教的狂热而闻名的社会反倒不能建立自己的天民党呢?答案部分在于,19世纪以来,天主教在西班牙从来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深入人心,而民间和自由思潮对神学文化的厌恶情绪却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70年代末期西班牙教会不仅纷争不断,而较之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的意大利,其组织显得更加四分五裂。教会里的等级制度与佛朗哥有着紧密联系,佛朗哥有权任命主教,部分高级教士镇压民众的热情甚至连军事独裁者也自叹弗如。教会的中间阶层则受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的影响较深,而巴斯克地区的一些低级神职人员则受到了进步的民族主义甚至是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总的看来,西班牙的教会不像意大利那样拥有世俗群众自发组织联盟的传统。⁶⁹这样它就无法在动荡不安的后佛朗哥时代以大一统的形式保留一席之地。脆弱的等级制也无法再和具体的政治组织联系在一起,而更倾向于把它在自己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上的优势多样化。但在持续的经济增长浪潮以及60年代末70年代的骚乱中,这种优势已经伴随着世俗化文化的兴起而极大地弱化了。1945-1950年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那时的天民党和民主中间派联盟在欧洲大陆的反共土壤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如鱼得水,对教会也充满了虔敬之情。可惜的是西班牙无缘重复这段历史。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主中间派联盟既缺少一个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形象又缺少组织动力。它的大杂烩形式注定了它的短命。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联合巩固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这就是

它今天继承的组织形式。西班牙最古老也是最强大的真正的工业和商业资本主义中心位于地理边缘地带，也就是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地区算得上是全国资本主义统治的心腹之地——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最大的工业集中地区，人均收入为全国之首，还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最密集的中间阶级（首当其冲的是为数众多、特征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但是在西班牙，他们是中央政权最主要的反对者，每个民族情绪强烈的地区都与卡斯蒂利亚的统治和文化格格不入。一旦佛朗哥的高压独裁统治在这些地区消失，就必然导致民族主义政党势力的重新抬头，它们往往还控制了当地政府。在此基础上，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和一致联盟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那些阶级分布和语言状况上介于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之间的地方小党所不能比拟的。⁶⁹但是在西班牙的总体政治框架中，它们的结构作用却是近似的：两者都是地道的群众组织，成员数量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两者都由当地的资产阶级领导，它们在外表上要比伊比利亚半岛上其他任何地方的政治组织都更开明。值得一提的是，两者都充满了天主教精神。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是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个成员。一致联盟跟教权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其领导人普霍尔（Pujol）毫不掩饰自己对教会的忠诚。换句话说，这些都是西班牙最接近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团体——如同人们能够想象的那样，这是骄傲的有产阶级的有机表达。但是，当自信的资产阶级政治的“自然”堡垒为了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已经转而反对它、成为向前突出的堡垒的时候，他们的力量至多能被看作是西班牙的右派全部潜能的一个完全扣除（net subtraction）。

这个现象所意味的第一个清晰标记随着地区选举出现了，那时候，苏亚雷斯刚刚在1980年3月就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自治章程问题举行了磋商。结果民主中间派联盟致在了民族主



义政党手下,在巴斯克地区名列第五,在加泰罗尼亚名列第四。第二年,该党陷入了裂变,苏亚雷斯面临被迫辞去首相职务的危险。在其后的12个月中,15个“社会民主”议员退出了民主中间派联盟,通过各种方式加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再后来,苏亚雷斯也抽身而退,建立了一个在1982年的秋季大选中赢得了微不足道的2.9%的选票的民主社会中心党(CDS),因为右翼的基督教主义者和人民民主党人都倒向了弗拉加的人民同盟。同时,另一个前佛朗哥分子列奥波尔多·加尔沃-索特罗(Leopoldo Calvo-Sotelo),于1981年2月接掌民主中间派联盟,他想通过最低共同标准的政策来阻止危机,这个努力使他作为一个政党和政府的首脑只能停留在社会真空中运作。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在加尔沃-索特罗的授爵典礼上,陆军中校特耶罗(Tejero)带领国民卫队的一群乌合之众闯进国会,试图召集旧秩序的武装力量。但王室的不认可在24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出闹剧。曾经巩固了国内战争政权的前现代社会和传教士的力量如今对军事独裁已经不再有所帮助了。

民主中间派联盟右翼势力的解体为西班牙社会主义向权力中心挺进的努力扫平了道路。但这还需要另一个条件——与此同时西班牙共产党的左派正走在自毁之路上。西班牙共产党以强硬的手段进入了后佛朗哥时代。它也是惟一一个反对独裁统治并建立、保持有组织抵抗的政党,那时的监狱里关押的全是共产党的斗士。共产党在全国领导了最大的独立工会网络:工人委员会。它对60年代期间兴起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在普通群众中的基础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与之相比,仅仅在1978年它就拥有20万党员。然而仅仅过了几年它就惨不忍睹了:工人委员会分裂成三个派别,大选中才得了4%的选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卡里略最大错误在于他急于从苏亚雷斯那里获得西班牙共

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惜一改自己的传统形象,在历史上,西共一直扮演着反对弗朗哥独裁统治的先锋和皇室的忠臣角色。这个仓促决定立刻就暴露出它的灾难性后果。其实,西共的领导层一方面低估了自己的潜能,因为在弗朗哥政权解体后,不管是谁执政,共产党或迟或早都会获得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天真地认为一旦取得合法地位后,他们的得票会立刻上升到30%。但在1977年的大选中,他们仅获不到10%的选票,这个残酷的事实本来应该能够让人清醒的。但是西共仍然执迷不悟,卡里略比冈萨雷斯更起劲地赞美蒙克罗协定,说它是“民族集中政府”的良好模式,在此模式下,西共可以和民主中间派联盟并肩奋斗。从共产党的这个姿态中获益的只有社会党,它今后在语言上更为偏激,在行动上也更有恃无恐。

卡里略竭力在外部树立起一个温顺的欧洲共产主义形象,为了掩饰这一意图,他在党内实行了高压专制统治,党内不少新生力量原来是国内抵抗组织的成员,他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1981年7月,一群“改革派”准备在第10届党代会上实现内部权力的民主化,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当共产党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地方组织要求摆脱中央、寻求独立时,组织内部不和的问题尚未解决,现在又加了上民族矛盾。1981年秋季,巴斯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起来反对卡里略,但都遭到了开除出党的处分。不久以后,共产党在1982年的大选中又遭重挫,一度支持卡里略的人此时纷纷反对他。卡里略被迫作出隐退的姿态,任命一位出身于阿斯图里亚斯的年轻矿工赫拉尔多·伊格雷西亚斯(Gerardo Iglesias)接替他担任总书记之职,他自认为能够控制住伊格雷西亚斯,但他看到的只是自己这位继承人如何执行反对他的“改革”路线。同时,退役老兵伊格纳西奥·加列格(Ignacio Gallego)也自行退党,建立了一个主要以加泰罗尼亚为基地的超级正统的人民共产党(PCPE)。然

后,卡里略自己对新的领导班子发难,仗着马德里和巴伦西亚对他的支持愤然出走。结果到了1983年,西班牙共产党分裂成三个派别,它们互相指责其他各派,声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合法继承人。⁶⁰

欧洲共产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多少算得上是政治胜利的法宝,可是没有哪个国家像在西班牙那样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这主要是因为它与自己的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革命性的基本传统进行了巨大而具有灾难性的决裂。这也因为西班牙共产党不像意大利共产党那样拥有一个同质化的、领导本党经历了60年代以后各种坎坷的集体领导层。卡里略在自己党内所处的岬角地位是马歇或贝林格所不能比的。这样,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民主思想和实际的政治操作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得更为显著,1977年致命问题出现的时候,再给历史遗留问题和民族问题退火就已经太晚了。不管西共具有怎样的历史局限性,它在佛朗哥统治时代有多么辉煌,但它向琐碎的权力政治转变的道德毁灭和不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独裁专制,对西班牙工人运动来说都是灾难。这么做的一个明显结果就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再也用不着害怕来自其左边的制裁了。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胜利

胜利的天平倒向了另一侧,西班牙社会党在1982年10月的大选上大获全胜,这在欧洲社会党历史上、甚至在更宽泛的欧洲议会制政体上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一次胜利。社会党共得选票10,127,392张,占全体选票的48.4%,几乎是名列第二的对手人民同盟的两倍。此外它——得益于苏亚雷斯创立的津贴制——还获得了众议院57.7%的议席。他们的胜利大有席卷全国之势。例如在安达卢西亚,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的得票从1979年的30.2%上升到1982年的63.8%,在格拉那达,从

35.8% 上升到 57.9%。但是在社会党势力还比较薄弱的边远省份卡斯蒂尔和加里西亚，它们得票上升的势头就并不那么猛烈了——例如在拉科鲁尼亚的得票率仅从 17.9% 上升到 38.4%。但只有在巴斯克的心腹地区丰普佐阿和比斯凯以及加泰罗尼亚的部分地区，社会党的得票上升幅度才在 10% 以下。

这些比例的历史性突破——至少对工人政党而言——往往都伴随着它们群众组织的加强和社会力量的扩大。但这样的事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内就没有发生过。它的党员数量自 70 年代末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 1979 年的 10.1 万人减少到 1981 年的 97,000 人，总工会的会员数量也呈同比下滑之势，从 146 万下降至 137.5 万人。²⁰ 社会党所以能在 1979 年到 1982 年之间得票率几乎翻了一倍，主要得归功于西班牙共产党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崩溃。一方面社会党的左面没有有力的对手，另一方面右派正在弗拉加的领导下进行重组，因此，在从中间派到左派的整个广阔政坛上，社会党如人无人之境。一方面，相对于混乱无序的政治气候，社会党能以一种高度的纪律性和自信的形象出现。另一方面，民主中间派联盟没有能够解决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1981 年秋季又竭力促使西班牙加入北约，这些举动使得社会党温和的改革主张更受欢迎。选民参与率的提高——从 1979 年的 67% 提高到 1982 年的 80%，达到了欧洲的平均水平——则是社会党取胜的又一个原因，数以百万计的新选民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党在权力中心的领导地位。

冈萨雷斯把 1982 年 10 月当作他们 1979 年脱离左派激进主义的最终标志没有什么造作——这个转变非常明显，因此在竞选中，苏亚雷斯新成立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民主中心党蛊惑人心地宣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必然要实行国有化和政府干预经济。有人说，1977 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西共和极左团体的总共得票率达 46.3%，比佛朗哥去世后两年的得票



还要少,可事实上,联合左派无论如何也能从资产阶级中心破裂中获取政治利益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西班牙工人社会

表 8.1 1977-1982 年西班牙大选的投票和议席分布

	得票率(%)			议席比例(%)		
	1977	1979	1982	1977	1979	1982
民主中间派联盟	34.8	35.0	6.8	47.1	48.0	3.4
人民同盟	8.4	5.8	26.5	4.6	2.6	30.3
社会民主中心党	—	—	2.9	—	—	0.6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29.4	30.4	48.4	33.7	34.6	57.7
西班牙共产党	9.3	10.7	4.0	5.7	6.6	1.1
西班牙社会党	4.5	—	—	1.1	—	—
一致同盟	3.7	2.6	3.7	3.1	2.3	3.4
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1.7	1.5	1.9	2.3	2.0	2.3
其余党派	8.2	14.0	5.8	2.3	4.0	1.1

资料来源:J. M. 马拉瓦尔(J. M. Maravali)和J. 桑塔马利亚(J. Santamania)根据内务部提供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参见“西班牙政治变迁”,《制度》1985年11月,第97、118页。该文没有能够对其他党派的数字作出明确的分类,这样就隐瞒了一些并不重要的结果,如1977年五个极左团体的3.1%的得票率。

注:人民同盟,由曼努埃尔·法拉格领导;社会民主中心党是苏亚雷斯1982年脱离民主中间派联盟之后建立起来的;一致同盟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最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

党淡化其社会纲领,拒绝向任何政治团体妥协,以此来保证能在1982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进一步促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为中央政权的左派占有者,而不是把左派的势力延伸到新的民间领域中去。但是,由此低估该党为保证自己的胜利果实而提出的各种口号也是不对的。其中的两个口号听起来很有激进主义的味道。第一个口号是呼吁社会上下一齐努力,把失业现象减少一半,第二个是就西班牙是否加入北约问题敦促召开一次全



民公决大会，社会党自己不论是在国会上还是在大街上都对此持反对意见。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最受欢迎的承诺中，它们为其权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准点。

冈萨雷斯政府上台时承诺要在其执政期间创造 80 万个就业机会。这并不是在竞选演讲坛上一时冲动作出的偶然承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指出降低失业率是“未来几年面对西班牙社会的主要挑战”，也是“社会党政策中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项面向公众的行动并没有走过场就匆匆结束了，尽管后来有人宣称西班牙的经济危机在社会党刚刚要着手治理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了。1983 年夏季，格拉——副首相——还在一次采访中自豪地宣称：“不管卡珊德拉斯（Cassandra）说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们，政府一定会履行它的承诺，本届议会新增 80 万个就业机会是毋庸置疑的。”采访继续写道：“格拉指出这很难做到，但‘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将它化为现实’。”²⁹

老练的政客一般都对援引精确的数据持谨慎的态度。事实上，经济政策并不是出自格拉而是米格尔·波伊尔（Miguel Boyer）之手，波伊尔是一个一心要走一条正统的合理化道路以赢得国际金融市场的信任的银行家。1982—1983 年，失业在西欧蔓延，提供就业机会的计划直接与时代潮流相抵触，这对 80 年代整个资本流动趋向构成了挑战。因为有法国社会党的前车之鉴，所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1982 年冬季对形势的估计没有发生错误，它很清楚地看到了西班牙国民经济的弱势地位，因此最终没有逆流而动。民主中间派联盟留下了一堆烂摊子：低增长、高通胀、财政赤字和支付手段的失衡。波伊尔开出的药方是货币紧缩和增加税收，制止经济增长过热，通过剔除效率低下及亏损的企业来重建西班牙工业结构，吸引国外投资以提高技术含量，努力加入欧共体。到此为止，政府已经走上了私有化的道

路,西班牙的跨国公司的相对比重增加了。1983年1月已接近崩溃边缘的庞大的鲁马萨集团,在差不多完全易手给了私人资本之后,立刻就恢复了元气;国家工业研究所(INI)是佛朗哥时代创建的国有公司,此时大幅度地低价出售其从纺织业到旅游业的资本,其中赛特和埃恩兹汽车公司51%的股份,分别被大众和通用汽车公司购下。最大的一笔买卖是西班牙国家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联合创建的西班牙AT微电子公司——新厂房坐落在马德里以北的特雷斯坎托斯,主要生产集成电路,联姻的一方是美国著名的跨国公司,另一方是经营西班牙通讯的私人垄断企业。政府在这次联姻中也有所表示,出资额达初期投资350亿比塞塔的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又计划大规模毁灭伊比利亚半岛上陈旧的核心工业。到1986年初,官方计划将剩余劳力进行转型,这些人当中包括三分之一的钢铁工人,重型电力部门一半的职工,60%的造船工人,五分之一的纺织工人,甚至还有汽车制造厂里的工人。⁶⁹

在传统的银行家眼里,这个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在冈萨雷斯的第一届政府的努力下,西班牙资本主义大有改善。降低通货膨胀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通胀率从1982年的14%降低到了1985年的8%。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约2%的速度递增——接近了同时期欧共体的平均水平。出口有了显著提高,而进口大体不变,于是出现了贸易顺差。另一方面,这些成功是以西班牙工人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执政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非但没有新增80万个就业岗位,反面削减了原有的50万个。曾经在1976年回落到5%的失业率,到1982年冈萨雷斯上台之时达到了17%,到1986年西班牙进入欧共同体时已上升到22%,成为欧共同体国家之首。1983年,约一半以上的16-19岁年轻人、38%的20-24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且他们得不到任何社会救

济，只能以父辈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聊以自慰，或者在地下经济圈里为获得一点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苦苦挣扎，这些人的队伍还在不断地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总工会过去那些支持政府限制工资和实现工业转型的呼声连同工会自身的力量一起很快就减弱了下来。1985年春季，工会主席尼古拉斯·雷东多(Nicolas Redondo)说：“市场经济好像是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我们惟一领教的只是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失业、更大的不公和更进一步的贫困。”⁹⁸雷东多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领导人，曾在70年代中期与冈萨雷斯和格拉一起重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自工人社会党上台以来，他亲眼目睹总工会成员减少了将近一半，只剩下了70万人。政府对于工会的不满情绪当然不能置之不理。1985年春季，波伊尔放松了财政政策，就业市场得到了些许喘息之机。尽管商界把波伊尔称颂为西班牙金融的救世主，但波伊尔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伸手要求获得负责各个开支部门的副首相职位——冈萨雷斯拒绝听从他的摆布撤换格拉，他于是就辞职了。接替他的是负责“转型”的工业部长卡洛斯·索尔查加(Carlos Solchaga)，由此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接下来的一年——1986年——美国的经济繁荣加上西班牙进入欧共体，经济不景气的势头终于逆转过来了，于是开创了一个迅速积累的时代。

社会党的大西洋主义

在首届社会党政府的最后岁月里，政府的主要工作还不是经济，而是安全政策。对于加尔沃-索特罗1981年的失败，不成熟的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表现出了少有的积极，突然商议起西班牙怎样迅速加入北约的政治结构问题，他们的最终目标指向了完全的军事融合。西班牙早就是美国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中的重要一环。但美国与西班牙的协定对于华盛顿来说并不是一

个最佳的结果。1963年和1968年,佛朗哥曾就个别条款的修改问题跟美国作了艰难的讨价还价,希望美国能做出更大的财政和外交让步,而美国则表示,西班牙政府要价太高,已经打破平衡,但美国政府将始终向西班牙政府敞开大门。除此之外,在佛朗哥时代,西班牙的军事力量从组织到装备到部署无不出于内部镇压的考虑——预算过于节俭,军事技术化水平相当低——西班牙身为西欧第五大国,其丰富的兵力资源却对北约的战略规划起不到任何作用。完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当然是西班牙心向往之的,但佛朗哥的孤立主义、荷比卢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独裁制度的反对态度,都阻碍了这一进程。马德里议会民主制的出台终于消除了这层障碍。加入北约成为西班牙的欧洲现代化进一步地摇旗呐喊,这也是商界和主要思潮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但正当加尔沃-索特罗内阁在国会通过了这个议案的时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却发起了一项猛烈的反对运动,参加运动的还有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结果公众的意见也发生了大幅度变化。1979年的民意测验显示,58%的马德里人持无所谓的态度,只有15%的人温和地或强烈地反对,到了1981年9月,反对西班牙加入北约的人数已上升到48%。⁶⁹

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赢得1982年大选之后,就改弦易辙了。冈萨雷斯政府声称,虽然它原则上不支持西班牙加入北约,但也不便轻易收回成命。在国防部长纳尔齐斯·塞拉(Narcis Serra)的领导下,迅速展开了军备扩张,比佛朗哥时代消耗了更多的预算资金,制定了一个庞大的从美国购买新式装备——战斗机、航空母舰、垂直起降喷气战斗机——的计划。到1983年春季,政府正式改变立场。政府发言人说:西班牙的民族利益要求它在北约保卫西方的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曾错误地认为西班牙还有别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西班牙要加入欧共体的前提是必须成为北约的成员。曾经有一次西

班牙工人社会党坚持认为，“把两件事扯在一起是错误的。公开地为这样一个重要决定做交易是缺少政治和外交意识的表现——这是欺骗人民的手段”。⁹⁰而此刻，它却尝试着去说服西班牙人，北约和欧共体是同一个目标和意图，民众希望结束西班牙在欧洲大陆上的孤立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大可以劝说人民相信西班牙加入大西洋同盟的必要性。实际上，这就是菲利普·冈萨雷斯自己的想法——对他来说，北半球资本主义世界里像西班牙这样规模的国家是一定要实现现代化的。“正常化”是其目的，而加入北约则是该目的的人场券。

尽管社会党战略选择发生了变化，但在它承诺就西班牙加入北约问题召开全民公决的时候，还是陷入了僵局。冈萨雷斯和格拉反复权衡了他们的战术，彷徨3年之后终于决定不采取直接的行动，以免导致政府信任危机。尽管公众缺少加入北约的热情，但人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社会党会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强行作出决定。对右派而言，弗拉加的人民同盟咋咋呼呼，比政府本身更西化。对左派而言，西班牙共产党业已分裂，构不成任何政治威胁。在社会党内部，冈萨雷斯宣布，任何意欲参加反对政府立场活动的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如此一来反对意见很快就悄无声息了。随着两方面的主要政党——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基本问题上协调一致，控制了议会80%的席位，在广播和电视的播出时间上也控制着相同的比例，这样看来在投票时说“不”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实际上，西班牙社会党的盘算几乎落空。西班牙普通老百姓对北约的反对态度比预想的要强烈而广泛得多。在里根向中美洲实施相反政策的时候，公众对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认识、对国内战争之后像朗哥政权的第一个盟友的认识不可能很容易改变。西班牙民族传统与这些情绪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即使在佛朗哥反动专制统治下也没有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一个



联合了天主教民主党、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人权团体和极左派的非正式的协作委员会(CEOP)和特别公民论坛,以它们动员全半岛人民的能力给官员们带来了一片混乱。它们发动了大规模的、富有想象力的示威活动和集会,这使得统治阶层从一开始就处于守势。

全民公决前的一个星期,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人主张收回加入北约的决定。为了组织这个计划的实施,政府聚集了它所能调用的一切理论和实践资源。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宣传主要就两大主题进行了反驳,一个认为反对北约的投票缺乏任何可靠的行政管理依据来执行它,并且会使国家陷入混乱;另一个认为,即使行得通,成千上万的人也将会失去工作。政府采用了无情的电视闪电战,首相向选民发出了2800万封信,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报纸和广播广告上投入了300万英镑,冈萨雷斯亲自向全国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毫无阻碍地大谈“和平”这个字眼,最终如愿以偿——许多劳工选民响应社会党的号召,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示忠诚。尽管如此,还是有将近700万的西班牙人——约占全部选民的40%,而且在西班牙最发达地区如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占了多数——投了反对加入北约的票。

全民公决的胜利,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继任第二届政府铺平了道路。在经济上,尽管冈萨雷斯的任期内失业率不断上升,但通货膨胀率还是有所下降,并且经过3年的萧条经济又重新呈上升趋势。经济部现在可以说,正统的手段得到回报了。人们日益相信任何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都只能导致衰退——80年代的西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相当有利。在社会建设方面,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教育和现代化;严格的堕胎法案和教会学校的公共资金制度是最好的说明——社会福利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进。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西班牙工

人社会党可以名正言顺地声明它已经实现了“民主联合”——这个声明无疑得到了选民的响应。如果说新议会秩序最初的总设计师是苏亚雷斯,那么冈萨雷斯——一个很有能力的政治家,虽然不是很有影响的国家建设者——就是这种稳定的议会秩序的受益者。军队回到军营里去是阴谋崩溃的结果,而不是塞拉部长人事政策的结果。但是地方自治运动向全西班牙的扩散没有受到马德里方面的一丝阻拦,这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个突出成就。为了加入欧共体,谈判从1983年开始到1986年大功告成,无疑是一个制度性的转折点。

冈萨雷斯政府赢得它多年寻求的名声还另有一层意义:从行政管理的层面上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统治比他们的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前任要稳定得多,他们在内阁所占据的位置称得上固若金汤,当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相比之下,苏亚雷斯时代的轮盘赌式的人事安排使得即使忠诚的支持者也感到不安。在整个行政管理阶层内部,社会党确保年轻的西班牙职业人士和技术人员能够迅速地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这段时期没有其他西欧国家发生了如此快捷而大范围的权力交接。在这个表面下,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政策本身,而坚持他们对党的名字和记忆的忠诚。这些资产——向中产阶级精英敞开的升迁之门,过去好战的形象——并没有在西班牙社会产生一个有组织的港湾:成员不超过15万,在西欧各大党中,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人数是最少的。但它对于国内反对派的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党向国人展示了一个开明的、有能力的政权形象,与它相对的是仍旧由法拉格领导的右派——天主教的斯特劳斯在他自己边缘化的世袭领地之外引起了普遍怀疑——和局限在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的中间派。1986年秋季,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赢得了第二届政府。它的得票率是44.4%,高居得票26.1%的人民同盟之



上,社会党再次获得议会的绝对多数。

增长狂热

第二届冈萨雷斯政府的气候与第一届明显不同。1987年西班牙经济迅速增长,年增长率达到了5%以上,而且西班牙的3年黄金岁月留下了西欧经济增长最快的记录。加入欧洲共同体引发了雪崩一般的外国投资热潮,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有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府和充足的阳光。1986年到1990年间,价值100亿比塞塔的资金流入西班牙,是前5年外资总量的10倍以上——到后来,直接投资额每年都翻倍增长。同时,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降低了制造成本,但西班牙国内生产总值也同样下降了3.5%。随着索尔查加发起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企业利润直线上升。股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新高,还掺杂着疯狂的金融合并和资产投机——80年代马德里的地价涨了5倍。西班牙城市出现了这个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消费高潮。

然而新景象的背后并不平静。如果说第一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的紧缩政策没有受到社会动乱的干扰,那么,第二届政府的刺激消费政策就不同了。基调之所以改变了,要追溯到1986年反对加入北约的政治动员,那次运动给西班牙留下了持久的影响。运动在学校里大获成功,新入学的学生在1986年末和1987年举行了火药味甚浓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逼迫胡塞·马拉巴尔(José Maravall)——教育部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首席智囊——引咎辞职,但直到一年以后在教师罢工的压力下马拉巴尔才辞职,不过学生运动也确实使政府吃惊不小。与此同时,劳工的联盟阵线也发生了变化。全民公决运动的冲击就足以让人们感受它了。面对大规模的反北约的投票,共产党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于是便通过建立一个选举联盟——“激进联盟”——以便为推行自己更广大的激进政策韬光养晦、保存潜

能,同时它也对曾经组织起运动的各种力量进行了改组。新联盟阵线组建于1986年春季,包括加列格另立门户的人民共产党,一些小型的左派——自由团体、生态和平团体。一年后共产党工会联盟——其领导人是年轻的安东尼·占蒂雷兹(Antomo Gutierrez)——与关系疏远了的西班牙工人总联合会重归于好,同仇敌忾地反对索尔查加的新自由阵线。

结果是工会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它要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兑现向支持它上台的工人许下的承诺,紧缩政策的年代结束后,现在政府必须在经济政策方面实现一次“社会转变”。经过几轮漫长的毫无结果的谈判,联合阵线运动发起了反政府的24小时总罢工。1988年12月14日,全国陷入停顿状态,其规模不仅为西班牙历史之最,也是80年代西欧最大的一次罢工行动。面对经济瘫痪、电视停止播送的形势,冈萨雷斯打算辞职。尽管惊险很快过去了,然而教训却牢牢留在了政府心头。“社会转变”付诸实施了,而且速度很快。在民主中间派联盟执政的1980-1981年,用于健康、退休和失业赔偿的费用呈上升趋势,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在西班牙社会党执政的1983-1988年,这个数字只占0.4%了。现在,面临联合阵线的矛头所指,社会支出增加了20亿比塞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

这个转变适逢其时,因为此时经济繁荣的脚步还未停下。这两个因素足以使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继续执政,在1989年10月的大选上,社会党以微弱优势胜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损失了100万张选票,但是右派也毫无所得。大选中涌现出的黑马是“激进联盟”,现在它的领导者是胡里奥·安圭塔(Julio Anguita),深孚众望的科多巴市长,1988年他取代伊格雷西亚斯成为西共总书记,IU获选票9.2%,把过渡时期被西班牙共产党吸引过去的选民重新争夺了回来。这个成绩足以迫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采取社会最低纲领行动了。1990年联盟实现了它梦寐



以求的目标,他们迫使政府——经过政府多年的抵制——接受了退休金的指数化。另一方面,关于社会党腐败的证据越来越多地曝光,官员们的发财热潮——索尔查加曾吹嘘“要说在短时期内最快最多地发财,在欧洲西班牙是第一,说不定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开始反作用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社会党所获得的非法资金大多来自那些有利害关系的财团,而不是哪个具体的富翁,财团虚设了服务机构,由此间接地把钱汇给社会党,参与腐败事件的并不只局限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一党,右派也染指其中。当阿尔方左·格拉的弟弟胡安·格拉(Juan Guerra)在塞维利亚有不明财路东窗事发后,一时间全国上下齐声讨伐副首相——此公从未取悦于主要的新闻媒体。虽然没有人明确指出格拉自己也和他弟弟一起中饱私囊,但社会舆论还是对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索尔查加也在背后打了不少他的黑枪。为时漫长的格拉职位危机标志着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个转折点。幸运的是冈萨雷斯和格拉之间有着牢固、伴随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度过了风雨飘摇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友谊,冈萨雷斯善于接受公众的吁请,格拉则具有高超的组织才能,两者结合起来使得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立于不败之地。1990年秋季,冈萨雷斯宣布:一旦格拉辞职,他也会辞职。

当然,副首相也从未取信于西班牙商界和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对他的不信任倒不是因为他掌权之后,和冈萨雷斯在宏观经济或社会党的安全战略上政见不同。在角色分配方面,格拉负责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塑造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不是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他对待党内左派和偏激的不同意见显得毫不手软,在强迫改变对加入北约的态度过程中,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和社会党统治机器的运作尽管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在治理国家的政府中心他则显得不那么称职,因为政府的要务是解放政策,最大限度地摆脱——不管多么任重道远——

社会党好战分子和支持者带来的各种制约，以及工人组织造成的压力。财政部的改革计划时不时遭到他的反对，理由是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例如在对待波伊尔的退休金改革问题上，有鉴于此，波伊尔和索尔查加不约而同地想将他免职，免得他处处给他们掣肘。在职位上，格拉担任副首相并实际操控了社会党的大权——党政大权集于一身相当罕见，使他成为社会-民主政体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在个人气质上，他比他的大多数同僚都更为“思辩”，并在组织和为之融资的 2000 计划——一项炒得很热的、旨在实现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战略思想的现代化的规划，这项工程调动了党内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千个组织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和讨论——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这项工程以一份措辞平和、热烈赞颂“社会市场”的报告收场，它同时也提醒政府注意人民对福利和充分就业的需要，这些已经被社会党遗忘已久的内容在 1990 年该党的第 32 届党代会上得到了采纳。不管结果如何，讨论的过程还是反映出社会党的形象和它超负荷工作机器的形象，社会党不愧为政府之外一个相对独立的活生生实体。这样，格拉失去代表顺应潮流思想的人的信任就不足为怪了。冈萨雷斯曾经高度信赖过他，直到最后一刻还力图保住他的位置。但是 1991 年 1 月，格拉——和法国的舍韦内芒（Chevènement）一样，只不过不那么公开而已——反对参加海湾战争。这一次矛盾终于爆发到了顶点：当西班牙军舰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冈萨雷斯将格拉解职。他的离去被普遍看作是社会党更新换代的一个分水岭。

与此同时，索尔查加正努力要给增长过热的经济降温。西班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才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货币兑换率相当高昂，信贷受到严格的约束。到 1991 年，投资额直线下降，一天就丧失了 1000 个工作岗位。经济衰退再次逼近的时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已经不能重现 80 年代初期的辉煌了：通货膨胀率

居高不下,预算满是赤字,贸易逆差不断加剧。在法国,为了和统一后的德国马克保持一致而采取的高利率,导致了就业率的低下并严重干扰了出口,而对于投机行为又没有能够给予任何打击。1992年秋季,经过代价巨大而无益的抵抗,“坚挺”的比塞塔在大面积混乱的欧洲货币中终于崩溃了。1993年初,渡过了数月不断加剧的危机的社会党已感到岌岌可危,连菲利普·冈萨雷斯能否呆在台上都是个问题。政府决定在6月举行大选,此时,关于社会党危机的传闻已是路人皆知的了。

到目前为止,右派已经重整旗鼓,以求一搏。人民联盟在1986年的大选中落败之后,法拉格辞去了主席职务。可是他的继承者——来自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政治新手——有他的缺点却没有他的长处,1989年初人民联盟与自由党和天主教民主党合并为人民党,法拉格再度出山。这一次,他的“皇太子”胡塞·玛丽娅·阿兹娜(José Maria Aznar),一位年轻而冷酷的税务检察官更有力地领导了人民党,她率领新成立的联盟参加了1989年10月的大选,并在1990年春就任主席。在阿兹娜的领导下,人民党脱离了过去佛朗哥分子的形象,认真地为自己树立起了负责任的、温和的新形象,并在西班牙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当中广泛地培植新生力量。在1993年6月的运动中,阿兹娜以一个组织良好的政党主席身份出现,背后有大批的群众追随,西班牙的主要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她。与此相反,冈萨雷斯则显得计穷力竭,风光不再,两次电视辩论都是第一回合就遭惨败。在西班牙政治的传统个人化氛围中,如今也模仿美国的作法装点得气派堂皇,一个政党的成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党领袖的个人表演。但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袖很快重振雄风,在电视和群众集会上完美地完成了竞选任务,他以政治的紧迫感告诫人们要提防西班牙右翼的历史性危险,但在以后的公开演讲中人们就再也听不到这些言论了。

选举结果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第四次连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赢得了 38.7% 的选票，在吸收消化了巴斯克左派以后，巴斯克地区独立的社会党小团体的全部得票比 1989 年少了 1 个百分点。但此举使他们在一条更高的路线上得到了近 100 万张新选票，从任何标准看，这都是一项突出的成就。人民党把已经销声匿迹的社会民主中心党的选民全都收编了过来，得票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到了将近 35%。人们原本都以为激进联盟会抢夺社会党的不少得票，但实际上他们的得票只少量地增加到了 9.6%。这些结果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议会中再次从非比例代表制中获益，由于有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默认的支持，立法机关的大多数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另一届冈萨雷斯政府。

表 8.2 1986-1993 年西班牙大选的投票和议席分布

	得票率(%)			议席比例(%)		
	1986	1989	1993	1986	1989	1993
人民同盟/人民党	26.2	25.8	34.8	105	106	141
社会民主中心党	9.3	7.9	—	19	14	—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44.3	39.6	38.7	184	175	159
IU	4.7	9.1	9.6	7	17	18
一致同盟	5.0	5.0	4.9	18	18	17
巴斯克民族主义党	1.5	1.2	1.2	6	5	5
其余党派	9.0	11.4	10.8	11	15	10

左派的活力

自 1982 选举获胜以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连续 12 年执政，很明显打破了选举引力规律。用什么来解释社会党这一空前的

成功呢？1993年的大选实际已经显出了三大主要原因。第一，国内多数基本力量支持左派。西班牙右派则由于佛朗哥时代流传下的祸根而遭世人诟病，这祸根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苏亚雷斯向民主的过渡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这意味着当时的政权始终与西班牙过去的保守主义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意大利、70年代中期的葡萄牙那样。疑惑的阴云就这样徘徊在数百万西班牙人的心头，他们响应了冈萨雷斯大选活动最后一个星期发出的号召，对集权气氛怀着极为戒备的心理。另一方面，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资产阶级政治势力本来是应该最强盛的，然而右派偏偏在这两个地方脆弱不堪——过去的15年两地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声势越来越大，使得右派势力不断削弱。使冈萨雷斯重新认可蒙克罗协定的、与普霍尔的一致同盟的协议就是这个结果最具体的体现。这个方面的意义十分重大——资产阶级力量的分裂，正是由于这样，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霸权才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非常相似。换个角度看，北欧国家也有脱胎于共产主义传统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基调更加激进。这些原因促使了左派能在大选中赢得半数以上的选票，而不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需要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见鬼！”一位人民党领导人在6月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还在左派手里控制着！”⁶⁰其实，从1982年以来，“左派联合”政府不但完全可行，而且还会深得社会党最狂热支持者的欢迎，这远比冈萨雷斯对银行家的理解受欢迎。当然，这样的联合也会产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在西班牙社会将出现一个更激进的改变——它接近于激进联盟提供的另一种前景，但缺乏具体细节。

如果不考虑左派的联盟，那么和中间派的同盟就根本无从谈起，部分原因在于菲利普·冈萨雷斯本人的地位。在西欧，除了戴高乐之外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像他那样彻底地主宰国家的命

运。冈萨雷斯所以能拥有这样的权力，是因为他有人所难及的多种长处——社交能力、权谋机变和管理能力，他集敏捷的反应和沉着稳重的气质于一身也是广为人知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西班牙宪法规定，首相（或总统，如他在西班牙语里就是这样为人所知的）所拥有的特权远远大于西欧其他任何国家政府首脑的权力。冈萨雷斯集法国总统的多数大权和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属于总理的权力于一身。他通过一个由他任命的内阁，实现对国家的日常管理，其内阁成员必须既不是国会议员也不是他的党员。虽然他由议会任命，却无须亲自出席议会会议，只有一项包含了替补人选的“建设性动议”才能将他免职。⁹³在这样的体制下，“总统”的权限自然大得多，他可以做一切总统制政体下才可以做的事，而不必像其他国家的首相那样向议会的大多数负责。国会完全变成了一台留声机，内阁成了密码检索本。部长们已经没有什么自主权，也很少有机会集体觐见冈萨雷斯本人。格拉曾经不无尖刻地说：“部长会议从不讨论政治；政治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的事。”⁹⁴自格拉离职以后，后继者更加大权旁落。社会党的领导层很清楚他们在选举上主要仰仗冈萨雷斯，他们不愿意甚至根本没有想过要控制政府的行为；而冈萨雷斯从未遇到过真正的政策挑战，同时他克制自己不去招惹党内统治机器跟他对立。这种倾向于魅力型领导人的潮流在党内四处蔓延，他的地位因之越抬越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使更大的权力集中在冈萨雷斯手上，他的视线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最初支持他的选民。对于他的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假如我们像左派和右派那样认为冈萨雷斯在西班牙简单地仿效撒切尔主义，那么，这无疑是错误的。假如联合运动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彻底地保留自己的激进作法和自信的表现，那就不仅是因为它在多数工人群体中间有相对安全可靠地位，而且因为它和首相及议会的多数党一样继续秉承了共同的传



统,冈萨雷斯正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即使在尖锐的对立中,他也能协调好与工会领导人的工作关系,这是威尔逊(Wilson)和卡拉汉(Callaghan)所远不能及的。这也不是一个个人风格问题。实质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领导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退却,以及怎么样来保住社会基层对本党的好感。

现在我们来论述西班牙社会党得以幸存的第三个原因。1992年,还在大选之前的第9个月,社会党为本党的初次胜利举行了1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10年来的决算表是什么样子呢?西班牙是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生活水准随之提高,这对执政党十分有利。经济相对繁荣的结果是分配极不公正。这种情况与意大利如出一辙,财政收益显示雇员的纳税数额大大高于雇主,而作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而且,他们的购买力的提高程度只相当于欧共体平均水平的一半。1982年失业率为16.2%,1992年又回到了17.6%,失业者多为青年人和妇女,失业者的队伍还在急剧扩大:他们当中得到救济的人不足一半。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总就业率还是低于1972年,但还是创造了约130万个工作岗位。^④三分之一的新工作岗位是在政府办公室里拟定的,政府机关规模几乎增长了四分之一(主要是因为地区行政机构的扩充),这是一股社会党领导人无不哀叹他们改革失败的力量。

在社会建设方面,社会党最引以为豪的资本——用格拉的话说——是实现了教育、卫生和退休金事业的普及。^⑤事实上教育事业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教育的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翻了一倍,西班牙成为西欧世俗化程度最突出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20-24岁年龄段的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受教育者人数上升,但教育质量却下降了。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新增加了500万,但是医疗资源的增长并没有跟上——西班牙每1000个居民拥有的病床数只相当于法国的一半。退休金制度的

普及,给人民带来了无可否认的利益: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大约有200万西班牙人平生第一次领到了退休金,他们的购买力有力地回击了工会以通货膨胀为由对社会党进行的抨击,退休金制度是社会党1993年大选的一张王牌,当时冈萨雷斯提醒公众:右派党上台之后极有可能取消该制度。80年代的后5年尽管处于“政权交接时期”,但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水库——的投资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增长幅度超过了社会开支的提高。⁶⁸人们再也没有理由说社会党没有在西班牙创造出一个福利国家的雏形。人们只能说社会党所作的一切并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但凡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开明的右派政党执政,这些都一样能实现。但是,既然西班牙不存在这样的右派政党,社会党自称赢得了历史性信任的说法理所当然地为公众接受了。不过社会党的选民并没有该党理想化的想法。1992年末,社会党的选民被问及是否相信社会党对腐败指控的否认说法时,80%的人表示他们不信。更令人吃惊的是,当被问及社会党执政的10年时间里哪个社会阶层获益最多时,40%的社会党支持者的回答是“富人”,只有16%的人认为是工人和社会底层的群众——不少于55%以上的人认为正是他们受苦难最深重。⁶⁹由是观之,忠诚于社会党的选民并非都是头脑糊涂的人。

前 景

冈萨雷斯的第四届政府诞生于经济衰退期,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右派。国会对加泰罗尼亚的容忍自有其道理,因此这样的态度不会遭到首相的抵制。新内阁部长中有7个以上的“独立分子”,他们都是非社会党的技术官僚。索尔查加本人就是从财政部调到国会去的,他在国会中是社会党代表的领袖,目的要减少格拉在党内的影响。在社会党的整个运作机器中,格拉的信徒早就靠边站了,尽管这些人在南部他们的传统堡垒里依然

很有势力。为了应付即将来到的事实,党内已作了清除异己的工作。此刻的政府正与西班牙社会中的工人组织的各种联盟发生碰撞,因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使工人组织“灵活化”,以使得西班牙的资本主义更具有竞争力。它意在取消始于佛朗哥时代的保护性政策,为的是使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到新的产业领域中去,简化对劳动力的再安排和再分级程序,并且降低以后3年的实际工资。这场新的攻势——或者用共产党领导人胡里奥·安圭塔的话说,叫做“阶级选择”——引发了罢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一时间政府和它最初选民之间的关系显得前所未有的紧张。如果说新的路线继续过去10年的基本作法,把西班牙政府的政策调整为适应国际市场的必要措施,但有所不同的是,作这个调整的外部条件已急转直下向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80年代后期,马德里成为欧洲热门集资最集中的大都市,一时食利者如潮水般蜂拥而至,投机热潮的代价是巨额的公共赤字和外部赢利的不断下降——1985年还略有盈余,1989年则亏损114亿,1991年亏损159亿,1992年亏损240亿。^⑤过去的一年里比塞塔三次贬值,在同一时间段里,政府的姿态从最严格的亲欧洲货币单位的辞令,转变为对一切趋同共存雄心的放弃,好像一大群的人被召集去拉一条船,结果却让它沉没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人们对失业的恐惧从未减弱,社会党因此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当失业率又飚升到20%以上——差不多3倍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即使有刺激经济的强大动力——并不只是最简单的降息手段——出现,80年代末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否重新启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国外投资逐渐枯竭,德国公司的目光转向了东方,新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很难抵消传统产业部门的萎缩所带来的损失,而后者在欧洲市场上的崩溃还在加速;^⑥建设陷入衰退的低潮;金融服务过去创造过

很多新的工作岗位，如今也面临着非常不确定的时代。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只有大幅度地降低生活标准和安全标准，指望这样能给国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在此背景之下，人民党仍将他们的地位确立为继承者的身份。该党领导人走的第一步棋是切断过去与法拉格矛盾的关系：阿兹娜公开接受了第二共和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完全和谐一致——并使人民党同欧洲政坛上的无民党保持合作关系。她是一个能力出众的政客，手段胜过丁加利西亚的战马，她进入了议会讨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议题，对一些涉及到特殊问题甚至是扩大联盟的特别举措，也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她也有年龄的优势，影子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仅为50岁，而她自己才刚满40岁。尽管社会民主中心党作为右派的一个竞争对手被消灭了，但人民党还是未能进入新的工人阶级领地，他们在选举中仍旧没有必胜的把握；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他们削减税收、私有化和扶植中小企业的纲领也未必能打出一番天地。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上，他们相对更小心一些，比社会党显得民族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在这层意义上，他们和西班牙雇主联合会显得更为一致，胜过他们和对社会党管理经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的大银行的默契。大选以来，社会党轻而易举地与一致同盟达成了谅解，说明对于资产阶级中右派而言，在社会党的统治下作出另一个合理可行的选择是不现实的。但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野心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菲利普·冈萨雷斯和普霍尔之间的沟通也异乎寻常地困难。尽管普霍尔在对加泰罗尼亚的经济和政治战略中着重强调了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性，但他们和人民党的加泰罗尼亚中央集权主义者还是难以达成谅解。

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像过去预见得那样久远），人民党愤怒的呼声仍清晰可闻。西班牙也许真的是“左派的国家”——当然还不至于成为“社会党的国家”。意大利提供的榜

样告诉人们,现在冷战的限制已经消除,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变化起来是极其迅速的。从数字上看,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党组织有所加强,⁶⁹从社会上看,它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并确保它能继续执政。1994年春,金融丑闻的风暴席卷了第四届冈萨雷斯政府机关,中箭落马的有国家财政和安全部门,索尔查加本人则被无情地扫地出门,这一意外足以威胁社会党的执政地位。于是,普霍尔的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对政府的杠杆作用就随之提高了。如果冈萨雷斯政府还像以往那样——种种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这样做——高居于它的核心选民之上,那么,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遭遇就会是它的前车之鉴。



注 释

- ① 关于这种差别的更广泛的讨论,可以参见佩里·安德森:“欧洲之光”,《英语问题》,沃索、伦敦 1992 年版,第 307-325 页。
- ② 沃尔夫冈·梅克尔:“社会民主党的终结?”《西欧权力来源和统治政策的对比研究》,法兰克福 1993 年版。梅克尔早些时候还撰文研究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
- ③ 关于比较数据,可以参见安德瑞·鲍尔索的权威性论文:“西欧的经济滞胀”,《新左派评论》总第 201 期,1993 年 9、10 月号,第 62 页。
- ④ 《狱中札记》第三卷,都灵 1975 年版,第 1630 页。
- ⑤ 关于克瑞对工党上次大选前夜的处境的分析,参见其鞭辟入里的论文:“工党力量的变化、工人阶级的衰落和工党的选举”,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主编:《后工业社会中的工党》,牛津 1992 年版。在《工联主义和英国的特质》(沃索,伦敦 1993 年版)一书中,爱略特对该党直至 70 年代末的发展史进行了言辞尖锐的回顾,其中还包括对它从此之后的发展的一个纵览。
- ⑥ 关于比较范式,请参见“欧洲之光”,《英语问题》,第 340-345 页。
- ⑦ 对这一转变最好的讨论可以在格拉西摩斯·莫斯科纳斯(Gerassimos Moschonas)的《1945 年以后的社会民主党》(巴黎 1994 年版)中找到,参见该书第 37-52、75-83 页。这一杰出的作品是由一个在克里特岛工作的希腊学者撰述的,虽然它的篇幅较小,但在质量和涉及的领域上却可以和梅克尔的研究匹敌。这两部在相互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作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莫斯科纳斯无意于分析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政策,而这一点正是梅克尔的书的核心,但它却较之后者给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组织结构以更切近的关注。

- ⑧ 历史地看,英国在 1976-1990 年间所发生的工资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参见阿曼德·戈斯林、斯蒂文·马钦和科斯特斯·梅厄:“工资怎么了?”,财政研究所,1994 年 6 月,第 4 页。它比 80 年代的美国要高,但低于绝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
- ⑨ 莫斯科纳斯著作的主题之一就是:1973 年以后,一般而言,较之劳动阶级在规模上的减少,社会民主党在劳动阶级内部失去了更多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例外,它抓住了无产阶级的选票,但却失去了更多白领和公共服务部门的选民。
- ⑩ 关于这些资料,请参见格奥恩·泰保恩关于西欧战后社会文化变革问题极有权威的全景论述:“1950-1992 年的现代欧洲社会”,佩里·安德森等主编:《欧洲叙事》第一卷,图林 1993 年版,第 467-468 页。
- ⑪ 在欧洲社会主义政府对改革国家的财政体系——不论它们是多么不公正或不完善——的极端抵触中,这当然是一个因素。梅克尔对它们的开支计划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他认为没有比保持对它的信用更慷慨的了。他在“社会民主党的终结?”(第 209-301 页)中严厉批评了它们的失败。
- ⑫ 莫斯科纳斯:《社会民主党 1945 年以后的历程》,第 151 页。
- ⑬ 参见其著名的论文“社会民主党的不幸”,《水星》1987 年 10 月号,第 1022 页。这篇文章的靶子之一就是梅克尔指引的方向。
- ⑭ 参见斯蒂文·卢克斯:“左派是什么?本质社会主义及其纠正的冲动”,《泰晤士文学副刊》1992 年 3 月 27 日。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压缩文本,其评论有力,但有些浮泛。
- ⑮ 他暗示,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将可能朝着斯堪的纳维亚的标准,即 50% 的“非法”生育发展。
- ⑯ 在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工作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 ⑰ 降低工资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保证普遍就业权力的办法,在英国,它被鼓吹为降低失业水平的一种方式,具体办法就是工资减半。而在 80 年代,没有人谈论过这一点。参见米歇尔·拉斯廷:《保卫多元社会主义》,伦敦 1985 年版,第 147-172 页。
- ⑱ 安德瑞·格奥兹一直是这种战略最雄辩的鼓吹者,具体参见《经济理性批判》,沃索、伦敦 1989 年版,第 183-215 页。

- ⑲ 参见《关于基本收入的争论》(菲力普·冯·帕瑞尤斯主编,沃索,伦敦1992年版)中的那些有差异的论文,这个文集是在洛瓦恩召开的一个国际讨论会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其中包括安德瑞·格奥兹的一篇批判这一理念的界限的文章(第178-184页)。
- ⑳ 尼凯·哈特对这个问题做了最有说服力的一般讨论,参见“生育:现代社会女性压迫的实质”,《论点》,1991-1992年冬春季号。
- ㉑ 关于儿童教育之有说服力的评论,参见帕特里夏·休伊特和佩内洛普·里奇:《社会正义、儿童和家庭》,IPPK,伦敦1994年版,第24-26页。
- ㉒ 这是保罗·奥尔巴克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所讨论的主题,《新左派评论》总第192期,1992年3-4月号,第31-33页。
- ㉓ 关于德国模式的敏锐描述,参见大卫·古德哈特:《重塑德国社会市场》,IPPK,伦敦1994年版,第17-32页;在雅克斯·德若兹的《劳工管理、契约和资本市场》(牛津1989年版)中,LMF的理念得到了很好的探索。
- ㉔ 琼·若马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沃索,伦敦1994年版)是近来最重要的作品。
- ㉕ 与之相比,在宪章之后的激进批判从安冬尼·巴尼特的值得注意的论文“帝国主义国家”(《权力与王冠》,伦敦1994年版,这是一卷“在英国君主制基础上制定宪法”讨论会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论文集)中得到最精确的估价。
- ㉖ 对有关导致1991年大选结果的选举趋势和政治发展的概要评论,可以参见H·伯格斯托姆的“十字路口的瑞典政治和政党体制”和D·塞恩斯伯里的“转变中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西欧政治》第14卷第3期,1991年。
- ㉗ 参见《晨报》1993年5月22日和6月9日。
- ㉘ 关于这一分析,可以参见S.E.奥尔森:《瑞典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卢恩德1993年,第2版。
- ㉙ 关于这一部分所论及的绝大部分主题的进一步细节和参考书目,请参见乔纳斯·庞图森:《社会民主党的极限:瑞典的投资政策》,伊萨卡1992年版。



- ⑳ L·莱文:《论计划经济》,斯德哥尔摩 1967 年版,同时参见 N. 乌格:《1912-1934 年的社会民主党和失业》,卢恩德 1976 年版。
- ㉑ 涉及到 20 世纪 30 年代确保了社会民主党人对政府的巩固控制的这一重新联盟的文献,其范围十分广泛。如果需要特别广泛的分析,那么,可以参见 G. 泰保恩:“杰出的社会民主党”,《失业史研究》1984 年第 27-28 卷。
- ㉒ “消费政治”和“生产政治”的区别引自 J. 斯蒂文:《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伦敦 1979 年版。
- ㉓ 参见 D. 哈比斯:“瑞典一致协议下的工资压缩”,工会经济研究所,斯德哥尔摩 1990 年版。与工资一致政策有关的政治斗争,可以参见 A. 海德尼尔斯:《工会的组织发展》,斯德哥尔摩 1976 年版;A. 马丁:“瑞典的工会”,P. 古尔维奇等编:《工会和经济危机》,伦敦 1984 年版;以及 P. 斯维森:《公平参与:瑞典和西德的工会、工资和政治》,伊萨卡 1989 年版。
- ㉔ G. 瑞恩:“政治思想的演变”,总工会编:《工资政策与一致》,斯德哥尔摩 1980 年版,第 46 页。
- ㉕ A. 马丁:“瑞典:工业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的策略”,D. 加森编:《工业中的工人自我管理》,纽约 1977 年版,和 B. 西蒙森:《工人权力和经济政策》,斯德哥尔摩 1988 年版。
- ㉖ R. 梅德勒:《雇员投资基金》(伦敦 1978 年版)和 E. 阿萨德的《总工会与雇佣工人基金》(斯德哥尔摩 1978 年版)对雇佣工人基金的起源问题提供了详细的说明。
- ㉗ 根据梅德勒委员会的计算,在它的建议中,如果一家公司的年平均利润率是 10%,那么,雇佣工人基金只要花费 35 年的时间就可以获得 49% 的股本。
- ㉘ 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编:《雇佣工人基金和资本》,斯德哥尔摩 1978 年版,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编:《工人运动和雇佣工人基金》,斯德哥尔摩 1981 年版。
- ㉙ E. 阿萨德:《围绕雇佣工人基金展开的斗争》,斯德哥尔摩 1985 年版。
- ㉚ 莱文:《意识形态和战略》,斯德哥尔摩 1985 年版,第 356 页。
- ㉛ V. 伯格斯托姆:“党的纲领与经济政策”,K. 密斯盖尔德、K. 默林和 K.

阿马克编:《创造社会民主: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世纪》,帕克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页。

④② J. 爱尔斯特:“合理政策的可能性”,《欧洲社会学档案》1987年第28卷。

④③ M. 格利尔姆:《瑞典人民和雇佣工人基金》,卢恩德1988年版,第232页,同时参见S. O. 汉森:《瑞典雇主联合会的政策》,斯德哥尔摩1984年版。

④④ 参见表1.1和格利尔姆:《瑞典人民和雇佣工人基金》,第82-93页。

④⑤ 爱尔斯特:“合理政策的可能性”,《欧洲社会学档案》1987年第28卷。

④⑥ 1979年,在公共部门的雇员中,雇佣工人基金的支持者比反对者多1%,而到了1982年,反对者则比支持者多31%。在私营部门的雇员中,1979年,反对者比支持者多10%,1982年则多33%。具体参见格利尔姆:《瑞典人民和雇佣工人基金》,第179页。

④⑦ 参见H. 伯格斯托姆:《突如其来的开始:从在野到执政》,斯德哥尔摩1987年版,以及费尔特的政治自传《所有这些日子……》,斯德哥尔摩1991年版。在“政治和1991年的政权变动”(《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1卷)中,瓦尔特·考皮也强调了学院派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声称:学院派经济学家在财政部政策制定中所占比例,大约从1976年选举失败之前的15%上升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50%。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更一般的理念和政策,请参见P. 瓦尔特的“‘令人不安的衰退’: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福利国家的危机”,《政府及其反对派》1985年第20卷第3期;H. 哈克罗和H. 迈德森:《瑞典的政治和政策》第二章,费城1987年版;A. 马了:“瑞典:重建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配领域”,哈佛欧洲研究中心1987年论文。

④⑧ R. 普雷姆福斯:“‘瑞典模式’和公共部门的改革”,《西欧政治》1991年第14卷第3期。

④⑨ 参见考皮:“政治和1991年的政权变动”。税收改革的普遍后果一直是一个容易引发争吵的问题。如果正像它的支持者声称的那样,在收入再分配问题上它真的并没有倒退,那么我们只能说先前的税收体制还不够先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改革是选择性国家干预政策的退却。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税收政策,请参见斯泰摩:“社会民主

注
释



义与社会主义”,《政治与社会》,1988年第16卷第4期“美国、瑞典和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税收政策”,《世界政治》,1989年第41卷第4期。

- ⑤0 瑞典产业部:《服务行业的发展》,斯德哥尔摩1990年版。
- ⑤1 I. 爱瑞匈:“第三条道路:联合或革新”,《经济探讨》,1989年第17卷第3期。瑞典生产力增长与它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对比关系是瑞典学术界中一个争论激烈的话题。与传统经济学家的见解相反,考皮认为,相对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国家,瑞典生产力增长的滞后完全是一个即将开始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过程的自然结果,参见考皮:“瑞典跟不上了吗?”,《经济探讨》1990年第18卷。爱瑞匈的观点并不一定与考皮的观点冲突,因为强调工资成本控制的新自由主义供应经济学政策不一定适用于瑞典。
- ⑤2 H. T. 索德斯托姆主编:《历史转折时期的瑞典》,斯德哥尔摩1991年版,第115-118页。
- ⑤3 对20世纪80年代公共部门的收入政策及其工资议价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请参见N. 爱尔文德:《瑞典模式》,斯德哥尔摩1988年版;K. 爱兰:“压力下的瑞典集体议价”,《英国工业关系杂志》,1989年第27期;P. 斯维森:“工会政策、福利国家和超阶级的冲突”,M. 古尔登和J. 庞图森编:《为了改变而交易:欧洲和北美的工会政策》,伊萨卡1992年版;凯杰尔伯格:“瑞典模式能够幸存吗?”,A. 费曼和R. 哈曼编:《新欧洲的工业关系》,牛津1992年版。
- ⑤4 对于这一批判,梅德勒清楚地指明了其中的基本要素,参见梅德勒:“十字路口的瑞典劳工运动”,《政治经济学研究》1989年第28卷。
- ⑤5 格利尔姆:《瑞典人民和雇佣工人基金》,第237页。
- ⑤6 由工程企业的老板们发动的旨在取消工资集中议价体制的斗争,起初受到了瑞典雇主联合会其他利益集团的抵制。关于大财团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的进攻,请参见A. 马丁:“工资议价和瑞典的政治”,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1991年论文;V. 佩斯多夫:“瑞典模式的崩溃和作为主要政治行动者的大财团的复活”,斯德哥尔摩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991年论文;H. 德吉尔:《瑞典模式的沉浮》,切尔切斯特1992年版;J. 庞图森和P. 斯维森:“雇主为什么反对瑞典模式?”,《失业史研究》1993年第53-54卷。

- ⑤7 E. G. 奥尔森：“工人的流动和资本的力量”，《政治经济学研究》1991 年第 34 卷；G. 埃斯宾-安德森和 R. 弗里德里：“西欧经济政策制定中的阶级合作”，《政治权力和社会理论》1982 年第 3 卷。
- ⑤8 P. 斯维森：“社会民主主义再考察”，《世界政治》1991 年第 43 卷第 4 期，“从瑞典模式的开端看它的终结”，柏林 1992 年调查报告。
- ⑤9 我个人对瑞典工业结构长期发展趋势的看法，极大地受益于 B. 卡尔松等主编的《技术与工业结构》，斯德哥尔摩 1979 年版。
- ⑥0 仔细说来，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过沃尔沃的政治作用，或者一般地说，还没有人研究过瑞典不同的工业部门的政治态度与它们的生产组织的关系问题。
- ⑥1 参见马霍：“从工资一致到工作一致”，《经济与工业民主》1991 年第 12 卷第 3 期。
- ⑥2 进一步的观点请参见庞图森：《瑞典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伊萨卡 1988 年版。关于瑞典劳工运动富有特色的阶级联合主义，请参见 G. 罗斯：“对于工会来说什么是进步的？”《理论与社会》1881 年第 10 卷第 5 期，和 G. 哈金斯：“政治联合主义及其企业主题”，《经济和工业民主》1985 年第 6 卷第 3 期。
- ⑥3 瑞典产业部：《服务行业的发展》，第 105 页。工程企业 1987 年的海外雇佣占其雇佣总量的 68%。
- ⑥4 依照卡尔松的研究（《技术与工业结构》，第 69 页），进口货物中瑞典工程企业出口的比重从 1975 年的 24% 上升到了 1980 年的 40%。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依旧在继续。
- ⑥5 卡尔松：《技术与工业结构》，第 40 页。
- ⑥6 L·爱瑞匈：“瑞典模式哪里出问题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研究所 1985 年论文。
- ⑥7 同上书。爱瑞匈指出，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综合水平要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高，但却并没有产生像后者那样的生产力成果。
- ⑥8 庞图森：“沃尔沃和英国雷兰的工会、新技术和工作的重新设计”，M. 古尔登和 J. 庞图森编：《为了改变而交易》。
- ⑥9 关于地区性的工资交易和工资支付问题，请参见 N. 爱尔温德：《地方工资市场》，斯德哥尔摩 1992 年版。

- ⑩ T. 尼尔森:《工人或官员》,卢恩德 1988 年版。同时参见斯科特·拉希:“新社团主义的终结”,《英国工业关系杂志》,1985 年第 23 卷第 2 期。
- ⑪ 参见布鲁林:《从瑞典模式到经济协作体》,卢恩德 1989 年版,以及布鲁林和尼尔森:“从共同体到管理社团主义”,《经济学与工业民主》1991 年第 12 卷第 3 期。关于工厂与工业关系,参见凯杰尔伯格:“瑞典模式能够幸存吗?”,A. 费曼和 R. 哈曼编:《新欧洲的工业关系》,第 121 - 136 页。
- ⑫ 工业复兴的修辞学的误入歧途是值得注意的,参见伊拉姆和鲍尔杰森:“瑞典的工厂改革和弹性生产的稳固化”,杰索普等主编:《弹性政治》,爱尔德肖特 1991 年版。
- ⑬ 瑞典冶金工人工会:《好工作的平均劳动政策》,斯德哥尔摩 1989 年版,第 67 - 73 页。
- ⑭ 参见斯瓦尔福斯:“瑞典的福利政策”,《英国社会学杂志》1991 年第 42 卷第 4 期,“政权和布平等的态度”,T. P. 伯杰和 S. E. 奥尔森·豪特主编:《新欧洲的斯堪的纳维亚》,奥斯勒 1993 年版。
- ⑮ 用议会选举的话来说,政府与 1991 年兴起的具有右翼平民主义色彩的新民主党达成了许多交易,但此举并没有鼓舞人民对于交换市场的信心。政府保卫通货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为了获得议会支持,它不得不进一步依赖新民主党。关于 1992 年的危机协议和比尔特政府引进的改革措施,参见奥尔森:《瑞典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第 358 - 372 页。关于失业保险和工会的密度,参见罗特斯泰因:“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和劳动阶级的力量”,斯泰摩等主编:《政治建构》,纽约 1992 年版。
- ⑯ 参见 F. 卡斯特:《社会的社会民主想象》,伦敦 1978 年版,埃斯宾-安德森:《反对市场的政治》,普林斯顿 1985 年版。
- ⑰ 在《晨报》1993 年 5 月 22 日的民意测验中,44% 具有明确政党倾向的选择支持资产阶级政党集团,而 1991 年大选时,这个数字是 52.9%; 19.5% 的选民支持保守党,而 1991 年大选时的数字是 21.9%。
- ⑱ G. 泰保恩:“民主史上的独特篇章”,默林和阿马克主编:《创造社会民主》。
- ⑲ 仔细说来,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国内政策,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深入全面

的学院派分析。默林等人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关于社会民主党 1948 - 1978 年间代表大会的情况,请参见 J. 皮尔斯:《党代会和政府政策》,卢恩德 1986 年版。

- ⑧⑩ 关于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历史关系和组织纽带,参见阿马克:“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马丁:“工资议价和瑞典政治”。
- ⑧⑪ 关于我们对挪威和北欧国家的一般性论述,请参见拉斯·穆塞特:“论调控理论对北欧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研究的影响”,《调控通信》1993 年 2 月第 6 期。
- ⑧⑫ G. 埃斯宾-安德森和 W. 考皮:“从贫乏的慰藉到制度化的福利国家: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政策的发展”,R. 爱瑞匈主编:《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阿芒克 1987 年版。
- ⑧⑬ 参见 P. S. 安德森和 J. 阿克霍姆:“斯堪的纳维亚”,A. 波尔托主编:《欧洲经济:增长与危机》,牛津 1982 年版。
- ⑧⑭ T. J. 哈尼希 E. 兰格:“机遇还是危机?”,《工人运动史研究》1979 年第 2 期。
- ⑧⑮ 本特·索福斯·川诺伊:《国家、银行和 1950 - 1988 年的信贷政策》,奥斯陆大学政治系 1993 年未刊论文。
- ⑧⑯ 对这个问题的比较研究,请参见拉斯·穆塞特:“20 世纪 70 和 20 世纪 80 年代北欧的经济政策”,《国际组织》,1987 年第 21 卷第 3 期。
- ⑧⑰ 孔特·海德:“挪威工党内部矛盾和内聚力的双重衰落”,D. 贝尔和 E. 肖主编:《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冲突和内聚力》,伦敦 1994 年版。
- ⑧⑱ B. 古斯塔文森和 G. 亨尼厄斯:《工厂改革的新模式:挪威的个案研究》,奥斯陆 1981 年版。
- ⑧⑲ 威廉姆·M. 拉菲提:“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形成”,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研讨会论文,奥斯陆 1990 年 6 月 21 日。拉菲提同时还把许多与公共雇佣、对金融部门的监管相关的政策视为强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战略表达。而我们认为,其中有些主要还是对更加困难的经济管理问题的调整,它们导致经济战略的不连贯。
- ⑧⑳ H. I. 马特埃:《1850 - 1950 年的挪威信贷机制》,奥斯陆 1992 年研究报告。
- ㉑ 挪威公共调查委员会:《石油租金政策》,1980 年 4 月;挪威银行:《信贷

市场的分类结构》，奥斯陆 1979 年。

- ⑨② 关于两届非社会主义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深刻探讨，请参见法格伯格等：“挪威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衰落”，《新左派评论》1990 年总第 181 期，“结构转变和经济政策：压力下的挪威模式”，《挪威地理学杂志》1992 年第 46 卷。
- ⑨③ 1988 - 1989 年间，国有银行所占份额更是跌至 18%，参见马特埃：《1850 - 1950 年的挪威信贷机制》，表 2E。
- ⑨④ H. 托普：“1989 年的劳动力结构”，《劳动力市场研究》1989 年，第 26 页。
- ⑨⑤ G. 容纳：“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政策”，《政治科学研究》1984 年第 25 卷第 2 期。
- ⑨⑥ T. 山德温和 K. 施密斯：“研制开发和经济结构：一个比较的视野”，挪威计算中心，奥斯陆 1993 年。
- ⑨⑦ H. 斯凯伊：“挪威妇女不平衡的发展”，《新左派评论》1991 年总 187 期。
- ⑨⑧ G. 埃斯宾-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重天地》，剑桥 1991 年版。
- ⑨⑨ A. 雷诺：“亲善妇女的福利国家？以瑞典和挪威为例”，J. 莱维斯主编：《欧洲的妇女、工作和家庭》，伦敦 1993 年版，第 61 页、第 64 页以下。
- ⑩⑩ 同上书，第 68 页。
- ⑩⑪ R. 盖耶：“合并与共同体的矛盾：一个统一欧洲中的英国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美国政治学会 1992 年论文。
- ⑩⑫ 1982 年 8 月《发言人评论》和 1982 年 8 月 19 日《政坛》。它们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理查德·艾斯特斯进行分析的。
- ⑩⑬ 斯文特·阿吉·汉森：《丹麦的早期工业化》，哥本哈根 1970 年版，第 11 页。
- ⑩⑭ 汉斯-诺贝特·拉姆：《丹麦的社会民主党和农业工人：1870 - 1900》，奥登斯 1983 年版；亨宁·格雷勒：《1871 - 1903 年的丹麦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 1978 年版。
- ⑩⑮ 欧温德·奥斯特鲁德的《斯堪的那维亚的农业结构和农民政策》（奥斯陆 1978 年版）一书中，讨论了农业结构和政策之间的关系。
- ⑩⑯ W. M. 拉弗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人运动》，奥斯陆

1971年版。书中讨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发展。

- ⑩ 乌尔苏拉·施米德勒:《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一个新左派政党》,法兰克福1969年版。
- ⑪ 阶级结构的变化资料取自 *Lavindkomstkommissionens Betaenkning* 1982 (低收入委员会的报告)第70、71和336页,和约根·格尔·安德森的《丹麦的社会构成》,阿尔胡斯1979年版,第98页以下。
- ⑫ 汉斯·埃里克·阿弗伦德·弗兰德森:《1840-1978年的丹麦阶级阵营和阶级斗争》,哥本哈根1980年版,第173页以下。
- ⑬ 整个60年代没有出现过严肃的工人论辩:亨利克·摩肯伯格和安德斯·罗斯达尔主编: *Arbejdsloshedsundersogelserne* 3 1982年哥本哈根出版,第288页以下,弗兰德森:《1840-1978年的丹麦阶级阵营和阶级斗争》,第425页。
- ⑭ A. M. 卡斯特鲁普和 I. 拉尔克森: *Rindalismen. En studie i kulturmonstre, social forandring og kultursammenhold*, 哥本哈根1979年版。
- ⑮ 1992年自由党-保守党政府对这条法令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大大限制了学生的权利。
- ⑯ 弗兰德森:《1840-1978年的丹麦阶级阵营和阶级斗争》,第316页以下;卡伦·耶斯佩森,“1969-1970年丹麦的罢工”,《社会主义政治》第5期,1976年12月,第3-41页。
- ⑰ 古纳·拉斯姆森: *Det smalborgelige opror*, 哥本哈根1977年版;约翰内斯·安德森: *Fremdskriftsbevægelsen, arbejderklassen og venstreflojen*, 哥本哈根1977年版。
- ⑱ 弗兰德森:《1840-1978年的丹麦阶级阵营和阶级斗争》,第345页。
- ⑲ 格尔·安德森:《丹麦的社会构成》,第157页以下。
- ⑳ 爱娃·科林斯基:《西德的政党、反对党和社会》,伦敦1984年版,第20页。
- ㉑ 奥托·克希海姆:“西欧政党制度的变迁”,J. L. 帕罗姆巴拉和 M. 威纳主编:《政党和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6年版。
- ㉒ 彼特·洛舍:“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终结了吗?”,《新社会/法兰克福分册》1988年第5期,第453-463页。
- ㉓ 汉斯-迪特·克林格曼:“西德”,I. 克鲁威和 D. 丹佛主编:《西方民主

国家的选举变迁》，伦敦 1985 年版，第 453 - 463 页。

- ⑫① 杰拉尔德·布伦塔尔：《西德社会民主党人（1969 - 1982 年）：一个执政党的传略》，大石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9 页。
- ⑫② F. M. 罗梅尔：《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派别》，奥普拉登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67 页。
- ⑫③ 斯蒂文·派杰特和托尼·伯克特：“西德的政党和大选”，《寻求一个新的稳定秩序》，伦敦 1986 年版，第 267 页。
- ⑫④ 绿党：《联邦纲领》，1980 年。
- ⑫⑤ 《绿叶》1981 年第四卷，第 18 页。
- ⑫⑥ 科林斯基：“党派”，《反对派和社会》，第 310 页。
- ⑫⑦ 详见 W. 帕特森：“绿党的昨天和明天”，P. 梅克尔主编：《联邦德国四十年》，纽约 1989 年版，第 340 - 366 页。
- ⑫⑧ 戈登·施密斯：“变化中的德国政党制度：1987 年大选的后果”，《政府与反对派》1987 年第 22 期，第 137 页。
- ⑫⑨ INFAS，《新闻报导》1987 年 1 月 26 日。
- ⑫⑩ 沃夫冈·吉波斯基和马克斯·卡塞：“1987 年 1 月 25 日联邦议院选举初状”，《政治与当代史》1986 年第 48 卷，第 5 页。
- ⑫⑪ 见斯蒂文·派杰特：“1982 - 1986 年在野的社会民主党”，《西欧政治》1987 年第 10 期，第 351 - 352 页。
- ⑫⑫ 同上书，第 165 - 166 页。
- ⑫⑬ 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政治》第 7 期，1985 年 7 月。
- ⑫⑭ 社会民主党主席团，《新基本纲领草案》，波恩 1986 年，第 7 页和 25 页。
- ⑫⑮ 《法兰克福评论》，1989 年 1 月 6 日。
- ⑫⑯ 彼特·格洛茨，《经济周刊》1988 年 4 月 29 日。
- ⑫⑰ 盖尔哈德·施罗德，《经济周刊》1988 年 4 月 29 日。
- ⑫⑱ 彼特·洛舍：“德国政党的演变”，《工会月刊》1992 年 9 月第 9 期，第 535 页；斯蒂文·西尔维亚：“松散成对的无政府状态：左派的分裂”，斯蒂文·派杰特主编：《新德国的党派和政党系统》，达特茅斯 1993 年版，第 175 页。
- ⑫⑲ 有关论点见安德烈·马可维茨：“西德 68 年分子眼中的 89 事件”，《德国政坛》1992 年 4 月 1 日，第 14 - 17 页，赫伯特·凯彻尔特：“1990 年

德国大选和民族统一”,《西欧政治》1991年10月,第131页。

- ⑭ W. 帕特森:“对外政策和安全”,梅克尔主编:《联邦德国四十年》,第192-210页。
- ⑮ H. 克莱纳特:《绿党沉浮》,波恩1992年版。
- ⑯ 参见彼特·洛舍和弗朗茨·瓦尔特:《社会民主党——阶级党、人民党、份额党:社会民主党从魏玛共和国到德国统一的发展史》,达姆斯达特1992年版,第38页。
- ⑰ 同上书,第380-386页。
- ⑱ 维纳·培尔格:“一个疲软的冬天”,《当代报》1993年2月5日,第6页。
- ⑲ W. 威格“社会民主党的两代主席团”,T. 雷夫等主编:《德国政治阶级:考验中的德国精英》,波恩1992年版,第211-213页。
- ⑳ 西尔维亚:“松散的加倍的无政府状态”,派杰特主编:《党派和政党制度》,第183页。
- ㉑ 参阅阿伦德·里普哈特的重要研究文献《民主:21个国家的多数主义和一致政府模式》,纽黑文1984年版,该文将联合王国定性为多数主义民主的范式。但是用欧洲的标准来看,英国的政府模式是绝无仅有的,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引进了威斯敏斯特体系的很多基本特征,英国和它们并没有什么共同点。
- ㉒ 这些数据和表5.5中的数据来源于一个与民主和竞争有关的资料汇编,该资料是我们与日内瓦大学的斯蒂万诺·巴托里尼共同搜集的。
- ㉓ 参见迈克尔·加拉夫尔、迈克尔·拉沃和彼特·迈尔:《西欧的代议制政府》,纽约1992年版,第75-78页。更翔实的资料参见埃米尔·克希纳主编的《西欧自由党》,剑桥1988年版。
- ㉔ 关于此节内容翔实的论述见斯坦·洛坎的《公民、选举、政党:发展步骤的比较研究方法》,奥斯陆1970年,第72-168页。彼特·J.卡斯坦恩的《世界市场的小国家》也论述了该主题,此书出版于1985年,伊萨克,详见第150-156页。
- ㉕ 见斯蒂万诺·巴托里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左派:选举发展的规模、构成和模式》,载于汉斯·戴尔德勒和彼特·迈尔编纂的《西欧政党制度:连续性和变化》,伦敦1983年,第139-176页。

- ⑫ 有趣的是,英国政府在1920年对爱尔兰管理法中采取了比例代表的单个可转换投票的形式(STV),作为爱尔兰自由政府的宪法的一部分,意在鼓舞爱尔兰新教少数派的忠诚,时至1973年,又在北爱尔兰地区的郡级选举方面引进了同样的制度。这样,作为少数派代表当选的一种方法的比例制原则就被威斯敏斯特政府接受下来了,但它从来没有被认为是与泛英选举环境相适应的。
- ⑬ 有关此节的充分论述见佩里·安德森的“当今危机的起源”,《新左派评论》总第23期,1964年1-2月,第28-83页,这一文章在他最近出版的《英国问题》(伦敦1992年版)中被重印,第15-47页。
- ⑭ 有关此节更广泛的论述参见罗宾·布莱克布恩的“威斯敏斯特的废墟”,《新左派评论》总第191期,1992年,第5-35页,和佩里·安德森的《英国问题》(伦敦1992年版),第302-53页。
- ⑮ 有关论述见斯蒂万诺·巴托里尼和彼特·迈尔的《身份、竞争和选举的可行性:1885-1985年欧洲选民的稳定性》,剑桥1990年版。
- ⑯ 有关法国的最新数字,参见C.伊斯玛:《第五共和国的政党政治》,巴黎1989年版,第163页;有关其他国家的数据参见里查德·S.卡茨:“1960-1990年欧洲民主党的党员”,《欧洲政治研究》1992年第3期,总第22期,第329-345页。
- ⑰ 该报告于1991年7月由《卫报》作为《卫报研究》第三卷出版。
- ⑱ 举一个例子说,报告第10页提出,现代法国的选举制度是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才建立起来的,即使是如今的多数原则制度也是在第五共和国成立之后才采用的;再如,报告第59页中关于意大利保留强制投票制度的部分又犯了常规的错误;又如,报告第36-37页评价选举制度对政府稳定性的影响部分中,援引的资料是在1975年出版的比较数据,这部分资料甚至未能准确地指出不同选举政体下各届政府的执政期限的相对长短。
- ⑲ 近期英语世界最全面的研究包括维农·波格达诺和大卫·巴特勒编辑的《民主政体和选举》(剑桥1993年版);安德鲁·迈克拉伦·卡斯台尔的《西欧选举制度简史》(伦敦1980年版);波纳德·格洛夫曼和阿伦德·里杰法特编辑的《选举法及其政治影响》(纽约1986年版);阿伦德·里杰法特和波纳德·格洛夫曼编辑的《选择一种选举制度:问

题与抉择》,(纽约 1984 年版)、雷恩·塔格佩拉和马修·S.舒加特的《席位和选票:选举制度的效果和决定因素》(纽黑文 1989 年版)。对英国政体的主要抉择的评论可以参见维农·波格达诺的《什么是比例代表制?》(牛津 1984 年版),该文论述明晰,可读性强。

⑩ 参见阿伦德·里杰法特:“1945-1985 年选举法的政治影响”;“对雷的古典研究的评论、再分析和更新”,《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990 年第 2 期,总第 84 期,第 481-496 页。

⑪ 参见乔万尼·萨托里:“选举制度的影响:错误的法律还是错误的方法?”格罗夫曼和里杰法特:《选举法及其政治影响》,第 43-68 页,文中最简单地论述了选举制度所赖以推行的政治和公共机构环境的重要性。

⑫ 例如,迈克·加拉夫尔的“爱尔兰共和国选举制度的政治影响”一文就对此有综合全面的分析,《选举研究》1986 年第 3 期,总第 5 期,第 253-275 页。

⑬ 例如,就工党和保守党的选民而言,自由民主党很可能是“最不被看好的选择”,至少在英国,假如在两者择一的投票制度下,工党和保守党的其中之一必须要在竞选中被淘汰出去,那么自由民主党很可能得到受欢迎程度第二的选票,那么改革的结果就会让自由民主党大大受益。特别要指出自由民主党会在众多选区中占据第二的位子。当然,假如选票不可以转让,那么投票者只能选出惟一的一位候选者,在单独成员的选区中当选的候选人就很可能得票不占绝对多数,这样就给选举改革保留了可以改进的余地。

⑭ 此术语用于 S. 卡茨的一篇文章的较为全面分析的语境中,文章标题是“政党政府:一种理性的概念”,弗朗西斯·G. 卡塞尔和鲁道夫·维尔德曼主编:《政党政府的幻想和现实》,柏林 1986 年版,第 31-37 页。

⑮ 参见 S. 卡茨“党内偏好投票制”一文的评述,格洛夫曼和里杰法特:《选举法及其政治影响》,第 85-103 页。

⑯ 参见萨托利:《选举制度的影响》。

⑰ 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为什么要在法国 1986 年立法机构的选举上敦促引进比例制度,原因就在于要让国民阵线在议会中赢得代表权,以减少传统右派党的席位份额,从而避免政府内部右派势力过于强大这一可能。

注
释



- ①⑧ 参见 S. 卡茨和彼特·迈尔：“改变政党组织的模式：卡特尔政党的出现”，林姆里克大学 1992 年 ECPR 联合会议论文。
- ①⑨ 具体数字请参见安德烈·高龙：《第五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史》第一卷，巴黎 1983 年版，让·弗拉斯蒂：《光辉灿烂的三十年代》，巴黎 1979 年版。
- ①⑩ 在这一时期，法国从过去殖民地的进口从 1949 年的 25% 下降到 1973 年的 6%，从发达工业国家的进口从 55% 增长到 75%，出口从 47% 增长到 75%。
- ①⑪ 关于对这些技术官僚的作用的讨论，参见理查德·库伊斯尔：《现代法国的资本主义和政府》，剑桥 1981 年版。
- ①⑫ 在《戴高乐》第三卷第二部分中，拉古杜尔极好地论述了戴高乐的地缘政治主张。
- ①⑬ 同上，第 21-25 章。
- ①⑭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实际工资的增长都相当缓慢，参见高龙：《第五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史》第一卷，第 31 页。
- ①⑮ 关于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资料，参见 H. 波蒂埃：《这就是法国社会主义》，巴黎 1980 年版，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章；丹尼尔·里古：《1900 年以来的法国社会主义史》，巴黎 1961 年版；R. 奎利奥特：《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权力运行》，巴黎 1972 年版。
- ①⑯ 有大量文献研究了冷战时代的法国共产党。参见菲利普·罗布瑞克斯：《法国共产党党秘史》第二卷，巴黎 1968 年版，第 4-6 章；A. 克瑞盖：《法国共产党：人民的素描》，巴黎 1968 年版；欧文·华尔：《斯大林时代的法国共产主义》，威斯特普特 1983 年。两份对照鲜明的官方文件是索瑞森：《法国共产党党史》（巴黎 1964 年版）第 12-13 章，和鲍迪伦等著《法国共产党：发展历程及其问题》（巴黎 1981 年版）中由马特利撰写的第七章。
- ①⑰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 A. 唐纽：《脆弱的联盟》，蒙特利尔 1984 年版。
- ①⑱ 这些文章后以《法国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巴黎 1961 年版）为题再版。
- ①⑲ 节育被抨击为资本家和美国针对工人阶级的马尔萨斯阴谋，参见：J. 维曼瑞希：“世界和平和禁止核武器或节育：反对向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倒退”，《国内妇女问题研究》，巴黎 1962 年版。

- ⑩ 托雷兹把法国国内支持“意大利”思想的人视作可疑的赫鲁晓夫分子，参见：P. 罗比尤斯：《我们这一代共产主义者》，巴黎 1977 年版。关于学生清洗运动，参见 H. 哈曼和 P. 罗特曼：《这一代人》第一卷，巴黎 1987 年版，这部分内容把 1968 年左派激进分子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和这些事件联系起来。
- ⑪ 密特朗早期生涯的最好研究文献是弗朗茨-奥立佛·吉斯伯特的《弗朗西斯·密特朗或历史的尝试》，巴黎 1977 年版。
- ⑫ 关于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的作用，参见乔治·罗斯：《法国的工人和共产党》，伯克莱 1982 年版，第七章。
- ⑬ 拉古杜尔的《戴高乐》第 27 章讨论了将军的最后 300 天；也可参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的真相》，巴黎 1982 年版。
- ⑭ 曾经想成为法国一个看似有道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党员的德洛尔，60 年代供职于法国计划和投资部门和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工会。1968 年以后，他的命运和左派戴高乐主义者拴在了一起，之后他曾任沙邦-戴尔马的顾问，参见米勒斯：《雅各·德洛尔》，巴黎 1985 年版。
- ⑮ 尽管得到了工资增长指数的保证，但总工会还是拒绝接受公众部门的收入政策，并劝说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仿效。最后，保守派在 1972 年的立法选举中击败了沙邦-戴尔马。
- ⑯ 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变化，参见 J. 德劳内：《19 世纪末期以来法国的工薪阶层和剩余价值》，巴黎 1984 年版，特别是第 221 页以后。关于工业争端，参见罗伯特·鲍埃尔：《1968 - 1982 年的劳工、资本、积累和危机》，马克·凯瑟曼和盖伊·格卢编：《法国工人运动》，伦敦，1984 年版。
- ⑰ 有关当时的危机警告，参见斯托弗里斯：《巨大的工业威胁》第三章，巴黎 1978 年版，和 A. 科塔：《法国和世界帝国主义》第二部分第一章，巴黎 1978 年版。
- ⑱ 有大量文献涉及到了这段历史。其中有 R. W. 约翰逊的《法国左派的长征》（伦敦 1982 年版），戴维·贝尔和拜龙·克利德尔的《法国的社会党》（牛津 1984 年版）第三章，雅克·凯格特的《社会党》（巴黎 1983 年版）。有关秘密政治，参见 A. 杜·罗伊和 R. 施奈德：《浪漫的玫瑰》，巴黎 1982 年版。
- ⑲ 这阶段最好的史料参见弗朗索瓦·安克的《共产党人的抉择》（巴黎

1981年版),关于这时期的文献及其讨论,参见法国共产党:《法兰西的社会主义》,巴黎1977年版,以及让·法福、弗朗索瓦·安克和吕西安·塞弗:《共产主义和国家》,巴黎1977年版。

- ①⑩ 让·费边的《同志之间的战争》(巴黎1985年版)登载了苏共中央1977年3月给法国领导人的一封信,苏共在信中威胁说,如果“反苏行为”继续进行的话,这就会颠覆马歇的领导地位,甚至导致法国共产党的分裂。这样的高压激怒了中央委员会中的强硬派。
- ①⑪ 让·费边在《同志之间的战争》中援引法国共产党的一位要人的文件,声称莫斯科对左派联盟的破裂负完全的责任,而事实很清楚,苏联领导人对此是很反感的。对法国共产党的转向的合理解释只能是这样的:国内局势的逻辑使党内反对力量增强了。
- ①⑫ 在简·延森和乔治·罗斯的《内幕真情:危机中一个法国共产主义小组》(伯克利1985年版)中,我们曾经以人种史的风格讨论了这段时期该党的“基层”在巴黎所发生的一切。
- ①⑬ 关于总工会,参见罗斯:《工人和共产党》第十章,乔治·罗斯:“总工会”,克塞尔曼和格鲁克斯:《法国工人运动》。关于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参见哈曼和罗特曼:《第二左派》,R.默瑞奥克斯和G.格奥克斯:《法国劳工民主联合会》,巴黎1989年版。
- ①⑭ 密特朗的纲领誓词大部分摘自1980年的《社会党规划》,该文为社会党的极左团体撰写。有关该组织在抵抗自由运动期间的源头,参见让-比埃尔·瑞奥克斯:《第四共和国》《热情和必需》,巴黎1980年版。
- ①⑮ 阿兰·里皮茨在《勇敢的停滞》(巴黎1984年版)中对这一场危机进行了最好的总体分析。更加专业的计量经济学文献参见A.方特纽和P.穆特:《直面危机的左派》,巴黎1985年版,P.霍尔:《统治经济学》,伦敦1987年版。
- ①⑯ 参见CERC:《法国税收状况的近期发展》,巴黎1984年版。
- ①⑰ 这些部长包括即将未来的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和皮埃尔·贝雷戈瓦,顾问让·里布是总统的一个密友。
- ①⑱ 对这一非常时期政府内部矛盾的最好评论是菲利普·博夏的《战争的第二次兴起》(巴黎1986年版),同样题材的资料也见诸皮耶尔·法弗耶和米歇尔·马丁-罗兰的《密特朗的十年》(巴黎1990年版)第一卷

第四部分。

- ①⑨ 丹尼尔·辛格尔：《社会主义的末日到了吗？》，纽约1988年版，书中提供了左派批评政府政策的有关资料，其猛烈程度是右派从没有过的。
- ②⑩ 有关奥瑞克斯法案的原初立法意图参见让·奥瑞克斯的《辛勤劳动者的政权》（巴黎1981年版），具体的注释参见D.盖勒：“奥瑞克斯法案：法国工业关系的改革？”霍华德·马金和文森特·莱特主编：《密特朗1981-1984年任职期间的经济政策和决策》，纽约1985年版，第205-251页。其后，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打破了社团主义者的组织，建立了如雷诺这样的国有公司。
- ③⑪ 关于中央集权专制的具体细节，参见Y.梅妮和C.克瑞默恩在乔治·罗斯编著的《密特朗试验》中所写的文章。
- ④⑫ 到80年代，天主教会还是中产阶级的父母经常光顾的安全港湾，在那里，他们希望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公共学校的恶劣影响，因此这里还算是个大的庇护所。教师联合会的影响和社会党内部的世俗传统把该党推入了一个恶性的政治冲突。关于这个问题的透彻分析，参见安东尼·普鲁斯特：“教育大漩涡”，罗斯主编：《密特朗试验》。
- ⑤⑬ 1985年密特朗已经意识到社会党将在下一年的大选上面临困难，为此，他向那些自己可以依赖的政治盟友赋以特权，这其中特别是意大利裔大亨希尔维奥·贝鲁斯科尼。和意大利的克拉克西一样，他也是因为依赖从美国的电视连续剧中看到和借用来的愚蠢的政治游戏而声名狼藉的。1986年右派重新上台之后，它也在继续这种犬儒主义。
- ⑥⑭ 我们当中有人曾分析过该党的状况，乔治·罗斯：“党的衰落和政党体系的改变，法国和法国共产党”，《比较政治》1992年秋季号。
- ⑦⑮ 关于这些趋势的分析，参见克里斯·豪威尔：《劳工管制》，普林斯顿1992年版，《工会问题》，巴黎1988年版；关于工会和左派直到1986年的更多的资料，参见乔治·罗斯：“密特朗时代的法国社会：从左派到其他”，罗斯主编：《密特朗试验》。
- ⑧⑯ 此节参见乔治·罗斯：“所有的萨特都到哪里去了？”，詹姆斯·霍利菲尔德和乔治·罗斯主编：《新法国探索》，纽约1991年版。
- ⑨⑰ 对这段历史的最精彩评论是P.鲍赫特的《疯狂上演两次的危机》（巴黎1988年版），帕维尔和马丁·罗兰的《密特朗的十年》（巴黎1992年版）

第二卷第八部分也有所评论。

- ⑳ 1984年6月,在密特朗担任主席的欧洲议会封丹白露峰会上,德洛尔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当时,在讨论解决80年代早期业已瘫痪了的欧共体问题,特别是英国争吵和西班牙、葡萄牙的成员资格问题上,法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 ㉑ 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密特朗和罗卡尔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让-保罗·列乔瓦和让-皮耶尔·贝蒂埃:《水火不容》,巴黎1990年版,罗伯特·施奈德:《沉默的对峙》,巴黎1992年版。
- ㉒ 塞日·鲍加:《法国社会及贫困阶层》,巴黎1993年版。
- ㉓ 参见乔治·罗斯:“马斯特里赫特之后”,《世界政治杂志》1992年夏季号。
- ㉔ 有关这段历史时期的具体的社会和政治资料,保罗·金斯伯格的《意大利当代史》(伦敦1990年版)中有极有见地的评述,其中关于中左派的部分特别出色。
- ㉕ 西德尼·塔洛:《民主和混乱:1965-1975年意大利的抗议活动和政治主张》,纽约1989年版,罗伯特·朗姆列:《紧急状态:1968-1978年意大利动乱的成因》,伦敦1990年版,两书都包含这时期学生运动和工人暴乱的引人入胜的第一手资料。塔洛的周期理论建立在完备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朗姆列呈现出了后现代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框架,但是两个人谁也未能为他们所生动描写的现象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 ㉖ 胡安娜·巴干:《解放运动面面观:1945年以来的意大利工人运动》,纽约1984年版,此书提供了关于菲亚特工厂的很有价值的社会历史材料。巴干是支持新左派的美国记者,原先笃信马克思主义,后倒向女权主义,但是严格地说,她的书不能算是历史著作。
- ㉗ 乔瓦尼·孔蒂尼:“都灵的南部移民和阶级冲突”,1984年11月伦敦现代意大利研究协会年会论文。
- ㉘ 参见乔瓦尼·孔蒂尼:“《战后意大利的政策、法律和劳资谈判》”,斯蒂文·托利戴和乔纳森·蔡特林主编:《劳资谈判和国家》,剑桥1985年版,第208页。
- ㉙ 关于宣言团体的起源和演变的最好的报导可以参见鲁西安娜·卡斯特琳娜的采访,题为“宣言和意大利共产主义”,《新左派评论》1985年

3-4月,总第151期。

- ⑳ 根据《基辛当代档案》(伦敦1984年版,第327-355页)引用的内务部原始数据,1969年到1982年3月期间共有432名黑色恐怖分子被监禁,而被逮捕的红色恐怖分子达1414名。资料没有显示黑色恐怖分子被监禁的时间长短,有没有经过审判,这些人最终是越狱的还是获释的。
- ㉑ 盖利名单上列出的963人当中,有30个将军、8位海军上将、两个反情报组织的首脑、情报工作的便衣协调人、卡里亚里、萨勒尔诺、帕雷尔摩和特雷维索的警察头目、布雷西亚和帕尔马的省长、《晚邮报》的主编,还有43名议会代表,保罗·维尔金森:《新法西斯》,伦敦1981年版,第138-139页。维尔金森暗示:P-2和喷泉广场事件有牵连,并且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和黑色恐怖分子有长期的联系。
- ㉒ 参见鲁普特·孔瓦尔:《魔鬼的银行家:罗伯特·卡尔维的生平和时代》,伦敦1984年版。
- ㉓ 朱迪特·卡布和佩斯·阿鲁姆针对战后的南部情况,特别是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写过两篇调查文章。两位作者根据各自搜集的材料,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南部左翼力量甚嚣尘上,并带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民主党的情绪。详见朱迪特·卡布:《南部意大利的职位、权力和贫困》,剑桥1982年版;佩斯·阿鲁姆:《战后那不勒斯的政策和社会》,剑桥1973年版。
- ㉔ 朱迪特·阿德勒·海尔曼:《女性的旅程:五个意大利城市的女权主义》,牛津1987年版,这是关于70年代和80年代意大利妇女运动的惟一的一本长篇英文著作。莱斯列·卡德威尔的《意大利家庭问题:妇女、政治和法律改革》(巴京斯托克1991年版),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离婚和堕胎问题。胡安娜·巴尔干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视点》,代表了在一个独立的文本里希望融合阶级和性别问题的最认真的尝试意图。
- ㉕ 帕奥罗·弗洛雷·达凯和弗兰科·莫雷蒂的“意大利危机的矛盾”(《新左派评论》总第96期,1976年3-4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最早的分析。该文完成于两次大选之间。加拿大学者格兰特·阿莫埃特为这段时期使用了葛兰西的术语:《意大利共产党:人民阵线的战略危机》,伦敦1981年版,第207页。阿莫埃特的写作视角和意共内部的因格拉

奥左派很接近,综合了很多地方事件的研究结论,但作为一部描写一个政党历史的著作,它过多地局限在党内事件,缺乏宏观视野。

- ⑳ 关于红色旅见保罗·福尔龙:“意大利的恐怖主义政治:反响、反应和保守主义”,朱利叶·洛杰主编:《恐怖主义:对国家的挑战》,牛津1981年版。在汗牛充栋的意大利文文献资料中,最重要的两份可能是乔治奥·加利的《武装党的历史:1968-1982年》(米兰1986年版)和乔治奥·博卡的《“我们恐怖主义者:12年武装斗争史自述》(米兰1985年版)。
- ㉑ 参见萨维里奥·阿斯普列阿:《永别了,克拉克西》,利沃尔诺1984年版。该书的第97-98页提供了1979-1980年社会党党员的部分资料,这些资料主观色彩比较浓。阿斯普列阿本人是社会党一个党内小团体的成员,后来脱离了社会党。他的叙述以新闻报道的格调记录了他们和克拉克西决裂的经历。1993年阿斯普列阿再版了他的这本书,在书的导言中,他指出:时间证明他对克拉克西的看法是多么正确;而那些描写过80年代意大利社会党的英国或美国的学者,却很少有人能够不加任何改动地再版他们的著述,那些做过改动的作者多少有些难以启齿的尴尬。
- ㉒ 这些数据来源于利塔那·阿尔梅尼和维奇·德·马尔奇主编的《叫我们同志!关于共产党重建的情况》(罗马1991年版),本书收录了“重组”最初崛起的三个月里,许多普通的积极分子所披露的一些评论。塞尔乔·加拉维尼的《一个共产党员所思考的问题:意大利共产党如何分裂、如何重建?》(罗马1991年版)从理性的角度对产生分裂的政治差异的原因作出了合理解释。意大利群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执著并没有引起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关注,他们的目光始终紧紧地注视着左派民主党。
- ㉓ 路圭·科特斯:《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重组”的文件和讲话》(米兰1991年版),书中描绘了新组织对那些离开意共多年又从未加入过无产阶级民主党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
- ㉔ 这里有两份关于最近危机的有用报告,它们某种程度上是大量的事实陈述。一份是佩斯·阿鲁姆的“死亡预言的记录:意大利第一共和国”,瑞丁大学政治系1993年1月论文(N.12),另一份是斯蒂文·海

尔曼的“意大利的左派和政党制度的解体”，《社会党档案(1993年)》，伦敦1993年版，第190-210页。

- ⑳ 伊沃·迪亚芒蒂：《同盟：政治主题的地理、历史、社会学》，罗马1993年版。这是一本对运动进行了最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佩斯·阿鲁姆和伊沃·迪亚芒蒂：“维尼蒂亚的自治联盟”，卡尔·列维主编：《意大利的地方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牛津1994年版，迪亚芒蒂在他的一篇非专业文章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迪亚芒蒂在联盟和第三意大利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具体特征之间找到了一条多数评论家不能企及的联系线索，关于这个问题的翔实文献参见安娜·岑托·布尔：“伦巴第工业区的政治：以北方联盟取代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人》1993年第13期。她详细说明了伦巴第工业集中化地区和1995年大选中把最高选票投给联盟的那些人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她解释说，这种模式部分脱胎于对小商人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联盟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另一部分脱胎于这些地区政治亚文化的种族主义苗头。由雷娜托·曼海姆尔编著的《伦巴联盟》（米兰1991年版）是一卷包含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资料集。
- ㉑ 美国和苏格兰的辩护者将联盟的种族主义最小化甚至完全否认，参见爱德华·卢特沃克：“意大利的旧政体”，《伦敦书刊评论》1993年8月19日，及约瑟夫·法雷尔：“伦巴第/北方联盟：保守革命？”，列维主编：《意大利的地方主义》。但是该书收录的另一篇文献，安娜·岑托·布尔的“种族渊源、种族主义和北方联盟”则从该党1992年选举宣言及其对选民的调查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关于联盟主要理论家奇安佛朗科·米格里奥的种族主义情绪，参见1993年月1日《卫报》对他的采访。
- ㉒ 斯蒂文·冈德尔和西蒙·派克尔主编：《1989-1993年的意大利民主革命》（1994年即将出版）。该书指出，意大利革命这个提法是有误导作用的，然而它还是广泛传播于信息相对灵通的评论者当中。
- ㉓ 关于60年代末的形势分析，参见理查德·索勒尔：“新西班牙”，《新左派评论》1969年11-12月，总第58期。
- ㉔ 胡塞·马利亚·马拉巴尔：《转型时期的政治》，马德里1985年版，第68页。

- ⑳ “缓冲地带”这个概念是智利分析家卡洛斯·乌内乌斯在《西班牙民主转变时期的民主中间派联盟》(马德里 1985 年版)中精心提出的,其中第 27 - 32 页的评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研究文献。
- ㉑ 参见雷蒙·加尔和胡安·帕布罗·福斯:《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伦敦 1981 年版,第 226 - 267 页,两位作者都对上述极左思想持怀疑态度。
- ㉒ 参见 R. 谢列瓦:《1879 - 1983 年的西班牙民主历程》,巴塞罗那 1983 年版,第 263 页。
- ㉓ L. 塞布瑞恩与冈萨雷斯的访谈,《国家杂志》1979 年 6 月 14 日,转引自 A. G. 圣特斯玛斯:“西班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发展”,《制度》1985 年 11 月,第 67 页。
- ㉔ 关于这一点汉内尤斯在对西班牙的基督教民主运动问题的深入讨论中,分析得十分透彻,此书已绝版,第 175 - 190 页。20 世纪的西班牙并没有人民党的对应党派。
- ㉕ 有关这个问题的生动的对照描写,参见罗纳德·弗拉泽尔:“处在边缘的西班牙”,《新左派评论》总第 96 期,1976 年 3 - 4 月。
- ㉖ 有关这个过程的深入讨论,参见帕屈克·卡米勒:“西班牙共产主义的阴影”,《新左派评论》总第 147 期,1984 年 9 - 10 月。
- ㉗ 参见 J. F. 泰斯诺斯:“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连续变化”,《制度》1985 年 11 月,第 24 页,文中摘引了大会记录。但从 1976 年到 1979 年的数据不是非常可靠。
- ㉘ M. 费尔南德兹-布拉索:《阿尔方索·格拉访谈录》,巴塞罗那 1983 年版,第 196 页。
- ㉙ 参见 1986 年 1 月 20 日《金融时代》的各部门调查。
- ㉚ 参见 1985 年 5 月 10 日 ABC 的广播。
- ㉛ 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参见安格尔·巴那斯:“西班牙安全政策的一致性”,《列维坦》1984 年 8 月第 17 期,第 13 页。
- ㉜ 参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 1981 年出版的宣传手册。这里长篇引言摘自 1985 年 12 月 8 日 ABC 广播。
- ㉝ 参见 1993 年 6 月 14 日《国家报》。
- ㉞ 参见保罗·海伍德:“新民主政体的管理:西班牙首相的权力”,《西欧

政治》1991年4月。

- ⑭ 参见《国家报》1992年10月28日的特别增刊。
- ⑮ 关于这部分和以下的其他数据资料,见索尔代德·卡列格-迪亚兹、安德鲁·米塞和胡阿昆·普列多编辑的综合调查报告《十年的大致轮廓》。
- ⑯ 参见格拉在他和胡塞·菲利克斯·特萨诺斯合编的《转变的十年》(马德里1992年版)一书所作的前言,它事实上再现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全部官方的成就,第16-17页。
- ⑰ 试比较弗兰西斯科·费尔南德兹·马鲁甘“经济改革的冲动”一文中的列表,《转变的十年》,第177页,第185-188页。
- ⑱ 《十年的大致轮廓》,第22页。
- ⑲ 资料来源:1989年数据出自凯思·G. 萨尔蒙《现代西班牙经济》,伦敦1991年版,第18页,1991年和1992年数据出自1993年4月2日《金融时代》。
- ⑳ 1991年工业产量下降了0.9%,1992年下降了1.0%,1993年仍呈下降趋势。
- ㉑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成员从1982年的11.7万人上升到1991年的30.9万人,参见胡塞·菲利克斯·特萨诺斯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社会政策”,《转变的十年》,第46页。



译者附记

《西方左派图绘》是沃索出版社出版的“图绘”丛书中的一本(其他三本分别是《民族主义图绘》、《意识形态图绘》和《妇女运动图绘》)。该丛书所选篇目都曾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过,其目的“在于阐明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一些关键性主题”。虽然这4本书的主编各不相同,但在我们看来,它们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一个人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理论态度和理论立场。这个人就是《西方左派图绘》的主编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领导着《新左派评论》杂志的佩里·安德森。

佩里·安德森的生平多少有些传奇色彩。他1938年生于英国伦敦,但他的母亲却是在中国的上海孕育他的。他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婴儿期,直至1941年日本人占领租界。安德森的早期学校教育是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完成的,接着他在动荡不安的1956年(苏联武装镇压匈牙利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进入牛津大学,在汤普逊、霍布斯鲍姆、希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下完成了大学教育。安德森于1961年开始介入前一年刚成立的《新左派评论》杂志的工作,并在1962年成为它的主要编辑。他为杂志制定的新的方针是:“把它建成一份具有严肃性、能够出版一些深入探讨了某些问题研究的杂志”,“杂志应是激进的和学术的,但同时它应当面对一般知识群众”。正是在他的领导下,40年来,《新左派评论》成了

欧美最重要的左派理论刊物,并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欧美左派理论争论的主题和方向。

作为一份左派杂志,《新左派评论》自然有其倾向性,这不仅表现在它的激进的政治倾向上,而且表现在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倾向上,后者毫无疑问是由安德森着意塑造和引导出来的。安德森秉承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传统,肯定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坚决反对经济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人们依赖什么生活,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们怎样生活,这样,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就必须和生产方式一样得到人们的重视。所以,回顾《新左派评论》40年来的政治问题研究,我们总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两点方法论特征:在生产方式的结构变迁中发掘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的深层原因,并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西方左派图绘》所选的8个个案研究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上述方法论特征。

在作为一个总体的西欧左派政党的黄金时代已经显而易见地终结的1994年,安德森为什么会编辑这样一个论文集来图绘西欧左派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呢?答案只有一个,即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效应迫使像他这样的新左派检讨以往的乐观主义,“更新”自己对现实历史发展趋势的看法。话还要从头说起。众所周知,20世纪初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深刻地改变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并由此改变了它的阶级结构、政党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不管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和以青年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和政治对立,但有一点无疑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坚信社会主义即将实现,差别在于怎样理解这个社会主义以及实现的途径

是什么。西欧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在二战后的一系列政治表现历史地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凸现为真正激进的左派立场,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新的结构变形又已经悄然开始,这也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非常显著地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白领工人的出现和传统的蓝领工人阶级的比重的相对下降,大量中间阶层的涌现。从这些新的中间阶层中诞生了一批新的激进分子,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与传统的无产阶级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他们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进行政治认同的同时却又不能接受它们的政治路线和理论立场,从而保持了巨大的异质性。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新左派。1968年的学生风暴和工人风潮历史地将新左派推到了西欧政治舞台的前台,从而使事实上已经终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68传统得以再生。但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财产的时候,新左派显然并没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思考真的可以为后工业时代的西欧左派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吗?在我们看来,无论新左派所属意的妇女运动、生态运动怎样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视界,但它们都在本质上延续了后看阶级意识革命的主观主义的乐观情绪。然而现实历史的发展是无情的。在经历了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危机后,资本主义在资本的全球扩张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自己的惟一统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左派政党政治和新左派的68传统一起消耗殆尽了。左派,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左派将何去何从?1994年的《西方左派图绘》显然并没有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它通过对西欧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左派政治的长时段描述和微观分析,实证地得出了如下几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根本上侵蚀了传统左派政

治的社会基础；由于左派对正在进入的后工业社会缺乏清醒而务实的认识，因循守旧，从而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已经没落的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死灰复燃，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意识形态霸权；左派对全球化浪潮中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同样缺乏真实的理解，因此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一败再败，最终丧失自己曾经拥有的领导地位；生态运动和妇女运动不可能成为社会解放的道路，相反，它们只有在社会解放之后才可能获得真实的解决。这样我们也就发现“图绘”丛书的内在逻辑构思：《西方左派图绘》是“的”，《民族主义图绘》、《意识形态图绘》和《妇女运动图绘》是“矢”，它们都是用以深化人们对前者的理解的。

《西方左派图绘》出版前后，英国工党就在布莱尔的带领下重新上台执政，资本主义在“第三条道路”的面目下全面复辟，紧接着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仿效。对新左派而言，这一事件要比苏联、东欧的解体更具杀伤性：左派政治的确复兴了，但它却是以向资本主义的倒退来实现的。因此，在《新左派评论》2000年第1期题为“更新”的主旨论文中，安德森不无悲伤地说：世界图景如今完全改变了，新左派必须放弃幻想，现实地面对历史，为此，杂志必须进行改版。安德森的转变遭到正统左派的猛烈批判，他们认为《新左派评论》的改版表明：安德森已经掉入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潭，以杂志为中心的新左派已经放弃了批判的传统和责任，“自杀”了。在我们看来，正统左派的立场固然可嘉，但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因为他们一贯坚定的立场并没有能够哪怕一丁点地改善他们不断萎缩的影响力，与他们的抱残守缺相比，安德森的现实主义立场倒是更可取。那么，安德森是否也像布莱尔和施罗德一样向右转了呢？现在就对这个问题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决不会像吉登斯那样赤裸裸地拥抱新自由主义，因为在2001年4月

的访谈中,他明确地指出:虽然左派政治已经结束,但左派思想依旧是我们面对现实时不可或卸的理论遗产。

本书由张亮和吴勇立合作翻译完成。吴勇立翻译了第3-8章。张亮翻译了导论和第1、2章,并对所有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校。本书的翻译还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张世华教授、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严爱华女士、崔培玲小姐、蓝鹏小姐的帮助,他们帮助翻译了书中出现的一些意大利语、法语、瑞典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并就一些历史和国情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咨询。

张 亮

2001年9月19日于南京大学